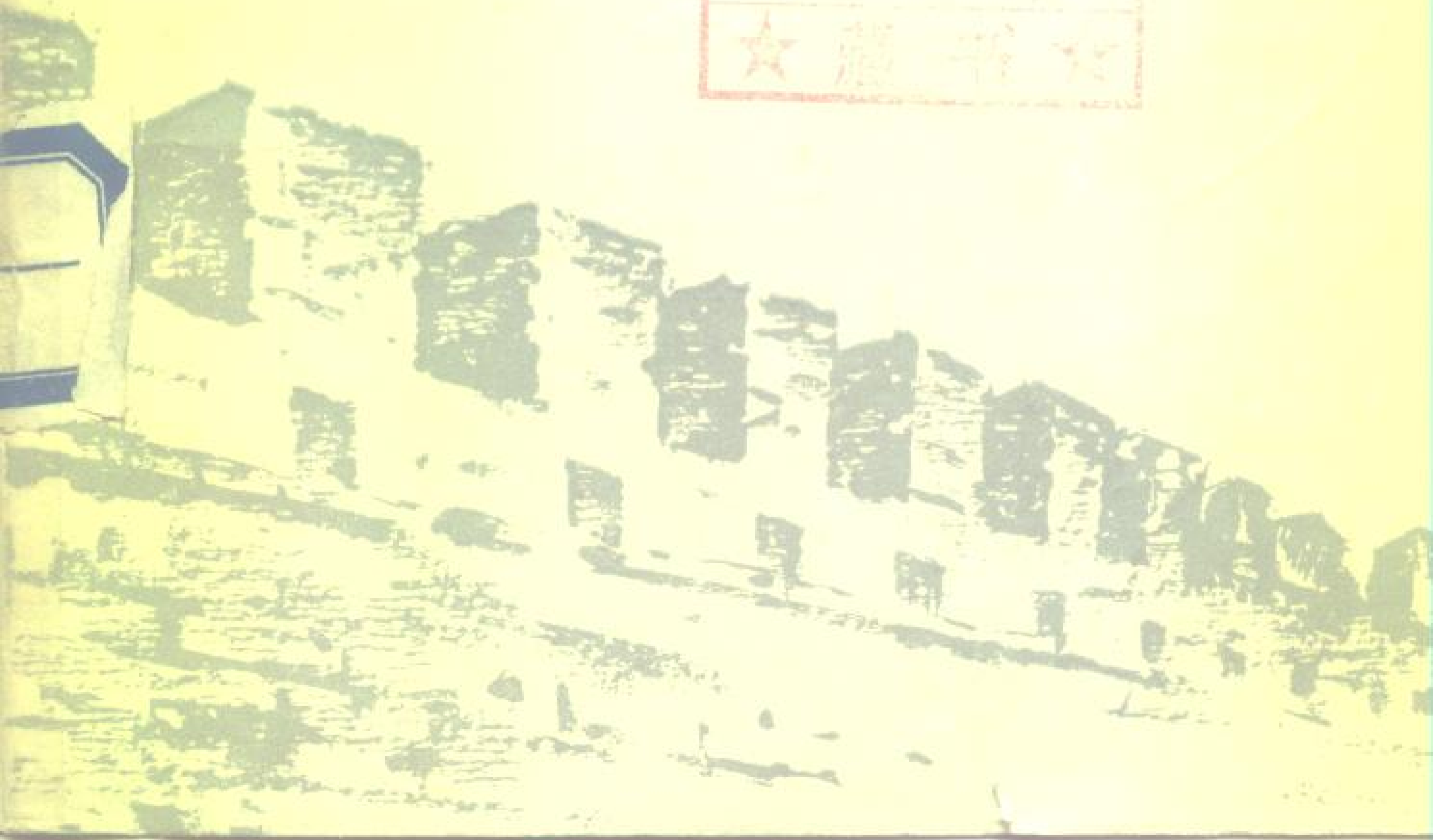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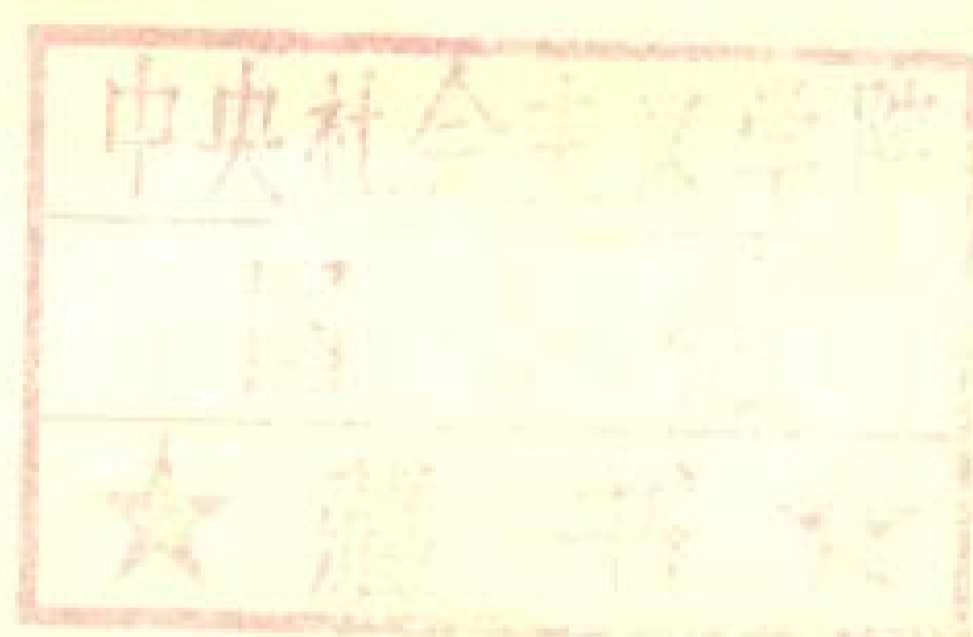


〔苏〕C·A·达林

中国回忆录

1921—1927



K26
29

55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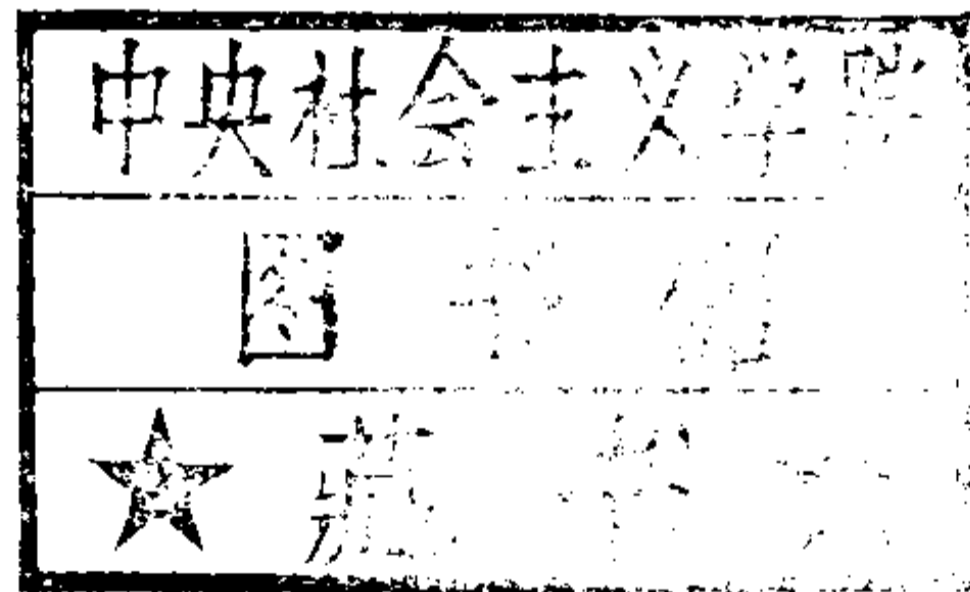
中国回忆录

1921—1927

〔苏〕 C. A. 达林

侯均初、潘 荣、张亦工、
梁澄宇、刘敬忠 译

李 玉 贞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回忆录

1921—1927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 3/4 印张 241千字

1981年 3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9,501—22,000册

统一书号：11190·065 定价：1.00元

内部发行

273604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А. ДАЛИН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5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译出)

侯均初译第一章至第六章、第三十二章；

潘 荣译第七章至第十二章；

张亦工译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一章；

梁澄宇译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六章；

刘敬忠译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一章。

译 者 的 话

《中国回忆录》是C·A·达林1922年—1927年在中国活动的自述。

C·A·达林生于1902年。1921年起，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之一，后来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工作。1921—1927年间，达林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和远东青年代表大会。曾于1922年、1924年、1926年三次来中国工作，会晤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2年他曾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过谈判。大革命失败前夕，又随同广州国民政府北迁，经南昌而至武汉。达林参加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重要活动。本回忆录记述了他在这些活动中的见闻，并反映了达林对当时中国革命中的一些事件和某些领袖人物的看法。书中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但有的观点是错误的。

另外，书中有些史实是否可靠，尚待进一步研究，如达林在第十三章中称，他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一记载迄今尚未见于中文书刊及当事人回忆录，德文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也未反映这一事实。

达林每次离华归国后，都将在华情况撰写成文，公诸于书报。所以本书素材早在二十年代就散见于苏联的报章杂志及小

册子之中。例如，达林曾将其第一次来华的活动情况撰写成文，发表在1923年的《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杂志上。1925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Молодёжь в китайск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记述了达林第二次来华的活动情况。1926年又有达林的《在中国革命的行列中》（《В рядах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一书问世。1927年底达林离华归国后，其《中国革命随笔》（《Очерк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出版。

1974年达林将过去发表过的文章及小册子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写成《中国回忆录》。

原书照片（二十六幅）大部分是作者在中国时拍摄的。我们选用了其中的八幅。

原书有作者序言和结束语，由于没有什么史料价值，我们的译本将其删略了。为了方便现代史研究工作者，我们在书末附了《达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著作目录》。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黎澍、李新同志的五名研究生的翻译习作。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共同译完了这部书。谨在出版之际向他们热烈祝贺，并希望他们不断做出新的成绩。

本书译校存在的缺点，望读者指正。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刘明逵、时光、人民大学杨云若同志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史实方面的疑难问题，在此，特致衷心谢意。

李玉贞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目 录

上卷

- 一、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1)
- 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4)
- 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23)
- 四、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34)
- 五、赴上海之路……………(48)
- 六、战斗的洗礼……………(57)
- 七、北京。广州之行……………(64)
- 八、广州。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79)
- 九、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
次代表大会……………(86)
- 十、与孙中山最初的几次谈话……………(99)
- 十一、北伐……………(109)
- 十二、陈炯明叛乱……………(119)
- 十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和青年共产国际
第三次代表大会……………(128)
- 十四、1923年……………(138)
- 十五、哀痛的日子……………(144)
- 十六、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全会与毛泽东
的意见分歧……………(148)

下卷

十七、再去中国之前·····	(159)
十八、重到上海·····	(167)
十九、北伐时期的广州·····	(177)
二十、工会·····	(189)
二十一、广州的商人·····	(198)
二十二、北伐·····	(207)
二十三、广东的农村·····	(213)
二十四、南康·····	(224)
二十五、历史的回顾·····	(234)
二十六、赣州。乘舢板去南昌·····	(245)
二十七、在蒋介石的大本营里。牯岭会议·····	(260)
二十八、武汉·····	(274)
二十九、武汉的无产阶级·····	(286)
三十、革命中的农民·····	(292)
三十一、革命危机·····	(299)
三十二、过去和现在·····	(310)
俄汉人名对照表·····	(318)
达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著作目录·····	(328)

一、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我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大约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利用会前的短暂时间，我预先了解了今后工作的内容，处理了一些组织问题和个人问题。

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当时尚在柏林。在莫斯科搞国际青年运动的是沙茨金。

1919年我在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间，就很了解他。他是莫斯科共青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1918年10月召开的全俄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领导工作。1919年底在柏林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沙茨金通知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成员应该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也应该前去参加。还要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随即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我应当结识远东各国的代表，并和他们建立联系。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在莫斯科开幕。根据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议，大会通过决议给远东书记处成员以发言权。

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列大厅^①举行。革命前，历

^① 三十年代安德列大厅全部改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在此举行。

代俄皇的宝座设在这里。十月革命后，宝座搬走了，大厅前半部安了一个有阶梯的木台，四面蒙着红布。木台上是主席团用的长桌。从大厅右面看去，讲台设在靠近窗口处。木台左边的圆柱后面是一扇镀金雕花的高门，可通沙皇的客厅和寝宫，现已成为各委员会的会议室了。雕柱画栏、覆以厚丝帐幔的大床仍在各寝宫里保持如故。会议休息时，代表们沿着宫廷的通廊散步或交换意见。讲台旁安着拍电影用的弧光灯，画家们携带画架在大厅里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位是勃罗茨基。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一个特殊位置。大会召开之际，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全世界阶级力量总的对比，特别是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各共产党的策略、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都应作出相应的转变。

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即1917—1921年间，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党不止一次地进行了急剧的转折。四年的时间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几年却成为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整整一个时代。列宁的天才恰恰在于，他能够不失时机地正确地把握住时局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确定其本质并很快地改变策略。十月革命期间的土地纲领就是一例。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纲领，而实行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保证了农民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让社会革命党人毫无办法。布列斯特和约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党在列宁领导下签订了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称之为“耻辱的和约”的布列斯特和约，那时指望德国革命把这个条约变成一纸空文，实际情况确是这样的。1918年布哈林曾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并反对过布列斯特和约，而这时，在1921年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他回忆起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的斗争时，自己承认是“蠢人”。

1921年，内战已基本结束时，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实现了新的急剧转折。这个转折在1921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所作的报告中已做了说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直接继承了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精神。

我听取了列宁在克里姆林宫这同一间大厅里所作的两个报告。实际上，两个报告讲的是一个问题：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实行新策略的必要性。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这届党的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国内战争完全胜利的情况下首次召开的。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①的确，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人左右。这两个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列宁在这次大会上回顾已走过的道路时说：“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和俄国所有的产粮区都隔绝了。我们的情况非常糟糕，而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竟能够忍受这样深重的苦难和贫困，除了毫不倦怠地争取胜利外，一无所求，这几乎是一个奇迹。”^②但是，欧洲资产阶级的情况也极为不妙：就在欧洲的腹地——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工人们在一时期内夺取了政权，并宣告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英国工人也积极行动，提出“不许干涉俄国”的要求。1920年9月，意大利无产者占领了共有五十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页。——译者

② 同上，第474页。——译者

万人的六百个工厂。同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自发地爆发了大罢工。1921年3月，德国发生了工人武装起义。因此，资本主义的后方十分动荡。这种形势是我们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1921年，苏俄今后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出来了。国家处于困境之中。在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以后，经济遭到破坏，没有燃料、原料、机器和机车，再加上歉收，饥荒、伤寒病猖獗，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霍乱。

在这种情况下，喀朗施塔德开始了以“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为口号的叛乱。在此之前，反动派提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这时反动派改变了策略，它企图利用的是农民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和工人的疲惫厌战，因他们已屡经战乱，饱经沧桑。因此，我们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仅面临着经济崩溃，而且还面临着与工人阶级和农民关系方面的危机。

在1921年春天以前，列宁的战略出发点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帮助俄国的无产阶级，然后，在取得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苏俄将恢复遭到破坏的经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当我们开始国际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许多客观情况造成的。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

可。”^①

在国内战争的年代，别人是这样教育我们，我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复杂得多。资产阶级镇压了斯巴达克团的起义，并杀害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扼杀了巴伐利亚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意大利，右派社会党人和中派分子使参加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在1920年9月，该党没能领导工人以革命的手段占领工厂。1920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大罢工时，共产党措手不及。最后，在1921年3月，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的震荡之后恢复了元气，回过头来向工人阶级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则意味着劳动人民的反抗日益增长。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了共产国际的成长和成就，同时又说道：“这表明国际革命在怎样地增长，同时欧洲的经济危机在怎样地深化。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根据这一点就推想到欧洲在短期内会用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子，我相信在这个大厅里不会有这样的人。”^②

但是，新形势的特点是“国际资产阶级不能扼杀我们，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要比我们强一百倍。”^③列宁在说明现有形势的特点时说：“由于国际资产阶级企图扼杀我们的共和国没有成功，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自然，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④列宁将此解释为以法、英、美为一方，以苏俄为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7页。——译者

② 同上，第169页。——译者

③ 同上，第467页。——译者

④ 同上，第466页。——译者

另一方这二者之间在军事较量方面的均势。这种均势是不稳定的，但它却给战争带来一个喘息机会。

历史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单枪匹马地面对世界帝国主义，我们能不能不进行世界革命，长时期站稳脚根，直到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新阶段来临？当时谁也说不出这段时期持续多久——十年或是更长。但是列宁知道，这个时期将很长，因为他说过那是整整一个“均势时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军事上的均势时期正好持续了二十年，直到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

权衡了赞同和反对的全部意见之后，列宁对时代的主要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在持续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后，苏俄几乎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它能否单枪匹马长期地坚持下去，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生活本身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在赶走了外国干涉者和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后，放弃政权，把它还给资本家和地主，而等待着世界革命的到来，那是十分可怕的。

除了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以外，俄国的辽阔版图、自然财富、人力资源在解决时代的根本问题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十分有把握地谈到俄国站稳脚根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为达此目的，整个共产国际，首先是俄共（布）的策略必须做出新的急剧转折。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展示了一个战略计划，它包括苏俄对内、对外政策，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这是一个统一的战略计划。

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当时包括大量个体小私有者在内）。为此，必须首先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给农民一定的贸易自由；建立起社会主义工

业同农业的经济联系，以代替国内战争时期同农民的军事联盟；发展农业以保证工人有粮食，工业有原料；发展工业，以保证向农业提供机器。

为了恢复工业，还必须吸收外国资本，把企业租让给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完成了这一转变，它以新经济政策为名而载入史册。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贸易自由时直率申明：“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公开说出这一点，并且着重指出这一点。”^①因为小农在集市贸易中一方面不断产生富农和资本家，另一方面也不断产生雇农和工人。因此，列宁强调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并不表现为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

经济政策上的这种转折，乃是在资本主义面前的某种退却。我们并不怀疑列宁策略的正确性，但应该说，这种退却引起了青年们的懊恼，更何况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这种情绪谈论得很多。

但不应忘记，列宁写的不仅是退却问题，他还展示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前途，他经常说到全国电气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计划。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到了苏维埃政权将建成第一座拥有一万二千瓩马力的水电站。列宁写道：“一万二千瓩是一个很小的开始。熟知美国、德国和瑞典的电气化的外国人也许会笑我们。但是，会笑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7页。——译者

的人是最后笑的。”^①这话多么有预见性啊！

列宁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绝不意味着不实行土地和工业国有化政策。至于对外国资本的租让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就是向资本主义缴纳贡税。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充分地准备革命的时候。”^②

因此，当时列宁的战略目的就是赢得时间。为什么呢？为了建立大工业，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为了坚持到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国际革命运动的命运取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实力和巩固。

新的国际形势也要求西方共产党在策略上有所转变。不能指望工人阶级很快能够恢复自己的力量并转入进攻。现在面临的是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防御战。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在于，在列宁的领导下制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新策略。这一策略就是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这里谈的是克服工人阶级分裂的困难任务、工会的日常工作、经济斗争、共产党人参加竞选运动、利用议会讲坛，在与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不可调和斗争的同时，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代表大会的会议快要结束时，列宁做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在此以前，代表们曾就会上所做的各个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的攻击来自“左边”。列宁的报告考虑到这个情况。根据列宁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现存的情况下，“左派”们把赌注押在起义上，会导致工人的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80页。——译者

② 同上，第478—479页。——译者

失败，延缓世界革命的到来。但是“左派”们继续进攻，指责列宁和俄共(布)中央是机会主义，是向右转等等。那些“左派”集团的代表们在大会上发难，他们自称“左派”，想以此来强调自己的概念之“真正无产阶级”的性质。俄共(布)党内的所谓工人反对派，或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就是这样的例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甚至在名称上都要故意与站在共产国际立场上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划清界限。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柯伦泰作为俄共(布)党内的“工人反对派”代表，批评了新经济政策。用她的话来说，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重振、复兴的可能性。”柯伦泰当时说，如果世界革命推迟，那末对农民所做的让步，“必将使人们承认我们的政策所依据的那些共产主义原则违背了我们的愿望，这些原则是站不住脚的”。^①后来她承认“工人反对派”的立场是错误的。

托洛茨基没有公开反对新经济政策，但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与列宁就均势时期的持续时间以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估计发生过分歧。如果说，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新阶段到来之前的时间将是很长的，那么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则宣称，他认为如果在1919年，这是几个月内的问题，而现在，也不过就是几年之内的问题。过了三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弹老调说，无产阶级在俄国可以夺得政权，但要巩固政权只能是在世界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德国“左派”代表赫姆佩尔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要求共产国际“取消议会主义、工会和妥协政策”。他“认为”应立即进

^①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368页。

行世界革命以代替租让制以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好象是把赫姆佩尔在大厅里发言时的场面做了照相传真。他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应是让俄国得到无产阶级用纯粹革命的手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手段所给予的支持。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假如按第三国际的策略办，这一切都办不到。我们需要更沉着的方针。这是一个难题（笑声）。同志们会发笑。列宁同志也在笑。那有什么呢，笑就笑吧，但我们是深信不疑的。”^①

大厅里的笑声不仅说明代表大会对“左派”反对派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对俄共（布）策略的赞同。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代表们友好的掌声中谢绝了致闭幕辞。

列宁的工作很繁重，他既要在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工作，又要到工人集会上去演说。他关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进展，并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他不可能经常参加会议，但在需要的时候，在他认为必须参加辩论时，他就会意外地出现在大厅里。

我记得会议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进行的热烈的讨论。讨论的是意大利问题。

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加入了共产国际，但并未清除右派分子、改良主义分子。在意大利，与社会主义党并存的还有共产党，它那时坚持的是左倾观点。自然，两党合并的问题便提了出来，但社会主义党内部的右派却加以阻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不久，意大利社会主义党的右翼单独举行了会议。虽然右派实际上已同社会党人分裂了，在社会主义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中派分子并不愿与他们断绝

^①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377页。

关系，也不愿把右派开除出党。

6月28日晚间的会议是意大利问题讨论的顶点。

发言人是当时已参加共产党的著名的荷兰社会党人罗兰—霍尔斯特。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她支持德国“左派”并指责列宁，认为俄共(布)似乎采取了偏右的方针。

罗兰—霍尔斯特的发言快要结束时，大厅里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并非对她而发，人们是在欢迎此刻出现在大厅里的列宁。在罗兰—霍尔斯特之后发言的是拉查理。当时在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内他持中派立场。

这是一个广为人们熟悉的场面：列宁坐在台阶上，膝盖上放着硬纸夹，上面铺着白纸，他在纸上记着什么。列宁就这样坐在离讲台稍远一点的主席台的台阶上，专心地听取拉查理的发言并作笔记。

拉查理选择了独特的方式为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辩护。原则上他并不反对开除他们，但他仍然说，“我们必须有选择适当时机的权力和责任来做出这种决议”。他所遵循的公式是“一个党对共产国际既不完全服从，也不绝对独立”。^①

列宁在拉查理之后发言。他讲的是法语，然后自己把发言译成德语。我的法文不好，但懂德文。列宁毫不妥协地驳斥了拉查理和塞拉蒂的中派观点。他要求坚决、彻底地与改良主义者决裂。“凡是参加列德日奥—爱米利亚代表会议的人，都应当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是孟什维克——当然不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是意大利的孟什维克。……容忍象屠拉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留在自己队伍里的党，是不能加入共产国际的。”^②

①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66—1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0—451页。——译者

塞拉蒂和他的党说什么俄国人只有一个希望，即让别人模仿他，列宁批评了这种传言以后，驳斥了这一指责，并在他亲自译成德文的讲演中声明：“Das ist doch eine Dummheit。”他两次重复了“Dummheit”（蠢事）这个词^①。从那时起已过了五十多年，但伊里奇的讲话，他那不太清楚的卷舌音和他用特殊的语调和手势所强调的这个词却一直回响在我的耳际。

代表大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纲领。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要融合在工人统一战线中。采取一致行动反对进攻中的资产阶级，并不意味着与改良主义者、“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在思想和组织上的一致。这是我在仔细地思考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观点以后得出的结论。第二年我在中国解决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时，这个结论使我得益非浅。

统一战线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意义，因为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时，就强调了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列宁当时说：“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②

我仔细考虑了列宁的这些话，这些话为我阐明了我的新工作的意义和被压迫人民为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斗争的作用。列宁的讲话把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统一战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都联系

① 在列宁讲话的俄文稿里，此处记述如下：“我们从来没有希望塞拉蒂在意大利模仿俄国的革命。这是愚蠢的。我们的智慧和灵活性足以使我们避免做这种蠢事。”（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4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9页。——译者

在一起了。

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已谈到要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现在——1921年，当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工人统一战线决议之后，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内部的策略，即作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列宁主义原理的具体表现等问题自然就提出来了。

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青年共产国际建立于1919年11月在柏林召开的欧洲十四国革命青年组织代表大会上。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中有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代表拉扎里·沙茨金。他在出发去柏林之前同列宁有一次长谈。

柏林的代表大会是秘密进行的，苏联共青团十七岁的代表克服了许多障碍才到达柏林。从柏林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也还有不少困难。沙茨金在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干涉者最艰苦的年头出行，并秘密穿过了几国边境，这是真正的勋绩，所以我们视之为英雄。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在柏林。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柏林与莫斯科的联系十分困难。虽然沙茨金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不能去参加会议。只是从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苏联共青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青年组织之间才建立了经常的联系。

1921年7月9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现小歌剧院）隆重开幕。莫斯科市共青团组织的积极分子挤满了大厅。当晚，剧院大厅里人们情绪高昂，团结友好、热情洋溢的气氛，非笔墨所能表达。

来自几十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青团的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一起坐在台上。莫斯科的共青团员们初次看到外国朋友，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欢快的神情，他们的掌声传达了深厚的情谊。

因为与会代表是方兴未艾的世界革命力量的生动化身。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给青年共产国际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必须彻底改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青年组织，破除旧的工作传统并掌握新原则。这种转变不可能不碰到阻力和有时是相当尖锐的分歧意见，然而还是顺利完成了。

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占首要地位的是共青团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苏俄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共青团一直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执行党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共青团从来没有过任何争论和分歧。

在西欧却是另一种情况。革命青年组织在这里的出现本身就表示了对社会民主党背叛行为的抗议，那些社会民主党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支持“本国”政府。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支持过凯撒政府，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过帝国主义政府等等。这就引起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反对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许多左派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都反对这一政策。在这些组织中，威廉·明岑贝尔格领导的瑞士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起过主导作用。1915年4月在瑞士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大会就是这个组织倡议召开的。俄国的两名代表伊涅萨·阿尔曼德和格奥尔基·萨法罗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多数代表持中间立场。俄国代表团提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遭到了十四票对四票的否决。

十月革命后，西方的许多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进一步左转。他们不仅加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内右派的斗争，而且加强了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在一些还没有共产党的国家里，左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变成了独立的组织。所以谈不上让这些青年组织在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工作。在许多国家里，左派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接参与缔建共产党。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团仍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独立的传统，尤其象意大利这样的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最初还同本国的改良主义者一道加入过共产国际。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就把反对参加共产国际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当做自己的根本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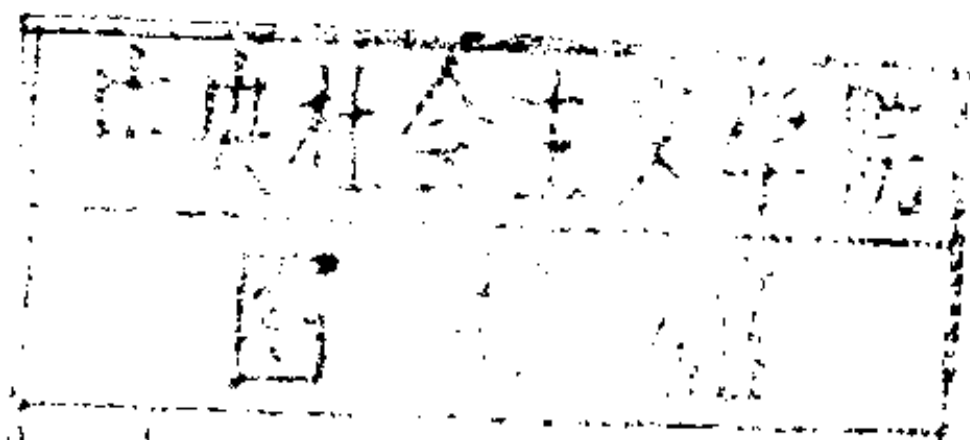
可见在那些年代，共青团实质上已经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不仅如此，某些青年组织还把自己看成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先锋队，是最左的政治势力。

在俄国，最革命的组织是布尔什维克党，因此谁也不会提出共青团在政治上不依赖共产党的问题。

明岑贝尔格在柏林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身分体现了共青团与其西方的先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左派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间的继承关系。但是，独立的传统与这种继承性同时保留下来了。这在共产国际建立以后就已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非但如此，对于革命运动来说，它已变成了一种阻力。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中的这些倾向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了批判。

就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作报告的是沙茨金。他的报告提出两方面根据：第一，根据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建立共产党的事实，这些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并承认其执委会的领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青年组织的作用就改变了。第二，在新形势下要求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严格集中。因此，共青团在政治上必须服从共产党，各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

许多代表反对沙茨金的观点。例如奥地利代表盖克斯曼就



反对共青团在政治上服从共产党。瑞士代表阿尔诺利德建议用“协调青年团和共产党的行动”代替“服从”一词。匈牙利代表列凯则把服从于党解释成青年团根本放弃政治活动等等。多数代表不支持这些发言，而沙茨金的报告提纲得到大会绝对多数票的赞同。谁也没投反对票，但是有相当多的弃权者。

在讨论当前的议事日程时，共青团在政治上的独立倾向又在工人青年的经济斗争问题上，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岑贝尔格针对这个问题作了报告，争论的题目是共青团与工会的关系问题。

过去，一个特殊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和德国共产党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积极进行活动。现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个德国工人青年团的特殊组织，在本国共产党发言之后，表示反对共青团参加工会工作，把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同参加工会的工人群众混为一谈。无论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否定态度都未得到支持。

但是，一种针锋相对的观念，一种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否定的观念也已经暴露出来了。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必须建立一种特殊的青年工会组织，进行只关系到青年工人利益的独立罢工。奥地利代表盖克斯曼以副报告人的身分发言，并维护这种观点。在此以前他一直坚持说，共青团在政治上应保持对党的独立性。

对于苏联代表团来说，盖克斯曼在青年工人经济斗争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新鲜，因为早在1920年，杜纳耶夫斯基就在俄国共青团内发表过类似观点。杜纳耶夫斯基的提纲当时即被否决了。应当说，他值得赞扬，因为他不仅抛弃了自己的错误观点，还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盖克斯曼。

后者的观点没有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他的提纲不仅遭到其他国家全体代表的反对，就是在奥地利代表团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统一。

青年团参加工会工作，为全体工人反对资本的共同斗争而吸收青年工人加入这些群众性组织，也是另一项议事日程的一部分：把新近成立的共青团变为劳动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当时俄国共青团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共青团都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列入大会议事日程的要点，有共青团组织的教育工作，农民青年和学生的工作，最后一点是从建立共青团基层组织的地域性原则过渡到按生产部门的原则。

上文已谈到，列宁所指出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本国的解放斗争在世界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建立并巩固革命的青年团，这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然，这个问题也列入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所形成的新历史形势下，列宁认为，殖民地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强调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这一论点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新理论。

列宁的新论点是共产国际在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任务中的出发点。它为我们在远东的实际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并赋予崭新的意义。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6页。——译者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已有许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出席。其中就有中国代表张太雷。他同时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蒙古、波斯、印度和不久前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希瓦、布哈拉、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青年组织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扎比罗夫就东方青年革命运动问题作了报告。他介绍了在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的青年工作经验，并制定出殖民地国家青年工作的若干组织原则。

应该说，当时谁也没有在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青年工作的实际经验。我们知道，在某些东方国家里有着各式各样的——从真正革命的到反动的宗教性质的——青年组织。必须研究对这些组织的态度以及在其中建立共青团支部等问题。

沙茨金关于青年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国家的策略的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这些国家的人民尚处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沙茨金援引日本、中国、朝鲜和蒙古的情况为例。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极为复杂，迥然不同，所以，不可能为所有的东方国家制定统一的策略。

这些国家青年运动的性质也因而各异。沙茨金说：“这便向我们清楚地证明，我们不可能十分准确地预先制定出执行委员会对东方的工作策略。”

很明显，由于东方各国存在着群众性青年组织，其任务便是在这些组织中建立共青团支部。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任何青年组织，那又该怎么办。是先成立一般革命的、还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呢？还是立即着手建立共青团组织呢？沙茨金在谈到殖民地国家时，认为让某些群众团体在青年共产国际中取得发言权是可能的。

现在我要说一说沙茨金的发言，因为他最熟悉这个问题。此外，他的发言表明，1921年，青年共产国际还只是刚开始从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还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和未解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根据各国的不同形势，应该进行实际工作并及时解决各种问题了。

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于1920年8月底在上海成立。紧接上海之后，其他城市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这些团组织几乎全部由学生组成。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里，共产主义者居于领导地位，但仍有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派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不能说这些人已经有了定型^的政治信仰，他们不过是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激进的青年小组。青年学生向往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转折，即从虔信儒家的宗法式思想转到俄国十月革命所宣扬的新思想。这种转变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能够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新生力量的出现，也反映了身受本国剥削者，首先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全民族的复兴。

“到民间去”的独特做法是二十年代中国学生的特点。先进的学生代表举办各种知识讲座，有的人则放弃学业，到工厂当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1921年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总数达一千人。这时召开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出来了。为此，在上海成立了中央执行局。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7月23日闭幕。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柏林迁到莫斯科。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所度过的一个月，对于我来说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以至我后来在中

国时还常常这样想，假如我没有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上过学”，那工作起来就会有許多困难。因为各国都存在着象如何对待非共产主义组织、共青团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工会工作这类问题。

在此之前我只有在苏联青年中进行工作的经验。二月革命的头几天，我被选进了本校的学生代表苏维埃。1917年夏，我参加了奥勒尔市社会主义青年小组。1918年该小组改为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我担任了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参加了工人青年团奥勒尔市团组织“第三国际”。

1919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与俄国共青团合并后，我被任命为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学生部部长。

俄国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被派往奥伦堡，在靠近前线和被红军从白卫军头子杜托夫的军队手里解放的地区做团的组织工作。在奥伦堡，我是省委组织部委员，而后于1920年3月，在奥伦堡省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进共青团奥伦堡省委员会。

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面临的是在哈萨克青年中开展工作的問題。为此，我被派往莫斯科，到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报到。我们的倡议被批准了，很快我被任命为奥伦堡的俄国共青团中央吉尔吉斯执行委员会书记。奥伦堡当时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当时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都。

我代表奥伦堡市共青团组织参加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就象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被“发配”到雅罗斯拉夫尔市去做共青团的工作。

几个月后，在1921年5月，我奉命回莫斯科，前往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处。因为要把我做为青年共产国际远东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调到共产国际去工作，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对于远东，我只有中学地理教科书中教的那一点知识，在中学只学过德文和法文，对于这种工作可以说毫无经验。雅罗斯拉夫斯基听完我的话以后对我说，你一边干，一边就会把一切情况都了解到了，至于在东方青年中工作的经验，“那你是有的，因为你是俄国共青团中央吉尔吉斯执行委员会书记”。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任命书。

在当时，缺乏工作经验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窘迫的。因为那时任何工作都是新的，就连苏维埃国家本身也是新生的。在革命的最初年代，专家并不是从大学里，而是在工作本身的实践中培养出来的。

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关于建立远东书记处的决议。书记处驻在地择定为伊尔库茨克。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过了几天我就前往任所。

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当时即使坐火车也要花费两周左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1921年。
从左至右：布卡蒂、达林、斯列帕克、舒米亚茨卡雅、明斯克、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

右的时间。1921年8月我抵达该处，书记处的成员已最后确定，全体工作人员也已配备齐全。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主持书记处工作。组织问题方面他的副手是明斯克尔，书记处的成员有：维经斯基（吴廷康）、国际妇女书记处代表勒柏辛斯卡雅、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即本书作者、办公厅主任——布卡蒂。

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安德列·契尔沃纳）是远东本地人，1886年生于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他在十二岁时就被父母送到赤塔去做工。很快他就在铁路工厂工作了，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十七岁的舒米亚茨基入了党。1905年革命期间他已经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了。起义遭镇压后，他隐蔽起来，后来流亡到阿根廷。1913年返回俄国，但很快就被捕了。

二月革命以后，舒米亚茨基成为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为该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舒米亚茨基从事地下工作，组织游击运动。粉碎高尔察克以后，他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后来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同时兼任第五军革命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消灭恩琴（翁格尔恩）男爵白卫军反革命叛乱的战役。当时舒米亚茨基三十五岁。他身着军装，穿一件骑兵的长大衣，戴着布琼尼式军帽。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党的战斗工作。虽然我们参加革命运动时也与他的年龄相仿，但和他相比，却还是年轻人。问题不在他比我们大十——十五岁，而是因为他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就曾积极参加了武装起义。虽然如此，舒米亚茨基总是很平等地与我们交谈。同时，我们

总觉得，十月革命的胜利、粉碎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也是他本人的胜利。因为他整个一生已经和革命事业紧密地连在一起了。他总是高昂着头，脸上显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其实他是一个质朴、平易近人的同志。他一心为党、为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利益而奋斗。

明斯克于1891年诞生在基辅的一个工人家庭里。1911年，他二十岁时加入社会革命党。一年后，他因从事秘密活动被捕，并被判处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他在狱中和流放地常常与社会民主党人往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7年3月，明斯克在伊尔库茨克被选进工农代表苏维埃。十月革命以后，他脱离了社会革命党并在1917年12月积极参加镇压伊尔库茨克士官生的反革命叛乱，为此他被社会革命党开除。

1918年，明斯克当选为西伯利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被选进中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年8月，由于白匪逼近伊尔库茨克，他和中西伯利亚人一起先撤到上乌丁斯克，后又撤到赤塔。白匪占领赤塔后，他转入地下。1918年11月辗转到达沃斯托克，在那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1月，他被白匪的反间谍机关逮捕入狱，一直被关押到1920年1月底，才被起义的工人和游击队释放出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红旗报》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后来，被俄共（布）滨海边区委员会派往哈尔滨，到中东铁路职工中开展工作。他作为俄共（布）滨海边区委员会的全权代表，领导哈尔滨的党组织。

1921年，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决定，明斯克被调离哈尔滨，先到赤塔，后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任舒米亚茨基的副手，直到1922年2月。

我在伊尔库茨克时，格里戈里·维经斯基（吴廷康）是二十八岁。晚些时候我和他在莫斯科共事，我们住在特维尔大街卢克斯饭店^①（今高尔基大街上的“中央”饭店）同一条走廊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里。

维经斯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贫困迫使他在初小毕业后就到印刷厂去做排字工，以后当会计。最后，在1913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谋生。1915年他在美国加入社会主义政党。十月革命以后，维经斯基于1918年春回俄国，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里他立即加入了共产党。国内战争使他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他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起义。击溃白匪军以后，他又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反革命暴动发生以后，他被白匪逮捕并流放到萨哈林岛服苦役。推翻白匪政权后，维经斯基于1920年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他有在高尔察克后方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并通晓英语，这便预先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他和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马马耶夫一起被派往中国。在北京萨赫扬诺娃与他们会合了^②，她也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北京大学两个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伊文）的协助下，维经斯基首先在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后来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他们二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创建，向殖民地人民发

① 即Luxe，亦可意译为“豪华”饭店。——译者

② 维经斯基偕库兹涅佐娃与萨赫扬诺娃一起很快就去上海了，马马耶夫留在华北。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同朝鲜侨民中的革命者建立了联系。

出了为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号召，引起了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在中国，这个高潮的标志是1919年汹涌澎湃的“五四”学生运动，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最革命分子从这一运动的左翼分化出来，他们在第二年联合起来建立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于是，在反帝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成熟了。这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和共产国际建立积极而直接的联系，了解它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汇入到世界工人运动的总潮流中去。在这方面，白卫军成了障碍，他们使中国和苏俄的联系中断了好几年。但是，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一被击溃，苏俄与中国边界连接起来，中国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就变为可能的了。

维经斯基有幸成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李大钊和陈独秀周围已团结了一些革命学生小组。维经斯基帮助这些小组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巩固下来，建立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在1921年7—8月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春，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和萨赫扬诺娃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

在勒柏辛斯卡娅到伊尔库茨克以前，库兹涅佐娃致力于妇女运动问题。萨赫扬诺娃是布里亚特族人，她专门研究蒙古问题。

我想说几句关于国际妇女书记处代表勒柏辛斯卡娅的情况。她出生在一个侨居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里，在英国长大。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衣着雅致的妇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都是军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冬

天戴护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毡靴。夏天的打扮是红头巾、军便装、士兵的皮带、长统靴。至于时髦，当时没人谈论，也没有人去想。当年谁也不会从外表上怀疑她不是布尔什维克。无论从外貌、气质和通晓英语的程度上，都难以找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同志到上海去工作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勒柏辛斯卡娅被派往中国，在那里她从事革命妇女运动问题的研究。（十年以后，我和她在国际列宁学校相遇，我们两人同在该校任教，勒柏辛斯卡娅在那里用英语讲授英国工人运动史。）

布卡蒂1890年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的父亲是立陶宛人，1863年因参加起义而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母亲是西伯利亚本地人。1905年布卡蒂在两年制技工学校毕业后，进铁路总厂当工人，直到1912年应征入伍。

早在1905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人的武装起义，为此被捕，并坐了一段时间牢。直到应征入伍前，布卡蒂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7年6月，他在前线入党，并在军队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工作。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他回西伯利亚，到了伊尔库茨克，在高尔察克的后方与白卫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1919年9月被捕，但同年12月就被起义的工人解放出来。

红军占领伊尔库茨克以后，布卡蒂担任东西伯利亚军的政委，后任伊尔库茨克省委副主席。1921年4月他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他与苏赫巴托尔共同担任领导，在蒙古打败了恩琴。1921年10月底，布卡蒂回来以后，就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依靠的是各国支部：日本、朝鲜、中国

和蒙藏支部。这些支部都由本国共产党人主持。通过任何决议，都要有他们直接参加。

各支部中还有苏联工作人员。机关人选配备得当。一部分是革命后从美国回来的俄国侨民；另一部分是长期生活在满洲的人，那里有相当多的俄国人，主要集中在哈尔滨，或多或少地都能讲汉语；第三部分人曾在莫斯科或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研究机关专门学习过地理；第四部分是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已具有在革命前的俄国或在白匪后方做地下工作的经验。

书记处里最大的是朝鲜支部。日俄战争后，朝鲜被占领，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很自然引起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3月爆发了朝鲜人民自发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起义，后被残酷镇压下去。

三月起义以后，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开始了。资产阶级、地主分子聚集在所谓的上海政府周围，革命民主主义者同旅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在俄国，特别是滨海边区有许多朝鲜侨民。

远东书记处的朝鲜支部，在建立和联合朝鲜本土的、旅居中国和俄国的朝鲜共产主义组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记得朝鲜支部的许多工作人员有韩满申^①、谢列勃里亚科夫（金满根）^②和太洪。后者从事青年运动。

1921年5月，朝鲜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举行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在朝鲜、中国和俄国工作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八十五名代表。舒米亚茨基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向大会致辞。

在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工作的，先是张太雷，后来是张国

①② 音译。——译者

焘。张太雷于1921年3月到达伊尔库茨克。几个月后他出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代表大会之后，张太雷回到中国，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工作。张国焘很快来到伊尔库茨克代替他。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局。同时他接到中国共产党的委任书，作为该党代表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

在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工作的还有一些苏联同志：阿勃拉姆松、马马耶夫、克利莫夫、多比索夫、达维多维奇等。

最大的困难是同日本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俄国的国内战争，狂热地觊觎远东。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已把整个满洲抢到手了。在苏联的远东，日本依靠匪首谢苗诺夫的白卫军，支持并组织俄国的反革命势力，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着滨海边区和阿穆尔省，派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最后在蒙古扶植起自己的走狗恩琴男爵。

笼罩着日本的沙文主义狂热、国内反动势力的猖獗、压制日本工人运动、残酷地镇压革命组织都给处在十分严密的地下状态中进行活动的日本共产党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远东书记处到底还是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日本支部的工作由前来伊尔库茨克的田口主持。

1921年2月，反抗恩琴白匪军占领蒙古的运动，是蒙古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早在1921年3月，蒙古人民党就在恰克图举行代表大会，提出了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

由于中国的反动派一直把蒙古看成是自己的领土，并打算派兵前往，人民党就此事向中国人民发出了呼吁。

布里亚特共产党人在蒙古人民党及以后的革命青年联盟的创建中起了很大作用。在远东书记处蒙藏支部工作的有丹契诺

夫、赫萨扬诺娃、科尼亚耶夫、纳佐夫、伊希多尔任、鲍里索夫以及尤金和斯塔尔科夫（扎里克托），他们在粉碎恩琴以后，曾在蒙古工作。

舒米亚茨基曾积极地参加蒙藏支部的工作。在建立自由的蒙古国家的过程中，他给人民党以很大的帮助。后来他被选为蒙古的荣誉公民不是偶然的。

远东书记处出版了铅印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杂志，它经常刊登有关日本、中国、朝鲜、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等国经济方面的文章，以及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及革命运动的资料。书记处情报部工作人员斯列帕克、佩尔林、考夫曼、拉依戈罗茨基专门为这个杂志准备材料。

当我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远东书记处的一名女工作人员，伊尔库茨克女共青团员柳托姆斯卡娅已经在从事青年运动了。现在她正投入远东革命青年组织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远东人民》第一期上，刊登了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向中国、朝鲜和日本青年团发出的呼吁书，吁请参加远东各民族和青年革命组织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热情奋发地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不仅要和日本、朝鲜、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取得联系，而且要同朝鲜、中国的工会，同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所有组织取得联系。这一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日本是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最反动的国家之一。在朝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任何行动都遭到极为严酷的镇压。至于在中国，则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对付革命运动。

日本依靠白匪残部，于1921年5月26日在滨海边区进行反

革命叛乱，推翻了当地远东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日本的傀儡政权——大资产阶级、投机商麦尔库罗夫兄弟的政权。1921年12月29日，白匪占领了哈巴罗夫斯克。

1921年中期，麦尔库罗夫的叛乱切断了滨海地区与远东共和国及苏俄的联系。因为叛乱，代表们无法经海路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只剩一条路，即假道满洲，再前往赤塔和伊尔库茨克。满洲到处是白卫分子、日本部队、警察等等。必须在上海、北京、哈尔滨建立联络点，保证代表们前往苏俄。尽管困难重重，这项工作还是进行得很顺利。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1921年。共青团小组。
从左至右：奥尔洛夫斯卡娅、舒米亚茨基、柳托姆斯卡娅、达林、
拉伊戈罗茨基、多比索夫。①

① 本照片共有七人，原书只列举六人的姓氏，左第一人可能未计在内。——译者

在这件工作中，舒米亚茨基的妻子丽娅·伊萨耶芙娜起了很大作用，她在远东书记处主持国际联络部。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她是很有经验的。舒米亚茨卡娅从1905年起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十六岁时参加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武装起义，曾被捕，但因未成年而获释。以后，在苏维埃政权胜利前的那些年代里，她一直在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和秘密联络点工作，与同高尔察克进行斗争的游击队进行联系。这就是这位善良、出众的女性的革命经历。

虽然困难很多，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结束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负的这个任务也完成了。

四、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

1920年9月，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曾在巴库召开。各国代表约一千九百名出席了大会。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印度、埃及都有代表参加。同时参加大会的还有刚刚从外国干涉者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阿塞拜疆、达格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费尔干、布哈拉、希瓦、巴什基里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喀尔梅克劳动人民的代表。参加大会的有朝鲜人、中国人，但主要是旅俄的侨民。国内战争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还未结束，这是蒙古、布里亚特、中国、朝鲜和日本没有派代表出席巴库大会的实际原因。

因此，1920年底产生了召开一个与巴库大会相类似的特别代表大会的想法，这个大会叫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鉴于太平洋地区所形成的形势，在1921年召开这样一次代表大会就成为特别急迫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的规模已经很大，成了远东各民族最大的威胁。

我们已经说过，日本是盘踞在蒙古的恩琴的后台。现在男爵穿上了蒙古长袍，自称为佛教徒和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并扬言其目的是要占领从布里亚特到主要是喀尔梅克人栖居的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带。

1921年5月，恩琴白匪军入侵苏俄领土，力图窜到西伯利

亚大铁路，以便向上乌丁斯克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指挥恩琴的行动，同时唆使滨海边区和阿穆尔省的白匪积极活动。

红旗军第五军的部队奉调出师镇压恩琴，粉碎了白匪并活捉了男爵本人，把他押解到伊尔库茨克，很快就在挤满人的话剧院大厅里公审。恩琴给人以狂躁的印象，难怪人们称他为“疯男爵”。

日本帝国主义夺取蒙古的企图破产了。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阴谋。恩琴被歼以后，独立的蒙古国家就成立了。

俄国远东出现了复杂局面。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1920年苏俄和日本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国家，即民主的远东共和国，首都是赤塔。这里通行的只有沙皇时代的金币和银币，私人店铺仍在营业。政权都在劳动人民手中。远东共和国的版图从贝加尔湖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远东共和国开始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已恢复了与哈尔滨的铁路联系。以老革命家优林（金托夫特—捷瓦尔托夫斯基）为首的使团已前往中国。他长着浓密的连腮胡，贵族似的相貌，态度谦和。他和别人不同，是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依靠白匪的力量，到1921年底实际上掌握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巴罗夫斯克这带地方。这样，当时日本的统治就扩展到了朝鲜、台湾、整个满洲、蒙古和俄国远东，形成了一个地域广袤的帝国，它威胁着苏俄和中国。这就是1921年的远东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触犯了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实行转折，从孤立主义转而实行对外的经济和政治扩张政策，并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插足太平洋彼岸。九国

华盛顿会议订于1921年11月11日开幕。帝国主义列强希望调节他们在远东的矛盾。日本的算盘是，它在俄国远东及中国占有的土地越多，在谈判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

很明显，在华盛顿会议上，美日互相矛盾的利益必定会发生冲突。美国力图改变力量对比关系使其有利于自己，同时企图博得中国和朝鲜人民对它的同情。实际上是想以一个大国的统治取代另一个大国，或者至少是削弱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而加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

当时，朝鲜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幻想着美国能担负起“解放”远东的“使命”，即希望它把日本人赶出朝鲜、满洲、蒙古，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会议寄以很大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听取日本、朝鲜、中国、蒙古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对抗华盛顿会议。初步决定这次代表大会于11月11日，即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在伊尔库茨克开幕。

1921年10月，代表们就开始陆续到达伊尔库茨克。他们历经艰难，辗转前来。相当大的一部分代表12月初才到达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大会会址迁往莫斯科，这就赋予大会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1921年12月底，一列专车载着全体代表、远东书记处成员及一些工作人员驶向莫斯科。

代表大会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有表决权或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各种政治流派的组织：从共产主义组织到宗教组织，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把所有的组织团结起来了。前来参加大会的还有工会代表。大约有一半的代表，是共产党员或革命青年组织的成员。

大会开幕前，与会者已到齐的时候，大会的名称有了变动。《真理报》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标题下，刊登了有关这次大会的消息，而1922年共产国际出版了题为《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资料汇编。这一名称更符合大会的特点和与会者的成分。

朝鲜代表团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中国。获得独立的蒙古也有两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人民党和革命青年联盟。荷属印度的一名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日本代表参加了大会工作，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日本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已代表本阶级同朝鲜、中国的劳动人民结成了联盟，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工人运动的老战士片山潜参加了日本代表团，也使日本代表团赢得了极大威望。片山潜于1921年12月首次来到莫斯科，这时他已被选进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团。

除了这些代表团以外，亚库特、布里亚特和喀尔梅克劳动人民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22年底，俄国的远东地区还没有完全消除白匪军和日本武装干涉者，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酝酿一个计划，企图把亚库特人、满洲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和喀尔梅克人联合起来，建立“泛蒙古国”。这个日本保护下的“泛蒙古国”，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期间，符拉迪沃斯托克还在日本干涉者手中，而帝国主义的日本威胁着亚库特、布里亚特、喀尔梅克各族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民族的代表参加大会是完全合理的。

1922年1月21日，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片山潜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加里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洛佐夫斯基代表红色工会国际，许勒代表青

年共产国际致了贺辞。

日本、中国、朝鲜和蒙古代表致了贺辞，另有罗易代表印度共产党、卡尔代表美国共产党也致贺辞。因此，大会开幕式开成了亚洲、欧洲和美洲劳动人民展示国际主义团结的大会。

大会的工作会议是在萨多沃—卡列特纳亚大街苏维埃大厦三号的一个大厅（现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大厦）举行的。

大会正式开始时先是形势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华盛顿会议（该会在1922年2月结束）问题。

果然不出所料，华盛顿会议正是在这种标志下进行的：美国、日本的矛盾已尖锐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德国战败，而日本则想趁机攫取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美国大发战争财，从欧洲的负债者变成了债主。

1922年1月底，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华盛顿会议的基本结果已经明朗。对朝鲜和台湾，会上未置一辞。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确认了日本占有这些领土。美帝国主义迫使英国解除了它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并强迫日本把它占有的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还给中国。但是，华盛顿会议却未涉及英、法、葡在中国的殖民地。

美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即取消欧洲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和贸易特权。但是华盛顿会议把归还中国海关和关税收入的问题束之高阁，恰是这笔收入保证了外国向中国提供贷款。由于苏俄的力量已增长，国际帝国主义矛盾的加剧，美国、日本被迫接受会议的决议，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撤军。

美国迫使日本退出远东，但这种情况并未缓和日美之间的矛盾，而只能使之更加尖锐化，从而导致二十年后他们之间的

战争。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谈到了不可避免战争。说实在的，当时都认为这场战争再过五年或八年就要爆发。

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专门决议，强调“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只能和他们结成联盟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

决议不仅提出了与中国、朝鲜资产阶级的幻想完全相反的一个问题，即似乎美国是亚洲的解放者，它还展示出被压迫民族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桎梏后的前途和发展道路。决议中说：“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帝国主义之后，远东各国的劳动群众才能为自身利益，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与先进的无产阶级共和国之间建立经济合作，并保证充分利用科学与技术成就而自由发展。”^①

国际形势报告以后，大会听取了一些代表团关于远东各国形势的内容丰富而饶有兴味的报告。

关于中国形势的主要报告人是张国焘。他讲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土地关系、农民状况，以及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情况。另一个代表邓培谈到了中国的工会、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情况。第三位代表林敦^②介绍了外国资本把持中国工业的情况。

根据大会决定，中国代表又获得一次机会再作两个报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介绍了本党和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情况；最后，女代表黄璧魂讲了中国妇女状况。

在会上，我认识了莫斯科的一家中文报纸的记者瞿秋白。他会讲俄语，故而有可能用原文研究列宁的文章、讲话和苏维埃政

^① 《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75页。

^② 音译。——译者

权的法令。他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后来在中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朝鲜代表作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谈华盛顿会议与朝鲜问题的关系，另一个是关于朝鲜的经济状况。

在大会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蒙古问题。粉碎恩琴、人民党取得胜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这些自然在外国帝国主义阵营中引起了反响。英国和日本于是要求将蒙古“归还”中国，这就意味着镇压民族革命，保存外国势力，使蒙古人停留在游牧部落制的阶段上。

粉碎恩琴白匪之后，日本多次催促北京政府出兵蒙古。中国反动派和掌握着蒙古贸易的商业资产阶级支持把蒙古“归还”给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代表登德布^①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引起了普遍注意。他谈到了日本在恩琴白匪入侵蒙古时所起的作用，蒙古人民党的历史及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登德布宣读了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的声明，其中说，中国革命者反对把蒙古“归还”给中国。这个声明十分满意地被通过了。

登德布在说明当时的蒙古人民党的性质时说：“我们的党不仅不是共产主义的，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她更接近于西方的激进民主党，所以她以使蒙古完全摆脱外国强权者的经济和政治压迫为己任。”^②

蒙古人民革命党现在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她走到这一步，党内并不是没有斗争的。但是登德布对该党的评价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自然，阶级分化在蒙古社会是存在着，

① 音译。——译者

② 《真理报》，1922年1月29日。

然而其阶级结构是前资本主义的。贫民很多，可是几乎没有无产阶级。一半左右的男人是和尚和喇嘛。

以要求“归还”蒙古为目的的中国军事干涉迫使人民党暂时保留了以“活佛”为首的君主政体，并与上层人士、王爷和佛教界结成联盟。只是到1924年，活佛死后，蒙古才宣布为人民共和国。

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各代表团的报告，最后以片山潜关于日本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详细发言做为结束。

日本代表由共产主义小组和所谓工团主义——共产主义者组成。会上工团主义者声明，他们确信自己的观点与共产党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要从组织名称中取消“工团主义”一词，而与共产党合并。

各代表团的报告，相互介绍的各国革命情况，都表明大会代表面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据此作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

报告说，如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确实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共产党人就应支持这一运动。同时还谈到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反对国内反动派，战胜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支柱——封建残余势力。指出了工人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和把远东人口中最基本的群众——农民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的必要性。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成员，工会代表顾^①某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之间发生了一场并非偶然的争论。张秋白

① 音译。——译者

把国民党几乎说成是共产主义政党，声称上海的产业工会似乎完全赞成国民党的纲领。接着发言的顾某坚决驳斥了这一声明，他指出，张所说的工会根本不同意国民党的纲领。后来的事件证明，这场争论背后掩盖着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的国民党所持的否定态度。

大会一致通过了共产党与民族革命组织相互关系问题的决议。

后来代表们应邀到彼得格勒，1922年2月2日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在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大会消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帝国主义所抱的幻想：认为它有解放朝鲜和中国的使命。大会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双重性质，指出吸引农民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大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国际主义态度对待远东各国的民族解放问题。

每逢星期日和各委员会工作的日子，就举行妇女——参加大会的女代表——的会议。该会于1月22日开幕，后来又举行了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妇女代表会议人数很少（因为大会女代表只有七名），但开得卓有成效。妇女代表交换了远东各国妇女所处地位的情况，商讨了未来妇女革命组织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于1922年1月30日开幕，进行了三天。有六十七人参加大会，即几乎占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一半。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占多数，但也有年龄大一些的代表。应看到，当时革命青年团体是作为独立的政治组织进行活动的，有时四十岁以下的人也加入团组织。一些新的青年组织一般都叫“青年团”，以区别于原来的组织。

沙茨金宣布青年代表大会开幕。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贝拉·库恩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贺辞。

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包括以下诸问题：1) 青年共产国际及其对远东青年革命运动的态度；2) 各国代表团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3) 远东青年运动的任务；4) 通过代表大会宣言。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理查·许勒作报告。他详细地叙述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历史，介绍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谈到殖民地国家青年工作的情况。许勒讲的是德语，他的报告首先译成俄文，然后再译成其他文字。虽然经过两次翻译，代表们十分专心并很感兴趣地听取了他的报告。因为当时远东的青年革命组织对于青年共产国际，或是一无所知，或是了解很少，而不久的将来，他们还都要解决与这个国际组织的关系问题。

我们对各地代表的报告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日本、中国、朝鲜和蒙古共青团的创建史。

日本当时还没有单独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参加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的日本代表几乎全体出席了革命青年代表大会。日本共产党正在筹建之中，其代表在出席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同时，还一面研究拟在本国建立的共青团的政治与组织原则。

远东其他国家却是另一种情况。朝鲜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青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得最为广泛。汉城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1919年3月的群众性起义。这次“和平起义”惨遭镇压后，朝鲜出现了各种青年组织，最初主要采取了宗教形式。基督教青年会在城市里很流行，通常它只不过是朝鲜青年革命活动的合法掩饰而已。在农村中进行活动的有“天路”那样的青年宗教组织以及各种教派。这些组织首先都是抗日组织。亲美的基督教青年会所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仅仅是因为这一运动指向

日本。为了对抗基督教青年会，日本殖民主义者在朝鲜成立了亲日的青年佛教会。更加普遍的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体育活动的朝鲜青年的各种合法联合会。至1922年初，朝鲜已有数百个各式各样的青年组织，联合了十五万人。除去其指挥中心在国外的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佛教会外，所有的组织都是当地的。他们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也没有中心领导。

1920年曾打算把各组织联合起来。1920年12月举行了朝鲜青年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朝鲜青年联盟。到1921年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召开时，这个联盟已有二百个组织，五万七千成员。这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

我稍微说一点后来的情况。应该说，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在团结朝鲜青年联盟内部的革命分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莫斯科代表大会两个月之后，即1922年4月，联盟在汉城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革命派退出联盟，建立了自己的联合组织。1923年，各革命联合会举行代表大会，联合了各派七十四个组织，其中甚至包括了宗教青年组织，但是这些组织都坚持反帝斗争和劳动人民国际主义的共同立场。这个新组织中的最革命分子不久便联合成立了共青团^①。

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和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太洪在团结朝鲜革命青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关于他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他的伶俐和反应敏捷有时令人发笑。他很快就学会了俄语，但往往词汇不够用。不过，他从不慌张，把雏鸡叫“母鸡的儿子”。有一次在以木制手工艺品闻名的维亚特卡（基洛夫）市，他看到一个烟盒，就问：“香烟的房子多少钱一个？”

朝鲜的革命青年组织历史很长，团员相当多。中国则与朝

^① 参看达林，〈朝鲜革命运动中的青年〉，莫斯科，1924年版，第94页。

鲜不同，在1919年中国首先建立的是学生会。到1920年，这些学生会中最革命的分子成立了社会主义学生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小组，但在这些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到1922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未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中国各地的学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十七名代表，出席了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蒙古革命青年团建于1921年8月。到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召开时，它已有三百名团员。团组织是在十分复杂的政治条件下工作的。前面我们曾引述了登德布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当时的蒙古人民党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军事干涉的威胁迫使这个党保留了君主政体，并与王公、喇嘛结成联盟，而且这些阶层的代表当时还在党内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蒙古政府终归还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机构，所以仍然得到人民党和革命青年团的支持。不过，在君主制度下，青年团对政府曾持某种反对立场。蒙古革命青年团的一个文件中写道：“尽管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了，但仍然保留下许多旧东西：维护旧秩序的贵族不顾人民死活地压迫人民，照旧按继承法办事，抗拒人民政府。”^① 人民党与青年团之间的关系曾具有冲突的性质。有时是因为青年团在个别问题上，采取了左倾立场而造成的。例如，在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就曾提到：青年团的任务就是在蒙古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另一些时候，冲突是因向贵族和喇嘛们所做的让步而引起的。

大会一致赞同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规定了蒙古革命青年团的任务如下：“因政府捍卫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的最终目标是蒙古摆脱外国压迫，所以青年团应竭尽

^① 参见达林：《蒙古革命运动中的青年》，莫斯科，1924年版，第25页。

全力支持政府；但另一方面，青年团应该注意使广大牧民群众的利益不致被忽视，所以青年团在国家建设中，应该执行民主改革政策。”

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正在筹建中。正象以后所出现的那样，党内存在着反对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后来又反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势力。在那样的情况下，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当时并不同意革命青年团隶属于人民党。同时，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蒙古青年团支持并积极参加贯彻党和政府的一切进步和革命的措施。过了几年，人民革命党清洗了消极分子，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与团之间建立了如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那种关系。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委托我做了青年运动任务的报告。1922年2月5日《真理报》上登载了这次会议的简要报道。从那时起已过了五十年。在此，我不用回忆去记述，而引用当时的一段报道。报道说：

“达林同志作了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报告。他指出，青年运动并不单纯是青年人的运动，而是共同的政治运动。他指出学生组织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朝鲜、蒙古的青年运动也具有同样性质，目标是争取国家的民族解放。这一切都说明，青年运动在远东的革命运动中有着深厚而坚实的根基。在评价个别国家的青年运动时，报告人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至今仍不具群众性。虽然近来开始向接近广大群众方面转变，它却仍狭隘、闭塞，没有力图成为群众运动。但应该具体制定政治纲领。否则就会流于分散、无定型，异己分子就有可能渗入到这些组织中去。比如在中国，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青年就加入了社会主义组织。

“革命运动的政治任务各国迥异。特别重要的是在工人青

年和比城市青年更加落后而愚昧的农民青年中开展工作。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吸引这些阶层的青年最好的、也是最易行的方法。尤有必要在女青年中开展工作，把她们从男女平权组织的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向她们指出，只有在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斗争中，妇女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至于组织形式本身，则必须高度集中，这必将大大有利于解决重大的革命任务。”

大会根据报告所作的决议，强调了把青年革命组织工作转到城乡劳动青年方面去的重要性的必要性，强调了同工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护工人青年的劳动而斗争的重要性的必要性。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在它通过的宣言中声明：“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东西方劳动青年决定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生死与共的联盟。我们承认青年共产国际是我们的领袖。”

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在远东青年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规定了运动的政治和组织任务。大会还建立和巩固了远东各国青年革命组织之间以及他们同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系。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不久，就召开了朝鲜青年同盟全国代表大会（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蒙古革命青年团代表大会（7月）。这些代表大会都根据各国的条件，依据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了各自的决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青年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1922年2月初，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几天，我就动身到中国去了。

五、赴上海之路

1922年2月初，我离开莫斯科动身去中国的时候，高尔察克已被红军击溃，外贝加尔地区的白匪也已肃清，但滨海边区和阿穆尔省还在白匪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手里。我要经过远东共和国的首都赤塔。中国领事馆设在赤塔，我需要在那里取得签证。从赤塔去中国途中，要经过我们的第八十六边防侦察队，再往前去就到中国的满洲里车站了。远东共和国的火车就通到这一站。在这里须换车去哈尔滨，到那里再停下来，取得另一种签证。到中国去的路上并不太平，更何况整个北满到处都有被击溃的高尔察克残部。

行期到了，我登上从赤塔开往满洲里的火车。车里人相当多。虽然远东共和国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只不过刚刚谈判这个问题，但是铁路联系已恢复，实际上各种关系也在调整之中。

我们的火车驶过第八十六侦察队，进入十公里长的中立区。后来铁道开始分叉，这标志着我们驶近了中国的边境车站。

终于到中国了。火车停下来，周围站满了持枪“值勤”的中国士兵。不许下车。最后来了一个英国人，他自我介绍说代表中国海关，后面跟着一个穿中国军装的俄国白卫分子，仔细地打量大家。他负责检查身分证和护照。

后来，在到达哈尔滨之前，又要在靠近车站的一个小镇上停下来。从木屋的建筑风格看来，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俄罗斯

族。马车夫把我带到一个“饭店”，可是已没有空房间了。明知必然要遇到一连串不愉快的盘问和谈话，我也只好接受建议，住到私人住宅去。没有别的出路。

果然，女房东特别好奇。我冒充商人，说是一等商人的儿子，现在到中国去做生意。于是女主人马上建议我买一车厢“三〇精粉”，然后再买几口袋白糖、一批茶叶等等。我明白了，我是在和边境走私犯打交道。我含糊其辞的回答，浅薄的经商知识使女主人警觉起来。她开始怀疑我，最后问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就此结束了谈话。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马上就遇到了麻烦事，而又这样突然地收了场。晚上，主人来到我房间。他已经从老婆的嘴里知道了她和我谈话的全部情况，不过他的态度倒还和气，我也就放心了。他看了我的证件，尽管证件完全合乎规定，但是他却劝我改变国籍，取得另外的证件，原来主人想赚我的钱，——走私犯就是走私犯。他的非法活动要求他与警察局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向我提供了中国当局为来华的白匪发放的证件。他说：

“你付给十五个金卢布就能办到。你到照相馆去拍几张照片来。警察局证件科的科长会到我这儿来，各种手续就都办妥了，你哪里也不用去。”

接受这个建议，就意味着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我对这个人产生了某种信任感，就同意了。第二天晚上，中国警察局证件科科长来到我的住所。他把毛笔、墨盒、浆糊和红印色摊在桌上。我把照片交给他，几分钟以后我就得到了一个中文证件。于是科长、主人和我就皆大欢喜了。

第二天我就坐在中东铁路的国际车厢里了。过去这条铁路属于沙俄，而这时仍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局掌握。我在火车上熬了一昼夜。但终于到了哈尔滨。我走出站房，马上就

感到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宣言确实是符合实际的。

社会革命的语言是激昂热情的。它能激发人们的正义感，也能表达人类尊严遭到践踏时的愤慨。宣言中写道：“靠别人的血汗养得大腹便便的外国资产者坐着车在这里东游西逛，车上套的不是马，而是人，资产者脚踢棍打地驱赶车夫。”我在哈尔滨第一次看到了人力车夫，以后在上海和广州多次有机会证实宣言的正确性。我几乎是泪水盈眶地看着这些瘦削的中国人，他们手里紧紧地握着车把，拉着座位狭窄的高双轮车，车里坐的是一个肥胖笨重的中国人，东西放在膝盖上。我坐的是马车，但人力车夫很长时间都没有落在马车的后面。

我在上海的时候，正值外国人审判中国人的上海租界法庭上，审理一个人力车夫案件。这位车夫拉着一个“欧洲文明的代表”走了四十分钟左右。外国人下车时，给了他五个铜钱^①。车夫拒绝接收这少得可怜的车钱，为此挨了一顿棍子。而且车夫还被警察局拘留了。车夫出法院时，还感到高兴，因为他至少没有因“对洋人无礼”而被判近三个月的徒刑。

中国的城市里有数以千计的人力车夫，在外国租界里尤其多。在那里他们不让任何人步行。车夫跟着你，一再央告你坐上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车主的车。车主收取“马”的绝大部分工资作为车租。车夫们从清早拉客一直到深夜。只是在吃饭时，才在大街上摆的饭摊旁稍事休息。车夫们在没有行人雇车的时候，就在洋车里睡觉。这些穷苦的人寿命都很短促，因为他们的心脏由于高速奔跑很快就衰弱下去。那时车主就会把他们象榨干的柠檬一样，一脚踢开。

^① 当时中国还有外国银币流通。所谓银元相当于中国钱一元或半美元。一银元值一百个制钱。

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常常可以见到这种情景：一辆有两只笨重木轮的平板车，上面装着各种什物、箱子、金属材料等等。十来个苦力代替马，用绳子拉平板车。绳子勒着工人们裸露的身体，他们青筋暴起，齐心合力按节拍唱出悲沉的“哎一哎嗨一哎嗨”的劳动号子，伴着这种牛马般的生活。在南方，在广州，甚至有妇女拉板车，她们还往往背着吃奶的孩子。

记得有一次看到板车运一个大而沉重的保险柜。拉板车的有三十多个妇女。她们大多数人的背上都晃动着乳婴的小脑袋。同样单调的号子“哎一哎嗨一哎嗨”刺激着行人的听觉。

有一个美国人常常对我说起，美国是个汽车国家。我曾问他，为什么他们在这儿不用载重汽车运这样的重物。他回答说，汽油要比这三十个妇女的劳动力值钱。中国女工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才得十个铜钱——这就是残酷的真理。

我住在哈尔滨商业区主要街道上的一家旅馆里。由于白卫分子在这个城里找到了安身之地，使该城市的居民人数剧增。街上到处都是人。看来，都是做交易和投机买卖的。逃到这里来的白匪残部军官们拍卖从俄国掠夺的贵重物品。有卖的，有买的，无论是大街、咖啡馆、还是商店，都是真正的交易场所。在这儿，处处使人感到日本的势力：日元是城里的主要货币。日本商店出现了。小铺店的橱窗里摆满了食品和各种商品。在离开莫斯科和伊尔库茨克以后，这种情况特别显眼。因为1921年对于我们说来是特别艰苦的。除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以外，伏尔加流域因发生歉收而闹饥荒。按配给证提供的低标准供给品又缩减了。每人四百克黑麦燕麦各半的面包、咸鲱鱼头汤、少量的稀粥。人们总是感到饿，但起码对于我国年青人说，这并不是什么悲剧。因为大家都一样挨饿，没有饱饿之分。这就是创造奇迹的決定性的道德因素。

谁也不掩盖饥饿。列宁常说到饥饿。人们从粮食充裕的省分给列宁运来了几车厢白面包干，他将其全部送给了幼儿园。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代表雷夫金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你们从苏俄回到祖国以后，请记住，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工人青年现在正经历着难以置信的艰难时刻。的确，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以来，从来没有这样艰苦的时期。伏尔加流域和东南各省的工农青年由于歉收而挨饿。因生产减缩，几千名青年工人被工厂解雇。我们对你们谈这些情况，并不是让你们垂头丧气，但你们应当知道，俄国的工人青年将不顾艰苦的环境，而坚定地举着革命旗帜，永远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

这是1921年7月。莫斯科苏维埃大厦前的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从下面铺上了砾石。车辆不多，小汽车难得见到，马车很少。街上长满青草，一片碧绿。园工用刀铲除青草，但是过两天草又冒出来，特别是在雨后。

缺少煤，因而发电站的电力不足。由于电力不足，免费电车经常停驶。夜里，街道上没有照明。

共青团员们嘲笑发牢骚的市侩和敌人，他们放声高唱：“贵族们坐在特维尔的街心花园，举起眼镜望着普希金的像。‘萨沙，我们的骄傲，你说说看，布尔什维克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啊！我们的骄傲——萨沙回答，‘当骆驼和虾跳起克拉科维亚克舞时，布尔什维克们就该走了’”。

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庄严的闭幕式上，德国代表舍恩加尔极为诚挚地谈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共青团员们：“在本国难以置信的艰苦、饥饿和贫困中，他们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这一事实应该成为我们未来工作的动力。”^①

①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164—165页。

我在此回忆了这些情况，是因为在哈尔滨，后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看到了充裕的食品和各类商品，这一点与饥饿的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城市相比特别令人触目。但这并不能迷惑我。我的眼前出现了只挣五个铜子的人力车夫和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只挣得十个铜子、身背乳婴的女苦力。我看到了，他们吃的是什​​么，穿得又怎样。他们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但富足的生活是不属于他们的，而且这个国家里成千上万的农民经常因遭水旱灾害而饿死。

我在哈尔滨会见了阿勃拉姆松，当时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满洲代表。他住在父母的寓所里，在革命前他们就是哈尔滨人。他在这个城市长大，会说中文，熟谙当地风土人情。他曾经是个大学生，但放弃了学业，全力投入党务工作。1920年他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部中国支部书记。东方部设在伊尔库茨克，它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直接前身。

阿勃拉姆松给我介绍了另一个哈尔滨，它与迄今我所见的那个哈尔滨完全不同。这就是“新城”，是铁路工人区，那里存在着俄国党组织。哈尔滨的共产党员做了许多工作，向中国人传播有关苏俄的真实情况，并同北京的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阿勃拉姆松已几次到过北京。作为一个会中文又了解满洲情况的人，他给予我们这些路过哈尔滨的人莫大的帮助。我为了继续前行至上海，从他那里获得了极为详细的情况和指导。

哈尔滨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全城分为两个部分：华人区和俄国人区。华人区有许多小商小贩。这里也有大商业资产阶级、商人、许多手工业者，更多的是工人和主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苦力。在这方面，哈尔滨的华人区与中国其他城市并没有什么区别。

“俄罗斯”城本身又分成两部分：老城或叫码头，是哈尔滨的商业区。市中心在此。所谓的新城乃是铁路工人区，中东铁路的工人和职员都住在这里。因此，哈尔滨的俄国居民由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铁路工厂、机务段的职员、工人、筑路工及修理工组成。

二十年代初，哈尔滨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外侨区”，高尔察克、谢苗诺夫和其他的白匪残部都涌到这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堕落为社会败类。军官先生们受雇于中国警察局、外国侦察队，把自己当作批发或零售商品出卖。在罪恶的巢穴里，他们干着诈骗或简直是抢劫的勾当。先前的“太太”们充斥了妓院，甚至公开在街上卖淫。各种社会渣滓——赌棍、鸦片商、人贩子都从世界各个角落汇聚到哈尔滨来了。当时维尔京斯基在哈尔滨唱“在香蕉—柠檬的新加坡”，大厅里挤满了白卫分子，他们似乎又看到了彼得格勒和他们曾经大显身手的舞会。

华人区以制造伪币著称。他们都是无与伦比的精工巧匠，造出的假俄国卢布、美元、英镑、法郎很难辨别其真伪。他们不仅伪造纸币，还伪造外国商品、中国古董，在世界市场上高价出售。钱币兑换商简直多得惊人，他们能把任何钱换成外国货币。人们总是提心吊胆，怕他们塞以假钱。金币不如纸币值钱，不过这在任何一个通行金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很普通的现象。

我在哈尔滨停留了五天。为了到达中国本土，更准确点说，是到长城以内，还需要一个所谓吉林局的护照。如果能得到某个商行的介绍信证明你的确是为商务前来，那就很容易得到这种护照。我花了二十个金卢布，就换来了这样一张介绍信。

从哈尔滨去上海，必须通过从中东铁路的终点长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区。

从长春到沈阳的铁路即所谓南满铁路，属于日本人。只要你从中东铁路的车厢换上日本人的火车，你马上就会碰到以“证件检查站”代表的名义出现的秘密警察的密探。

我还没来得及坐下，就有一个穿便服的高个子彬彬有礼地走过来。这是一个为日本暗探局效劳的白卫分子，他长着乌克兰式下垂的长长的黑胡子，一双黑眼睛射出冷光。他的鼻孔有点特别地吸着气，就好象在嗅你。

很快他就在另一个白卫分子和一个会讲俄文的日本人陪同下回来了。车厢里有几个乘客，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个问题是：这里谁是俄国人？他们得到回答后，就专门来盘问我。对其他人，他们只是大略看了看护照。

在哈尔滨我同意带一封中央同盟哈尔滨办事处给该组织上海办事处的信。这封信纯属商业性质，是用打字机打的，是别人送到了我在哈尔滨住的旅馆房间里。现在，我可以确信，在长春，日本警察已经知道这封信了。

盘问持续了很久，尤其因为我是唯一的俄国乘客，而且离开车还有许多时间。我从他们提的问题中看出，在哈尔滨的中央同盟办事处工作的日本侦缉队密探，让他们的上司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长春日本秘密警察局的三个代表对我特别注意，说明他们认为我是设在赤塔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成员。我甚至能判明，他们比我更了解远东局的成员。

最后，那个白卫分子不再纠缠我了，似乎很勉强地把开始盘问我时拿走的护照还给了我。

三天以后的深夜，我到了上海。

上海，在我的想象中是一座有神奇的浮屠和广厦飞檐的城市。我想象中的外国租界，好象是不大的西式公寓。但是当我面前出现了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和房顶上电光闪烁的霓虹灯广

告的景色时，我真是又失望又惊异。

我离开西伯利亚时，那里还是严冬，在哈尔滨已开始是融雪天气了，但仍很冷。离哈尔滨四天后，我过完了春天，来到了无雪而温暖的上海。

我走出车站。柏油马路、数量极多的汽车、有轨电车、几百个招揽乘客的人力车夫、中国音乐、大鼓的声音、听不懂的话语、灯火辉煌的大街、巨幅的霓虹灯汉字广告——这一切立刻使我目瞪口呆。

六、战斗的洗礼

当时世界上最大开放港口之一的上海，全城由三部分组成：公共租界（居民区）、法租界和租界范围之外的华人区（闸北）。上海实际上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外国城市。建有大型码头和仓库的港口就在公共租界的境内。公共租界虽然是国际共管地，实际上受英国人管辖。在黄浦江口停泊着英国舰队，警察局的头目都是英国人，警察由当时英国殖民地印度调来的锡克族人充当。如果发生骚乱，就有由外国人组成的所谓志愿军团来帮助海军。

当时上海已经是一个有大量工业企业的城市，主要是外国人开办的企业。工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构成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基本核心。公共租界里有最大的欧美银行的分行、高级旅馆、饭店、商店、电影院、豪华的别墅等等。这一切都属于外国人，但需要中国工人和服务人员。这里有专门与外国人作生意的中国商行。由于上述原因，在这个外国人的城市里，中国居民占多数，他们住在狭窄的街巷里，在洋房耸立的城市通衢之外的无人问津的地方。

法租界由巴黎指派的行政机构管辖。这里也有法国舰队，警察局的下级军官是从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居民中招募而来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外观。那堆红积翠之中一幢幢别墅尤显得富丽堂皇。

在上海租界的公园里，一到晚上就有乐队演奏，各种布告

(例如“禁止乱扔污物、攀折花木、骑自行车”)中还有“华人禁入”这样的布告。

几百万人的华人区住的是苦力、手工业者、工人、小商人，饭馆、赌场、鸦片馆、茶馆的老板。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上海的外国人服务。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喜欢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沦于各军阀集团的统治之下，他们时而投靠日本，时而投靠英国，于是在军阀集团统治更替时，“遭难者”就躲进上海的外国租界里。在法租界住有国民党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关也隐蔽在上海。

我住在公共租界一个与英国警察段毗邻的高尔察克军的军医家里，他的妻子同情布尔什维克。我多次得到她的帮助。在困难时刻，她尽力保护我并藏匿我的材料。

我首先应当会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和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组织处的成员。会见是在公共租界一条中国式小巷的房子里进行的。天已黑了，我被领着沿狭窄而陡直的木楼梯上了楼，走进有电灯照明的唯一房间。这个环境和这一片漆黑，使人感到秘密工作的某种浪漫色彩。

我不由自主地环顾着我被引进的那间屋子。屋内两边靠墙摆着两张小桌，桌上的纸写有我不认识的中国字，几张竹椅，一张象石头一样硬的铺着草席的木床，一个小书架。这是青年团的总部，但共产党员们也在这里集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是半年前才选出来的。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我环顾了所在的房间，心想，这间屋子很宽敞，足以容下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大约六十名党员的一半。到1922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约两千名团员。上海的

团组织起了领导作用，它担负着召集第一次团代表大会的工作，还为此选出了组织处，其中有张太雷、刘仁静和其他一些人。

参加这次会见的有七个人。我在这时认识了陈独秀。他中等个子，四十岁左右（中国人看起来很年轻，因此很难从外貌来判断他们的年龄），他那高高的额头已经有些秃了，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聪颖和机智。他举止质朴，并不象教授，喜欢开玩笑，笑起来颇有感染力。

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见，担任翻译任务。与会者已经掌握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革命组织和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我被告知，1月，当这两个代表大会正在进行的时候，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在上海第一次进行了公开行动。

青年共产国际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难的日子——1月15日定为纪念日和反军国主义斗争日，每年纪念这个日子。1922年，在中国首次举行纪念活动的这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了许多集会。

我们讨论了行将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其议程以及与大会有关的组织事宜。这实际上是座谈，不是什么会议。既没有主席、书记，也没有会议议程。每人发言都不受时间限制，而且就在讨论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时，大家也认为有必要发言。出现不同意见时，中国同志则遵循全体一致的原则。因此只要某一方面没有改变看法，或者没有找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新决议时，就不做什么决定。有过这样的情况，“说服”持续好几天，而完全没有采用表决和多数票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会议总是拖延很长时间。这与其说是行动组织，勿宁说是自修小组。

在后来几次会见时，有一次谈到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个组织1922年4月将在北京召开学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朝鲜革命

组织有时以基督教青年会做掩护，而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亲美派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力求揭露基督教青年会的亲帝国主义实质。整个3月和4月上半月，都是在全国反对基督教的学生运动中度过的。先是在上海，后来在其他城市成立的非基督教青年联盟，1922年3月就已发表了宣言，认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性质是“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

反基督教青年会运动延误了筹备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我已经谈过反日运动和中国资产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倾向美国的问题。美国人利用基督教传教士和基督教青年会替自己做宣传。

中国的传教活动很久以前就是由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进行的。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在中国起了原始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那种作用。从1850年持续到1864年，以太平天国起义闻名的中国农民革命运动，曾由中国基督教徒领导，并且是在福音书中借用的许多口号下进行的。清政府无力靠自身的力量镇压农民起义。英、法、德等国前来帮助清政府。这些“基督教”国家把太平天国革命淹没在血泊中。从此以后，基督教在中国人眼里就威信扫地，因此也就没有得到任何明显的传播。

可是，由美国人建立并大量资助的基督教青年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却开始发展，并影响部分学生青年。当时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这一组织的宗教——教会性质的活动，而是它的政治性质。例如，1919年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支持了中国抵制日货运动。这种作法是为了美国资本的利益，但被说成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民表示的同情。

一般地说，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依靠的是中国社会中最腐朽的部分——与外国资本勾结的欧化了的资产阶级，依靠他们

的子女，这些人感到中国文化是束缚，而把“欧洲生活方式”带进中国来。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留过学，正是这批中国青年为基督教青年会提供了干部。该会在1920年，在中国三十个城市和一百七十四个专门的学生组织中拥有七万二千名会员。这些组织的四百个领导人中有八十个美国人。仅1920年一年，美国人就为“自己”在中国的青年会工作花了十五万美元^①。

帝国主义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刚刚收场。伴随着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而来的便是关于裁军、平等、民主等等的议论。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是以此为纲领在北京召开的。该会希冀用裁军、民主、平等的口号加强美国对远东各国、首先是对中国的影响。

鉴于基督教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反帝运动。他们向人民群众散发了几百本小册子，几千份宣言、传单和呼吁书。

由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参加，很自然地就迅速出现了一个非基督教青年联盟，与基督教青年会相抗衡。当时所有在中国出版的报纸，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报纸的版面，都被这一新运动的消息占满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刊《先驱》，变成了非基督教青年联盟战斗的机关报。当然，指的并不是反宗教宣传，而是在于基督教青年会的政治性质，即它是与裁军、民族平等、民主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个亲帝国主义的组织。

这个联盟中某组织的书记给我看了一束信，这是他收到的各阶层居民代表的来信，信中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新组织及其斗

^① 参见达林：《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莫斯科，1925年版，第82—83页。

争的同情。非基督教青年联盟在其成立的第一个月就拥有二万多名成员。各大城市都建有该联盟的组织。到处都举行了反对基督教青年代表大会的集会和游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报纸开始叫嚣，当然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说中国的形势很象义和团起义时的情况（他们称义和团为“拳乱”），并要求开进外国军队镇压非基督教运动，即实质上是镇压反帝运动。威胁开始化为行动了。上海的英国巡捕袭击了非基督教联盟总部。镇压开始了，但运动却继续扩大。

在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组织世界大会开幕时，北京学生就在开会的礼堂里举行了反帝示威。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在那种形势下继续在北京开会已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转移到了离北京二十公里处^①的北戴河疗养区。这一逃跑行为使代表大会在中国舆论界名誉彻底扫地。

反对基督教青年会在北京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的运动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是它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活动。在这以前，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是自修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生团体。这时青年团已走到群众中去，并领导了这场引起全国巨大反响的运动，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在过去的两年里，学生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来1920年的示威游行以及与警察的冲突，实质上还只是反对日本的。1920年4月上海学生的罢课事件是上述运动之一。在宣布罢课以前，上海的学生联合会就向外国外交团保证答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防止公共租界里的混乱和防止给外国人造成麻烦”。1922年3—4月的非基督教运动，已经不仅是反日，而且是普遍的反帝运动了，因为它不仅反对日本，而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且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这样，运动就提高到更高的反帝斗争的阶段。

同时，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社会分化也开始了。原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北京的五个教授，这时表示支持基督教青年会。

在反基督教学生运动期间，社会主义青年团巩固了、成长了。这时青年团已超过三千团员，在十七个城市中建立了组织。

七、北京。广州之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广州召开，并且于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开幕。我已说过，尽管青年团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但它还不是共产主义组织。因为当时的青年团里有无政府主义者，又有改良主义者，还有政治方向不明确的社会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团代表大会赶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即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我正准备动身去广州，这时接到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巴意开斯要我尽快去北京的通知。苏维埃代表团是苏俄在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使团于1921年12月中旬来北京谈判苏俄与中国建交的问题。谈判进展很不顺利，因北京政府慑于日本的压力不急于解决此事。

4月初我到达北京，同前来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们正好同住一个旅馆。

那里什么人都有：女修道士、牧师、各国大学生——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还有印度人、黑人和欧化了的中國女性，甚至还有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代表，大概是从哈尔滨找来的。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代表中间很少有青年人。他们几乎都在中年以上，其中许多人已经秃顶并胡须花白了。代表中间甚至有已被推翻的愷撒政府的某位部长。

为了领导北京青年团非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派张太雷到北京，在举行基督教代表大会的日子里，中国青年不仅在北京的街道上，甚至在开会的礼堂里，举行了反帝游行。

到北京后，我马上前往苏俄使团住处。使团住在原沙皇政府使馆的馆址。在巴意开斯到来之前不久，北京政府从这里撵走了十月革命以后还企图继任俄国代表的沙皇官员。他们时而执行高尔察克、谢苗诺夫的使命，时而执行美尔库洛夫兄弟的使命。撵走沙皇官员，把沙皇使馆的楼房转交给苏维埃代表团，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北京政府对苏俄的态度。苏俄立即宣布放弃沙俄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反日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不承认苏俄已使北京政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但它仍然一味拖延着，不予承认。

我到了巴意开斯处，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他是使团顾问。这是一次很愉快的会见，因为在严酷、困难的1919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在莫斯科见过两次面。那时我在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除了主管学校部以外，还担任俄罗斯通讯社办的专门通讯《红色青年》周刊的编辑。这是专为地方苏维埃和党的报纸提供消息的刊物。俄罗斯通讯社社长是克尔任采夫，而通讯的编辑是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西比里亚科夫教我初步熟悉了新闻和编辑工作。

巴意开斯知道，我近期要动身去广州，当时广州已是孙中山政府管辖范围的基地了。巴意开斯的代表团交给我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楚孙中山的国内外政策；他对苏俄的态度；他近期内的计划，以及作为积极因素的国民党在广州政府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我被授以正式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谈判。

我在北京逗留了几天，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天

子”的都城。北京有许多古老的宫殿，惊人美丽的庙堂和宰堵波塔，巧夺天工的花园、池沼和拱桥。整个城市象是一座纪念馆，展示了中国独特、精湛的建筑艺术、人民的天才和技巧。北京不象我去过的其他任何一个城市。

北京四周修了又高又宽的灰砖城墙。这城墙是散步最好的地方。它宽到能容两辆小汽车并行，站在城墙上那四周种满树木的柏油林荫道上^①，整个古都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

北京街上的砖墙别具一格，它们环绕着宫殿和花园。街上铺的条石、古老的中国式房屋、牌楼、庙宇，更重要的是没有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喧闹嘈杂，幽静、彬彬有礼的悠闲的散步者，秀丽的北京妇女的轻盈动作——这一切衬托着奇异的中国古代风格，会使你感到，你并非置身于喧哗的都城，而是在一个规模宏大的博物馆里。你的动作不由地也渐渐变得经院式的小心翼翼，似乎担心破坏这一片宁静气氛或是踏坏了脚下北京大街上的石板。

这就是我初见中国首都的印象和感受。

后来我们在北京确实也见到了狭窄的小巷、老百姓住的低矮的房子；见到了被外国人戏称为“鞑靼城”的喧哗的北京商业区。但这一切并不能破坏我对北京的最初印象。在这里没有工厂的浓烟滚滚的烟囱，没有人围着小商贩购东买西，北京几乎没有现代无产阶级。只有城外火车头的汽笛声打破了中国皇都的沉寂。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新的北京。当时北京的革命中心——北京大学。青年们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个学校。只要国内一有革命风潮，北京大学总是首先响应，北京大学的学生走

① 原文如此。——译者

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1919年抵制日货运动，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都是如此。这里曾建立了中国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里曾有过中国共产党最牢固的组织。在假期，分赴各地的大学生把新思想传遍全中国，并在各地建立了革命组织。他们获得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的实际经验后又回到学校，于是，又是人心激动，群情沸腾。

动身的日子到了，火车载着我飞快地离开中国京城的灰城墙，驶向喧哗的、热闹的商业城市——天津。离开北京只有四个小时，天津工厂的烟囱就出现了。很快，天津也在身后了。再往前行见到的又是铁路沿线车站上成群结队赤身裸体求乞的孩子们，又见到外国人的恶作剧：向人群扔铜元，挑起衣衫褴褛、饥饿疲惫的乞丐们殴斗和哭喊。一路上向窗外望去不时可看到熟悉的场面：中国农民拉着沉重的原始木犁，在泥泞的稻田里吃力地躬耕。

在车厢里，我对面的一位俄国白卫军将军正在对一个看起来象商品推销员的英国人讲自己四处逃窜的经历：从克里木到君士坦丁堡^①；从土耳其到塞得港；又从那里到印度、香港等等。

浦口站到了，铁路线在这里中断了。我们站在壮观的翻着浑黄浪花的长江岸上。这里没有桥，火轮把旅客送达对岸的南京，从那里另有火车到上海。

在我从北京返回之前不久，上海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两个朝鲜人开枪射击日本将军田中以表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使用暴力。地方报纸最初就是如此报道这个事件的。

说这是谋杀，显然可疑。田中仍然活着。两个杀人未遂并

^① 现伊斯坦布尔。——译者

且当时就被捕的朝鲜人很快就越狱逃跑了。越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对于政治暗杀犯。引起人们怀疑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这一起未遂谋杀案被打死的，是一些在华盛顿会议后特别令日本人反感的美国人。这倒很象是日本的反间谍机关蓄意寻衅，组织“谋杀田中”事件，来寻找借口打击在华政治避难的朝鲜侨民，特别是破坏侨民的革命组织。

不管怎么说，英国、日本、法国的反间谍机关都行动起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开始搜查和逮捕侨居上海的朝鲜人了。法国巡捕拿着逮捕证闯入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朝鲜共产党员金满根的住宅，金满根急忙从二楼跳窗出去，躲了起来。他当然没有参与谋杀。

报纸上掀起了一场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运动。现在已经不是朝鲜人，而是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为组织谋杀田中了。某些形迹可疑的人，主要是俄国的白卫分子开始出入我的住宅，一会让我买他们的书，一会让我买他们的黄油，一会让我买他们的领带，时局变得极为不利。可是，在我动身到广州之前，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会见。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第一次同陈独秀见面时，就向他讲了行将与孙中山进行的会谈并要求指派共产党员参加，他们表面上可充任我的翻译。为此，党的中央局委派了张太雷和瞿秋白。

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我和筹备召集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处成员进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组织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并商定同去广州。决定由我、张太雷、瞿秋白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其中我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张太雷代表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处，而瞿秋白则代表共产党。

在上海我还会见了朝鲜同志。我们商定：太洪作为朝鲜共

青团的代表前去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动身到广州的日子终于到了。按照详细拟定的路线，我们应当乘轮船经过福摩萨(台湾)海峡，先停在南海岸的小港汕头。从那里再坐小船，经过一昼夜便可到三梅^①村，此处轮船不能停靠。从三梅再步行四、五天就走到通往广州的铁路上。这样，我们就能从陆上绕过英国的殖民地香港。

在去汕头的路上，我们的轮船因装卸货物在厦门停了几个小时。我们趁临时停船上岸，观看了这个座落在海湾上的小港口。海湾的一旁座落着中国的小城市——厦门，它不大，但是很热闹，在河岸街上有运输站和许多小店铺。海湾的一边是隐没在绿荫之中的外国租界。

我们先来到租界，上了山。在人工修砌的石阶上座落着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我们发现其中有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和福音会学校。

我们又乘渡船到了厦门。这里熙熙攘攘，天气炎热。我们看见很多人聚在一起，就走近人群。一个人站在高处演说，他旁边的柱子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人体解剖图：肌肉、静脉和动脉、被剖示的腹部。这是一个大学生在演讲，他手上的小棍不时地在图上指来指去，向全神贯注的听众讲解人体的构造，这是大学生“到民间去”，进行文化启蒙工作的实例。

我们向前走去。又是一群人，不过人少些。从人群中间传来好象是班都拉琴的声音。一个老人随着琴声拉着长腔在说唱着。这是演唱中国民歌的说书人。他在歌颂着英雄和他们的英勇行为和斗争。

一个大学生和一个说书人，一个在堤岸上码头工人中间，

^① 音译。——译者

另一个在古老的窄巷里。他们分别象征着新中国和旧中国。

我们回到了轮船上，缓慢地驶向汕头。厦门这个港口已被孙中山政府控制。但是，就在这里也一旁是中国城市，而另一旁是一片不大的外国租界和洋房，为外轮海员开设的酒吧间、列强的领事馆。

汕头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有将近十万人。它是花边编制手工业的中心和供应华中、华南桔子、香蕉的相当大的水果市场。但它主要是商业城市。当时为孙中山的军队所占领的这个城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代表是商人和高利贷者。

象孙中山的民主南方的其它城市一样，汕头与北方不同，有自己选举的市议会，自己的民主报纸，合法的工会等等。就是在小小的汕头，社会生活也比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华中和华北的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活跃得多。

在这里，市议员们大都是商人，掌握权柄的就是他们。其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所以这个党的党部设在最热闹的商埠汕头不是偶然的。

我们决定拜访国民党党部，何况在下一段旅程中党部也还应该协助我们。这是1922年4月19日，那一天我正好满二十岁。我们穿过几条繁华的小街巷，在一幢四周挂满了红、蓝彩旗的房屋前停下。这就是党部。我们走进去，沿着一般的窄楼梯上楼去。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是党部委员。我们互相介绍，他们递给我名片。我们按中国习惯开始喝茶。这是待客的礼节，就象欧洲以咖啡待客一样。

党部的主席对我讲，汕头当时计有将近一千名国民党员，多数是商人、教师和学生。也有一些工人。

“你们大约本周有会吧？我可以参加吗？”我问道。

“我们不常有会，即使开会，次数也很少。”

“那么你们怎样进行工作，怎样与党员们通消息呢？”

“我们给他们写信，在报纸上登广告……”

“可是如果某个党员不赞同某件事情，如何在党内解决问题呢？”

这个问题难住了老人，显然，他没有实际遇到过这种情况。

“党员支持我们的市政权。如果有人反对我们当政，他就不能当党员。”他回答道。

“请讲讲贵党的主张。”

“我们反对压迫中国的外国人。反对军阀统治。我们拥护人民政权，拥护民主。”

看来，纲领具有极普通的宣言性质。

“诸位对苏俄可曾有所耳闻？”

老人活跃起来，顿时双目闪出热情的光芒，表示了对苏俄政策的赞许态度。

到韶关车站无车可乘，我请党部给以协助。从韶关乘火车走约二百多公里便可到广州了。

他们发给我一个证明，上面写着我是“中国人民之友”，并有人一路陪同，务请在途中给予我等以协助。此外，在从三梅村到铁路这四天徒步路程中，应有一队卫兵护送我们。

到三梅的小船一周后开航。我们用这些时间来拟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以及代表大会主要议程的决议草案。

在小城汕头，毗邻日本和法国的领事馆的一家旅馆里，我们起草了纲领草案，在这些文件中我们宣告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死刑。

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进展很快，配合得很协调，几乎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就在这里，我们三人一起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章草案。

令人讨厌的中国白蛉子看来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一边。在我们讨论、协商时它们肆无忌惮地叮咬我们。结果我们的脸、手和脚都起了大包。但全部团纲、团章和各种决议草案终于准备好了。我们高兴得唱起了国际歌。当时我用俄文，瞿秋白用中文，而张太雷用英文唱。

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城市的生活。首先我们会见了当地报纸的一名编辑。他给我们讲了许多有趣的事。原来，他们刚一收到关于反对基督教运动的通知，就很快地在汕头联合大多数学生组织成立非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汕头俱乐部成了一座空房，可以关门了，”编辑笑着说，“现在，我们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请我在专门的群众大会上做报告，介绍苏俄的情况。我们商定好邀请工会、其它社会组织的代表和学生参加会议。

我作了报告，与会者对十月革命及苏俄的生活和斗争很感兴趣，反复询问工人地位怎样，很关心俄国的经济、苏维埃的法律等等。尽管要经过两次翻译（从俄语到北京话，从北京话到南方话），所有与会者仍聚精会神地听着。就在这个会上，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第二天，一个学生代表团来到我这里，请我到学校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报告。一名教师也来听报告。学生们手握毛笔，认真地听着并做着笔记。

简直不能相信，在离莫斯科这样遥远的地方，在香港开往上海的轮船不经常停泊的小城里，青年人如此地关心社会主义。

汕头的生活就象万花筒一样，反映了中国发生的各种情况。大庙对面的广场上，平时总聚集着许多看热闹的人和穿着油污

的衣服卖包子的女贩，今天格外热闹。我挤进人群，看到一个不寻常的场面。柱子上捆着一个人，他蹲在那里，低着头，众人都在看柱子上贴的布告。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捆在柱子上的人因盗窃被揭发，他被拉来“示众”——为了让每个居民都认识这个贼的模样并且记住：如果偷东西，就要被捆在耻辱柱上，落到“枷号示众”的地步。

还有另外一种场面，在这个小城里唯一比较宽的街上，正有一支敲着锣鼓、打着旗帜的很大的游行队伍。在群众集会上有激昂的演讲。这是正在罢工的印刷工人的游行，他们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已持续有三天了，一种报纸也不出版了。罢工者不肯作出任何让步。工人们最后胜利了，全部要求都得满足。其特殊之处在于罢工者中间有不少国民党在反对同样也是国民党员的自己的雇主们。

我和地方职工运动的领导人进行了谈话。他是汕头最大的工人组织——海员工会的主席。他穿着西服，很漂亮的衬衣领子，打着领带。我问，为改善工人的状况都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海员工会为此目的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工会会员是银行的股东，每年股东得到一些钱作为股东红利。此外，股东有权借款。据他说，这样他本人就能开店铺并通过做买卖赚钱来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这个海员工会的领袖是国民党员。

过了一会儿，我顺路到一个小铺去买烟，柜台后面站着的就是方才和我谈话的那个人。银行确实帮助他开了一个小铺子。在现代工业很少，而手工业占优势的中国南方的工会组织中，这样的“海员”很常见。

我们还去过一次戏院。汕头的戏院比起已受到外国影响的上海剧院来，更有特色。我们三个人沿着滨河大街走着。见有一束灯光照着的一个公园的入口处，那里有一长串等客的人力

车。公园里有小饭店，竹围的兽槛里有蛇和海狮。我们观赏了动物，然后穿过公园到戏院去。剧场是用竹子扎起来的，好象一个大棚子。正在上演一出很长的历史剧。这出戏已演出两周了，还要一个月才能演完。

刚开始我一点也看不懂，我的朋友们也是如此，他们是北方人，不懂南方话。我还是第一次到传统的中国式的戏院里。戏台搭在木板上，舞台上没有任何布景，随着剧情的进展，一个人拿着长长的字牌走出来，上面写着，故事发生在森林里、或是旅店、或是茶馆里。这情景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剧院一模一样。

演员们穿着中国古代服装，戴着假面具或者把脸涂得面目全非。多亏了中国演员们不同寻常的面部表情和每个动作惊人的表达力，我逐渐开始明白剧情了。我非常高兴地看着中国武士骑马奔驰。就用那普通的竹棍模仿马。然而效果是惊人的：幻觉使你感到，确有一个骑士在奔驰。

观众的举止是我们俄国剧院所不习惯的。他们在演出进行时大声说笑喝茶，进进出出。天气很闷热。就在这时，两个小伙子走进来，一个提着一桶热水，另一个拿着两条毛巾。然后一个人提着水桶拿着毛巾站在戏台旁边，另一个站在观众席位间的通道上。前面的小伙子把手巾浸入热水，拧干，扔给另一个小伙子，后者又把它递给观众，观众擦了汗，把手巾还给这小伙子，他又把这条手巾扔给提水桶的那个人。接着，又一条手巾飞来，另一个观众擦汗。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这一排人擦好以后，递手巾的小伙子又站到后排去。热毛巾在剧场里飞来飞去。小伙子不时地举起手，甚至不必看，毛巾就恰好落在他手中，没有一次落空。

这一切都发生在演出期间。

步行到韶关的准备工作用了几乎整整一周的时间。但是我们没有走成，也没有能了解中国农村的生活。

南方有一些重大的事变正在酝酿之中。1920年孙中山曾与军阀陈炯明联合占领了广州。这使孙中山有可能把华南变成革命基地，同盘踞华北、华中的反动派进行斗争。

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1917年被反动分子解散的国会议员们。1921年初，议员们宣布成立全国议会并且选举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总统”——与反动的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分庭抗礼。

国会授予孙中山以全权，与北方政府进行斗争，并且统一中国。此后，孙中山出发到广东省北部和桂林去建立革命军队。

孙中山力图统一中国和在中国实现民主化，这引起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不安。香港的英国当局早就支持在孙中山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职务的陈炯明。受到英国人唆使的陈炯明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抵制孙中山统一中国的各种措施。陈炯明用联省自治来对抗孙中山郑重宣布的统一中国的政策，即实际上保持政治上的分裂状态。

陈炯明说：“我们应当把广东省变成全中国的模范省，那时，其它各省的督军看到在这方面的成绩和我省的福祉，定会效仿我们，亦在本省实行民主，这样在自相联合的基础之上和平统一中国。”

这样，陈炯明一面用关于自治和民主的话做掩饰，一面反对孙中山筹划的革命的北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反对把国会设在广州，反对选举孙中山为全国总统。特别是陈炯明虽身为孙中山政府陆军部长，他却没有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陈炯明为了寻求群众支持，开始把自己装扮成比孙中山还“左”和“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极力向工人组织献媚，向工人发

表演说，甚至在物质上支持当时销路很广的广州共产党人的报纸《社会主义者》^①。陈炯明用这些手腕拉拢了当时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广州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并且派了三个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者》编辑部。陈炯明渐渐地在广州工人和小业主中获得某些影响。

1922年孙中山出于军事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与中国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签订了关于张作霖参加反对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集团斗争的协定。原设想，张作霖在北方的行动能够牵制直系的力量，使孙中山更顺利地进行北伐。

在张作霖开始军事行动反对吴佩孚直系集团的形势下，陈炯明决定公开反对孙中山，以便迎合英帝国主义，破坏北伐。陈炯明宣布，他反对出兵北伐，并且不派一兵一卒参加。

陈炯明的爪牙和喉舌们还挑拨工人反对北伐，蛊惑人心地声称，他陈炯明反对联合反动派张作霖，好象陈炯明是在为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民主而斗争。

孙中山处于困难的境地。他当时远离广州，身在桂林。而那时留在广州的陈炯明掌握着金融、兵工厂、粮食基地，掌握着北伐所需的一切。

然而，孙中山依靠忠于他的军队击败了陈炯明，陈被迫离开广州，把军队撤到了城郊，不过他的军队还据守着广州附近的全部军事要冲。1922年4月下旬孙中山从桂林回到了广州。

我知道此事以后，马上来到汕头国民党党部，在这里获悉了一些不愉快的消息。因当时正在打陈炯明，在这种情况下按

^① 原文为“Социал”。当时广州党组织办的报纸有《群报》，《社会主义者》，这里的“Социал”很象是“Social”（英文：社会主义）的俄文标音，故译为《社会主义者》。——译者

原定路线从陆路经过中国农村到广州已不可能。

这是1922年4月25日。但是，4月30日必须到广州。因为5月1日在广州要召开全国劳动大会，5月5日还要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张太雷、瞿秋白和我三人决定改变路线，乘轮船经香港到广州去。为了不引起英国巡捕的怀疑，我们事先约好在广州会面的地点，就分手了。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轮船就已到了香港附近，轮船在怪石嶙峋的两岸之间慢慢地向前行驶。最后轮船绕过一块大礁石，香港美丽的全景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整个岛子是一块极其巨大的岩石，其顶端耸入云霄。建在层层岩石上的别墅为绿树所环抱；与巨大的岩石比较，相形之下沿岸的那些六层楼房看起来就象一个个小黑点；街道蜿蜒盘旋向上通去，隐没在绿荫之中，——这就是香港总的轮廓。

轮船靠岸了。放下舷梯后，我们下船上岸。这是港口的堆栈及商业区，通行有轨电车。我乘登山电车来到香港最高点——耸入云霄的地方。钢缆拉着缆车飞驰向上，缆车有时沿着陡峭的、几乎是垂直的岩石行驶。

俯瞰海面和港湾，令人惊叹的美景尽收眼底。这是亚洲大陆最好的港湾之一。从岛的高处望下去，远洋轮就象是冒烟的小船。

中国的香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侵占，1842年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位于亚洲沿海，是联结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欧洲航路的海上枢纽。几乎所有的远洋轮都要在这里加煤、加水、补充食品。这就是为什么在南方，唯独这个岛上有的大量的中国码头工人受剥削和压榨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国最强有力的工人组织——海员工会的总部设在香港。

有将近五万名的中国海员和装卸工人参加了1922年1月—3

月以工人胜利而告结束的香港海员罢工。

观赏了香港美丽的景色之后，我用了十分钟就从香港乘船横渡到大陆——九龙。这是一条宽二十五公里的狭长地带，位于香港的对面，也属于英国。九龙被英国人强行“租”占，行政管理归香港。

九龙现有英国军队、警察，更主要的是还有英国海关征收关税和控制中国南方的贸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南方商业资产阶级具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情绪，并不仅在道义上，而且从物质上支持香港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

在九龙，我坐上了广九线列车。火车沿着美丽的海岸奔驰，穿过了一连串的隧道，拐向广州。远处已是一片灯火了。在灯光掩映中逐渐显出城市的轮廓。火车停了，我看了看表，离开香港才只有四小时。

八、广州。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领导人

广州——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国在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后，开放广州与外国人通商。但与上海相比，广州更多地保持了其独特风格，上海则不同，那里有很大的外国租界区，英、法的军队和巡捕，取了外文名称的街道。

虽说广州也有英租界——沙面（珠江上的一个小岛），但它和上海的外国租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用十——十五分钟就可以绕遍整个沙面。英国需要沙面只不过是作为它在中国南方统治的象征，而不是作为立足点和经济基地。香港和九龙地区租界已经起到这个作用。因此广州给人的印象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商埠。

与中国北方人不同，南方人是情感外露、活泼和机灵的，而广州本身就象一个甚至夜里都不关闭的大市场。就象所有中国的传统城市一样，这里的街道十分狭窄，只有二——三米宽。引人注目的是街上几乎完全没有英文招牌。

不过欧洲的影响在这里也有所表现：铺好了几条宽阔的街道，小汽车间或奔驰而过；路面铺了沥青；珠江岸上建了许多欧式楼房。

这里没有北京那种彬彬有礼的高官显宦，引人注目的是袒胸露臂、忙碌不止的大腹便便的商人或小工厂主；这里没有北

京的窈窕淑女，见到的是疲惫不堪的女苦力，她们整天挑扁担或是用带轮子的平板车拉着沉重的货物往返于堆栈和堤岸之间。

街道上总是熙熙攘攘。中国乐曲处处可闻。在广州的主要街道滨河大路上，有许多浓施脂粉的中国妇女。

河边上舟楫林立，俨然若一条“船街”。不时有船划到河心。帆船往返于河面。入夜，行船上灯火闪烁，构成美丽的画面。

岸边密集泊放的小船上有船户常住。他们沿河装运货物。这些人都是穷人，河上的苦力。

水上的生活是很热闹的。除小船外，这儿有各种等级的水上餐厅，有高级的，还有低级的，以及一些茶馆，水上大烟馆等。

深夜，大街上喧哗停歇，一部分电灯熄灭了，行人渐渐稀少了。这时，人行道上铺了草席，人们在上面睡觉。有的是一个人单睡，有很多是全家人睡在一起，这都是工人，他们不仅在陆上没有一块立足之地，甚至在水上也没有一条旧船。他们全家住在街上。白天劳动，干很多活，干很长时间，在街上吃饭，从流动的摊子上买些东西糊口，而夜晚就睡在人行道上。他们的胸部凹陷，脊背筋骨健壮，双臂坚强有力。他们有一张草席，用破布当作被子。此外，一无所有。

南方几乎没有大工业。在珠江的岛子上有许多丝织厂，约有几千工人。但这不是现代化工厂，而是建筑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纺织工场，技术极端落后。家庭手工业生产和小作坊是南方最典型的工业。

商业资本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得惊人。商人和高利贷者掌握了农产品的购销。这里有许多钱庄即典型的放高利贷的机关，以高利对穷人放债或利用各省的纸币以及外币搞投机生意。

在外国银行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英国汇丰银行。外国资本在南方不是工业资本而是商业资本。因此外资没有给南方的经济

生活带来象华北、华中那样的变化。

南北方的经济联系十分薄弱。特别在南方，不是从华北，而是从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地和马来群岛的荷兰殖民地得到各种成品。此外，还有南北方语言的差异作梗。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大不一样。全中国都使用方块字，识字的人都看得懂，但在不同的地区发音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在南方。在南方人和北方人都参加的小型会议中，如果与会者都懂英文，常常用英文交谈。人们也常常通过纸墨、毛笔帮忙，用笔把所需要的汉字写出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从北京或上海到广州，这些区别特别醒目。南方的男人不留辫子，而妇女大多数也不缠足。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特点也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前，男人留辫子是臣服清朝的标志。然而到了二十年代，农民和一部分市民还留着辫子，许多中国妇女还缠着足，走起路来很困难。而南方人远在太平天国时代，就以剪掉发髻来表示不服从清王朝。

历史和文化的差别曾经成为受到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南方自治运动的基础。但在南方有深厚基础的孙中山是反对自治主义的，他为中国的统一、完整和独立而斗争。

南方人是能够接受孙中山的反帝立场的，因为南方人反对霸占了香港、并且一直威胁着广州的英国人。孙中山在广东筑路符合南方人的心意。南方人乐于利用孙中山政府的民主机构，因为这使商人能够按自己的利益“自治”。

至于孙中山提出要把铁路和大工业收归国有，这不仅关系到南方商人，尤其更关系到北方商人。

对于自己的活动，孙中山本人能够讲很多。因为国民党或议会否决了孙中山有关工人问题、全民选举权等不符合资产阶

级利益的一系列提案。

“他们不理解我。”孙中山在这样的场合总是这样抱怨。

“他太主观。”广州的工商界代表则如此评论孙中山。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其政权所及的地区，力图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城市自治，允许自由出版，自由开展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等等。这种民主制度如遭到破坏，那么主要破坏者就是那些反动的军阀和军官，孙中山被迫与之结成同盟，而他们在孙中山困难的时候就背叛了他。

孙中山掌权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权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

后到广州的中国朋友们一整天都在找我，终于在广州的一家“洋大人”旅馆找到了。我们马上制定了次日的行动计划。如果我没记错，那是1922年4月26日，我们出发到了东山，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斯托扬诺维奇住在这里。

外国人居住在与广州市内方向相对的两个地区。一方是沙面，它面对香港；另一方是东山，它面向中国内陆。

在沙面有外国公使团的大楼、外国银行，干脆说，这是“帝国主义之岛”。东山也盖起了一些欧式的二层楼房，但与沙面不同，东山是中国广州的地面。

这里住着德国人、俄国人，与外籍妇女结婚的华人，和娶华人为妻的外国人。东山的人经常夸耀本地区的长处，看不起沙面。而沙面的人则把东山人视为“二毛子”。

斯托扬诺维奇是一个未经承认的国家的代表，当然是携同眷属住在东山。他身材高大，蓄着大胡子，和蔼可亲，乐于帮助别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斯托扬诺维奇过去是俄国工人，革命前侨居法国，在那儿学会了法语。从当时法属印度支那来

的一位棕黄皮肤的越南人是他唯一的同事。他们俩人都是远东通讯社的。这位越南人会说法语，懂中文，也了解中国南方的政治生活。

从斯托扬诺维奇那里我得到了关于南方形势的最新消息。我当时为之愕然了。不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政府，都被描绘得一团漆黑。按斯托扬诺维奇所说，这个政府实行敌视工人阶级的政策。他把孙中山的老战友们说成是美国看中的军阀。

斯托扬诺维奇的好感完全在陈炯明方面，似乎陈支持工人运动并且接近广州共产党组织。

当我对斯托扬诺维奇说，按我的观点，应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时，他听了也照样大吃一惊。

后来斯托扬诺维奇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和我共事。所以，本不应再写这些情况。当时我明白，他的立场反映了某些人的观点，但究竟是哪些人的观点，我还不知道。

我和瞿秋白、张太雷又从东山出发到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所在地去。

我们走在挂着旌幌、半明半暗、没有一点日光、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因为阳光根本射不进这狭街小巷。我们绕来绕去，向前，拐弯，然后又转回来，终于进入了一个小门，从外面只能见灰色的墙。窗户临院而开。我们穿过几个中国式的门洞，又穿过几个房间，进入了一个小四合院。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就设在这里。党委的代表也住在这儿。

会议开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多数是学生，听说在省里有主要成分是青年工人的团组织。市里的青年团组织中工人很少。党员几乎全部加入了青年团。青年团事实上就是党的同情者的组织。团和党的工作不可能区分开来。不过，青

年团里有话剧团和乐团——这是这个青年组织里唯一的青少年园地。

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种特殊的报纸一直在出版。但此报只字不谈青年工作。这是一般政治性的报纸。

我问，为什么不搞青年工作，得到一个极平常的回答：首先须要组织全体工人，以后再专门开展青年工作。

团委会占了三个房间。墙上挂着近日的报纸、标语、工作计划和各组活动时间表。党组织人数比青年团少一点，但党的政治影响当然大得多。共产党员们忙于组织工会和领导罢工斗争。

我们转到了有关南方的政治形势和孙中山及国民党政府的活动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关系十分紧张。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斗争引起了政府的危机，国民党内实际上因此发生了分裂：党内相当一部分人支持陈炯明；而另一部分支持孙中山的人则进行活动，旨在破坏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这一切使当地的共产党员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更加反感。

我开始谈陈炯明的问题，同时听到了对陈炯明赞扬备至的评语。人们对我说，工人们爱戴这位将军，陈炯明从广州败逃之后，工人们有孤寂之感。

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冲突及共产党对他的态度问题，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慎重的，着重指出，陈炯明犯了一个错误，其原因好象因为他“不是政治家”。

总之，广州人特别不愿意谈这个题目，对我存有很大的戒心，他们愿意了解我的观点，不愿回答我的问题。

我无须隐瞒自己的观点，就亮明了我的态度。人们反映冷淡，默然对之。

我们转入了庆祝“五一”节的问题。讨论了游行的基本口

号。这些口号共有三类：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苏俄；二、反对国内反动派；三、支持孙中山政府。

“五一”时我在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会的旗帜上看到了第一、二类口号，但是没有支持孙中山政府的口号。

九、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南方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很少。中国南方基本上是手工业和中世纪纺织业的地区。因此，就连工人组织的形式，那时也还不能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不久前，这里还完全保留着作坊和小业主与工人都能参加的行会。

现在这样的行会几乎不存在了，小业主们被从工会中赶走，但是这种组织原则还保留着。职业分工仍是工会组织原则的基础。比如说：手车夫^①工会、茶居工会、厨业工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海员工会等等。那时仅广州一地就有一百三十四 个工会之多。

工人必须取得工会会籍，不是工会会员找不到工作。

广州的工人们习惯戴芦苇编的笠笠。南方的太阳耀人眼目。白天不能看柏油马路，因为每一块玻璃、每个小水洼都反光，很刺眼。在那里几乎没有希望找到荫凉处。笠笠遮住了工人裸露的上身免受太阳曝晒，使他们不致中暑。工人们头上戴的大芦苇草帽没有使我惊奇，但草帽上用黑漆写的很大的汉字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帽子上的字标志着属于哪个工会。带字的帽子——这是独特的会员证。每个失业的工人，如果遇到本

^① 手车，广东方言，即人力车。——译者

工会有工作的会员在吃饭，就有权在一旁坐下，而那些会员必须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吃，这是习惯。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不久前，历史性的香港罢工结束了^①。工人们取得了胜利。罢工者反对英帝国主义，因而得到了广州资产阶级的支持。它曾给罢工的工人们以物质援助。国民党和孙中山政府也支持工人。

当然，这种态度赢得了工人们对于国民党和孙中山政府的好感，并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极其困难的财政状况迫使政府决定发行纸币。在此以前，只是私人银行有权发行纸币。

中国的货币是各式各样的。在兑换纸币的时候，人们首先要注意，这些纸币是由哪家银行在哪个城市发行的。在大城市里，日本银行和某些中国银行的钱是不易流通的。

广州资产阶级宣布以七十分兑换政府一元来抵制广州政府的纸币。由于资产阶级抵制纸币，它同工人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工人们要求资产阶级接受他们从政府领得的纸币。

激烈的斗争开始了。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砸了店铺。斗争以工人胜利而告结束。纸币也按票面价值兑换了。局势缓和下来，但这是暂时的。资产阶级决定变换手段破坏政府发行的纸币。各种商品都开始涨价，起初不明显，过了两周，各种商品的价格就上涨得相当可观了。商品涨价实际上意味着工资降低，这引起了工人们的不满。分散的罢工时而在这里，时而在哪里不断爆发。后来罢工运动发展为群众运动。又因为发生罢工的那些企业，其资方往往是国民党员，孙中山的反对者们就试图利用罢工运动去反对政府。南方的和平被破坏了。工人们对于国

^① 指奠定了全国工运高潮的香港海员罢工（1922年1月12日—1922年3月8日）。

民党的热情冷却下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广州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五一”节那天，游行队伍沿着广州最宽阔的滨河大街行进。小船上写着革命口号的小红旗争相辉映。

工人队伍在行进，几百面旗帜迎风飘扬。每面旗上都写着工会的名称。前排的人用几根棍子抬着一面大鼓。鼓手们站在中间奋臂擂鼓。笙、笛、鼓乐交织在一起，鞭炮在脚下齐鸣。游行着拿着人工制作的狮子头，让它伴着炮鸣、鼓乐和人们的哈哈大笑张嘴闭嘴，睁眼合眼，奇形怪状的长龙在街上蜿蜒移动。

每个游行的人都拿着红纸做的小旗，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日万岁！”“五一劳动节万岁！”

我们登上了最高的一所楼顶观看游行的全貌。这是惊人的场面。各街道都挤满了工人。一片红旗的海洋。游行队伍宛若红色的巨流。这是海员工会的队伍，队伍前面稳健地开着一艘很漂亮的大轮船模型，上面插满了旗子，由隐在船身内的几辆汽车拉动。

中小学的学生们带着乐队从城里的四面八方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队伍整齐地走过。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共产国际万岁！”“青年共产国际万岁！”“苏俄万岁！”

我们下了房顶向游行队伍集中的公园走去。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正在那里分发专门写的宣言和传单，并就地出售共产主义书籍。我从像片看出来，这边是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那边是关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

我沿着公园的林荫道信步走到共产党员的队伍中。我感到人们在注视着我，注意着我的每一个动作。他们对于一个外国人来参加集会感到惊讶。有人向他们说明了我的身份，于是态度

马上就变了：我们友好地握起手来。

开会了。每一篇发言都是热情洋溢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以及工会的领导人都先后讲了话。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五一集会的一个场面，那是从华北到这里来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的一名工人在发言。

“我们宣誓，我们将万众一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说这些话时，他把食指放到嘴里，咬起来。经过了沉重的瞬间，他很吃力地咬破了手指，剧痛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孔。演说者拿起一小块白布，用血在上面写了“誓死斗争！”几个字。

集会结束了。游行的人们又涌到大街上。已经五点钟了，但到处仍然很热闹。入夜，游行变成了狂欢，几乎通宵达旦。

与1921年不同，当时广州五一庆祝活动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有店主们参加。而这一次游行是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许多共产党员来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两位成员陈独秀和张国焘也到会了。后者是共产党在1921年建立的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了召集全国劳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在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各省党组织的领导人。

在此之前，我已经会见了孙中山。我把会见的情况告诉了陈独秀，建议召开前来广州的党的领导干部会议。

约有二十——二十五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应当指出，当时全国党员仅有一百二十五名左右。这样，全党几乎有五分之二的党员已在这里。我们开会的目的，乃是讨论党在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应遵循的路线问题，首先是对孙中山的政府和他的党——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广州的局势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极端复杂化：首先，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支持军阀陈炯明并进行反对孙中山政府的宣传；其次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左右着国民党的政策。

我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做了报告，根据莫斯科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谈了关于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关心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那一部分人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在发言中，我具体说明了我们将与国民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指出工人阶级应支持孙中山政府。

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还不满一年。党员的人数不多，而且主要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党乃是中国唯一的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政治组织，她从阶级立场出发摧毁旧的作坊和行会，她所建立的实际上是中国无产阶级崭新的组织。中国工人阶级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不晓得有改良主义者。

现在党应该前进一大步，应该摆脱单纯的宣传工作和闭塞的小圈子式的工作方法，而登上群众性政治行动的舞台，成为中国历史的动力。欲达此目的，就要与孙中山以及他的党结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会议提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但要以保持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为条件。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在与孙中山谈判时所说的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不需要孙中山的同意。共产党随时可以让本党的这些或那些党员大量地或少数地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并影响其政策。我们谈的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以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我们认为，这样加入国民党就是反帝

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这一点我同孙中山也谈过了。当然，统一战线要有一个前提，即国民党不应对工人运动进行任何限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力，有罢工的权力。

4月底至5月初在广州举行的共产党的会议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广州组织的代表不发表意见，实际上企图把全国劳动大会拉向支持陈炯明的那一边去。前面我已讲过，他们是孙中山的反对者。

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他说是“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宗派主义者。尽管张国焘在讲话中承认，孙中山政府是中国最民主的政府，而陈炯明起的是反革命作用，但实际上他的立场对广州的代表有利，因为这种立场实质上是反对支持孙中山。

张太雷和瞿秋白支持我，他们所持的观点是，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

虽然与会者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广州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在这次会议后约一个半月，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表了《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声明，表示愿意同所有的民主党派合作。这个声明得到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赞同。不过，当时党还是反对加入国民党。

党内没有坚定的政治路线，以及广州党组织公开反对孙中

山的斗争，都对全国劳动大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受广州资产阶级的影响，孙中山政府方面同工会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政府采取了限制工人运动的作法。孙中山颁布了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工会召集代表大会必须呈请政府认可。此外，政府还有权撤消它认为不合适的工会领导机关的候选人，并将自己的代言人、甚至不是工会会员的人，安插进工会领导机关。

这是火上浇油。香港罢工时期形成的工人、资产阶级、国民党和孙中山政府的统一战线出现了裂痕。而且，在全国劳动大会的开幕式上，工人与政府之间发生了冲突。

当然，冲突是从选举主席团开始的。在大会上国民党的代表大多数是依据新法令指定的。他们要求主要把该党代表选进大会主席团。这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工人们严厉谴责政府和国民党。结果国民党方面的要求被绝对多数票否决。当选为主席团的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国民党人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尔后再也没有露面。代表大会以五一游行作为隆重的开幕式。第二天这一切就发生了。

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会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但多数是南方人。因为经费困难和警察追缉，从其它地区前来此地很不容易。大会的议事日程包括统一全国工会，为改善工人地位而斗争等等。有一项特别议程是审议代表们的提案。

劳动大会继续进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推行支持陈炯明的路线。大会主席张国焘在陈炯明的问题上与广州代表冲突起来，故而破坏了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自动放弃代表大会的领导职责，实际上不再担任大会主席。

“反正我对他们毫无办法”，他对我说，“南方人听不懂我的北方话，翻译过去又歪曲了我的意思，北方代表倒是支持我，但他们是少数。”

凡此种种，结果使代表大会在政治上没有方向，没有领导。广州代表仍然推行支持陈炯明的政策。他们能够这样做，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缺乏坚定的政治路线。

劳动大会过后不久，广州党组织在陈公博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反对孙中山的运动。在上海的党中央局收到一条提案，建议把广州党组织的领导者开除出党。但是，当时中央局没有决定采取这一步骤。只是在陈炯明占领了广州，并驱逐了孙中山政府以后，在陈公博公开地与陈炯明一起发表文章而且以此为荣时，中央局才决定将其清除出党^①。后来，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全部解散了。

劳动大会在市中心对面珠江岸上的“莫斯科河彼岸”进行。河上没有桥，我们坐渡船来到彼岸。拐进了一条喧闹的生意兴隆的小街。最后进了一座还没完全盖好的四层楼房。代表大会就在这里进行。二楼的礼堂装饰着旗帜和许多标语。

正在讨论关于争取改善工人地位的问题。发言的是汉口来的代表——一个人力车夫，这是一个健壮、魁梧的小伙子。他在报告汉口人力车夫斗争的情况。

“人力车不归车夫所有，而是车主的。租车每天须向车主交五角——七角钱。即使挣不到这么多钱，也得如数交付。汉口有一万人力车夫宣布罢工，要求改善租车的条件。”

这位代表是这次罢工的领导者，他向大会讲述了人力车夫如何顽强地斗争，以及如何取得了胜利。

大会快要结束了，按议程应讨论有关工会会歌的问题。当时中国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革命歌曲。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

^① 嗣后，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亲信走卒；再后，陈又加入南京傀儡政府，成为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间。后来一位代表说，他们那儿工人们编了一首歌。他念了歌词，这首歌不能使大家都满意。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决定建议各组织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推荐歌曲方案。很快，《国际歌》就被译成中文了，中国工人就唱起了这支国际工人的战歌。

大会选举了工会中央理事会后便告结束。大会决定，理事会将设在上海。南方代表们欣然同意。他们明白，如果理事会设在上海，他们将独立于理事会。南方人主张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制。

1922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那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了。为了强调青年团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大会特意赶在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召开。

需要强调指出这一点，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过去什么样的人都有，除了共产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一些莫明其妙的分子。在1921年，这些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分子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后来只好解散整个组织，并在为数不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建立新的、真正的革命青年组织。

代表大会在广州的一个公园里隆重开幕，由张太雷致开幕词。第一天是纪念卡尔·马克思。

到处都可以感到节日气氛，喜气洋洋。男人们穿着洁净的，刚刚熨平的长衫；妇女们，主要是大学生，穿着短裙；工人们穿上了新的蓝布裤褂。总共约有五百人。

台上是主席团，上方悬挂着卡尔·马克思的大幅肖像。纪念大会开始了，共产党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作了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讲演。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一天过得很愉快，在距马克思的祖国一万五千公里的广州，在距莫斯科有二十天路程甚至还要远一些的地方，在遥远的中国，在几乎是热带的地方，隆重纪念着一个学说奠基者的生辰，——这个学说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代表中国各城市十五个组织的二十五名代表参加了这个代表大会。我受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在发言中，我不仅转达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代表大会的祝贺，而且说明了这个组织的性质、任务，强调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现实意义的青年共产国际的那些原则。

代表大会通过了团纲和团章。团纲指出：中国分裂为大大小小的督军辖区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直接结果，国际帝国主义得到中国卖国贼、汉奸的支持，这些卖国贼把国家的资源出卖给他们的外国主子。团纲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比国际资本主义好，因为它也采取与外国资本家同样的剥削方式。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使中国的人民大众：贫苦农民、小商人、小工厂主和其它劳动者遭到破产^①。

农民和小私有者既遭到破坏，这便促使他们去进行斗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双重压迫。团纲强调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这场革命的结果，是能够得到民族独立，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以及进行全民投票选举中央国家机关。工人阶级参加这场革命，帮助推翻旧制度，从而

^① 当时通过的团纲原文是：“中国的分裂和内乱既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植，加之又有一班由国际资本养成的外国资本家走狗、汉奸、卖国党，在现在及最近将来更能把中国一切的经济生命尽量卖给外国资本家。……国际资本的压迫日甚一日，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之失业和贫困也就跟着日甚一日。他方面，大都会又产生了欧化的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也采取外国资本家同样的形式用资本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见《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译者

受到锻炼，准备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①。

下面又说：虽然工人阶级从小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一定的利益，但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一旦小资产阶级推翻了军阀统治，它自己就变成为统治阶级。团纲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刚一结束，我们就应当立即着手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把全部政权转交给工农苏维埃。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启发阶级觉悟和培养青年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最近的目标^②。

团纲还指出了青年们的特殊任务和要求。其中有：为未成年工人建立六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还提出了以下要求：青年工人每周至少有连续三十六小时的休息，节日休息；颁布国家法令，规定对青年工人的劳动保护以及保护艺徒不受老板剥削。

团纲对青年的教育和文化启蒙工作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讲到了关于免费教育、大学自治、扫盲、建立俱乐部、自修小组等等。

团纲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宗教迷信。青年团认为，

① 团纲的原文为：“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双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的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力。……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见《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译者

② 团纲的原文为：“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力，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战胜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同资产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见《先驱》第八号，1922年5月15日）——译者

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是国际问题，从而宣布与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团结一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出了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特别决议，以此强调表明了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

这样，建立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全国统一、集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结束了。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①。

1922年5月10日代表大会闭幕。中央委员会驻在地的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这对党和青年团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还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就和陈独秀以及筹备大会的组织处成员们谈过这个问题。我谈了一个想法，认为把中心工作转移到广州比较合适。但是同志们不同意，于是决定把团中央仍设在上海。看来，语言的障碍在这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在瞿秋白与懂英文的广州代表谈话时需要我当翻译。瞿秋白说俄文时我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再这样反过来。

代表大会结束以后的第三天，即5月13日，我已经写信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重新考虑已有的决定。我在信中写道，团的主要任务是把狭窄的学生小团体变成青年工人的群众性组织。刚刚结束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地下秘密状态以及北方警察的迫害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大障碍。青年团的主要成分是学生，他们没有合法工作的实际经验，没有学会与青年工人、农民打交道。孙中山政府控制下的南方的合法条件为此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没有在工农青年中进行工作的经验，而且又是在秘密的条件之下，把团变成青年工人组织的任何议论都是徒劳的。

同时，广州正在成为现阶段反帝民族解放革命的中心，这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一点越来越明显了。拒绝把司令部迁到广州，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孙中山政府、对国民党、对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持否定态度的结果。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所在地问题，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月后，广州局势发生剧变。革命中心所在地问题就从议事日程上消失了。

十、与孙中山最初的几次谈话

孙中山之所以载入中国史册，首先因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袖；再者他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改变中国革命方向的倡导者。

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当他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时，他离开家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去找哥哥，后来在那里的英国学校读了五年书。

1883年孙中山回国，在广州的一个医科专门学校继续受教育，后来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毕业。按所受教育孙中山是一个医生，不过他行医时间很短，他把自己觉悟的一生献给了革命活动。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建立了革命组织——兴中会。孙中山在南方第一次组织武装起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只得跑到欧洲，后来又辗转到与中国邻近的日本。从那里孙中山组织了广东的起义，但又遭失败。

1905年，兴中会与另外两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新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曾在1906、1907和1908年三次举行起义。后来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日本将这些起义的组织者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侨居到美国。不久，新的起义酝酿成熟了，这一次是在华中的武昌。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中国革命的开始，同年12月，孙中山回到中国并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以后，孙中山犯了一个大

错误——他自愿辞去总统职位。这就为中国反动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踏上这个职位开了路。

新的斗争时期开始了。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于1913年和1914年发动了反袁起义。两次起义都以革命力量失败而告终，于是孙中山又流亡到日本，他再回国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了。

凡尔赛和约、日本夺走德国在华的殖民地、五四运动、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就是导致孙中山于1921年组建广州政府时的局势。这次胜利是通过与军阀陈炯明的妥协而取得的，因而基础是不牢固的。

这就是孙中山的简历。其中包含着一系列不成功的起义。失败的原因，首要的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关系尚未成熟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

我到广州的时候，孙中山政府正在经历新的危机，其原因是与陈炯明的冲突。就在我到来的前几天，仍旧忠于孙中山的军队刚刚占领了广州，把“同盟者”挤了出去。不过，这不是危机的解决，而是危机的加深，因为陈炯明的军队就驻在附近。

城里已经是一片安定的气氛了，滨河街上挤满了人，店铺也开张了。简直不能相信，就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曾兵戈扰攘。

这时在华北，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已启战端。英美支持前者，而日本支持后者。这两个军阀之间的战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角逐。很明显，华盛顿会议并没有缓和列强之间的矛盾，反而使其更尖锐化了。日本着意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反对“门户开放”政策。英国也主张维护“势力范围”，但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威胁了英国的利益。在现有的形势中，美国决定支持英国，从而也支持吴佩孚。

既然孙中山认为在其斗争中可以联合军阀，那么与“自由派”的吴佩孚协同行动反对张作霖就是最合情理的。不过孙中山却采取了相反的作法。他想利用北方军阀的混战打击主要的对手——掌握着华中的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军事协定就是为此目的而签订的。

许多人，甚至孙中山的某些朋友，对于同最反动的军阀张作霖结盟是不理解的。敌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利用这一联合搞宣传，反对孙中山。

北方军阀混战方酣，广东孙中山与陈炯明发生了冲突，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将要初次会见孙中山。这是1922年4月27日。

在约定的钟点，我和张太雷、瞿秋白一起乘车来到了孙中山的总统府。当时孙本人及其政府都在这里。汽车停在典型的中国式的带飞檐的门楼前。这是可以进出高墙围绕的宫院和与之相毗连的楼房的唯一通道。

趁卫队长打电话与某人联系和办理入门证明的时机，我仔细环视了第一个院子，这里驻扎着警备司令部和大约不下一营的士兵。

第一眼看到的是堆堆篝火，上面煮着饭食。篝火旁围着一群群的士兵，稍远一点的地方，堆着架起的来福枪。这场面象是在刚占领的地方露营。

人们一直在忙乱和奔跑。军官们跑来跑去，发布命令，更换岗哨。士兵们就睡在地上的阴凉处。令人感到整个局势紧张而不平静。

通行证办好了，一个军官应派前来，带领我们进入座落在高岗上的总统府。我们穿过许多道内门和僻静的庭院，最后在一个台阶旁停下。这里的武装卫队没有步枪，挎的是毛瑟枪。

上山的台阶被严密地遮掩着，象一个筐子。里面黑洞洞的象隧道一样。广场上到处是岗哨。天很热。上山要走很久。我们汗淋淋地好不容易走到“人世间”——一个栽满树木的小平场。又过了一道岗，我们才进入了总统府。我被带进了将和孙中山会晤的那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和四把椅子，石头地上铺了一张普通苇席。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墙角上立着花儿，上面摆着银制的小花瓶。

几分钟后，孙中山进来了。他中等身材，穿着竖带领领钩的灰色弗列奇式上衣，中国式的漆皮鞋。当时他五十五岁。他的表情和姿势表现出典雅、沉静，缓慢的动作给人以某种恬静的感觉。有了初进总统府门口时的印象之后，这种沉静、安详更显得突出。门口那里的人们在奔走、忙碌，而这里却是沉着、缓慢。从容不迫。

孙中山冷静的外表与传说并不一致。据传在战时，孙中山曾亲自开炮射击敌人。

孙中山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富于热情，目光炯炯，很象列宁。我对这两双眼睛的相似感到惊讶。孙中山目光的敏捷与外表的平静也是相矛盾的。

我们坐下来，马上就送上茶来。

我向孙中山递交了说明我的全权代表身份的信件，并转达了苏俄工人、农民的敬意和对他在工作和斗争中取得成就的良好祝愿。我同他谈话时，强调了“总统”一词，以示与所有外国帝国主义报纸相反。外国报纸不承认他的总统职位，只简单地称其为“孙博士”。

他在回答我的祝贺时，畅叙了他对苏俄的友好感情，表示很乐于向我介绍华南的情况和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

我们谈话的中心是关于陈炯明的问题。虽说发生了武装冲

突，陈炯明名义上还仍旧是广州政府的陆军部长。我确实晓得孙中山向陈炯明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谈判关于消除冲突和陈炯明返回政府的问题。谈判的结果我不清楚。我提出了关于和解的可能性问题。孙中山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并提高了声调说：

“我是总统，部长们应当服从我。他反对我，反对共和国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定不服从，那么他将被消灭。没有任何和解可谈。”

不过，这次谈话以后，孙中山的几个代表团又去找陈炯明进行了谈判，但是事实证明没有任何结果。

我们转到了与吴佩孚斗争的问题。孙中山告诉我，已经调补充部队到北线，同时以很乐观的语气谈到了北伐和迅速取胜的必然性。

话头又转到了苏俄的形势。孙中山对红军的人数、其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然后，孙中山询问了列宁的健康情况。在会谈结束时，我们约好以后将再会晤。

当时，我有些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感到孙中山很矜持和谨慎。另一方面，他希望经常和我见面，说明他打算与苏俄建立联系。

在后来的会晤中，专门讨论纲领问题时，我搞清楚了孙中山对我若即若离的原因。当时我们谈到俄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最初谈话的中心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孙中山反复询问我这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苏维埃、红军和自由对人民大众的意义等问题。孙中山听得很仔细，然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这样的问题我只好一笑对之。我说，对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来说，一个县的战场太小了。但我明白孙中山建议的含义，孙中山知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知道，广州的共产党人反对他，而我和这些人经常会面；他知道，广州工会已经脱离了他。很自然，孙中山一开始对我曾有某些怀疑，但是我的话与广州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并不一致。

在一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出人意料的建议，是孙中山在试探我的意图。所以，我只开了句玩笑作为回答。然后我向孙中山阐明了我们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及其可行的纲领等问题的观点。这些问题成为我们会谈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活跃起来，他的紧张神情消失了，眼睛里放出热情的光芒。他开始向我介绍他亲自写的党纲。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两篇演说分别阐述了这个纲领。

在这些文件中可以感到孙中山精心研究过的那种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经验。他试图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应用于中国国情。孙中山不讳言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他在自己的演说中说：“和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人民的政府，人民选举的政府，为了人民的政府’是相通的。这些原则不论对欧洲人，还是对美国人都是最高成就。中国也有同样含义的话。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族、民权、民生。”^①

① 1921年3月21日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全文作为附录载于拙作《在中国革命的行列里》一书中。（作者所指的演说，从时间和内容看，当指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一文。但对照原文略有出入。原文为：“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话是相通的。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他译作民有、民治、民享。”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二集，第207页。上海民智书局，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初版，八月再版。——译者）

孙中山当时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居住在中国的五个民族(汉、满、藏、蒙、回)通过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途径融合成统一民族。孙中山纲领的这一部分只字未提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三民主义”原则上建立的新中国,应当成为独立的国家,但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吸收外资。

孙中山的“民生”首先指的是对土地“按比例”收税。土地问题是纲领中这一部分的中心问题。收买部分土地,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按比例收税——这就是“三民主义”中阐述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同时废除土地私有制,国家只是规定了可以节制大土地所有制形成过程的按比例收税的办法。

关于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列宁早在1912年就有论述。他写道:“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接着列宁又继续写道:“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①列宁指出了孙中山的土地纲领与俄国民粹派纲领的相同之处。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是反动的。因为尽管纲领本身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土地改革只能加速它的发展。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这毕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页。——译者

的改良。

孙中山当时在农村力图依靠的，不是贫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富农，而是中农和小农。农民的利益在这个纲领中主要是在调整税制这一部分中有所反映。孙中山哪怕仅在他占领的广东省境内迅速、彻底地实行这种税制改革，他就可以把几百万农民争取过来，有他们的帮助，他也能够胜利地继续进行斗争。但他没有这样做。

当我问孙中山，他为什么不实行自己的土地纲领时，他回答说，现在他面临的是军事任务，他要把全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放出来。只有到那时，才能实行土地纲领。这就是他以往斗争的基本错误。如果依靠了农民，他就不会在斗争中经常遭到那样多的挫折和失败。

孙中山不懂得，他的纲领反映了哪些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不知道，在斗争中究竟应当依靠谁和怎样争取群众。他以为，他的思想和声望就能使敌人放下武器。孙中山认为防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避免阶级斗争是可能的。他知道阶级斗争的起源，也懂得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他说，欧美的全部不幸就在这一点。那里“财产分配不均”，那里群众贫困，而国家全部财富都集中在资本家手里。

孙中山说：“由此可见，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有人说，中国没有大资本家，这是实在的情形。”^①从这里他得出结论，中国不可能有阶级斗争。但是，按照他的意见，危险就在于大资产者能够出现。需要和这种情况斗争。不应允许大工业、铁路、煤矿、矿山的私有。这会引起“财产分配不均”，

^① 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二集，第211页。上海民智书局，民国十九年二月初版，八月再版。——译者

会在中国重蹈欧美的复辙。

“欧美社会在今日之患不均，便是吾人极好的教训，……所以兄弟提倡民生主义，讲到归宿，不能不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①

简单地说，孙中山当时关于民生主义的学说就是这样。把古代中国村社理想化是民生主义的基础。他自己说过：“……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②

资本国有化的学说即归结为节制大私有生产的发展，因为它使中国手工业、小商业、农业均遭破产。同时，深谙英、美的孙中山懂得现代技术比之于中国落后的中世纪技术的优越性；大机器工业比之于手工劳动的优越性。他认为把先进的现代技术引进中国是必要的，并详细拟定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但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是根据资本的国有化，根据对铁路、港口设施等等的国有化。实质上，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中国铺设铁路网，这是孙中山的夙愿，他非常喜欢谈及。孙中山写了一本专著《建国方略》专谈此问题，在这本书里，他论述了中国达到国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性。这本书已被译成俄文并由国家出版社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书名出版（新译文见：《孙中山选集》，莫斯科，1968年版）。

孙中山经常问我，苏俄能不能帮助他实施此计划，即着手在中国大规模地建设铁路。他认为建设一条铁路，经过苏联的土尔克斯坦^③连接莫斯科和广州，是实现其计划的首要的和基本

① 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二集，第211页。——译者

② 同上。

③ 在二十年代初，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等苏维埃共和国所在的地域仍沿袭旧习泛称为“土尔克斯坦”。

的任务。孙中山把建设这条铁路视为中国革命最紧要的事业。现在他有充分的理由指靠苏俄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按照孙中山当时的理解，“五权宪法”阐述了“民权主义”的原则。实质上，这个宪法乃是一部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的斗争时期，它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纲领。应该考虑到，中国无产阶级只是在孙中山的晚年才开始成为“自在阶级”。因此，孙中山只是到晚年才能用新观点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

目前，他还是按老办法办事，依靠的主要是军队。

十一、北 伐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方支持孙中山：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香港罢工时他援助过工人；他反对英国把持华南。同样还应当看到：不管孙中山本人是否愿意，他在广州维持住政权对抗华中的军阀和他现阶段的斗争，都是符合南方自治主义者利益的。自治主义的基本力量主要是供应地方市场的半作坊、半手工业型的小工业。它们害怕外国与中国大资本的竞争。

孙中山是全国的重要人物。他是辛亥革命的领袖。那个革命推翻了以北京为首都的清王朝的统治。对孙中山来说，南方的广东只是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跳板。统一的趋势和孙中山一贯的统一中国的政策与南方的割据主义、自治主义的趋势发生了冲突。因此，南方的小资产阶级对孙中山的北伐持反对态度。陈炯明利用南方自治的趋势，并助长实行瓜分中国政策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从而加强了自己和华南的地位。

孙中山地位动摇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确有效的社会纲领。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非阶级”立场上，不懂得在斗争中依靠谁。他没有关于工人问题的任何纲领，总是低估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用国有化吓住了资产阶级，他还没有公开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

在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我表示了这样的想法，即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用外国资本国有化的要求来代替泛泛的资本国有化纲领。我们就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孙中山说，他不能这样

做，因为他作为社会主义者，既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外国的资本主义。这是托词。他当时并不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同时又用资本国有化的口号吓跑了民族资产阶级。

他的全部策略说明他缺乏具体、现实而并非抽象的社会纲领：过去这表现为经常的军事起义，而现在则是同国内的这些或那些军阀妥协，建立自己的军队，获得军事胜利，这一切之后才是社会改革。

中国的军队是雇佣的。没有全民兵役制。每个督军（军事省长）都有自己的军队，主要地是利用通过税收从本省农民搜刮到的钱财维持。由于不断的内战、苛捐杂税、歉收、高利贷者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农民不断破产。极不发达的工业不能吸收农村抛出的大量劳动力。

几百万破产和贫困的农民在全国流浪，只求谋一口饭吃。他们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组成了土匪集团抢劫城市和乡村，课以各种苛捐杂税，到处勒索。另外一些破产的农民充当了督军的雇佣兵。

在南方，孙中山在广东所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支雇佣军队。它给人以惨淡的印象。不仅孙中山的士兵，而且连军官，从低级军官到将军，都是雇佣者。这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民革命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是追求个人名利、贪脏受贿之辈，把军人职业视为生财之道。

我对孙中山说，这样的雇佣军队不能实现国民革命，这样的军队是靠不住的。我同他谈到了建立国民革命的军队问题。

孙中山同意这个说法，但他回答说：“首先应当清除国内的军阀，然后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这是他的又一个错误。

孙中山还是看出了其军队的消极方面。后来，按我们顾问的建议，他建立了黄埔军校，为以后国民革命军造就了骨干。

我们还谈到了国民党。这个党，组织松弛、涣散，很难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称之为政党。我询问党的人数，孙中山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大数目字。他察觉了我的惊疑，解释说：“举个例子，上海大学生代表大会支持我，你知道，中国仅大学生就有多少？再加上我的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军队，总计有十万人。”

孙中山竟把这十万雇佣兵看作自己的党员！

当时内战正酣。北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军队正在打仗。这对孙中山开始北伐打吴佩孚是最有利的时机。但是与陈炯明的冲突，仍象过去一样，影响了军事行动。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他摇着拳头，脸涨得通红对我说：“我最好的朋友陈炯明背叛了，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孙中山决定还要北进。按他的观点，革命只是一场战争，战后开始重大的改革。战争对于孙中山来说，还不是革命战争与社会改革的结合。

孙中山亲自率军北上了，但是南方无论从军事观点、社会观点、或是政治观点来看，都没有巩固的后方。在后方没有解决与陈炯明的冲突。这个冲突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倾向，一部分党员明显地同情陈炯明。广州资产阶级方面对孙中山若即若离，孙中山的政府也没有得到工人的全力支持。

因此，孙中山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是不巩固的。而且为解决北伐的主要任务，他能指靠的只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首先靠的是刚招募的近五万名士兵的军队。指挥这些军队的军官们则与国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他还指望得到其他省份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由于某些原因，反对力图独揽中国大权的吴佩孚。

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军事联盟使吴佩孚不可能调动全部军队反对孙中山。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即广州政府和据有福建、

浙江两省、拥有近六万军队、与张作霖一样亲日的安福系^①订立了军事联盟。最后一点，四川军阀为了维持本省对吴佩孚的独立局面，而在军事上与孙中山搞联合。陕西的督军无论如何要把竞争者从本省的另一半地区赶走，所以陕西省的部分军阀也支持孙中山。除了五个恪守中立的省份（云南、贵州、广西、山西、湖南）以外，其余各省都在吴佩孚方面。

看一下中国地图，很容易判明，同孙中山结盟的任何一个省都不与广东毗邻。孙中山面临的任務，首先是同最邻近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因为在北伐之初，孙中山实际上依靠的只是广东省的五万军队，可是在广东境内广州城外就驻有五万陈炯明的部队。

孙中山战略计划的第一个要点，在于占领江西省。此后，各省联合力量方得从四面围攻吴佩孚：从南边——四川、湖南和江西省的军队；从北边——张作霖的部队；从西边——山西省的军队；从东边——安徽省的军队。不过，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孙中山还没出兵，他的兵力最强大的盟友张作霖的部队就被吴佩孚的军队打败了。

孙中山决定在没有张作霖配合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军事计划，他指望，到了盟军总攻时，张作霖能恢复元气并且还能从北边打击吴佩孚。

孙中山到了前线。他的部队顺利地攻进了军阀力量薄弱的江西省。等到江西一半已被占领时，孙中山凯旋返粤，料理政务。

这时，我又一次会见了总统。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宋庆

^① 安福系的领袖，后来北京临时政府的执政段祺瑞，当时曾到广州同孙中山谈判。这些谈判和段祺瑞的私访一直保密。（此事未见于国内的史料。——译者）

龄，她当时三十二岁，但看起来还要年轻一些，她同丈夫讲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国外长大的，不懂中文。1914年她嫁给了孙中山，直到丈夫临终，她一直是他的秘书和助手。

孙中山为前线战事兴高采烈，并且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再过两周，至多一个月，他一定会占领汉口。

“那时我将正式承认苏俄。”——孙中山兴奋地对我说。

我们已经谈过这题目。孙中山对苏俄很友好。这一次我们谈的是宣布国民党对苏俄态度的文件问题。孙中山轻声回答我说：

“你认为国民党所有党员都赞同苏俄？没有的事，甚至在我的政府和议会里都有苏俄的敌人。”他于是马上暗示，原中国驻美大使伍廷芳博士就属于这一派， he 现在是孙中山政府的外交部长兼广东省省长。

“况且，”孙中山继续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孙中山的会见甚至对某些政府成员和议员们都严格保密的原因。他只是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们才谈到我。

我们又重新转到军事问题。孙中山出乎意料地突然问道：

“苏俄能不能象在蒙古一样，在满洲发动政变？”

我被问得不知所措。

他继续说：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它在麦尔库洛夫的帮助下霸占你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张作霖的帮助下霸占了我国的满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那时苏俄的帮助就特别重要。”

总之，孙中山完全清楚他同张作霖联合的性质，并已有了对

付他的明确计划。不过关于蒙古问题倒是必须解释清楚的。

我向孙中山讲述了蒙古事件的始末。因为他所得到的消息仅限于中国的英文报刊。我对他说，今天，革命的蒙古，蒙古人民建立的国家，其实质与中国革命力量是相同的。

孙中山决定重返前线。动身以前他把我介绍给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按他的话说，这些人是苏俄的朋友，并委托他们随时将诸事进展情况告知于我。

这些人是：曾琦——广州政府的内政部长，林森——议会议长，詹大悲——一位四川省政府的军事代表，孙中山很欣赏他，他在政治上是孙中山的红人。确实，这是一个精力充沛并很能干的人，办事踏实，负责任。在这些人里还有杨仙逸——广州兵工厂的总监。这个职位是重要的，兵工厂要供给军队武器。

内政部长曾琦是一个最怪的人，我经常与他见面。他在滨河街上一家大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从房间的杂乱无章可以看出，他只是在这儿过夜或顺路在这里与人们见见面，就赶快离去。桌子上报纸、烟头狼藉，摆着一些空汽水瓶，杯子里剩有残茶。这一切有点不象中国人——很随便，不讲客套。

经介绍我认识了当地一位银行家。他总是说，他是苏俄的好朋友。为了进一步互相了解并推心置腹地叙谈叙谈，有一次他邀我去一个饭店吃饭。同时赴宴的还有曾琦和广州政府的几位知名人士。他们反复详细地询问我关于苏俄的情况，结果，我的回答成了关于我国革命的一个大报告。在场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每翻译完我的一段话时，他们总迭声称赞：“好！好！”

我打定主意揶揄一下银行家，就对他说，我们把银行收归国有了。他大笑起来并回答说，他是革命者，终生献身革命，并讲了自己的经历。他象孙中山一样，早在青年时代就侨居马

来群岛。在那里他发了财，并把钱财献给中国革命事业。后来回广州。在这里他作为银行家资助国民党，他本人早就是积极的国民党员了。这是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所依靠的中国新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宴会上我结识了几位同时赴宴的人。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孙中山向我抱怨人手缺乏。他说，他很需要后方的组织者、行政人员、搞国家经济，而不是搞私营经济的人员。孙中山曾反复问我，苏俄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表示希望得到苏俄专家的帮助。

孙中山又回到了广州，前线战事进展顺利。政府需要钱和武器。因为前线扩展了，还要与军阀们进行新的协商。军费开支也在增加，孙中山向美国人要求援助。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的影响多么强烈地反映在孙中山的政治纲领中。他在美国有很多私人朋友。美国在推行其对华政策时，并不反对在一段时间里支持孙中山，以故意刺激日本和英国。孙中山却对这种支持寄予很大的希望。极端亲美分子和苏俄的敌人、年迈的伍廷芳，被委以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职务不是偶然的。

孙中山政府因感到财政困难，向美国要求援助。然而，当时后者认定，对他们来说，吴佩孚是比孙中山更有用的人物。美国要支持吴佩孚去打以日本为后台的张作霖。

在这样的形势下，孙中山与美国谈判的结果是能够预料到的。美国人虽没有拒绝谈判，但是千方百计地回避提供贷款并在其他问题上对孙中山施加压力，包括美国要求孙聘请美国顾问进入孙的政府。孙中山同意了。然而，美国人还是不给钱。

尽管与美国人的谈判严格保密，但是纸包不住火，我已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谈判的情况。在同孙中山的一次例行会见时，

我就这个方面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孙中山证实了聘请美国顾问一事，并且对我说：顾问将不致影响政府的政策。

孙中山没有讲谈判的其他细节。他只告诉我，他有许多美国朋友，有时他和他们会面。

我把话题转到另外的方面。孙中山现在放弃了以前我们共同商定了的事情。来自美国方面的强大压力已可感到，这一次他待我很冷淡。

分手时，我告诉孙中山说，我打算离开广州。他请我无论如何不要走，把这一段时间专门用来详细研究南方的情况。我又感到孙中山仍然举棋不定。

和美国的谈判几乎一直拖延到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倾覆，但是孙中山没有得到美国的任何援助。人们对我说：“美国人欺骗了总统。”

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他曾那样相信美国的民主和指望美国的援助。

从这时起，孙中山的观点开始了急剧的转变，开始“重新估价”^①。紧接着发生的一些事件促成了这一转变。

距离广州不远就是澳门，它早已被葡萄牙商人霸占了，并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在那里有葡萄牙的总督，葡萄牙的军队和警察，但居民却是中国人。在1922年5月28日至29日的深夜

① 许多年过去了，1959年著名的美国教授沃尔特·罗斯脱在其《冷战和不发达国家》的文章中写道：“孙中山没能得到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援助，此后，他要求莫斯科的领导和援助。”（杰拉尔德·埃尔伯斯和保尔·顿肯合编《科学革命：挑战与希望》，华盛顿，1959年版，第48页）这些话责备美国总统沃伦·哈定不支持孙中山。但是当1965年罗斯脱本人在林顿·约翰逊总统麾下担任美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时，他成了越南战争升级的鼓吹者。按他的建议，美国给越南南方反动派以军事和经济援助。罗斯脱的帝国主义政策超过了哈定。

里，一个葡萄牙士兵在黑暗的角落里企图强奸一个中国妇女。一个中国人闻声跑来与强奸者搏斗。葡萄牙士兵拔枪打死了这个前来救助的华人。于是一大群中国人走上街头抗议强奸和杀人暴行。一队葡萄牙的士兵开枪镇压并有意寻衅。结果近一百名中国人被杀害。葡萄牙人野蛮残暴，他们居然用刺刀挑死已经受伤的人。

第二天清早，广州全城知道了这个消息，人们无比愤慨，很多人走上街头自发地组织了集会。广州对外联合会领导的汹涌澎湃的反帝运动开始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这场运动。

当天在广州公园里举行了群众集会，会上通过了下列决议：

“1.要求孙中山政府收回澳门，并派舰队前往保护中国公民。

2.宣布对葡萄牙人全面断交，停止在葡萄牙人的家里和他们的各种工厂里做工；抵制葡萄牙商品，通电各城市吁请援助死难者和受伤者的家属；停止向澳门运送食品 and 一切日用必需品；停止供应澳门净水及排除污水。”^①

孙中山政府向葡萄牙当局发出抗议照会，计有五点要求。其中有：一，由澳政府派代表同葡领向本政府道歉。二，将杀人军警及长官严办。三，优恤死者家属、伤者药费^②。澳门当局拒绝接受这些要求，于是激起了澳门和广州中国人更大的愤怒。人们开始组织义勇军。义勇军的队伍封锁了澳门。中国居民（华人）决定离开澳门迁往广州。澳门变成了一座被围困的堡垒。

① 引文未经查证。——译者

② 见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1922年6月10日。——译者

广州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救助离澳返穗的同胞。进行了募捐，收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

对澳门的封锁一直持续到孙中山政府倾覆。整个这段时间里，在大街上和室内，昼夜都在接连不断地举行群众集会。

澳门事件再次使工人、城市贫民和相当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团结在孙中山政府周围，结成了反帝统一战线。尽管澳门仍在葡萄牙人手中，葡萄牙人信服了，任意摧残中国人而不受惩罚的时代过去了。

这样，孙中山在北边顺利的军事行动就与后方反帝运动的高潮遥相配合。不过，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很久。

十二、陈炯明叛乱

张作霖与吴佩孚交战败北以后，被迫从华北退回满洲。他宣布了满洲独立，也不再希图夺取北京和统治全中国。

吴佩孚的军事胜利意味着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地位的加强和日本作用的减弱。英、美盘算借助吴佩孚把霸权扩大到全中国。吴佩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并进行了广泛的蛊惑宣传，力图争取社会舆论。他开始大谈国内和平、国家统一、缩减军队和召开议会。这些声明对华中资产阶级发生了很大影响。报刊上开始侈谈未来的改革。吴佩孚甚至扬言同意在北京召集“旧议会”，也就是孙中山在广州所召集的并于1921年宣布孙中山为中国总统的那个议会。有这种传闻，如果将来在北京召开的议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吴佩孚将服从。

1922年6月3日，我和孙中山谈过这些问题。他说，吴佩孚的声明是过去解散议会罪行的自白书。因此议会回到北京的条件，应是惩办解散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祸首和解除吴佩孚军队的武装。另一个条件，是让孙中山的军队开进北京。他说，这一切应保证议会的正常工作，保障国会不致再被解散。至于议会重新选举总统，孙中山则拒绝了，因为他不久前才被选任此职。

同时，中国资产阶级的报纸继续鼓吹那个扬言要实行社会改革和实行民主的吴佩孚。这纯粹是一种蛊惑性宣传。借助这种宣传，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企图拆孙中山的台，并制造舆论准备推翻这个“中国和平之破坏者”。

报刊的鼓噪甚为猛烈，以致孙中山在1922年6月6日被迫发表了关于国家局势的特别声明^①。在这个文件中，孙中山历数了北方军阀非法解散国会后，由于1917年开始的战争和内讧，使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他表示，希望吴佩孚的主张是真诚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要求。

首先，孙中山要求惩办解散国会的罪魁和保障国会安全。他在与我的谈话中也曾说到过这一点。他建议改组军阀军队为工兵，“收其武器，予以工具，每日作工六小时至八小时，先修治道路，次及其它工事”。按照孙中山的建议，其工作所生产的纯利，“以一半归于国家，以一半归于工兵，论人数均分”。孙中山在声明中指出：“如此，则一转移间，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铤而走险之虑。工事日繁。有生产发达之象。”^②

孙中山同时还建议编制二十万——三十万的国军，定为义务，两年一易。孙中山声明说：“此法既行，既有不逞之徒，亦无武力以为之衅。毁法之祸，可不再作。”^③按照孙中山的计划，吴佩孚的军队应缩减一半改为工兵，以表和平之念的诚意。

如能履行此项条件，孙中山表示，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协力谋划恢复国内秩序。

当然，这些条件是军阀吴佩孚及其后台帝国主义列强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好象是回答这个声明，吴佩孚指派了原独裁者袁世凯的副职，被视为反动分子的黎元洪代替跑到天津的亲日分子徐世昌当总统。

① 指《徐世昌辞职后对外宣言》和《工兵宣言计划》。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二集，第27—28页。上海民智书局，民国十九年二月初版，八月再版。
——译者

② 同上。——译者

③ 同上。——译者

中国都知道黎元洪无德无行，叛变共和，是内战的祸首。黎元洪在到北京就任总统的宣言中自己承认：“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①

1922年6月10日黎元洪的旧日老友，曾任广州政府成员的郭泰祺特意致书黎元洪，揭露黎在袁世凯死后的反革命作用。接着是伍廷芳的声明，以及最后孙中山发表声明要求列国不得承认黎元洪为总统。

这时，孙中山的军队在江西省顺利地向前推进，英帝国主义者则在孙中山军队的后方暗中策划陈炯明的武装叛乱。

吴佩孚表面上发表宣言，声称希望和平、立宪和治国，而在实际上与陈炯明勾结在一起，以打击孙中山。吴佩孚的奸细们在南方进行鼓动并设法说服在广州的议员们回北京。

在这样的局势下，南方的盐场和屠宰场爆发了工人罢工。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食盐是国家专卖品，系政府收入来源之一，屠宰场供应城市肉类。有人报告，场主们为“北伐军需”捐助了一大笔款，收买警察镇压罢工。广州警察局长魏邦平是一个反动家伙，一个贪官，人品极坏，政变以后他首先背叛了孙中山。现在他开始镇压工人。许多罢工领导人被捕，在警察局遭到毒打，工会接连被封闭。

镇压的结果使所有工会与罢工工人团结起来，广州当时有总同盟罢工的可能性。这次罢工运动失去了往日纯经济斗争的特点，而变成了政治斗争。工人们要求罢免魏邦平。

我为此与孙中山谈过，提请他注意政府反对工人的危险，说明了国民党与工人群众联合的必要性。孙中山当时没有作声，然后回答我，关于殴打工人一事他毫无所知，他将查明此事。魏

^① 见《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号，第53页。——译者

邦平没有被罢免。这一切削弱了由于澳门事件而增强的人民群众对孙中山政府的支持。魏邦平的行动有利于陈炯明和吴佩孚。

这时，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张秋白议员回到了广州。我在那里已认识了他。孙中山很快接见了。张秋白对苏俄非常满意。他对我讲，他正在这里进行争取中苏结盟的运动，正在写关于莫斯科之行的书。他的报告对孙中山起了很大影响。

在我们的一次例行会见时，孙中山对广东距离苏俄国境太远深表遗憾，我们谈的时间不长，约定近期再见。但后来再没能相会。

1922年6月15日深夜到16日凌晨，我被枪炮声震醒。早晨，我打算外出，但是别人提醒我，城里正在打仗。

就在6月15日那天深夜，陈炯明派军队包围了广州并且炮击了孙中山的总统府。陈炯明的军队没有遇到特别的抵抗就进了城，因为孙中山的军队还在北边前线。孙中山跑到仍忠于他的军舰上。他的夫人和最亲密的同事宋庆龄扮装成女佣人躲到了沙面。孙中山的老朋友和战友廖仲恺的夫人也躲在那儿。不久，她们二人一起到上海去了^①。

第二天，市里有的地区还在政府军手中。滨河大街上还有枪声。

我到底走到了东山。斯托扬诺维奇的住宅里一片慌乱气氛。孙中山从自己的军舰上炮击敌人阵地，现在已有六发炮弹落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东山，爆炸声震得玻璃都响了起来。

我们谈论着孙中山。他犯了许多错误，造成了他的失败。我经常与他争论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但这是与一个在斗争

^① 此处与史实不符。可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何香凝：《我的回忆》一文。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33页。——译者

中屡遭失败而从不气馁的革命者的争论，是与一个目睹祖国遭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抢劫而痛感忧忿的人在争论。

他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是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下产生的。但是，不仅在其活动的性质方面，而且在其全部思想和个人品格方面，孙中山始终是一个革命者。

现在，在我们谈论孙中山的时刻，这个勇敢的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顽强地抵抗叛乱者。孙中山没有离开广州，他在自己的军舰上继续斗争，炮击陈炯明的军队。

天已经黑了。我决意横穿整个广州，从东山到我的住处沙面去。城市显出死一般的寂静。街上布置了可以迈得过去的木防栅。士兵们站在木防栅旁。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处于临战状态的巡逻队。架着机关枪。这是陈炯明的部队。不知从哪里，看来是从河滨街一带传来了枪炮声。

我向前走着，暂时平安无事。因听不懂巡逻队向我高喊什么，我就回喊“沙面”（沙明纳）^①让士兵们明白，我是外国人，甚至可能是英国人。

在这个漆黑的夜里我终于摸到了通向滨河街的宽阔的大路上。在这里枪声已清晰可闻。从岗哨那儿传来一声凶狠的喊话。当然，我一点也不懂，但我知道，他们在问，走路的是谁。我又回喊，“沙面”，但这次无济于事，我听见扳动枪栓的声音，又喊了一声“沙面”，没什么作用。我隔壁住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他看了我一眼，并且喊了一句什么，当时我看见一个士兵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一分钟，陈炯明部的一个军官走上前来。在迅速降临的热带的黑夜里，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很清楚地看见了她的白手套。他看见我是外国人，就给我行

^① “沙明纳”Шамина——广州英租界的俗称。

了军礼，笑了，还道歉（我不知道为什么），并用蹩脚的英语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告诉他我的去向。他马上命令一个勤务员给我领路去沙面。勤务员领着我穿过狭窄的中国式小巷，顺利地到了通往沙面的小桥。他哪里知道，几天以后街上将要张贴陈炯明为我的头悬赏二万元的布告。

第二天我又到了市里。家家都紧闭门户。人们躲了起来。街上只有一些士兵和岗哨。很惹人注目的是滨河街道所有中国商店上面都飘扬着英、美、日的国旗。这是因为在华的外国产业受到特别保护。广州的商人和企业家托庇于外国领事。领事们得到一定贿赂，便允许在中国商店上挂外国旗子，以保护商店免遭洗劫。

但是大商店的老板们不单是指靠外国旗，他们把房屋圈上电网，在铁丝网上挂着画有骷髅的小板。上面写着：“生命危险”。

陈炯明的士兵们还是一味抢劫。在老城的狭街窄巷里抢劫。为了自身安全，居民们在房屋门口构筑了防栅。

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①在那里等我。直到现在我还认识他。但已听说他是中国大新闻记者，曾在外国留学，刚从英国回来。

陈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向我讲了吴佩孚和香港的英国人所支持的政变详情。陈友仁很注意我对政变的态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我请他转告孙中山，我祝愿他斗争成功。

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我，有关我们谈话的全部文件，他随身带到了军舰上。孙中山的冷静使我感到惊讶，在出其不意

^① 即陈友仁。——译者

的政变时刻，当稍有延误他就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他没有惊慌失措，而随身带走了敌人不应看到的那些文件。

我和叶夫根尼·陈约好了我们今后会见的时间和地点，便分手了。

不久，我们又见面了。孙中山仍抱有希望。海军忠于他。他已下令，命参加北伐的军队回广州支援他。现在，他在等着自己的军队。无望之处，是军舰上缺少煤和给养。军队能否在煤和米的储备耗尽之前抵达广州——这是使孙中山焦急不安的问题。

然而，北伐的军队一知道孙中山在广州遭到失败，很快就瓦解了。首先是雇佣军官们背叛了总统，转到敌人方面。孙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他乘炮舰撤退到黄埔岛。征用了几只驳船运米，这样消除了粮食危机。但仍没有煤。孙中山说，要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广州的情绪低沉。英国的武装舰队以“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为名开进了广州城。陈炯明与英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很快就暴露了，在香港海员罢工时期，全广州曾团结一致地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城市的经济生活被破坏了，工厂企业关闭了，首先吃亏的是工人，他们失业了。资产阶级开始抱怨，说陈炯明扰乱生意。政变以后第四天，人民对陈炯明的失望和不满就已经显露出来。

这时，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之一，最近担任孙中山政府外交部长的伍廷芳去世了。他虽不赞同孙中山的许多民主思想，但在困难的时刻他并没有背叛他。白发苍苍的老人被政变所震惊，吓出病来一命呜呼。他是中国很著名的人物。广州人民都认为陈炯明是这位老人致死的罪魁祸首。伍廷芳的葬礼成了支持孙中山，抗议陈炯明叛乱的示威游行。

外国使馆的全体成员都来给伍廷芳送殡。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表参加伍廷芳的葬礼并非没有原因。是他第一个在辛亥革命时受孙中山的委托向列强递交照会，保证革命毫不触犯外国人的利益。看来，他们现在好象把这个保证与伍廷芳一起埋葬了。他们仿佛感到：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已和伍廷芳之死一起成为往事了。新的革命时代——反帝时代开始了。

我再次与叶夫根尼·陈会面，他重复了孙中山请他转告我的话：“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中山当时表示愿意去苏俄。坚守在军舰上已经不可能。储备的煤就要用完了，无任何援助可待。

我通知孙中山，我即将离开广州，并请转告他，尽管有此次令人惋惜的事件，我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深信不疑。

在动身前夕，我又会见了叶夫根尼·陈。孙中山转告我：“倘我不得赴苏俄，现在我宁可不到上海去，而将于此地斗争下去终此一生。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就在这里，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孙中山写道，我将对契切林讲述他——孙中山现在的处境，说他不会停止斗争并请求代向列宁转致友善之情。

孙中山就这样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他是推倒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但并未把中国引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现在，中国新的革命动力成长起来了，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仅仅借助雇佣军队和军阀的联合

力量取得胜利的办法，已经不适应于中国社会力量新的对比关系了。人民大众的运动已成为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雇佣军阀无论怎样配合也不能导致胜利。

很明显，不能把革命仅仅看作是军事斗争，而把深刻的社会改革推迟到彻底的军事胜利之后。革命应该是军队依靠人民群众运动进行的斗争。革命要取胜，就应该把社会改革与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斗争结合起来。

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就表现在，他在晚年看清了中国革命的新动力。他懂得了，现在没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胜利。他在晚年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孙中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以便今后在斗争中依靠人民大众。

孙中山懂得了，在俄国十月革命把旧世界分裂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以后，外国帝国主义加紧援助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最反动的势力。希冀得到某个外国帝国主义强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援，已变成了幻想。他自己现在就是这种幻想的牺牲品。而苏俄倒是唯一支持中国革命的国家。孙中山看到了，中国人民只有苏俄这样一个真正的朋友和同盟者。

与叶夫根尼·陈告别的时间到了。我们紧紧地互相握手告别。我到上海去了，在那里会见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我向他们介绍了广州的局势，以及陈公博在广州反革命政变时那番摇旗呐喊所起的作用等等情况。我们就所有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从上海到了北京。在那里我从报上得知孙中山已到上海。

十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 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从中国归国途中，我已经不必要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因1922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已撤消。它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现在对于日本、朝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都转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了。至于说蒙古人民党，虽然当时这个党在形式上还没有加入共产国际，但蒙古革命运动的问题同样也在共产国际进行研究。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也有了相应的变动，决定建立东方部。

8月份我回到莫斯科，很快又到德国去了。11月初我从德国回国，那时，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开始工作。隆重的开幕式是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现正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工作会议。

我在莫斯科被告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把我列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①。我作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陈独秀和列席代表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1922年汉堡德文版中并未见此记录。——译者

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是张太雷和我。他是正式代表，我是列席代表。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好赶在十月革命五周年召开。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的困难年代已经过去了。1922年10月25日，红军解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在从白海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这一片广袤地域上，到处红旗飘扬。困难的年代——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现在，在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结束以后，国家和人民能够轻快、舒畅地喘一口气了。现在已能够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顾和讲述，1919年2月4日，苏维埃政府曾经按下列条件向帝国主义列强建议停止国内战争：（1）苏俄承认沙皇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2）作为对它们偿还借款和利息的保证，苏维埃政府同意以某些资源为抵押；（3）按照它们的选择，向他们提供租让企业；（4）同意对处在协约国或其俄国代理人以军事占领的形式所据有的某些地区做出领土让步。

英、法、美、日和白卫军认为这些建议是我们软弱的证明。当时他们以为：只要再使一把力，苏维埃政权就会垮台。外国列强拒绝接受这些建议。他们扩大干涉并加紧支持白军。现在，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时候，可以作出总结：谁是国内战争的胜利者，谁遭到了失败。

列宁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居于中心的位置，在谈论到我们的错误和列强的错误时，列宁指出：我们的失策和他们的失败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难证明的。就拿美、英、法、日同高尔察克签订的条约来说吧。……它们不先盘算一下，不思索一下，也不观察一下，就答应帮助高尔察克。依我看，这种失算即使

从一般常识来看，也是难于理解的。”^①在这里列宁还援举了帝国主义列强另一个最最愚蠢的例子——凡尔赛和约。“它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呢？”^②列宁问道。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于1922年11月13日。过了一周，11月20日，他又在大剧院举行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个演说还是专讲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总结和当前的任务。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列席了大剧院的这次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精神抖擞地讲着。演说时，他不是站在主席台上，而是在剧院的舞台上走来走去，一会向着这边，一会儿又走到那边，我们大家，所有列宁的听众，都觉得他在和每个人单独交谈，他在亲自与你面谈。因此，他的演说和他本人也就和听众越来越近。

他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一边走一边说：“你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们大家都知道，内战拖了多么久，消耗了多少力量。现在海参崴的收复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鼓掌多时）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胜利。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③

我们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最近病了。医生严格限定他的工作时间。但现在他站在我们面前，好象十分健康，情绪很好，生气勃勃。因为这是革命彻底胜利的五周年纪念日。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列宁最后的演说，没有想到我们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在他经常发表演说的国际会议、代表大会和工人集会上听到他的声音了。

①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译者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5页。——译者

符拉迪沃斯托克解放了，但属于俄国的萨哈林岛的北半部还在日本手中。没有疑问，这是经美国同意搞的，这是华盛顿会议对解除英日联盟的“补偿”。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日本和中国代表的建议通过了抗议日本占领萨哈林岛俄属部分的决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举行了三十二次会议，其日程是丰富的。除了关于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报告外，会上还讨论了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如资本的进攻和各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的纲领、殖民地和土地问题、凡尔赛和约、合作运动，还有与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等个别党的活动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代表们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活动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意大利发生了使世界历史出现曲折的事件。1922年10月31日，墨索里尼匪帮进入罗马，夺取了政权。这就是列宁在上一次大会上所说的资本进攻的新表现。与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势的转变。1920年至1921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结束了，复苏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高涨到来了。在周期性高涨的局势下，改良主义的幻想复活了，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联合了起来。革命高潮时期脱离了社会党右派的中派分子回到了与资产阶级公开妥协的怀抱。在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反对转入进攻的资产阶级的道路上，这种现象成了障碍。同时，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的夺权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列宁在致大会的贺电中写道：“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大多数工人。”^①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页。——译者

统一战线问题、建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在资本进攻的形势下提出局部要求的纲领，都是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自然就出现了各共产党行动的统一和协调问题，即在共产国际队伍中加强集中制和纪律的问题。因为当时共产国际被视为统一的世界共产党，而它在各国的组织是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季诺维也夫特别坚决主张集中，主张把共产国际变成全世界统一的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内部过分地“拧紧组织上的螺丝”引起了列宁的担心。因此，列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它的好的一面在于此，它的坏的一面也在于此。……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译成各种文字，并且译得都很好，——而是因为它充满了俄国气息。……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①

现在，当我写中国工作的回忆时，我经常想，我们往往没有充分倾听列宁的这些话，并有时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机械地搬到另外的环境。但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主要战略问题上是正确的。我指的是关于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与许多中国同志的争论中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反对陈炯明而支持孙中山，在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坚决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殖民地问题再次成为主要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670页。——译者

问题之一。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的直接参加下，从理论和战略观点深入研究了反帝民族革命运动问题。第四次代表大会则与那次代表大会不同，这次会上讨论了现有的东方实际工作的经验，这就提供了解决一系列策略问题的可能性。到1922年底，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等国家都建立了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建立对远东的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朝鲜各侨民团体间的激烈斗争阻碍了朝鲜共产党人联合成统一的党。蒙古人民党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听取了荷兰代表冯—拉文斯坦、印度代表罗易和日本代表片山潜三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

拉文斯坦大量地和长时间地叙述了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东方问题的历史。他的报告根据的是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错误理论”。按照他的意见，殖民地的独立使资本主义失去积累的来源，因此，今后帝国主义就逐渐地不可能存在下去了。按照拉文斯坦的意见，殖民地的独立应该自然而然地导致帝国主义灭亡。如大家所知，列宁指出了罗莎·卢森堡理论的错误。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了列宁是正确的。应当指出，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没有包括拉文斯坦的错误论点。

罗易的报告主要介绍印度的情况，不过其中涉及到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土耳其的局势。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必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片山潜在报告里谈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它将给整个远东人民带来的威胁问题。

讨论各报告时，中国代表刘仁静发了言。他对国民党不依

靠群众，不宣传群众并且仅仅力图依靠军事手段获胜等进行了应有的批评。不过，他的发言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另一方面，又说很多组织起来的工人支持国民党。这自然就产生了问题：如果这个党大多数党员是反动分子，为什么工人们还支持它呢？刘仁静发言中的这个矛盾反映了共产党内部对国民党问题的意见分歧。可是，他在代表大会上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论述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共产党人以个人方式加入国民党的合理性。我讲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不是以个人方式加入，而是在保持党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党加入进去。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包括共产党人应当遵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

在一致通过的提纲中指出：“如果说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力量的过渡时期，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则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

与此同时，提纲中警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跟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几个敌对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勾结的危险。”

考虑到反帝统一战线中社会成分的复杂性，提纲着重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必须在总的反帝战线中争取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的地位。”而且，在这些国家里“应当为政治制度的最大限度的民主化进行无比坚决的斗争”。

提纲指出，反帝革命只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才能胜利。在这个文件中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印度、波斯、埃及）害怕土地革命的口号，恰好说明当地资产阶级跟大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封建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的密切联系，以及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后者的依附。”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这一点完全是指中国而言。

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指出：“以‘民族团结’或是跟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国内和平’为名，企图逃避为工人阶级日常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的危险性。同时提纲强调：“要求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共和国紧密团结，是反帝统一战线的旗帜。”

这样，早在1922年列宁在世时，并且在他亲自参加下，共产国际已经详细制定出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纲领。它包括对发展中国革命有现实意义的许多问题的回答。

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在前一天，即12月4日，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剧院隆重开幕。来自三十八个国家的一百二十一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剧院的大厅里座无虚席，挤满了莫斯科各工厂的共青团代表。在这里有各区委的委员、莫斯科团市委和俄罗斯共青团的中央委员。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宣读了列宁的贺辞，列宁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很遗憾，我不能亲自前来向你们致贺。最真诚地祝你们工作成功。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取得了崇高的称号而忘记最主要的任务——必须实事求是地推进培养青年和学习的工作。致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弗·乌里杨诺夫（列宁）。”^①

列宁在青年的会议上进行演说时，总是号召青年们学习。在1919年4月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1920年10月的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都是这样。他的号召绝不象上年纪的人对青年人进行的说教，而是把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涵义贯注到“学习”一词中：不仅识字和掌握科学基础知识，是对青年进行任何教育的先决条件，而主要地还要学习建设社会主义。要知道，当时谁也不晓得这门科学，成年人不晓得，青年人更不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4页。——译者

晓得。就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报告中指出：“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或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但是，只要不打仗，没有战争，我们就应当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①

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的开幕式上，加里宁、古比雪夫、意大利共产党人博尔迪加——代表刚结束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其他许多代表讲了话。

后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的米特罗凡尼耶夫大厅进行。

沙茨金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内，远东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特别是在中国、蒙古和日本。

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纲领的问题。这个纲领还是在柏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在通过纲领的时候，仅仅制定了青年共产主义组织（而且也只是在欧洲）的原则。当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还没有共青团组织，因此，关于东方工作问题在纲领中没有得到反映。而现在，三年以后，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殖民地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问题，纲领中应取明确的态度了。

沙茨金作了关于新纲领的报告。他向代表大会传达了新纲领草案的内容和它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纲领。但是制定共产国际纲领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因此，通过纲领的事延期了。由于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0页。——译者

这个原因，决定不就沙茨金的报告展开讨论，而把纲领草案分发到各国的共青团组织去讨论，并且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通过以后，再履行批准手续。

至于东方青年工作的具体问题，则建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讨论并准备决议草案。12月15日，代表大会听取了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并批准了它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了近期各国共青团的任务。它建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集中力量吸收青年工人入团，把团变为群众性组织。考虑到中国各省和各地区存在自治主义倾向，决议建议中国的共青团加强其组织机构的集中化。

第二天，举行了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张太雷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十四、1923年

两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我留在莫斯科担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主任。这时，我虽然要经常转做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工作，但仍然从事远东工作。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国际大厦中占了一层楼。大厦位于玛涅日纳亚广场，在克里姆林宫的库塔菲亚塔楼旁边。第一层现在是大剧院和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售票处。过去，这里住过人。现在，走廊把以前隔开的私人住房连接起来了。

当时，我住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卢克斯饭店（今高尔基大街的“中央饭店”）。这是共产国际的旅馆，住的是在莫斯科有常任工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库西宁及家眷、柯拉洛夫、季米特洛夫、马里奥·埃尔科利（陶里亚蒂）、格拉姆什、什麦拉里、瓦尔加、乌布利希、哥特瓦尔德、多列士，还有许多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印度人和美国人都在这里住过。季米特洛夫最亲近的助手萨普诺夫一家住在我旁边。沿走廊再过去一些，住着正在努力学习俄语的片山潜。维经斯基和从事中东工作的勃里克、里查·佐尔格也曾住在这里。我无法把所有的人都列举出来。这是一个友好的国际公社。这里的许多房间已经载入国际工人运动那些著名活动家的传记。人们在卢克斯饭店的房间里讨论各种事件，制定决议方案，协调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的办公室与宿舍没有区别。

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不久，在1923年1月，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因为尽管反帝统一战线有了显著进展，中国共产党仍然对国民党持强硬的否定态度。共产国际1月份的决议认为，国民党是唯一重要的民族革命政党，它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时也部分地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这种看法与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看法根本不同。根据上述对社会情况的分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仍然留在国民党内^①。

1923年2月，孙中山在亲日派安福系军队的帮助下，击溃了陈炯明的军队，将其驱逐出广东省。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并建立了新的国民党政府。这届政府比1921年至1922年的政府要稳固得多。孙中山在广州的这个胜利加强了国民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北方则发生了性质完全相反的事件。原拟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是完全合法的，各大报都报道了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况。“自由主义者”吴佩孚命令军队和警察禁止会议开幕并驱散了大会代表。对此，各工会宣布全线总罢工。罢工遭到了武力镇压。2月7日，军队向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三十七名工人。北方各工会紧接着也开始受到迫害。

吴佩孚军队枪杀工人产生了两种后果。在此之前，特别是在香港大罢工以后，全国工人运动处于高潮。到处建立工会，举行了胜利的罢工。在二月惨案以后，工会暂时停止发展，共产党员的数量也减少了。

^① 原文如此。准确些说，应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

——译者

枪杀工人的第二个后果则不同，这件事撕掉了吴佩孚自由主义者的伪装。知识界和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吴佩孚，转而同情回到广州的孙中山。此外，大多数共产党人也改变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从6月10日到19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大会的中心议程是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这一次，以陈独秀为首的多数代表支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张国焘代表少数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此，张国焘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1923年7月，在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首先谈的是把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变成为以工农青年为主的组织。大会通过了在工厂建立支部和为改善企业中青年工人的处境而斗争的决议。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事实，即会上详尽地讨论了农村的青年工作。

至于对国民党的态度，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是这样表示的：“共产主义青年团^①的全体团员在坚持不懈地大力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应该用各种方法帮助这个革命政党的发展和巩固。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青团员，应该始终在团中央监督之下，并服从团中央的指示，共青团员在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同时，不应忽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各种情况下，都应表现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②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

① 应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译者

② 见阮爱国（胡志明——达林）主编《中国和中国青年》，东方大学中国学生部编辑，译自法文，莫斯科，1925年版，第53页。（本段引文不确，系大意。详细内容散见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决议案》，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I（1915—192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北京1957年版，第361—362页。——译者）

会完全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

由于和共产党接近，国民党便有可能摆脱与各种军阀结成的单纯军事同盟，而转向吸引人民群众参加民族革命的斗争。孙中山在1922年的失败之后，急剧地改变了整个对内对外政策。

1922年底，还在上海的时候，孙中山就发表声明承认了外蒙古的民族自决权。这个声明第一次公开表示出国民党向新原则的转变。

联合共产党对于孙中山来说，还意味着进一步接近苏联。1923年年中，孙中山政府在南方巩固以后，便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援助广州政府的各种形式进行谈判。蒋介石于1923年8月抵达莫斯科，带来了孙中山的请求，希望苏联派政治和军事顾问到广州去。根据这个要求，鲍罗廷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当时，鲍罗廷三十九岁。他在1903年入党，1905年革命时期，曾担任党组织的书记并领导里加工人的战斗队，曾是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他流亡国外，到了英国和美国。1918年，鲍罗廷从美国回来，并积极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工作，他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鲍罗廷离开美国以后，继续和美国共产党保持了密切联系。

我熟识鲍罗廷的时候，正值他携家眷住在卢克斯饭店。他的两个儿子生在美国，不懂俄语。家里日常说英语。长期侨居国外，给鲍罗廷的作风留下了一些痕迹。他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平易近人，眼神活泼，好开玩笑。总之，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同他在一起总感到愉快。他的话不多，宁肯多听少说，同时用简短的言词和插话“说出”自己的观点和对各种事情或人物的态度。他的特点是头脑冷静，

风格独特，时而对这种或那种问题发表意外的见解。列宁认识鲍罗廷，他写给鲍罗廷的一些短信保留下来了。

鲍罗廷以前从未到过中国，也没有处理过中国事务。因此当他被任命为孙中山的顾问时，自然就来找维经斯基和我征求意见，详细询问关于孙中山、国民党和广州等方面的情况。这些谈话主要是在卢克斯饭店进行的。

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业已开始，1924年1月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制定了切实的方案。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纲领。今后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增添了其他内容。国民党提出了新目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根本改革土地关系；实行工人立法。这是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考虑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也部分地注意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反映了中国革命阶级力量的配置已发生改变。国民党的左转影响到该党内部形势。就在1月的代表大会之后，右派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给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新任务——加强国民党左派的地位。

简括地说，1923年和1924年初中国的重大事件，就是这样。

1923年底，已不必再说服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建立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了。需要从参加或不参加国民党的争论转到在这个党内从事具体工作上了。于是马上就出现新的原则问题。其中之一是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

1924年3月，要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讨论团在中国新形势下的任务，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由我作为代表出席这个会议，1924年1月，我必须再度去中国。

动身的准备工作已经结束，上级指示也批准了。这一次我决定经海参崴去中国，然后从海参崴乘轮船去上海。火车票已经放到我的口袋里。1924年1月20日，经张太雷和我签署完成了关于亚非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状况和任务的简要报告。

远东的共青团组织工作最为成功。日本已经建立了共青团，在非常秘密的地下状态中进行工作。但是，警察的迫害和1923年9月大地震的影响，妨碍了团的工作进一步开展。在朝鲜，各革命青年组织正根据共产主义纲领继续进行联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队伍继续壮大，并且如前所述，在1923年年中召开了第二次团代表大会。但是，尽管两次代表大会都做了决议，社会主义青年团却仍然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组织。在蒙古，已经举行了革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其他亚非国家，革命青年团的建团工作还处在开始阶段。在印度，最初所实行的组织方针是建立民族革命青年团，而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打算以后再由其左翼组成共产主义青年团。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在我从中国回来，以及从其他国家得到更详细的报告之后，还要重新研究亚非革命运动问题。

我准备于1924年1月24日动身去中国。在海参崴还要停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在那里了。

十五、哀痛的日子

临去中国之前的那些日子，列宁的突然逝世使我们深为悲恸。虽然老布尔什维克都称列宁为“元老”，但这是就他创建党的作用而言——他是最老的布尔什维克，而并不是指他的年龄。1924年1月，列宁还不到五十四岁。

我们大家都知道列宁有病，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会逝世。他确实有病，但是又康复了，并且还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一次，他象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分析、评论所犯的错误，提出新的任务。做完报告以后，代表们围着他的时候，他还谈笑风生。就在不久之前，莫斯科苏维埃在大剧院举行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的隆重大会，列宁还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预言还在我们耳边回响。

但是就在1924年1月22日，星期二的早晨，加里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昨天，1月21日晚六时五十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了。

噩耗很快传遍了莫斯科。就象通常发生了令人担心的大事件那样，人们跑到街上，期待了解详细情况。《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联合号外终于出来了。政府讣告很简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死期将近。最近以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情况显著好转。种种迹象都使人以为他一定会进一步恢复。昨天，弗拉

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非常意外地急剧恶化。几个小时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了。”

人们在大街上读联合号外，肃穆悲痛地沉思着离去。每个人都在思索：没有列宁，革命的前途和难以逆料的未来道路将会怎么样呢？大家心情沉重。

列宁的灵柩在第二天即1月23日由哥尔克村移到莫斯科，当天下午一点到达帕维列斯基车站。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迎候列宁灵柩的代表团。我们每个人都有有一个相同的证件，那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文笺上用打字机打印，并由执行委员会书记库西宁签署的。

当我们来到扎茨帕的时候，车站广场上站满了人。红色的灵车非常醒目，灵车上套的马披着志哀的黑色马衣。人们抬着列宁的灵柩。灵车就留在了广场上。灵柩后面跟着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娅·伊里伊尼奇娜、列宁的亲友以及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军乐队演奏的哀乐令人心碎。

车站附近的小广场仅能容纳的为数不多的代表团，组成了护送灵柩的队伍，跟在列宁的灵柩后面，由帕维列斯基车站向阿霍特纳市场的工会大厦走去。沿途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为了防止过分拥挤或发生意外，这一天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号外，刊载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列宁治丧委员会的公告：

“数十万莫斯科居民希望参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葬礼。所有的人都能有机会向列宁遗体告别。但是，只有严守秩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丧葬期间，在莫斯科居民密集的道路上，才不至过分拥挤、发生意外。

因此，治丧委员会要求所有参加送葬的人，在列宁的灵柩

由帕维列斯基车站移到工会大厦期间，以及送葬和安放遗体期间，严格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命令。

治丧委员会主席 Ф·捷尔任斯基

1924年1月22日于莫斯科。”^①

护送列宁灵柩的队伍所经过的路线，由帕维列斯基车站出发，往巴尔丘克方向，再经过瓦西里·勃拉仁纳教堂，穿过红场，到工会大厦。列宁的灵柩停放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暮色已降临，显得更加寒冷了。

向列宁遗体告别的仪式从1月23日晚上七点开始。人们川流不息地从莫斯科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参加告别仪式的队列绕过奥霍特纳市场、特维尔斯卡亚大街、戈奥尔基耶夫斯基胡同，从大德米特洛夫卡方向进入工会大厦。已经是寒风凛冽的深夜，而吊唁仍未停止。奥霍特纳市场上燃起了篝火。人们严格地自行维持着秩序。

在动身去中国的前夜，我两次向列宁遗体告别。我在酷烈的严寒中排着队从列宁的灵柩旁走过去；到了街上，我又排到队伍里。坚毅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直守在列宁的灵柩旁，她没有流一滴眼泪，仿佛在回忆和列宁共同工作和斗争的生活。

早晨四点钟，我走出圆柱大厅。就在这一天，1924年1月24日，我坐上了莫斯科到海参崴的火车。车箱里寂静、悲伤，大多数乘客臂上戴着黑纱。

1月27日，我们到了雪积冰封的西伯利亚。暮色降临了。我们的火车在一个废弃的孤寂无人的小站上会合了一列货车。两列火车停在那里，同时长时间地鸣起了悲咽的汽笛。这是在

^① 《真理报》和《消息报》号外，1924年1月23日。

莫斯科红场上安葬列宁的时刻。

我们都走出车箱，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声。此时，大家的心都向着莫斯科，向着红场。

列车开动了。这是悲哀的旅程。西伯利亚已经落在后面。我又到了温暖的上海时，这里也在举行追悼列宁的活动。服丧、追悼会和演讲列宁学说在中国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广州进行了特别广泛的活动悼念列宁。当时那里正在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1月25日，代表大会举行了追悼列宁的特别会议，孙中山讲了话。根据他的提议，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了唁电，其中一段是，“他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将继续珍视他那种造成最高度的政治家和有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①

代表大会为悼念列宁休会三天。到处都在阐述列宁学说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一个月后，孙中山发表了悼念列宁逝世的祭文：“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②

这个祭文反映出孙中山的世界观已发生了急剧转变。在他直接领导下，国民党正在进行政治改组。国民党内补充了新的成员，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给国民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力量，他们把列宁的思想带到了人民群众之中。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8页。——译者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译者

十六、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全会。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

1924年2月中旬，我到了海参崴。这座美丽的城市象一个半圆形剧场，座落在佐洛托伊湾的小山岗上。这是一个不冻港。莫斯科寒风凛冽，而这里的防波堤外，却有汹涌澎湃的海浪，真正令人惊异。这时，关于英国承认苏联和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已经大有进展，故此，悬挂英国旗的轮船已经常路过这里。

当时，海参崴住着许多中国商人，以及前来谋生的中国工人。朝鲜侨民更多。当地有朝鲜党、团组织。为当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出版了中文和朝文的报纸及小册子。这些报纸和小册子可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传到朝鲜和中国。

我在这里遇到了太洪，当时他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朝鲜事务的代表。朝鲜侨民中的派系斗争还在继续。这是在朝鲜开展革命运动的极大障碍。2月底，朝鲜青年革命运动各派及团体的代表在海参崴进行会晤，终于就统一问题达成了协议，而且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共产国际主要是面向朝鲜国内的革命组织，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局势，并促进了国内革命运动的团结。

在我来海参崴以前不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

卜士奇^①也来了。他在这里和青年共产国际在海参崴的全权代表齐托维奇商定在中国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协议。这不符合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发生的变化。如果在此之前必须说服中国同志相信同国民党合作的正确性，那么现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则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放弃政治上的独立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定于3月下半月举行，所以应该赶快动身。3月3日，我乘英国轮船前往上海。这条两千吨的轮船装满了圆木。海上风狂浪涌，因此，走了五天五夜才到达上海。

虽然我在上海已经是“老住户”，但还是离不了维利杰的帮助。他在工会中央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任会计，很熟悉上海，认识许多同情苏联的上海人，认识一些中国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也在工会中央委员会办事处工作。我在1922年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才和维利杰结识，现在，我们象是故友重逢了。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在一个兼包伙食的房东那里租了房子，安顿下来。

从我第一次到中国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内，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得了很大成绩。加强了对当时和工会保持联系的学生组织的影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各学生联合会在郑州、汉口和其它城市为罢工组织了募捐。枪杀罢工工人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学生们万分愤慨。他们举行集会

① 卜士奇曾在莫斯科学习，当时他给自己选了一个笔名：无产者（Пролетариев），他学过俄语，口语流利。曾是团的领导人和党的工作人员。在1924年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而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回国。1936年被蒋介石当局逮捕，后以叛变赎得自由。六十年代，曾一度在台湾任蒋介石政府外交部长。

通过了抗议书。学生报纸的编辑部转到了团组织的手里。

不久，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激战之后，五百名学生被打伤，其中八十人受重伤。有几个学生因重伤死在医院。这便在全国引起了风潮。召开了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决议案。这次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决议案刚通过，大会就被法国巡捕驱散。于是决定迁到广州继续开会。1923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广州继续开会。

以前，学生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列强已经“利益均沾”，代表大会主张全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1919年曾与日本相对抗、并自称为“中国之友”的美国，如今在广州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被痛斥为“中国自由的死敌”。这一切都说明了学生运动正在向左转。

在京汉铁路工人遭到枪杀和北京的学生示威遭到血腥镇压以后，由于“临城事件”，反帝运动很快又重新爆发了。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惯用的手段是寻衅进行武装干涉。从中国土匪中搜罗的雇佣打手，杀害了一个什么外国人，然后照例是外国军队开了进来，“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在“临城事件”中，也不难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司空见惯的手段。中国土匪在离临城车站不远的地方袭击一列客车并抓走了一些外国人。1923年8月，列强要求把中国所有铁路线交由他们实行检查和警备。

对此的回答是，北京学生联合会以三万五千名大学生的名义发出了《告全世界人民、英法日美意加和各国工人阶级、苏联、德国和所有被世界资本压迫的民族书》。

这份呼吁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专横跋扈及其在中国制造的动乱之后，指出：“北京学生联合会公开申明，临城事件的

责任完全在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豢养的军阀。人民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任何人以为中国人民应该对此负责，我们申明，人民应负的责任仅仅在于，在此之前还没有消灭人民苦难和中国动乱的主要根源——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①

向世界工人阶级呼吁，向苏俄和被压迫人民呼吁，不但控诉日本，而且控诉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这一切说明，与1919年相比，学生运动已经有了多大的进步！

在加强反帝运动的同时，还发生了敦促北京政府承认苏联的运动。从1923年底到1924年一年中，莫斯科、北京建交以前，这是学生运动的基本要求之一。

与此同时，学生内部阶级分化的过程开始了：其资产阶级部分，以及来自富裕农民和绅士家庭的学生，背离了民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手中。同时，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逐渐脱离了团组织。到1923年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减少到五百个，现有团员总数为二千五百人。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强了工农青年的工作。开始出版三种中央机关报以代替《先驱》报：《团刊》，主要以团员读者为对象；《中国青年》，基本上预定以大学生为对象；《青年工人》^②，其读者对象如名称所示。

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了罢工运动。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常领导罢工和组建工会。

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还在某些省份积极参与组建农会的工作。在建立了农民协会的湖南即是如此。广东也成立了同样的

① 未查到原文。——译者

② 未查到该刊。——译者

农会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就这样在各方面都有所进展。但是，就是到1924年，团员主要还是大学生，是他们领导着所有的团组织——从上到下都一样。

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方针的改变，这个党在新纲领基础上的改组，从纯粹军事谋划转而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工作，反帝运动的加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等，这一切向社会主义青年团提出了新的任务。为讨论这些任务，1924年3月底，在上海召开了团中央全会。

全会在公共租界（实际为英租界）典型的中国街区中的北四川路一带举行。在弯弯曲曲的中国小巷里很难找到开会的那座楼房。因此有一位熟识的中国同志在约定的地方迎接我，我跟在他后面几米远的地方。终于到了开会的地点。那是二层楼上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桌子上摆着墨汁、毛笔和略带黄色的薄信笺。

大家互相问候。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毛泽东，他身材高大魁伟，容光焕发，特别是他穿的那件浅灰色绸长衫很惹人注目。其他的人都是穿普通的蓝布长衫。

我在这次全会上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务的报告。还在全会召开以前，团中央机关报刊载了我的一篇关于青年工人工作的文章。当时用来代替决议案的提纲草案已经译成中文分发给与会者。我的报告全文保留下来了，因此可以在此援引其中的基本内容^①。

^① 该报告于1957年以中文载于《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I（1915年—1924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北京1957年版，第477—484页。——译者

报告指出，虽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有很大成绩，但它尚未成为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而主要由学生组成。这可以说是因为：既然当前的任务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和实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此团组织提出了全国性的口号。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而且很明显，团不能在这个阶段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团的一般政治活动把保护工农青年利益的工作放到了次要地位。而受全国性口号的吸引参加青年团的，首先是青年学生。但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捍卫其利益的阶级组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团组织应该主要由工农青年组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看来需要建立一些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中工作的工农青年的群众团体。

我在报告中谈到了在海参崴和一些中国同志讨论青年群众组织问题的情况。我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应该建立农工青年联合会。其他同志建议组织国民党青年联合会。我反对这种意见；因为我觉得，如果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能吸引工农青年参加自己的组织，那么国民党青年联合会就更不可能。

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没有在工农青年中工作的经验。因此，决定青年群众团体的名称还嫌太早。只能讲基本原则。至于青年工人，应该以组织小组或俱乐部的方法开始工作。在农村则应该建立青年农民协会。主要的是找到能够引起青年工人兴趣并且能吸引他们参加组织的工作方法。不应该轻视基督教青年联盟利用的那些方法。他们把文化教育工作放在首位。我们也应当进行这种工作，给工农青年搞科普讲座，帮助他们自修、扫盲。

我又说道，应该认识到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纯文化”。我们要把政治，把我们自己的政策放到文化工作中去。任何时候也

不应该忘记文化教育工作的这些基本原则。否则，青年团就会变得与资产阶级的以及和平主义的组织没有区别。

文化教育工作应该与争取改善青年工人的经济状况、缩短工作日、确立每周休息日、提高工资的斗争结合起来。必须吸收青年工人参加工会，本着阶级斗争精神进行政治工作。

农村也存在青年农民所关心的问题。但是，农村当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为改善无地农民的状况，为减租减息，为废除厘金，即废除各省各县的苛捐杂税而斗争。

在城乡建立青年工人小组和青年农民协会时，不要急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些组织。首先要学会做青年工作，善于建立基层组织，逐步把他们吸引过来，以后才能召集相应的代表大会，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并赋予固定名称。

组织建立青年工人小组、俱乐部以及青年农民协会，应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青年团应该领导这种种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团坚决转为面向工农青年，绝不意味着放弃学生工作。这个工作还必须继续下去。但是，工农青年工作是工作的中心。

如果国民党支持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群众组织的工作，那当然很好。但是，一定要使青年工人小组、俱乐部和青年农民协会完全处于共产主义影响之下。

我继续说：当前，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已经完全出现了。在1月的广州代表大会上，国民党通过了一些符合共产主义的原则。联合宣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原则和国民党的原则有分歧，事情就会复杂得多。

某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所以不能这样办。

近几年内，我们将要和国民党一道前进。而在民族革命胜

利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就要分道扬镳。在胜利以前，我们要和所有的民族革命组织共同奋斗。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不能分裂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原则，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在同国民党的原则不一致的时候，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

我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在毛泽东发言之后，则转而成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应该强调提出，我的报告依据的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曾积极参与制定这些决议和指示，当然是完完全全赞同的。同时也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意这些决议。然而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的发言却违背这些决议。

毛泽东在发言中援引新“三民主义”，断言国民党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应该加入共产国际。然而国民党在1924年1月的代表大会上甚至只字未提要被吸收加入共产国际。根据共产国际的章程，每一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共产党。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则意味着承认国民党是共产主义政党和取消毛泽东为其中央委员的那个党。

毛泽东坚决反对以阶级观点对待中国农民。反对提出以一部分农民（无地佃农）对抗另一部分富裕农民的口号。他把全体农民——既有佃农，也有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都解释为一个阶级，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

还有，毛泽东的发言根本没谈全会的中心议题——在青年工人中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发言以后，与会者都想发表意见。全会延长了几天。

凭着对这次全会的直观感受，我给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他本应和我一起去中国，但是有些事情把他耽搁在莫斯科了。我们曾约好在海参崴见面，但是这也没有做到。我不能等他，因为在上海已预先约定了会见日本共青团员的日子。这一次会晤不能延期，所以我没有等维经斯基就到上海去了。

现在，开完全会之后，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保存下来了，现将原文引述于下：

“1924年3月30日于上海

亲爱的格里戈利：

团中央全会于今天结束（下面我写了不能在上海等他，以及应该回莫斯科的原因——达林）。你在那里不妨工作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达林）……你在这里将可以听到中央委员会书记^①毛泽东（一定是马林^②的人）那些叫你瞠目结舌的事情。例如，国民党现在和过去都是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其为一个支部。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和地主官吏（绅士）们搞在一起，等等。这位老兄是青年团中的党代表，而且在团中央全会上坚持推行这种观点，幸而这只不过是徒劳。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马林（斯涅弗利特）——荷兰社会民主党党员。1913至1919年住在荷属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在当地参加左翼社会民主党，后成为爪哇和荷兰共产党员。作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曾在殖民地和民族问题委员会工作。马林曾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923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他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不应该面向共产党，而应该面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甚至面向宗教组织，如荷属印度的伊斯兰教同盟那样。按照他的意见，在中国应该依靠国民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过早，没有社会经济根基。我和维经斯基都反对他的观点。

1927年，马林与共产国际断绝关系，加入了托派。

我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①

这封信是匆匆忙忙用铅笔写就的。天已经晚了，送信的同志早晨就要将信送达收信人。

这就是毛泽东在1924年初的政治表现。如果事情发生在1919年，即毛泽东曾经参加的五四运动时期，他这种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番话是在五四之后五年，是在中国共产党开过三次代表大会之后！

后来，毛泽东没有再代表党中央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②。

毛泽东很快被党中央派往广州，在国民党内工作。在那些年内，他从来没有从事过工人运动。

1924年4月初我离开了中国，5月，我已回到莫斯科。

1924年6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之后，从7月15日至25日举行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一次会议重新讨论了东方的工作问题，通过了一个决议，即在殖民地国家，除共青团外，还要建立由共青团领导的单独的群众性的民族革命青年组织。这个决议重申了我动身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以前，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那个指示。

张太雷曾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发言。在谈到共青团员必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时，他着重强调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保持独立的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性。张太雷始终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他在思想方法方面、

① 据现有资料无法证实此信内容。——译者

② 1925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将团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精神上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的表现和他对国民党所持的立场，都不是偶然现象。在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并改变其方针之后，某些共产党人同样也改变了方针。以前曾不得不同认为国民党是反动势力的张国焘集团进行斗争。现在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某些人认为国民党是如此革命的政党，甚至要求接受它加入共产国际。

后来，毛泽东因为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态度而指责他右倾，但是毛泽东自己正是这种倾向的创始者^①。

① 据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活动及其在当时的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判断，达林的这段回忆显系对毛泽东同志的诬蔑。但是，为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我们仍将此段保留下来。——译者

十七、再去中国之前

1924年7月底，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了。我的中国之行和相继举行的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及各种协商会议和工作委员会等等都已经过去。现在我可以休息了。我已接近共青团的“临界”年龄了。按团章规定，当时团员最大年龄为二十三岁。根据团章我决定提出解脱我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问题。还是在雅罗斯拉夫尔市搞团的工作时，我考进了雅罗斯拉夫尔大学经济系。我通过了一年级的考试，升入二年级。以后，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就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现在到时候了，可以提出继续学习的问题了。我向有关机关谈妥了这件事，1924年秋天，开始入学考试时，我被解脱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

但是，什么也没有学成。相反，我参加了工农红军空军管理局的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编辑出版处的主任和政委。

内战才结束不久。当时，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完全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需要重新装备红军。其首要任务之一是建设空军和民航。我们几乎没有航空工业，飞机也很少。在十月革命以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的飞行员和机械师，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內战，只有不多的一批人保留下来。

现在几乎是白手起家建立空军和民航。已拨出了几个工厂制造飞机，开办了一些训练飞行员和机械师的军事专科学校。装备了一批飞机场，组建了科学研究中心等等。需要技术、军

事、训练、宣传方面的书籍，需要招收青年人进专科学校，需要用“航空”这个题材吸引作家和新闻记者。这些技术、军事战术、训练和宣传等书籍的出版工作都交给了工农红军空军管理局编辑出版处。

如果从前在内战时期，对群众提出的口号是“无产者，上马”，那么现在的口号就是“无产者，上飞机”。符拉季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写道：“资本家正在上天入地，无产者同志快坐上飞机。”

乍一看，这种工作和中国问题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甚至这时也要从事中国工作。

1925年初，苏联政府决定开辟我们的莫斯科——北京航线。有六架飞机参加飞行：两架德国“蓉克”和四架各种类型的苏联飞机（其中仅有两架装备了苏联生产的发动机）。当时的飞机，部分是用木头制做的，机翼上包着帆布，涂上调和漆，表层再涂上清漆。

应该指出，向北京的飞行经过的将是一条完全生疏的航线。当时仅在苏联的欧洲部分有一些多少可以将就使用的机场，在西伯利亚就要在原始森林上空飞行一千公里，飞越贝加尔湖和群山，再飞经整个蒙古，在乌兰巴托停留以后，绕过戈壁滩，才到北京。

那时，没有附设着修理基地和良好的导航信号台及联络系统的现代化机场，只好直接在机场上多处点燃篝火以标示飞机着陆地点。

飞行员和机械师不免要冒生命危险完成这次飞行。如果有三、四架飞机到达目的地，就可以认为这次飞行完全成功了。报界拒绝派记者随机飞行，因为某些报纸的代表不敢参加这样冒险的飞行。

一批有经验的苏联飞行员参加了这次飞行：波利亚可夫，沃尔科沃依诺夫、戈洛莫夫、纳伊金诺夫、托玛舍夫斯基和叶卡特夫。随航机械师是：米赫也夫、卡梅舍夫、洛德泽维奇、马利科夫、库茨涅佐夫和阿西波夫。工农红军空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史密特被任命为这次远航的飞行主任。直到最后时刻才搞清有三位记者参加远航，其中包括志愿参加的吉娜伊达·里赫特尔。她在远航途中才接到《消息报》编辑部的委任书。

这是一次吸引了全国人民的非同小可的飞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都在注视这次飞行，就象是1957年注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样，难怪它以“莫斯科—北京远航”为名载入了我国航空史。当英雄的乘务组全体人员安全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在大剧院举行了隆重大会。大厅里挂着巨幅标语：“劳动群众向莫斯科—北京远航的英雄们致敬！”

这次远航的首要目的是考验我们的飞机和发动机，并宣传苏维埃的航空力量。途中在每一个机场降落时，人民群众总是闻声赶来，不但有市民，就连农民也从遥远的乡村前来观看飞机和飞行员，听他们讲演和介绍这次罕见的危险飞行。外国资产阶级报纸曾预言这次飞行将彻底失败。而当飞行顺利结束时，它们又宣布这是“骗局”，说飞机似乎不是从莫斯科起飞，而是从苏蒙边界上的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城起飞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展开的一些事件，使这次飞行具有了政治性质。在华日本纱厂开展了罢工运动，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上海一家日本工厂的日本监工在与工人冲突时打死了一名中国工人，打伤三十人。这激起了全国的愤怒，成为反帝运动新高潮的直接原因。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抗议日本人杀害工人。当游行队伍经过外国租界的时候，英国巡捕

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打死十六人，伤者甚众。此外，英国巡捕还抓走四十人。

上海枪杀游行者的事件在全国掀起了真正的反帝风暴。十五万上海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枪杀工人。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一度席卷了所有的城市。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暴力之下保卫自身权利的斗争，导致了反帝运动的新高潮。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支持工人斗争，特别是在那些外国资本排挤民族工业资本的沿海城市，更是如此。

“五卅”事件引起的反帝运动，在1925年6月23日广州事件之后有了新的动力。在广州，英帝国主义者也从英租界向进行抗议的示威游行群众射击，打死五十名工人，打伤一百一十七人。对这次屠杀事件的回答是宣布抵制英货。中国工人举行罢工，然后又离开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香港。于是在南方开始普遍抵制这块英国殖民地。

因此，1925年年中，全中国展开了反帝运动，它囊括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工人、学生、商人和知识界。现在，工人阶级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北京的航行应该显示苏联劳动人民与进行反帝斗争的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应该表示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我们的飞机在1925年6月10日，即“五卅”事件十天之后起飞，7月9日进入中国，但被当局扣在边境地带，因此7月13日才在北京机场降落。这是在广州枪杀事件的三周之后。飞行时间如此之长，是因为当时的飞机夜间不能飞行，每一个降落地点都有长时间的集会，就地排除不大的机械故障也延误了飞行时间。

到北京的距离共计六千五百六十六公里，全程纯飞行时间

是四十九小时二十分钟。飞行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一百三十七公里，如果把停留时间也计算在内，则为每昼夜一百六十六公里。

我们的飞机又从北京飞到了开封，这个城市当时已在与国民党联合起来的冯玉祥将军的控制之中。然后又飞到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心——上海。我们的飞机停留之处，除官方人物外，工人和学生的代表团也带着向苏联祝贺的标语前来欢迎机组人员。飞行主任史密特在中国的群众集会和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在北京时，他邀请了一些人力车夫，用苏联汽车载着他们在城里兜风，然后又送到电影院，并且不顾警察的抗议，和他们一起坐到留给外国人的最好的座位上。史密特过去是工人，1916年入党。他给我们讲了不少在中国逗留期间的趣事。我们出版了他记述这次飞行的小册子。他在书中描述了开封欢迎苏联飞行员的宴会。

“大多数是中国官员参加的无休止的宴会使我们厌烦透了。况且这些宴会根本不邀请许许多多欢迎我们的工人代表团，这也是不能容忍的。为我们的飞行举行的庆祝活动完全由当局所掌握。我们告诉中国督办说，我们希望在宴会上不仅看到当局的人员，也要看到工人和社会团体。他们许诺在下一次宴会上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天，顾问向翻译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省里是否有什么工人组织？’

“这是革命的顾问在向革命的省长发问

“他们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组织，就邀工人们出席宴会欢迎我们的到来。

“安排了盛大宴会，鼓乐高奏。约有三十个穿蓝衣服的工人在座，但被赶到了靠近厨房的地方，而官员们则全都坐在一边。一看此情此景，我们当然立刻把外交礼节全都忘在九霄云

外了。这还有什么外交礼节可讲呢。工人们举着旗子来欢迎我们，可是简直被打发到厨房里，而我们自己在宴会上的席位却远离他们十万八千里。我们自然转告省长，说我们很高兴，感激他的关注，不过我们还是想和工人们坐在一起。

“‘如果贵处断乎不许，那么或者请允许我个人和工人坐在一起。如果不同意我去，那么我们大多数同志反正是要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您请便吧。’

“总之，他们商量了一阵，不好得罪客人，因为招待一次客人他们开销甚大。把三十个工人都带到里边来了，挤了一些。再看时，眼前不是丝绸长袍和马褂，而是蓝布衣服了^①。工人们马上就发言表示反对督办解雇了一名工人，并且不容宽恕。我们颇费了些气力才制止住工人。然而宴会也结束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宴会结束时和工人们依依惜别的情景。”^②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给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党的干部、宣传人员、以及革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决定在莫斯科创建中国中山大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癌症病故。他在去世前一天，即3月11日，致书苏联政府表示：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保卫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

① 作者在另一处写道：“穿长袍的只是官员。他们穿着一式的丝绸马褂和长袍。”（长袍子，上套黑色马褂。——达林）

② 史密特：《从莫斯科至北京的航行》，莫斯科，1926年版，第44、45、53页。

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①

致苏联的书文，不仅是给国民党的遗嘱，而且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纲。

已经决定，有实际革命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国民党的成员，都可以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

拉狄克被任命为校长，副校长是以前在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工作的巴维尔·米夫。我们大家都了解，米夫曾任校长办公室的政委。还在1923年，他就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米夫很有策略，他有节奏地履行其职责，并且保证了正常的教学进程。1927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

被吸收参加中山大学工作的首先是一些中国学家，如伊万诺夫（伊文）教授、安德列耶夫，其他还有从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教师的成分本身就可以说明这所大学总的情况，该校的宗旨是对中国革命青年进行理论训练。应该指出，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大多数学生以前曾是中国大学的学生。

1925年秋，中山大学开学。不久，我也被吸收兼任教学工作，但主要仍在红军里工作。

我在社会发展史教研组工作，教研组编写了饶有兴味的教程。学生们都全神贯注地听课。教程的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至今的发展学说。对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从生产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阶级矛盾，以及一种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2页。——译者

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规律性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

最主要的是，在这一方面不仅阐述了全部人类文明，而且特别阐述了中国历史。我们这些教师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历史，以及欧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现在正坐下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我们攻读了马可波罗、马卡尔特涅伊勋爵、俾丘林、库诺夫、扎哈罗夫、格奥尔基也夫斯基、斯卡奇科夫的著作和文章，还研究了英国和德国关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以及土地关系等方面的著作。这都是为了能再用中国的事例来说明讲解的课程。

我们教研组的会议经常开成活跃的学术讨论会，前来参加的不仅有其他教研组的同志，而且有莫斯科其他大学和院校的教师。这些讨论会常常引起许多有趣的想法，启发了教师 and 学生的创造性思想。

至今，我们认为社会发展史这一门专业课是整个社会科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的入门必修课。

1925—1926学年就这样过去了。招收新生、给学校购置中文书籍、与中国大学联系，以及许多其他的组织方面、政治方面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只有在中国才能就地解决。因为都知道我是“老中国人”，认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国民党的某些领导人，所以共产国际很快就决定派我出差去中国。

我从军队复员了，重又登程远行。现在除了奉命办理的事情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一个纯粹科研性的任务，即搜集太平天国革命史料，因我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很感兴趣。

十八、重到上海

1926年8月底我抵达上海。当时国民党军队连战连捷、正在顺利地由广州向北推进。从我上一次到这个城市以来，才不过两年多的时间，但是这里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发展了，出现了许多新的高楼大厦、银行和饭店。主要街道——南京路上开始拥挤了，自行车铃声和尖厉的汽车喇叭声不绝于耳。

1842年，第一次英中战争以后，英国人强迫中国接受了所谓的“南京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上海这座不大的滨海城市向外国商业开放，并且把沿黄浦江岸的一块地方划给外国人当租界。昔日的小镇变成今天的大城市了。但就是到1926年，那里也只有二万五千名外国人；其中一万五千人是白俄。当时有十万中国人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地，单是人力车夫就有六万名。

当时，这里是亚洲最大的交易所，它操纵着全世界——无论香港还是纽约——的银价。不要说外资银行，单是大的中国银行就有八十家。远洋轮船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港口，卸货之后，装上新货，再驶向欧洲、美洲、亚洲和澳洲的港口。1926年，上海港的货运量占世界第三位。

现在，在这里大显神通的，不是穿长袍的中国商人，而是新的欧化了的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穿的是时髦的西装，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为自己修建豪华的别墅，还有停放贵重汽车的车库。富有的中国女士佩带着贵重的首饰，由这班欧化的崇拜者陪同，在饭店和剧院招摇过市。她们梳着最新的巴黎发式，涂着

口红，描了眉毛，开着汽车兜风。午夜到英国“皇家饭店”去喝昂贵的洋酒，跳狐步舞和却尔斯登舞。

迎合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口味的电影也出现了。例如电影《儿子的孝心》，在上海颇为流行。

儒家的道德准则要求子女绝对服从双亲，子女刚出生，父母就给他们订亲。当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夫妇长大成人时，他们就应该绝对遵从父母之命。这是儒学的“孝顺父母”的表现之一。这部电影一开始就引用了孔夫子的这句话。

一个在国外大学毕业的中国青年，正在归国途中。他在轮船上认识了一位欧化的中国少女。她也曾在欧洲留学。浪漫史在旅途上开始了。他们一同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们的爱情达到了顶峰。他们过着欧洲式的生活，下午五点钟喝茶，跳狐步舞。姑娘与父母同住，有洋房、大钢琴，家里是西式摆设，不过母亲还是希望她穿旗袍，姑娘拒绝了。青年男子逐渐成为这家人的常客，不久便向女方求婚了。一切都很顺利，年青夫妇很幸福。但是，主人公突然收到了父亲的信，要他马上回农村去。他知道其中的奥妙。还在童年时，他就和邻居的女孩子订了婚。现在他应该去和这个他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从来都是穿着裤子、而且不会跳狐步舞的姑娘结婚了。

“狐步舞”和孔夫子展开了斗争，悲剧开始了。这时候，看剧场里的观众比看银幕有趣得多。从这些面孔上，你可以看出，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悲剧。使观众不满的是，孔夫子胜利了，而欧化的年轻资本家动身到离上海很远的农村去找他父亲。主人公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守旧的宗法式家庭。观众显然不喜欢这种守旧的生活方式、风尚和习惯。他们讥笑的不是穿晚礼服的主人公，而是讥笑那个严守中国习惯和儒家道德观念的宗法式家庭。新娘被领来了，她是一个丝毫未曾接

触欧洲文明的典型的中国姑娘。钟情于上海那位女主人公的新郎毫不留意这位明媒正娶的新娘。但是孔夫子这样要求，还是举行了婚礼。孔夫子战胜了欧洲的“狐步舞”文明。这些外国观众和欧化的中国观众公然不满，而整个电影是迎合这些观众的，因此悲剧还不能结束。这一对年轻夫妇外出旅行，进了城。一辆汽车撞上了他们乘坐的马车，年轻的妻子死了。观众满意这个情节。结局清楚了，于是皆大欢喜，男主人公又和那位欧化的中国少女到了一起。既没有得罪孔夫子，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文明又取得了胜利。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就是这样的。连外国观众也很满意。

几个月后，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的这个悲剧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演出了。

上海的新兴资产阶级依靠的是新的生产基础，即现代化的工厂。当然，其中多数属于外国资本，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掌握的也不少。

当时，上海有各种工厂二百五十个，其中有三十万工人。此外，在一些小工厂、作坊和运输行业中当苦力的还有十五万至二十万工人。

在五十八家纺织工厂中，共有二百万纱锭，十一万七千工人。二十二家属于中国资本家，其余的则属于日本人和英国人。

在完全由中国资本控制的八十家丝织工厂中，有十二万女工和童工。在由一家英美公司控制的众多烟草工厂中，有二万五千工人。中国企业家掌握的火柴工厂有一万工人。此外，在上海还有机器制造工厂、铁路工厂和机车库、面粉厂、造纸厂、船坞等等。

在贸易方面，中国资本势力更加强盛。除了几家大洋货店以外，其余所有大、中型，当然还有小型贸易都在中国资产阶

级控制之中。

华商经纪人在上海，而且总的说在全国，都起着特殊的作用。外国商品的推销和中国原料采购的所有业务都要通过华商经纪人办理。这类商人被称为买办。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无论在中国工厂，还是在外国人办的工厂里，中国工人的处境都很悲惨。

毫无成见和偏袒之嫌的基督教青年会国际书记舍尔伍德·埃季，曾经这样描述上海纺织工厂工人的处境：“清晨，我们访问了一座外国人管理的现代化棉织厂。七岁至十二岁的男女童工上白班和夜班，每天挣八分钱。他们的母亲们也在旁边和他们一起干活，所得工资稍多一些。就在这里，我们有时还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或者睡在废料堆上，或者在母亲通宵达旦不断工作的机器跟前玩耍。”

这位舍尔伍德·埃季还描述了上海工人的居住条件：“我们访问了一个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面住了十个人，一半人在夜班时间睡觉，另一半人在白班时间睡觉。屋子里既没有炉子，也没有烟囱，直接在地上拢火，火上扣着家庭做饭用的铁锅。”这些描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的英国工厂监察员的报告，在文字上几乎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种情况在英国是发生在十九世纪初，而在中国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上海工人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忘我地进行斗争。这远不是单纯的经济罢工，因为大多数工厂属于外国资本，主要归英、日资本家所有，因此，每一次罢工都变成了反帝行动。

人们还记得1926年8、9月的那些日子。在一艘日轮上，船方打死了一名中国工人。为此，上海所有日本纱厂都宣布罢工。英国巡捕开始镇压罢工。于是最大的英国怡和纱厂立刻罢

工，其他英国企业也停了工。罢工逐渐从外国工业的一个部门波及到其他部门。国民革命军北进越快，工人运动进展就越猛烈。直到有一天英国报纸惊慌失措地报导，上海已处于总同盟罢工的前夕。逮捕开始了。工人组织了战斗队——工人纠察队。

这已经是9月初了，9月7日——国耻日快到了。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帝国主义在镇压了义和团起义之后，签订了迫使中国大量赔款的议定书。

总工会指示，这一天不要采取行动，要保存力量，等候国民革命军抵沪。但是一部分工人还是和学生一起组织了活动。

这一天，上海的街道象是临战阵地。南京路上的每一座房子都有大队英国巡捕荷枪而立。外国志愿兵团的装甲车在城里东奔西驶。尽管如此，马路上仍然一直有飞行集会，四处散发反帝传单。巡捕害怕重演五卅事件，没有开枪，但是他们以枪械相威胁，驱散集会群众。人们此散彼聚，集会地点并不在宽阔的街道上(离机枪远一些)，而在店铺门外进行。一个学生站在店铺门前的长凳上，愤怒地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巡捕刚一出现，讲演的学生就躲进店铺，人群则四散，以便过一会到另一街区，另一店铺前重新聚会。

尽管工会指示不要行动，尽管上海实际已处于戒备状态，工人们还是举行了万人反帝集会。

前几年是学生领导反帝运动，现在与那个时候不同，领导运动的是工人。这方面的转折点是1925年的五卅事件，从那时起，民族解放运动变成了由工会领导的真正的反帝革命斗争。这在1926年的上海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新情况。它反映在各方面，甚至反映在外国人的举止上。

有一次，我们从一家电影院出来，碰到了上海常见的一个

场面。一个英国人打了人力车夫一记耳光。新鲜的是，一些外国人围住了那个英国人，使他很尴尬。“您忘记‘五卅事件’了！”——他们就是这样对他说的。

五卅惨案象一场恶梦留在外国人的记忆之中。此后，外国帝国主义者终于明白，继续执行老政策、蹂躏和枪杀是危险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慑于工人运动和日愈提高的群众政治自觉性的压力，被迫在民族革命高潮中放弃老的统治手法。现在，他们不敢碰中国人。只消碰一下，上海就会面临新五卅事件的危险。

就在不久以前，上海的公园门口还挂着“华人禁止入内”的牌子。现在摘掉了这种牌子，换上了新牌子，写着“华人着西装可以入内”。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一种让步。但是，上海的苦力们鉴于缺乏住房、工资低微，决定在每天十六小时的工作之后，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个足觉。于是，他们未经官方同意，就钻到公园去过夜或休息。在上海码头也有长椅，但“只供外国人坐”，五卅事件之后，苦力们决定也要在这些长椅上休息。上海出版的英国报纸刊载了给编辑部的这样一些信件，“尊敬的编辑！我陪妻子在公园散步，真感到脸红，不敢正视妻子，因为长椅上躺的是苦力”。报纸上讨论了一阵这个问题，白卫分子提出了一个建议：收门票，交费者均可进入；苦力们没有钱，因此他们进不了公园。但还是决定暂且不这样办。只是在工人运动的浪潮平息以后，巡捕才敢再度禁止中国工人入园。

五卅事件激励了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它是作为1925—1927年的革命载入史册的那些事件的开端。

上海的情况反映了以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为其特点的中国总的形势。列强郑重声明，他们将严守中立。但是英国和美国“为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派军队在上海登陆，而外国当局宣

称，他们不允许在租界进行任何革命的示威游行。

当时华人区及其毗邻地区都处在反动军阀孙传芳控制之下。他暂时没有参与战争中的任何一方。当时他尚举棋不定：支持还是反对蒋介石。因他与蒋自从一起在日本读军校以来，就建立了密切的私人交情。但是在外国列强影响下，孙传芳日益转向反对国民党的一方，随后又公开反对一路攻打过来的广州军队。

上海的外国当局虽已宣布中立，却又同孙传芳达成了协议，允许他通过外国租界调动军队。租界邮局暗中检查了所有邮件，并就政治上的“可疑”情况通知了华人区的秘密警察。

这时，我访问了一位中国的名教授，此人也颇受外国人敬重，他住在法租界。时间已很晚，是晚上十一点钟了，突然有人不停地敲门，这是学生们从抗议集会上跑来了。他们说，在七十个中国密探的帮助下，法国巡捕拘留了所有参加集会的人。大多数人当场就获释了，但是集会的组织者们被逮捕了。在缴纳赎金以前，法国捕房不会释放他们。老教授马上赶到城里去，过了半小时，他带来了法国巡捕需要的那笔钱。在等待教授回来的时候，学生们愤慨地告诉我，这七十名中国密探不是法国巡捕房的人，而是孙传芳手下的人。但是根据和英、法巡捕房达成的协议，允许这些密探在外国租界“工作”。这就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严守中立”。

在这种紧张局势中，我会见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不仅有仍然驻在上海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某些领导人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还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及上海大学的某些教授和学生等等。

同时，租界的英国密探加紧跟踪苏联人，从事间谍活动，严密监视苏联领事馆。上海英国密探头子叫吉文斯，他学过俄

语。很多白俄为他效劳，甘愿从事任何反苏勾当。

我住在一个循规蹈矩的资本家的房里。在这幢三层的大楼房里，有很多中国佣人：厨师、专管刷鞋的仆人、专管洗衣的仆人、打扫房舍者和听差等等，工钱很少，因此资本家们并不在雇人上省钱。据说，这些仆人中有些是给巡捕房通风报信的人，但是在这里，我却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房东从不过问我干什么，在哪里消磨时间，以及为什么那样晚回来。这幢房子毫不令人悬心，我很泰然。

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十一——十五天了。有一次我白天回住所去，已经走到离我的住处所在的那条街不远的拐角处，突然从停在人行道旁的一辆汽车里跳出一个人来，他抓住我的一支胳膊，把我拖进了汽车。他自己开车，我们飞快地向前急驶而去。我马上就认出他来，这是我们领事馆的职员米利哥拉姆。据我所知，他的工作是防备那些白俄的反苏活动，保护苏联领事馆和为数不多的旅居上海的苏联侨民。米利哥拉姆告诉我，吉文斯刚刚签发了我的逮捕证，借口是我动身来中国前不久，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书，即我那本《在中国革命的行列里》。

事情是这样的：吉文斯还没有来得及签署逮捕证，米利哥拉姆就已经知道了。他往我的住处打电话，我不在，估计我应该回去吃午饭，就决定在街上截住我，因为巡捕随时可能到我的住处去。显然，巡捕已经从某一个想去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学生那里知道了我正在上海。很多这样的学生来找我，要求送他们到莫斯科去学习。

米利哥拉姆把我带到一座房子，安顿在一间顶楼里，劝我不要出去。在此之前，我实际上不了解他。有一次在领事馆，别人介绍我们认识了，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他是谁，什么时候来上海的。甚至现在我也没有问他这些问题。

一直到六年后，我才在莫斯科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红色教授学院见到他，那时我在该院学习，我正在读三年级。有一次在走廊里面对面遇上了他，这次见面完全出乎意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他。只是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他不同寻常的经历。

米利哥拉姆是1916年的俄共(布)党员，他的党龄是从1916年5月1日算起的。这一天他因为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上参加了斯巴达克团员的反战示威而被逮捕。

1896年他生于卡里施市，该城位于距俄德边界不远的俄罗斯帝国领土上(现属波兰人民共和国)。因此，当他在上海救我免于被捕的时候，他是三十岁。但是他已经过了够别人经历五十年的历程。他的父亲是工人，后来又成了花边工厂的工长。于是他的儿子从童年起就在那里做工，先是打下手，而后成为钳工。1913年，米利哥拉姆到了德国，先在萨克森的煤矿做工，而后又在鲁尔区的一家克虏伯工厂做工。在那里，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大战爆发前，他回到了俄国，但是在德国人占领华沙以后，他又潜回德国，在柏林市铁路系统做钳工。在参加五一游行被捕并被监禁几个月以后，他被发配到克虏伯的一个工厂去强制劳动。他从这里逃到荷兰，在那里参加了潘涅库克、高尔捷尔、罗兰——霍尔斯特领导的左派团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因在荷兰参加亲苏活动于1918年被捕，并在监狱中关了九个月。而后他到了比利时，并加入比利时共产党。直到1920年夏天，米利哥拉姆终于来到了苏俄。他马上志愿参加了红军，并被派到波兰战线，在波兰白匪后方的侦察队中服役。1920年12月，米利哥拉姆回到莫斯科，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1925年出差到上海。我就在这里认识了他。

回国以后，米利哥拉姆在明斯克工作。在白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时，他颇费了些周折才获准休假，以便继续学习。1930年，他考进了预科，然后又在1932年9月考进了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红色教授学院。在这里，我们又重新见面了。

我们回忆了一同在上海的那一段经历。有十到十二天的时间，米利哥拉姆把我藏在那间顶楼里，每天给我送饭，然后，正如通常说的，有一日他终于把我带到他的汽车上，向上海码头驶去，安排我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不在香港靠岸）。

对米利哥拉姆的感激之情，我将永志不忘。至今，他那坚毅勇敢的形象依然时时浮现于我的眼前。

十九、北伐时期的广州

轮船在广州码头靠岸了。自从陈炯明反革命政变后我离开这座城市，才过了四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广州发生了很大变化，简直难以辨认了。

早在1921年，孙中山就开始实施其改造广州的计划。由于他的努力，修筑了一条从广州市到近郊农村的公路。这是第一条宽阔的通衢。现在，广州已经有好几条带路灯的干线，高楼也多了。广州逐渐从陋街小巷的中国古城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还没有电车，但是人们已经常常在议论了。目前在城里来往的还只是不大的公共汽车。每修好一条公路，立刻就通公共汽车。

在住房确定以前，我在鲍罗廷那里住了几天。他居住和办公的那幢两层楼房位于东山上。一层是顾问们和翻译及技术助手的办公室，二层是鲍罗廷和家人的住房。还有几间客厅。

鲍罗廷的住处真是一个司令部。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常到这里来。人们一般不在这里久留，同要找的人谈完后，就离开了。于是又有新的人来。就这样从早到晚不停地出出进进。鲍罗廷的妻子总要费一番功夫才能把丈夫叫去吃饭。

在这里，我见到了在莫斯科就已认识的胡志明、张太雷。

军事顾问阿基莫夫、杰涅克、齐利贝尔特、康奇茨、库马宁、马采依利克、罗加乔夫、捷斯连科、切列潘诺夫等人随布留赫尔（加伦）驻在北方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中。

苏联政治顾问小组在鲍罗廷的大本营里工作。这里有我在俄国共青团和随后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时就认识的塔尔汉诺夫。他介绍我认识了年青的苏联中国学家约尔克姆、沃林和卡拉契夫。广州政府财政顾问史特恩及其助手沙斯也在这里。这时我又见到了维什尼亚科娃。

塔尔汉诺夫和约尔克在这里出版用打字机打印的《广州》杂志，刊登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资料。

鲍罗廷的妻子法尼亚·谢苗诺夫娜经常把国民党领导人的夫人们请到自己的住处来。在她的“沙龙”里，我又见到了宋庆龄，认识了她的妹妹宋美龄，她当时已是蒋介石的妻子^①。蒋介石通过她和孙中山成了亲戚。我还在这里见到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

鲍罗廷到广州已三年了。他在这里做了大量工作，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并不总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也尊重和爱戴他。他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一个有趣的谈伴，单是外表就令人好感，他熟谙国民党领导人的言谈风度、相互关系、以及中国的礼节和交往。除个别人外，这些人仿佛都戴着假面具。他们总是四平八稳，从不高声说话，总是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但是他们有对各种事件、建议和人物表示态度的特殊方法。鲍罗廷对这种纯粹中国习俗已经完全了如指掌了。

孙中山的气质与他的这些同事不同。他象真正的革命者那样，从不隐瞒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我记得1924年在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他给蒋介石写的一封信。孙中山写道：

“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

^① 此处恐是作者之误。据1978年6月台湾版的《蒋总统秘录》第十五册《蒋总统年表》所记，蒋与宋美龄是于1927年12月1日结婚。——译者

命，非以俄为师，可断无成就。”^①

孙中山和鲍罗廷成了近友。他们一起制定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鲍罗廷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威望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段友情。

孙中山在世的后几年，国民党逐步走上了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各派力量，在新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但是，党的成分并不单纯。我已经说过，还在1922年，孙中山就对我说，他周围有许多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把国民党变成统一战线的革命党，同时也就需要团结这个党内自始就反对和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大地主所组成的右派，这是不足为奇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后，英帝国主义者指使的反动势力几次企图推翻广州的革命政权。当时，广州政权实际上是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廖仲恺领导的。鲍罗廷曾对我说过，廖仲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的雅各宾党人。

孙中山去世以后，形式上是汪精卫领导政府。从刚才引用的那封信可以明显看出，孙中山已经不信任他了。用革命原则改组国民党的领袖并不是汪精卫，而是廖仲恺。群众都了解他。

整个1925年，广东省都是在肃清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度过。其所以成功，是由于政府依靠了人民群众，依靠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在上海的五卅事件和1925年6月23日广州事件引起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高潮中，广州的反动势力被打败了。但是广州的反动势力此后不久就对革命力量进行了一次打击。廖仲恺遇刺

^① 《国闻周报》第4卷，第14期，第3页。——译者

了。

在广州，人们始终认为，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以前任广东省国民党军队总司令的胡汉民，参与了杀害廖仲恺的阴谋。

廖仲恺被刺加强了右派的地位，削弱了廖仲恺以前所支持的汪精卫的地位。从此，汪精卫有了国民党左派的名声。

1926年3月20日，当时任广州附近的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发动政变，踢开了汪精卫政府。为了掩饰政变的真正性质，蒋介石击了国民党极右派一掌，但是却全力以赴地攻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竭力分裂工人运动。土匪出身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在农村“维持秩序”，并且解散了一些农会。

当时，中共中央派到广州与蒋介石谈判的代表，是中央委员张国焘，他打算“消除误会”。然而蒋介石却从他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从他身兼校长的黄埔军校，甚至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中，清除了许多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在3月20日事件以前掌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毛泽东。经过谈判，蒋介石毕竟还是把武器发还给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但在黄埔军校，他表现得更狡猾：他不仅解散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而且也解散了校内的极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3月20日事件发生在反帝运动高涨和同香港断交的情况下，发生在北伐的准备时期。北伐只有靠人民群众，特别是靠农民的支持，才能有所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支持同香港断交并发表反帝言论。他本来就无力一举镇压工农运动，消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因此，1926年3月20日政变没有进行到底。这一点当时使许多人未能认清事件的真正实质。

1926年秋天我到广州时，人们已经几乎不提3月20日事件了。因前线连战告捷，到处热情洋溢。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

中做了大量工作。每天都在密室或大街上举行集会。出版了很多通俗的革命书籍。到处张贴传单和宣传画，甚至最偏僻的角落也不例外。政治生活朝气蓬勃。广州街道上的行人总是比肩接踵：时而是罢工工人的示威；时而是庆祝国民革命军胜利的游行；时而是商人的游行；时而是街头集会。国民党的蓝旗^①、中华民国的红旗和白色的标语口号汇在一起，这一切，象排山倒海的洪流，滚滚向前。

当时，广州政权就是处于街头巷尾这种革命气氛的影响之下。某些问题有时不是用法令，而是通过斗争的各方在街头的争论来解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变成了某种仲裁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门口总是聚集着工人、商人。当然，常常是工人居多。

这是商人们在游行。他们衣冠楚楚，大腹便便，举着国旗和国民党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去请愿：要求镇压农村的土匪活动。一部分破产农民沦为寇盗。商人们控告抢劫行为，埋怨无法在偏僻的县城和农村经商。

这是工人纠察队，他们也举着国民党旗列队行进。司号员用号声协调纠察队员的步伐。他们身着军装，帽戴国民党徽，手持步枪，前去帮助罢工工人制服那些尚未认输的企业主。

工人纠察队执行了同香港断交的任务。正式的绝交已经取消了，但是群众仍然继续斗争。因此，我离开上海时乘的轮船没有到香港去，而是从旁驶过，直接进了珠江口。正式停止断交后继续抵制香港的还有汕头市。汕头市工会主席告诉我们，停止罢工意味着加强而不是削弱反对英国的斗争。直到现在，断交运动还是由工人纠察队监督进行。他们不许给英国轮船装

^① 原文如此。——译者

货，不许和英国人通商。他还说，现在，我们撤回了纠察队。但是我们向工人、商人和全体居民发出号召：即便没有任何工人纠察队，工人也不要为英国人做工，商人不要与英国人通商，市民不要买英国货。让群众自己代替纠察队进行抵制，在汕头，人们就是这样看待撤回纠察队的决定的。

甚至在广州，很长时间内也没有能够顺利停止抵制活动。当时广东政府的外交部长是陈友仁，1922年陈炯明政变之后，他是我和孙中山之间的联系人。正式停止抵制香港以后，广州报纸发表了陈友仁对报界的谈话。他申明，这个决定是国民政府政策中朝着同英国建立正常友好关系方面的转变。香港的英国报纸也发表了这个讲话。采访记者知道断交活动是工人们搞的，便告诉陈友仁，他并不怀疑政府的善良意愿，但是他也同样不相信工人的善意，而停止断交活动却有赖于这些工人。陈友仁



广州。工人纠察队司令部

似乎回答说，如果工人拒绝停止断交，那就用暴力强迫他们服从。

广州工人知道了这个谈话后，城里开始出现风潮。已经罢工十六个月的香港工人和广州工人都曾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工人们已经把香港围困了十六个月，现在，政府却以动用武力威胁他们。这个谈话马上就引起了抗议游行。这个谈话使群众如此激动，致使陈友仁在报纸上辟谣，否认他曾经威胁工人。但是这并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工人们要求政府公开声明，停止与香港断交并不表明对英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仅仅是在陈友仁声明同记者的谈话不确，又一次辟谣之后，工人才平静下来。

1926年，广州最令人震惊的是连续不断的罢工。广州工人粉碎了反革命买办的队伍，这支队伍得到了一个有讽刺意味的卑称“纸老虎”。在国民党广州政权处于千钧一发的时期，广州工人帮助它战胜了反革命。广州工人阶级是国民政府实行革命措施的最可靠的支柱；很多工人参加了国民党。工人们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同时，一直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

近十年来，本已很微薄的实际工资平均下降了10%，有一些职业下降了35%。这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刚一巩固，反革命威胁刚一减少，工人就开始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了。应该看到，工人为了挣得微不足道的工资，每天要劳动十一到十五个小时；并非所有的工人每周都有休息日；学徒则无偿地从清晨干到深夜，而主人只供应粗茶淡饭。国民党左派同情工人，但是通过立法途径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服从这种法律。因此，正在进行罢工斗争以解决这个问题。广州没有一天没有罢工。

准备北伐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布了一个告工人书，其中说到：

“亲爱的工友们，世界上最可怜最痛苦的，再莫过于你们了。工友们，你们要回过来想想，国民政府是不是你们的政府，肩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重任的革命军的北伐，是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凡是稍妨碍政府行动，有妨碍北伐前进一切不必要的罢工，都要极力暂时忍耐避免，……无论工农商学兵，都要集中在一个意志之下，……绝不可稍有分歧，予敌人以可乘之隙。工友们，你们是国民革命的急先锋，北伐又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你们要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一致拥护北伐，北伐胜利万岁。”^①

情况的独特之处在于，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尽管在呼吁工人支持北伐，却没有按法律程序采取任何措施，哪怕在最小范围内规定雇佣劳动的条件和通过工人立法：规定工时，限制使用童工，确定妇女劳动条件，使工会权利合法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制定了这种残缺不全的工人立法。显然，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如何也应该解决工人问题，应该给工人阶级一些具体东西，改善其处境。这同样也涉及到农民问题，首先是租贷条件。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在立法方面毫无作为。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反帝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不可避免地会伴以城乡阶级斗争的激化，而共产党就要在这场斗争中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至于国民党，政府一面号召工人支持北伐，同时又威胁要用暴力镇压工农的斗争。

广州工人响应了国民党的号召。他们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兵或当担架队员。没有这些人，国民革命军就不可能前进。

^① 见于《国民党北伐期中对工人的宣传大纲》。全文载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二），台北，1959年版，第571—574页。——译者

但是，在以北伐胜利的名义号召阶级和平的同时，却发布了戒严令，其第九条就借口妨碍战事而禁止集会和罢工。

这个戒严令当然是毫无作用。工人们没有停止反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譬如织袜女工就无法靠两元的月薪过活。当兵工厂的工人受到威吓，说如果还不停止罢工，就要以同盟歇业对付他们时，工人们举着国民党旗来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表示，倘发生同盟歇业，工人将宣布大罢工。此后，当局没有敢于采取这种办法对付工人。

广州工人没有听信国民党号召阶级和平的言词，继续举行罢工。这并非因为他们反对国民党，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尽快地、始终不渝地贯彻国民党的纲领，执行国民党自己大吹大擂的宣言。

但是在许许多多的罢工中，也有一些令人踌躇、令人为难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孙中山开始改建广州城的事。拆掉了平房，铺建了宽阔的沥青马路。市政当局买了一批公共汽车，并且在城里组织了汽车运输。但是这一切引起了人力车夫的反。

广州的人力车夫组织得很好。有一次，一个警察照老习惯用棍棒打了人力车夫。第二天，全广州市的人力车夫都罢工了。他们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拉着自己的车子鱼贯行进，最后如愿以偿：那个警察被解职了。

当时，人力车夫都反对公共汽车。市政当局决定扩大公共汽车运输，并在通电车以前增加公共汽车线路。这时人力车夫为抗议市政当局计划，开始罢工了。在人力车夫的压力下，市政当局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大工业生产前的工人斗争是否是进步的？人力车夫租了车拉运乘客，当他们为了改善租贷办法反对车主的时候，这个斗争是正义的。但是人力车夫反对公

共汽车的斗争也是正义的吗？这种斗争不是很象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的卢达分子^①反对机器的斗争吗？

广州的新旧事物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亲眼看到了两次群众性的节日庆祝活动：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和11月12日的孙中山诞辰。

当时在国民党中国，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一天是休息日。节日前夕，在6日晚上，举行了一些专门纪念十月革命的会议。工人、学生、国民党组织都举行了集会。还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听完报告后，工人们发表了声明：“我们也应该马上学习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因为只有他们的道路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

晚上九点钟，街上到处都在举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节日演出。在最热闹的一些地方搭起了露天舞台。演员们在舞台上扮演俄国资本家、白匪、工人和农民，我们看了很惊奇。我们不懂汉语，但是完全能看懂他们的表演。第二天，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操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里大多是国民党旗和写着无产阶级口号的标语牌，还有许多面带镰刀斧头的红旗。

群众集会通常都是按阶级特征组织起来的。同一个广场上就搭了几个讲台。一个是为向工人讲演的人预备的，另一个是为向商人讲演的人预备的，第三个是士兵的讲台，第四个讲台的周围都是学生。

1926年11月7日，广场上工人最多。但是在学生和士兵的讲台周围聚集的人也不少。这一天没有商人的讲台。我们在这一次集会上，收集到一捆纪念十月革命的呼吁书、传单、报纸和

^① 卢达分子，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工人自发捣毁机器运动的参加者。——译者

杂志。

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中心的工人讲台上发表的演说，不时被热烈的喝采声“很好”打断。广州工人是多么聚精会神地倾听这些演说啊！

我们最为赞赏的是广州少先队员，这是不能忘怀的情景。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们举着他们的旗帜来到了会场。这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子弟，他们赤着脚，破旧的衣裤仅能蔽体，孩子们系着红领巾，背着伞状的草帽。这些小无裤党^①举起小拳头欢迎我们，并且用汉语唱起了《青年近卫军》。他们绷着小脸蛋，高呼“时刻准备着”，正步列队走过。每队都有一位年轻的女辅导员吹着哨子整步。这些年轻女辅导员的步履和服装式样，都与莫斯科的女共青团员们一模一样。

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同样也举行了很多庆祝集会和游行。我们出席了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这个地方规定了而且牢固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仪式。会场里通常都挂着孙中山像，两边分别是马克思像和列宁像。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礼堂到各县党部礼堂，到处都是这样。肖像下面，张挂着孙中山的遗嘱。每次会议无论大小，不管是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小型办公会议，开会之初，首先是与会者全体起立，会议主席朗读孙中山遗嘱。之后，全体人员向孙中山像深深地三鞠躬。然后选举主席团，正式开会。会议结束时，全体人员再次起立，齐声高呼口号，祝愿国民革命成功。

1926年11月12日的游行比11月7日范围更为广泛。除工人外，还有许多学生和商人。前一天夜里，街上举行了提灯游行。

^① 无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讥笑革命群众的用语，后成为爱国革命家的绰号。——译者

主要参加者是工人。他们举着孙中山像，打着国民党旗，并在上面用不同记号标明了各自的职业。他们提的灯笼上写着标语，十分醒目。所提的口号又一次宣称：“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一切权力归工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虽然共产党当时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是游行者的口号就是这样的。

五年以前的游行主要还是特有的传统的民间娱乐：舞狮、舞大大小小的怪兽，敲击避邪的大鼓。现在，这一切已经被乐队和旗帜所取代了。广州工人成长起来了。这一点甚至在游行的形式上都有所表现。

就是在广东的农村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广州市开办了农民运动领导人讲习所。学员们有一次去调查某个农村。农民向他们控告了当地一个反对农会的地主。这里曾经发生过杀害农会会员的事件。学员们在农民帮助下，捉到了这个乡间的财主，把他押到广州，关在自己的讲习所里。

很难描述当时的广州。这里有一些情况与难忘的1917年的俄国雷同。我总感到，人类的语言太贫乏了，无法表述这些强烈的感情。人民群众来到街道和广场上参加革命活动，我无法表述他们的愤怒和欢乐，他们的爱和恨；不仅无法表述对整个威严的人流的感受，就连准备献身共同事业的每个人的表情、眼神和手势都难以描绘。广州是中国人民革命群众运动的摇篮。我在1922年就了解广州，现在，我亲眼看到，下层人民在最近几年已经发动起来了，人民群众开始主宰历史，我亲眼看到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了，社会问题常常是在街道上解决的。

二十、工 会

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刚刚过去四年。这几年里，中国工业的面貌变化很少。工人阶级的成份也没有改变。到处依然大都是用老式技术从事的手工业劳动。作坊里的活要求长时间的训练和技巧。这虽然是手工劳动，但同时也是技术性很高的劳动。瓷器、牙雕、银器、木刻、织锦等驰名世界的工艺品，都是在古老的手工工场和作坊生产的。同时还有许许多多的缝纫、制鞋、制陶、锻造、细木工以及其他各种作坊。本领和手艺都是一代一代传袭下去。作坊主通常也和工人一同劳动，特别是在那些不大的城镇里。但是大部分雇主还经商，他们同时又是商人。

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是非技术工人，即装卸工、普通建筑工人、苦力等等重体力劳动者。

与此同时，每个城市也有现代产业工人，司机、钳工、电工、五金工人等等。他们为数较少，工资高得多，形成了工人贵族阶层^①。就总体而言，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一样，成份并不单纯。其特点在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职业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占优势；第二个特点，是工人主要在小作坊中做工；第三个特点，是非技术工人居多，他们是刚从农村来的重体力劳动者。

^① 原文如此。——译者

如果说工人阶级的成份几乎没有变化，那么其组织性却大不相同了。在这方面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几乎所有的广州工人都参加了工会。这些工会具有行会的性质，因此很分散。

不久以前，不论雇主还是工人都参加的老的中世纪行会在这里还有很大势力。阶级斗争的发展导致了行会解体，它们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工人脱离行会而组织了工会。但是，行会有上百年传统，有吸引劳动者的特别办法和难以摆脱的宗教仪式。有人给我讲过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情。

广西省某县，木匠开会成立工会。报告人和组织者并不难向工人说明参加工会的必要性。因此，会开得很顺利。但是突然出来一个老人，他说，工会是个好事，不过不知道保佑木工的神灵意思如何。当地还有这位神的庙。一直平静的会场沸腾了。一个机灵的共产党员提议把这位神灵列为首席木工会员，工人们这才平静下来。直到给这位神灵开了会员证，木匠们才同意加入工会，并开始报名。但是此后又有一个关于庙的问题。这座庙是行会修的，一直由两个财主掌管。组织木匠工会以后，即老行会分裂以后，工人和雇主就开始争夺这个庙。在远离铁路和轮船航线的那些县，这种中世纪行会破灭和消亡的过程常常就是这番情况。

广州工人已经与此不同了。行会的神对工会将持何种态度，这个问题不再使他们为难了。但是行会也有其他的办法控制一部分工人，让他们离开阶级斗争，特别是高工资的上层工人。罢工刚一打破行会界限，把工人联合到工会中去，雇主们马上组织了另外的“雇主的”工会，吸收了上层工人、一部分失业工人以及工贼参加。

罢工期间，雇主解雇了罢工者，然后从“自己的”工会中雇用了一些新工人。当我在广州时，雇主们组成了二十六个这

类工会，共有约二万八千名会员。“雇主的”工会加入了广东省总工会。这个组织由来已久，而且各种行会和同业公会都在其中。它的头头是一个叫陈森的犯人。

广州市工人代表会机关报《广东工人响导》^①曾经评价陈森，“从他出世直到最近娶小老婆，我们从未见他为工人办过一件事。陈森……回老家去买了那里一大片地。……他在选举广州市长期间起了很大作用^②。结果陈森更阔气、更发福了。……他拿着资本家的钱，感恩戴德地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破坏工人罢工和提高工资……陈森的主要工作是帮助资本家组织工会……参加广东省总工会的工人从来也没有增加过工资……他曾经杀害了广州市粉面茶馆工会的三个会员，还帮助雇主杀害过牙刷业工会的会员。”

还在1925年7月，陈森就组织杀害了粉面茶馆工会的会员，工会一再要求政府惩办凶手。一年过去了，工会以罢工一天来纪念工友遇难一周年，但是陈森却在广州市逍遥法外，后来粉面茶馆和牙刷作坊的工人自己抓住了他。

甚至在广州这个革命运动中心，商业同业公会对一部分工人居然还有这样大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工人已经参加了革命的组织。

1926年，广州共有二十万工人，其中十七万人加入了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会。但是这些工会是按行会建立的。例如运输工人有二十二个工会，三万九千会员；其中只有两个工会、一千一百会员参加了“黄色的”广东省总工会。木匠有十六个工会，其中四个参加了黄色工会。

① 该报系英文报纸，下面的引文译自俄文。——译者

② 当选为市长的是国民党右派孙科(孙中山元配的儿子)。

按行业建立的工会，其分散性居然达到这种程度，制做西式帽子的工人单有一个工会，制做中式帽子的工人也单有一个工会。

广州有一百七十六个革命工会，全部参加了1924年成立的广州市工人代表会。

在工人的阶级自觉性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建立产业工会的愿望。但是这一过程进展缓慢，不够健康。

广州的产业工人处境特殊。他们的工资比普通工人多几倍。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为六至二十元，而产业工人为三十至七十五元，有时还要多。工人贵族单有特殊的机器工会，其中有六个工会，约八千五百人，主要成员是五金工人。广州的一万零五百名五金工人中有七千人加入了机器工会。这个工会既没有参加广东省总工会，也没有参加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在工人运动中起着最反动的作用。

有两个过程决定了工人的状况，即农业的破产和机器的使用。破产的农村把数以千计的农民赶到广州去，他们寻找工作，随便多少工资，甚至只要有两碗米饭吃，他们也干。破产农民涌到城市的苦力大军之中，致使非技术工人本来就很低的工资更降低了。机器则逐渐排挤了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

这两个过程导致了同一个结果：在业工人处境恶化，失业工人增加。又加上通货不断膨胀，既然没有任何劳动立法，工人只有用罢工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罢工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为了消除罢工运动，政府用其所谓超阶级性和貌似公允掩饰自己，成立了国家仲裁机构，处理雇工和雇主间的争执。国家仲裁机构实际站在雇主一方，用围困法对付工人。我们在广州期间，一些火柴工厂进行的一次罢工就是例子。某工厂解雇了十六名女工，于是这个工厂的工人宣布罢工，而且罢工很快

就波及城里所有的火柴厂。近九年来，这些工人没有长过一次工资，但是食品价格却提高了一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持续了三十五天。工人们领不到工资，迫于饥饿只得退让，停止了罢工。再一个例子是裁缝店工人持续了半年多的一次罢工，仲裁会并没有解决冲突。

裁缝店雇主组织了自己的同业公会，它通过了一份请愿书。全体雇主举着国民党旗把请愿书交到了国民政府、省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商民部和公安局。雇主们要求：一、派警察保护裁缝店，免致混乱；二、严惩肇事工人；三、倘若雇主被工人纠察队拘捕，并押解至公安局，被捕的雇主应立即获释。

广州商会机关报《商报》于1926年10月1日报导了最新事态：“因接到请愿书，公安局长命该地段警察严密防护裁缝店，并命令万一雇主与工人发生冲突，则立即出动警察制止混乱。倘有不服从警察命令者，将其捕送公安局审查。”

缝纫工人罢工期间，所有企业都挂着牌子：“一致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旁边就挂着雇主公会的牌子：“被压迫的工友们，我们很遗憾地关门了。”

雇主的请愿书还有这样一点：“命令缝纫业工会不要反对自称为雇主并因此退出工会的工人。”换言之，雇主募集了一些工贼，并劝他们加入雇主的工会。雇主力图分裂缝纫工人工会，组织工贼工会。正是因为这一点，“社会治安”才受到破坏。

罢工持续了很久，政府的仲裁会简直成了彻底的讽刺。如果工人不让步，仲裁委员会的会议就延期三天，然后一再延期，直到工人因为缺钱用而认输。同时，雇主们还恐吓工人并策谋杀害罢工领导人。

这就很清楚，为什么广州每个工会都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纠察队保护罢工免受雇主指使的袭击，保护工厂免受工贼之害。

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诽谤工人纠察队实行恐怖。火柴厂主们以“工人恐怖”为理由已在讨论迁厂香港和澳门，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一些印刷厂主携带财产搬到了县城。“工人恐怖”就是工人建立了工会，雇主要与之打交道的是工会，而不是单独的工人了。

1926年10月，资产阶级更起劲地散布“工人恐怖”的流言蜚语，流毒甚广，以致工人代表大会只好召开专门会议，发表了告人民书，说明现状。

这个会议有一百五十名代表参加。会上批驳了关于“工人恐怖”的非难。国民党报纸《国民新闻》于1926年10月19日就这次会议发表了如下报告：“代表们表示，由于物价昂贵又不断上涨，工人被迫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雇主时常迫害工人、解雇工人。这时，工人不得不封锁企业。当然，如今是北伐时期，和平和秩序至关重要。因此在每一次冲突或混乱之时，工人都期望督察部门负起解决这些冲突的责任。但是事实证明，常常是罢工虽然持续数月之久，当局仍不予注意。最后代表们表示，如果地方当局了解工人处境，他们就绝对不会发布那些严酷的命令。”^①

“严酷的命令”，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还在1926年8月6日就已发布的解除工人武装、逮捕使用武器的工人并交军法处处理的命令。

1926年12月，已经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广州迁到汉口之后，又重新颁布了反对罢工的决定。此决定与以前的命令区别不大，但是这一次确实开始解除工人武装，并为此动用了军队。

^① 未查到原文。——译者

工人代表大会又向省政府递交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多次冲突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似乎工人们蛮不讲理。但是，如果我们据实认真考察工人的要求，则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改善他们悲惨处境的最低要求。

雇主这时究竟如何呢？他们虚伪地允诺考虑工人的要求，但是即便最小的要求，他们也从来不予任何回答。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关闭企业或解雇工人。他们组织了黄色工会，雇用歹徒殴打、杀害罢工者，利用工贼破坏罢工。

“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工人才不得不拘留破坏罢工者，封锁工厂和商店，把货物扣在工会的仓库中，并于冲突解决之后归还原主。他们这样做，并非图自己痛快。当局的负责代表从未象我们期望的那样快地把冲突审理清楚。例如，国民政府劳农部前任领导离职时，就留下尚未解决的劳资冲突一千七百多件。”^①

广州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资产阶级不仅用围困法反对工人阶级，而且主要是分裂工人阶级。

1926年9月，广州蔬菜业罢工。雇主已经建立了参加广东省总工会的黄色工会。这个工会用雇主的资金组织了一支有二百个流氓的队伍，并发给他们武器。罢工者遭到了袭击。在一条街上发生了激战，打死五名工人，重伤三名，另有两名罢工领导人被抓走，押到了雇主的“工会”，一路上还打了他们一顿棍子。

工人刊物上大约每天都刊登工会会员与行会的走狗或雇主“工会”会员之间的街头激战。

我的中国朋友们试图统计这类冲突的数目。他们没有搜集

① 未查到原文。——译者

到完整的数字，因为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登过报。就是这些不完整的数字毕竟也可以证明，从1925年7月到1926年6月共发生五十四起激战，或者说，平均每周不少于一次，多数情况下都打死了人。

我在广州逗留期间，即1926年下半年，殴斗更加频繁。殴斗完全按兵法原则，而且是在宽阔的太平街上进行。敌对双方举着旗子走来，激战开始。许多工人死去是因为当局虽然宣称中立，实际上支持雇主的工会。

政府既承认工人代表大会，又承认广东省总工会，因此广州工人中的斗争和分裂不可能根除。国民党右派无疑支持广东省总工会。他们还支持一个组织，即广东机器工会。

1926年9月和10月，广州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要求铁路当局把工人当人看待。

机器工会破坏罢工斗争，在铁路工人的斗争中扮演了叛徒的角色。其他工会支持铁路工人，宣布与机器工会断绝关系。例如，印刷工人拒绝为机器工会印制一文一字。

机器工会得到了国民党右派及其掌权的代表者的支持。自1926年11月国民政府迁到汉口以后，广州当局就公开反对铁路工会，支持机器总工会。

国民党一直自我标榜为“代表全民利益的党”，一视同仁地保护工人、商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有工人部和与此平行的商民部。同一个组织中常发出相反的指示。工人部通常由共产党人领导，该部把工人组织起来，支持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同时，资产阶级也通过商民部反对工人运动。形势复杂而又矛盾。

所有的罢工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资产阶级也打着同一面国民党旗帜反击工人阶级。这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

阶级斗争。中国工人阶级驳杂的成份、手工业无产阶级中盛行的行会传统、产业工人的特权优越地位等等，使国民党有可能分裂工人运动。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工人的基本群众还是跟随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

二十一、广州的商人

广州作为商业和手工业城市成长和发展，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广州就有一支大商船队。广州的商船不但沿海岸向南北分驶，而且往来于马来群岛各地，还开到印度。与西欧通商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从十八世纪开始，广州就是中国与葡萄牙、荷兰、英国贸易的唯一通商口岸。但是这些国家的人不能在城里居住，仅仅在固定的短暂时间内，他们一年一度有权运来货物，在城外欧洲商人临时安歇的地方与广州商人互市。卖出货物和购到中国货之后，外国人必须马上离开城市。

广州的对外贸易由一个专门的行会掌握，它由十三家最富裕的商人组成。据上谕，除十三行之外，任何人无权与外人通商。在1840—1842年英中战争以前，外国人一再企图冲破这种对外贸易的垄断，但是枉费心机。参加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商人要向北京宫廷交纳大笔税款，但是他们垄断对外贸易，因而大发横财。

在鸦片战争和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以及开放其他对外口岸之后，广州作为外贸中心的重要性开始逐步减小，其地位逐步被上海所取代。但是在丝绸和上等稻米贸易中，广州依旧保持了原有作用。城里开始发展手工业，商品由此行销广西、四川南部、云南和贵州。广州发展了，广州的商人也日渐富有。

商人们不喜欢政府干预其商务，为了抗拒政府，他们早在1692年就联合成立了广州商业联合总会。这个商会的名称沿用

了二百二十三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又过了四年，它那古板的中世纪基础才垮掉，制定了较为民主的章程。于是商联总会改名为广州总商会。

参加总商会的不是单个商人，而是商人的行会。这些商人行会在中国由来已久了，但只是到最后的清王朝时期，它们才具备了特殊的力量。

这些商会不仅在中国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偏远县城，而且在天津、上海、汉口和广州这些资本主义中心城市，都一直存在到本世纪二十年代。

中国县城的商业行会主要是小商人为共同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而组成的联合会。这些商业行会通常是跟随共产党的。例如，1926年年中，在广西省梧州县城，共产党人不仅领导了工人斗争，而且领导了小商人反对蒋介石部队的军官巧立名目征捐收税的斗争。

甚至在上海，当时也有小商人的里弄联合会，他们经常支持工人的斗争。里弄商人联合会是地域性组织，行会则是按一定的贸易或生产类别所搞的联合。如“盐业公会”或“棺材业公会”。

天津、上海、汉口和广州的行会仅仅保持了中世纪的形式，而活动内容却改变了：如果说它们以前反对政府，那么现在，上海或广州的行会反对的已是工人了。

1926年，广州有一百四十家注册的公会。此外还有一些为了逃税没有注册。一些广州人断言，总共有将近二百家公会。这个城市的商人和雇主公会五花八门，非常分散。工人组织也是一样。在广州，有粉面茶馆工会，同它并列的，或者确切说，同它作对的，也是茶居工会；同样，有制烟工人工会，同时就有烟业公会，当然工人们不能够组织各种自己的工会与公会分

庭抗礼。例如有银行业同业公会、丝绸出口业公会、茶业公会、猪肉业公会或者那个头发经营业商人们的公会，他们收购各个剃头匠的“废料，”转卖给农民做肥料。与这种“商品”公会同时存在的还有同乡会，例如，在广州的天津商业公会或在汉口的上海银行业公会。同乡会在贸易中起重大作用。他们和本乡商人密切联系，同时执行代表职能并进行银行转兑手续。

行会始终是按照一定价格买卖货物的组织。在这方面，从事收购的商人们的行会，其权力特别大，他们彼此串通定下收购价，残酷掠夺农民。

公会通常都参加了所谓的总商会。1926年，广州有五个商人团体，其中三个是市商会，两个是省商会。1924年以前，广州只有一个总商会，即1692年成立的那个商会。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两年之中，一个总商会变成了五个各种行会或直接由商人组成的商人组织。其中最强大的是仅由行会组成的总商会，不过最近也有某些单个商人参加，这是一些最大的资本家，他们有时比所有商业行会加在一起还要富有。

总商会联合了广州七十二家大行会，其余四个财力较弱的商会都从属于它。由下面一点就可以设想总商会的力量：联合了广州所有的银行家并向广州所有商业界和工业界发放贷款的银行业公会，是该商会成员之一。

商会决定着全省经济生活的进程，执行诉讼职能，因为除特别重大的刑事纠纷外，参加总商会的同业公会，其内部冲突都在总商会内解决。

总商会的政治势力很强大，没有它的支持，任何一个军阀在广州也站不住脚，因为任何当权者的财政状况都依赖商会。1922年陈炯明推翻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时，就曾得到总商会的支持。大地主陈炯明在总商会中是自己人，他一家控制了整个海

丰县。

1921年以前，总商会选举了终身主席和副主席。1915年，商业联合总会改组为总商会时，陈廉伯被选为主席，他任职到1924年底。陈廉伯是广州最大的银行家，其银行业务同在中国最有势力的英国汇丰银行有密切联系。这个银行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经济工具。

1922年，陈炯明推翻了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这表明香港和中国的买办都反对孙中山。

当孙中山政府在广州重新稳固下来的时候，总商会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并在1924年发动了反对孙中山的武装叛乱。总商会头子陈廉伯领导了叛乱，汇丰银行提供了经费。

广州总商会既是商业公会联合会，又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叛乱被镇压以后，陈廉伯逃往香港。但是他的同行们在1926—1927年间仍领导着商会。继陈廉伯之后，一个大银行家兼买办成了总商会主席。副主席是一个富有的渔业资本家。商会的十二个董事中，有四个最大的银行家，其中一个台湾日本银行的买办。

商会一直反对国民政府。尽管如此，政府一直下不了决心解散广州大资产阶级的这个反革命组织。

另一个商人组织——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是全省各城市商会的联合组织。参加该联合会的主要是小商人的行会，但是为吸引大资本家，该会章程也允许单个商人参加。联合会共有全省各城市三十八家商会。这个组织的典型成员是地方的高利贷钱庄，同时买办也在联合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是1924年陈廉伯组织的。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过全省范围的商人团体。城市里有商会，但相互之间没有组织联系。1924年广东总商会准备叛乱时，陈廉伯不

仅立意要得到广州本市，而且要得到全省各城市的支持。联合会就是为此成立的。陈廉伯的走卒领导了联合会。这个组织鼓动广东省许多城市的买办进行了反革命叛乱并且支持广东东部的陈炯明部。例如在中山县，他们通过地方商会把各乡长和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地方军阀武装都吸收来参加了叛乱。联合会的董事会由广州的银行高利贷者、茶商、轮船公司和进出口商号经理组成。

因此，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有其反革命的历史，它由在广东边沿地区活动的大资产阶级组成并和广州商会保持着有机联系。

民族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发展和国民党在南方的胜利，不能不影响到资产阶级，使其内部开始进行暗中斗争。那些手工工场场主、与外国帝国主义没有联系的中小商人，都对买办、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表示了不满情绪。这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1924年9月底和10月初，这一部分广州资产阶级组成了贸易促进协会。其成员不再是行会，而且有个别的商行和工厂。入会费一元，年会费五角，这对于广大小资产阶级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政府正式承认了这个组织，并且更其名为广州商民协会。它应该执行市立商会的职能，与反革命的广州总商会抗衡。

广州商民协会为了吸引商人，组织了广泛的招募运动。协会奖励每个募集到三十名会员的人一枚银质奖章，募集到六十名会员则奖励一枚半金质奖章，至于超过一百名以上，则奖励金牌一枚。1926年年中，商民协会已拥有一千五百家商号，共一万名会员，他们同时参加了广州总商会。广州商民协会中也有一些大银行家和大商人，但是他们同外国帝国主义联系并不密切。

一小批不重要的买办参加了协会，在会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广州商民协会一贯支持国民政府，和城市当局也有联系。这个组织对以交通部部长孙科为首的市政当局有很大影响。就是由于这个组织的坚持，市政当局解散了其成员通常是工人的小资产阶级战斗组织——里弄联合会。

这三个商人团体均属于劳动人民称之为“凶残的”组织之列。他们起劲地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和工人运动。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决定把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吸引到自己一方。为此也在广州成立了两个商人团体：广州市商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商民联合会。

国民党左派于1926年7月发起成立了城市商民联合会。入会的已经不是行会和商号，而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商人。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主要做小买卖的国民党员。甚至也有归国侨商参加，他们代表中产阶级，有时是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比当地同行们的革命性要强得多。国外的中国资产阶级一直供给孙中山经费。

广州市商民联合会没有能够联合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故只有三百至四百会员。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的另一个口岸汕头也有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小商人完全依附于“凶残的”资产阶级，因为它掌握了所有的批发商品、银行，当然也还有信贷。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因此不敢和“凶残的”总商会决裂。

广东商民联合会的情况则不同。建立这个联合会的动议是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提出的。它应联合的是县、乡和小城镇的商人、小贩和手工业者。

成立这个组织的准备工作在1926年5月开始，到8月，全省已建立了约一百个商业公会，共有约四万小商人。农村和城镇的小商人非常迅速、容易地组织起来了。在某些县，例如中

山县，联合会有六千会员。其实，广东商民联合会中不单纯是商人，一些伙计和职员也入了会。入会的雇主是典型的城乡小业主。这个组织的特点是，它有特殊的内外矛盾：雇主及其职员之间，以及身为富农的雇主和贫农之间的矛盾。

无论如何，这个组织当时是积极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唯一群众性组织。其所以能够建立，只是因为这些小商人住在偏远城镇和农村，与大资产阶级没有直接联系。在广州和汕头这样的口岸，企图使小资产阶级挣脱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影响，乃是枉然。广东商民联合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省党部领导，主要是政治工作人员参加其领导工作，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这个联合会完全彻底支持国民党左派。

所有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对厘金不满，这是中国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大患。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清朝官僚为筹集经费镇压农民革命，设置了厘金。他们在各条商路设立税卡，所有过境货物都按千分之一抽税。

清朝在外国帝国主义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但是厘金甚至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以后，还依然保留着。

各地遍设税卡。不仅在省界，甚至每省之内，都有数以百计的税卡。绅士们^①掌管税卡。他们征税时根本不给商人收据，这样税款就进了他们的腰包。即便开了收据，那么单据上注明的所收税款也象以往一样按千分之一抽税，但实际上征收的税款往往超出单据数额很多倍。票据上标出的那一部分交给当局，而其余部分就进了官吏的腰包。

身受厘金之害的首先是小商人，它对大资产阶级还不甚可

① 绅士——最低层的中国官僚。很多绅士滥用职权，从而变成了地主，象官僚和财主们一样剥削农民。

怕。大资产阶级宣布卖货与外国人（外国货物免税），于是往往就避开了法律。当然，受厘金之苦最深的莫过于农民了。农民的货物进入市场以前，要几次在各个税卡纳税。然而，中国农民即便能交纳得起厘金，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在出售货物之后，而不是货物上市之前。农民没有能力独立把产品运到市场上，因此陷入了收购商的魔掌之中，接受低廉的，致使破产的价格。因此大收购商和官吏最乐于保持厘金。

1926年10月，一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调查了四川省的厘金问题。情况令人发指。例如，在重庆到自贡的路上（距离一百七十五公里），价值约二十六元的一袋糖，经过二十一个税卡共纳税十三元。在涪陵至重庆路上（距离一百公里），价值约三百元的九十六张皮革，要交纳十六次厘税，共一百四十五元。从眉州到三百公里外的重庆之间，所有的货物都要经过七十八个税卡。

这一切还仅仅是在一省之内。不难想象，如果货物经过几个省，那么其价格会如何昂贵。当时税卡已经数以百计。

厘金是束缚中国经济的绞索，它因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你可以听到商人、农民和工人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废除厘金。国民党的纲领也宣布要废止厘金，但事实上，国民政府甚至从未打算取消它。相反，1925年8月，政府靠厘金收入了二十七万五千元，而1926年9月，这笔收入增加到二百一十三万元，成为预算收入的最大进项（第二大进项是公共赌场的收入）。

只有消灭把大部分厘金装进腰包的绅士，才能废止厘金。既然蒋介石政府不打算消灭一直由绅士把持的县政府，当然也就不可能废除厘金。

由于极为缺乏经费，广州政府首先制定了不动产税，又首先在城市设立了地产税。三个“凶残的”商人组织全都激烈地

反对这个办法，结果只好放弃了这个税则。而当政府制定了交易印花税和诸如此类的手续时，五个商人组织又全都激烈地反对。某些城市的商人们甚至罢了市。

这就是商人们对广州政府新财政措施的态度。

广东商人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除了极少数之外，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说是商人，而不是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商人和高利贷者，但是它已经掌握了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由此，它可以直接转变为现代工业资产阶级。这种转变在上海已经完成了。

从整体上说，中国资产阶级的成分极为庞杂。在数量上，居更多的是中小商人、小贩、收购商、高利贷者、小业主和家庭手工业者。处于支配地位的，则是买办、大商人、银行高利贷者、工场主和现代工业资本家。

所有这些阶层和成分在国民党内都曾经有代表。这个党内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之外，不仅有知识分子，也还有一部分工人。但是国民党从来都不是农民的党。农村中的商人和高利贷者作为大、中土地所有者加入了该党。在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领导权日渐转到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手中。

二十二、北 伐

单纯凭借军事力量占领广州和广东省，把广东省变成进行北伐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据点，这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全部战略的基础。刚一占领广州，马上就开始准备北伐。其办法就是同各军阀派系妥协，因为他们反对那些统治着中国腹地和操纵北京政府的军事集团。

我们已经知道，孙中山1922年北上军事考察的结局是多么可悲。1923年在安福系的帮助下，他再次占领广州以后，马上就开始制定新的北伐计划。但是，这次已考虑了过去的经验，要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准备北伐。

1924年的标志是，国民党转变了方针，加强了同共产党的合作，镇压了广州和广东省的反革命暴乱，把敌对的军阀清洗出军队。1925年，曾出现一线希望，即不经过国内战争，而是通过北京和广州两方的协商统一中国。孙中山为此亲赴北京，不久在此故去。

此后，广州发生了内乱；廖仲恺被暗杀；发生了1926年3月20日事件；汪精卫下野。这一切都令人警觉。但是，把持政权的蒋介石发誓信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人们信以为真了。另外，3月20日事件被某些人违背事实地说成是镇压香港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暴乱。所以有这些看法，是因为蒋介石当时还不能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尤其他在准备新的北伐，指望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此

外，蒋介石还害怕同苏联的关系恶化了，苏联就会中断军事援助。

1926年5、6两月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广州每天都举行反帝群众大会，街上到处张贴革命宣传画和传单，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这主要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搞的。

这个时期，正值湖南军阀唐生智在广州。他的军队已被吴佩孚打败。唐请求蒋介石支持再战吴佩孚，达成的协议是，唐生智军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军，他本人加入国民党，这位“新”国民党员、军阀唐生智让自己的士兵换上了国民党的帽徽。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国民党军队起初得到了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仍持观望态度。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一直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并支持这样那样的反动军阀。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与大地主相联系，反对罢工，害怕农民运动。参加运动的群众越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就越尖锐。

对于北伐，人们各有自己的看法。工农群众希望国民革命军得胜，从而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

在中国南方，连能通过大车的宽路都没有。军队走的是灌满水的稻田间狭窄的田埂，过河是走独木桥。士兵们就在那羊肠小道上一个跟着一个地鱼贯前进。大部队就这样带着机关枪、弹药、行装和给养行军。这些东西全靠人背——不是士兵，而是民伕。平均每个战士至少有一到两名民伕。机关枪全拆成零件装在口袋或者箩筐里，民伕用扁担挑着。如果没有民伕，没有工农的帮助，很难指望取胜。

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彻底改变了国民革命军的面貌。在军队中新建立的政治部，特别是它被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手中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军队受到人民群众的欢

迎。但并非总是这样。如果某个右派人物领导政治部，情况就不同了。

然而，北伐初期在广东建立的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真正革命军队的典型。

可是，反动军队的士兵是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他们虽然身穿军装，却往往形同匪徒，而国民革命军的战士比他们的情况要好。这些战士有着另一种心境，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些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首批参加北伐的那些部队就是这种情况。

反动军队路过城市时，商人们就赶忙关闭店铺，锁门停业；当他们经过农村时，农民们就组织自卫队来保卫财产免遭祸害。

国民革命军的情形迥然不同。我们曾同农民和城里人谈过话，问他们是否有抢劫的事。农民们不告士兵的状，而是处处亲切接待，送水送饭。如果说有不满的话，那不是对士兵，而是对当权者们，因为他们老是从农村抓兵拉伕。

城里的商人一见穿军装的就害怕，所以起初也害怕国民革命军。而后来，弄清了广州人不抢劫，就开着店铺并营业到深夜。听他们说，在吴佩孚或孙传芳统治时期，一打仗，店铺只是白天开；等前线临近城镇、有许多士兵过路时，店铺就紧紧锁门恭候了。

湖南农民供应国民革命军的给养，救治伤员，充当向导，带领士兵穿过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山间小路。国民革命军常常就这样出奇不意地闯入敌后，围而歼之。在前线的敌后地区，农民起义屡兴；起义者同吴佩孚军队作战，常常使他们丢盔弃甲。

吴佩孚的军队受到国民革命军和敌对农民的两面夹攻，而

四散逃遁。

中国古代有引蛇出洞的军事策略，广州军不是这样，而是积极进攻，力图追歼敌人。国民革命军攻入许多城市跟踪追击溃逃的反动军队。广州军攻陷了湖南省会——长沙^①。这是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罕见的胜利。吴佩孚军溃败，往武汉方面逃去。

湖南省的工农运动开始高涨。这就需要向群众说明国民革命军为何而战。

蒋介石发布了连篇累牍的宣言《诚告国人》^②。宣言第一部分讲了同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帝国主义奴役了全中国并利用军阀掀起内战，破坏了民族工业。其次是列数了中国军阀近十二年的全部罪行，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依存，所以为了彻底完成革命，就必须彻底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首先依靠人民的力量消灭军阀和一切反革命分子。”^③宣言号召群众支持国民革命军去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在下文中发誓说，他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

宣言无丝毫具体内容。只字未提减租和规定九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但是，宣言里倒是有“给人民以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言论的充分自由”之类的话。群众没有坐待许诺中的国民会议的召开，就立即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是旧法令尚未废除、新法令尚未颁布的时候经常有的情况。

① 国民革命军攻入长沙是1926年7月12日。——译者

② 此宣言即1926年8月16日蒋介石在长沙发布的《讨伐吴佩孚宣言》和20日于同一地点发布的《对外宣言》。——译者

③ 此段引文与宣言原文出入较大。因宣言原文很长，译者不便在此抄录。请见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的《北伐战史》，第1487—1490页。——译者

总而言之，这毕竟是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以来所通过的符合国民党政纲精神的文件，此宣言散发了几十万份，贴遍了城乡家家户户。工农群众奋起斗争，争取实现宣言中没有包括的内容。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

就这样，依靠城乡工农的支持，国民革命军攻势迅猛，势如破竹。

攻克长沙后，革命军朝两个方向前进：一路从长沙北上，直取武汉，以彻底打垮吴佩孚的军队；另一路东进，解放沿海各省和上海。

10月，革命军不但占领了湖南全省，而且紧追逃敌，进逼到中国腹地——武昌和汉口。

在这里，吴佩孚纠集了他所有的残兵败将，企图阻止进攻。打下武昌相当困难。革命军采取了唯一正确的战术，没有硬攻，而是先渡过长江到对岸，占领了汉阳高地和中国最好的兵工厂，夺取了汉口。这样就包围了武昌，但好久没有拿下，不过敌军已是瓮中之鳖。武昌四面八方已被严密封锁，军需供应完全截断，迟早要陷落。

广州军向武昌发起了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最后，出动了共产党人的一个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冒着枪林弹雨猛烈攻城，许多英勇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在这里阵亡，当地老百姓中间传颂着他们英勇善战的故事，反动军队闻之胆战心惊。

10月拿下武昌。很快就在东路国民革命军的逼攻下攻克了江西省会南昌。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向沿海各省推进，占领了福建省。

11月，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到此，国民革命军的情况完全改观。由广州出发时，总共五到七个军；现在，已近三十个军，而且已经不是当初的革命军了。攻占长沙后，蒋介石不再

执行坚决打击反动军队的革命策略，而是力图拉拢反动将领。这就是现在蒋介石军事策略的重心。他不打击敌人，而用金钱收买他们。那些雇佣将领、屠杀革命工农的刽子手于是率部转到蒋介石方面，戴上国民党帽徽，系上三色领带。

被俘的士兵很快就组编成新的国民党部队。俘虏兵常常对国民党的目的还一无所知，就象平时一样，又被雇到“新的督军部队”。同时，国民革命军主要军团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真正革命干部和指战员都失去了战斗力。

国民党军队就这样逐渐蜕变了。打起国民党旗号的昨日的反动军阀，今天又继续反对工农运动。新的“革命”军阀焚烧革命乡村、枪杀农民运动领袖、并准备打击工人阶级了。

但是，北伐却有着另一个重要成果。1927年初，中共党员计有五万人，团员四万人。不过五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由原先一个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小组、由脱离现实的一些小派别成长为强大的共产主义组织，学会了搞工农工作、组织工会、领导罢工、组织农会、带领农民斗地主，最后还发动人民群众响应北伐。

这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共青团加入国民党这个策略无比正确的最好标志。由于实行了这种策略，共产党和共青团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巨大的政治力量。

二十三、广东的农村

1926年10月底，国民革命军占据武昌后，决定由广州迁都长江北岸与武昌对峙的汉口。去那里要经过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大本营的驻地南昌。我受命同鲍罗廷和广州政府成员们同行。

一般从广州到汉口要先乘船到上海、再溯江而上到汉口。全程大约需要八昼夜，加上在上海逗留的时间，最多十昼夜。但上海还在孙传芳手里，所以只好走国民革命军占领区的旱路了。从广州往北的铁路仅铺了二百多公里。再前去还得步行十来天才到赣州，然后划舢板到南昌。

此行如此复杂，但终于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定于11月16日启程。动身之日，天色阴沉而昏暗。早晨七时许，汽车在窗前鸣笛。民伕们进屋来，把东西搬走，放上汽车，向码头开去。我们步行。快艇已经在等我们了。那里是一派送别的情景：一个小脚老太太，坐着人力车前来送别儿子。儿子与我们一起出发，去当翻译，他彬彬有礼地恭听母亲低语，但是没有接吻和拥抱。中国没有这种习惯。

我们大家穿的是卡叽布行军服，戴着军帽，有的腰带上还挂着手枪套子和行军记事簿。不少人带了照像机和暖水瓶。

快艇发动了，船尾下泛起浑黄的泡沫，我们向珠江对岸的车站方向驶去。没有桥，也没有宽马路，去车站只能乘小船或快艇。

车站广场已经挤满了人，军队排成两行，夹道而立。工人和国家机关人员都来送行。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摄影师和电影摄影师跑来跑去，部长们各自给本部门作最新的指示。

乐队奏起国歌。鞭炮震天响，火车开动了。从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上都可以说：广州被我们甩在后边了。

卧铺车箱，陈友仁就在这里，他还象外交部长的派头，身穿黑色便衣，外罩一件英国雨衣。他刚从英国回来的女儿同父亲一样，不会中国话，说的是英语。

司法部长徐谦老人，携夫人和小女儿——一个很有趣的七岁小姑娘同行，大家都叫她“小中国人儿”，连中国人也这样用俄语称呼她。她不久前才随父母从莫斯科回国，这是她在莫斯科得到的绰号。这个爱打架的顽皮孩子是一身莫斯科式打扮。

这次旅行的主要负责人和组织者是财政部长宋子文。他身穿军装，十分好动，总是这儿走走，那儿转转。他的胞姐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请我们吃水果、饼干和茶。

铁路沿线各车站都悬挂国民党旗，有仪仗队欢迎我们。每个车站上都燃放鞭炮，震耳欲聋。

晚上八点钟，我们就到了韶关。这是一个大县城，是当时尚未通车的粤汉铁路的终点站。从韶关到汉口，我们有时步行，有时乘船。只在南昌和牯岭稍事停留，共用了二十五天。

韶关是一座古城，从它的石墙、塔楼、碉堡枪眼上都看得出来。它座落在横贯广东全省的北江河畔。人们沿此江浮运货物，倒上火车，发往广州。而从广州往省内各地的货运也要靠这条线路。这就是为什么自从修成铁路后，韶关就变成了商业城市。

当火车驶进挤满人的站台时，天已黑了。我们应邀去市内参加集会和宴会。乘着木筏渡过了离车站不远的那条河，就咯

蹬蹬地踏上夜深人静的黑暗的道路。警卫打着手电照路。我们走了好久才到达古老的石门前。这是韶关的衙门(官府)，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官邸。里面有柱廊，有石砌的幽邃的小院，县长过去曾住在这里，现在驻扎着师司令部和地方机关，院里挂了各色旗帜。门口有两幅标语牢牢地印入我的脑海。一幅是：“国民党右派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幅是：“只有国民党左派才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和人民利益的保卫者。”

时间已经晚了，但人们却开始集中到一个大厅去开大会。各个组织的代表都来了。第一排坐的是穿白上衣、黑裙子的当地女学生和女教师；后边是官员、工人、穿丝绸长袍的商人和若干士兵。讲台上方挂着孙中山、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学生们在外国传教士运来的教堂管风琴的伴奏下唱歌。

这是旅途中第一次大会。讲的都是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和迁都武汉的原因。会后举行了宴会。这是极丰盛的中国宴席，有鱼翅汤，鲜美可口的鸡、鸭、燕窝和中国式调料。饭后已是深夜两点钟，我们又动身回火车站，因为天一亮，我们要开始徒步征程。

韶关当局事先接到迁都的通知，从晚上起就动员了当地的所有民伕。他们自带扁担前来，往衣服上别号码，记名字，手续繁杂，吵吵嚷嚷。

后来民伕不够了，军官们受命去找。他们于是奔忙起来，跑到城里去，有时还扯着人家的衣领拉伕。吵呀，骂呀。电影摄影师在抢拍部长先生的笑脸，也在那里凑热闹。民伕还是不够。于是，主要的组织者、财政部长宋子文就赶到城里去。到下午一点钟，终于带来了一队穿着军装的民伕。他们与其他人不同，穿的是厚厚的军装。民伕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扁担又不够了，又是一阵忙乱。最后扁担也搞到了。

还在广州时，就预备好了轿子。轿子较轻，是竹子作的，上张防雨棚。每八个民伕抬一个，四个人为一班。两个民伕提箱子和筐子。轿子没过三十个，而队列却长达三公里。



乘轿子

每位部长，除了有八名民伕抬轿，还有不下二十人搬运行李，厨师、嫖娼、仆役们步行。四个保镖挎着毛瑟枪始终围着他们所效力的部长的轿子跑来跑去。总之，每个轿子有不下四十个人伺候。专有民伕搬运供路上盘缠用的碎银。广东的纸币一出省就不能通用，必须付给咣咣响的硬币。为此，财政部长用口袋装了银币随身带着，民伕们在士兵的监护下抬着钱口袋。保卫是十分必要的，谁也没有把握，搬运钱口袋的人不会半路溜走。但是财政部长对这样的保卫仍然不很放心，在我们旅行期间，他是最操心的。

整个队伍由一个营的士兵在前后分别警卫。队伍鱼贯前

进，象一条长链，看不见头和尾。起初我们沿着从韶关到长沙拟将铺轨的铁路路基行进。不久，到一座小山丘前，结实的路基中断了。我们就往右拐，跨过一道沟，踏上一条依稀可见的草中小路。这是由广东去江西的通途。往往一失足，就踩到稻田的泥水里。天黑了。热带的夜晚马上就降临了。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近处不见一点灯光。我们的队伍在黑暗中有几部分不见了：有的掉了队，有的则远远地走到前边去了。轿夫们点起灯笼，可是风不断地把灯吹灭。我们又打起手电。小路有许多岔口，正是因为有手电，我们才没有迷路。民伕们借手电的光亮，在十字路口的草丛中看到刻有字迹的路标石。

这些石头路标是唯一的标志，说明这不是偶然发现的小路，而是“官道”。

我们走过了一些村庄。小路变成了有一米宽的石铺的大路。路两旁是带遮阳的墙，没有窗户，门扉紧闭，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四周不见窗户，没有灯光，无一点动静，也听不到犬吠，真是死一般寂静，犹如在墓地里。

这样走了很久，最后到达一个叫大桥^①的小村。这里人声嘈杂。民伕和士兵的人数比当地居民还多，所以过夜的地方不够。

我们宿在一座家庙里，它座落在绿树覆盖的高山脚下。这是当地唯一的砖房。庙里挤满了人。前两间堆放行李，部长的保镖占用了一间屋子。供台及其旁边的双层房间空着。当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涂着金粉、长满蛛网的神像好像生气地看着我们。我们把三顿饭并作一顿吃。因为整整一天粒米未进，可是走了四十里（二十公里）路。

^① 音译。——译者

大家都困了，我们打开自己的行军床躺下了。只是到清早醒来，才看到庙里很不干净，到处是尘土、蛛网和发霉的痕迹。大概从盖成之后就没有清扫过。在庙堂里过夜和放东西，在欧洲是要犯亵渎圣神罪的。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庙宇首先是流浪者的栖身处和前来赶庙会的乡下人的歇脚处。

早晨，开始有伤脑筋的事发生了：民伕们溜走了。这足以证明，韶关当局煞费心机，强制抓人，强迫人们扔下日常活计。而这些硬被赶来的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连夜逃走了。

每次宿营后的早晨都如此。只好每到一站重招一批新民伕来顶替逃走了的人，而新来的人下一夜照例逃走。从韶关坚持到汉口的民伕为数不多。

不久，我们又启程了。路好一些了，有的地方路宽，可以两个人并行。此地多山，我们在山间迂回前进，几乎一连走了六十里没有停留。入夜时，来到一个大村庄，当地叫张口^①。

我们在一座军用仓库里住下了。这是一座大的石头建筑，自然没有窗户，它比家庙干净，宽敞。当局准备了丰盛的晚饭招待我们：有几桶米饭，有中国的面条，还有鸡块。

我们已经学会使筷子，并且运用自如，能用筷子把米饭送到嘴里。厨师煮了满满一锅咖啡，我们用茶缸盛着喝。行军的生活、俭朴的习惯，都象我们的1919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甚至有时觉得好象完全不是在中国。可是部长先生们却对这种“生活的革命”感到忧郁。

黑夜过去了。延绵数里的辎重车队上路了。绿色的轿子在民伕们强健的肩膀上颤悠起来了。前面吹响了军号。乡民们都聚集在家门口好奇地看着我们。

^① 音译。——译者

又是层峦叠嶂，块块梯田。稻子已经割完，平旷的地里已经没有水，只留着四、五公分高的整整齐齐的稻茬子。稻田被分成许许多多的小畦，象菜园子。在这些小块地上，正在准备播种。温顺的水牛懒洋洋地拉着原始木犁慢慢地爬行。水牛鼻孔里穿一个环子，上面系着绳子，农民就靠这根缰绳指使这个耐劳的牲畜。

这儿的农村到处是灰暗、荒凉而贫穷的景象，我们进入这样的—个村子，首先走过路两旁用土坯垒的一排厕所。这是为过路人修的，归全村所有。这些农村运气好：它们处在由江西到广东的大路上，每天有数百人路过。过路人使用这些厕所，而农民就取得宝贵的肥料，分给村民使用。

厕所外面有一排没有窗户的茅屋，里边漆黑，勉强可以看到站在门里的人。

引人注意的是，村子里缺少男女青年，因为他们有的去城里找工作，有的被拉去当苦力和壮丁。村里大半是老人和小孩，他们的脸神表露了难言的苦楚、贫穷和无望。再走一、二百步，就出村了。接着又是一排厕所，路又被挤窄了。再前去，就又是一块块稻田了。

我们也遇过另一种类型的村庄。那里的人们好象不务农，而开酒馆。几乎每家都做某种生意。女人们坐在房檐下，卖花生、熟白薯、瓜子，间或也有桔柑。这些同房里房外单调灰暗的色彩融合在一起，穷困的景象十分明显，家中没有任何陈设和装饰，只在门口上方挂着一块小木板，上面画着符咒。

在这两个类型的农村，几乎都没有手工业，从帽到鞋都是买来的。到处有许多乞丐：老妪和小孩跟着每个过路人乞求施舍。这里也看得出来缺少男女青年，我们没看到他们在田里干活。

村里的农民与来自广州的人谈话时，其作风与礼貌同城里人没有区别，但是甜蜜的笑脸和作揖只是在同长官交往时表现出来。农民同民伕谈话很随便，不拘礼，不陪笑，很实在。可见，礼节是多少世纪来官吏们用棍棒逼出来，只是用来应付他们的。

路上还遇到一些买卖兴隆的村庄。那里有好几条街和许多小饭馆。但是店铺和手工业作坊更多。街道很窄，石头铺的地面，好象屋檐从上面遮蔽着，以致在晴朗的日子，这里还是荫凉和潮湿的。这些村庄里有小庙，神像前细细的蜡烛还发着微弱的光亮。通常小庙都又窄又脏，但不少地方也有一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又象庙，又象祠堂的不大的砖庙。

这种乡村里有大烟馆。我们顺便走进一间茅屋，偶然发现了它。在昏暗中我们看出躺在炕上的人，他的头跟前有一个特制的小灯，嘴里含一根长烟枪。把穿在金属丝上的白烟泡在灯上烧热，然后放进烟斗里。吸两、三口以后，人就腾云驾雾一般。眼睛暗淡无光，下眼睑浮肿。他在注视着你，但是你感觉得出来，他已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别人叫他干什么。

鸦片是中国农村的一大祸患。鸦片是英国人从印度运到中国来的，英国人掌握着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专利权”。鸦片烟首先在贵族中，特别是在宫廷中盛行。后来，鸦片烟“民主化”了，城里满是大烟馆。广州的高级饭店本身就是赌场、妓院和大烟馆。饭店没有公共大厅，一律是小单间，每个单间里设有吸鸦片用的硬板床。鸦片从城市蔓延到乡村，而且农村越穷，越吸鸦片。男人、女人，甚至连小孩子也吸。

农村中的手艺人制鞋、做衣服，用木机织布，用土法染布。这都是日用品。手艺人同时还是店主，自开店铺，出卖自造的产品。全家老小都做手工活。但是还有雇工，主要是“学徒”。

这是农村穷人的孩子，他们不分昼夜干活，只挣得一口饭和破衣烂衫。他们受着无情的剥削，而且这种剥削被宗法习俗掩盖着。

这些农村的阶级分化是显而易见的。这儿的手工业工人、铁匠、搬运东西的苦力都相当多。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出租土地的富商。

这儿也不乏盗窃国家财产的人，他们住在衙门（即管理机关）里。与其说衙门当局是维持秩序，莫如说是在敲诈落入他们掌心的每一个人。如果在革命的广州，我们居然曾目睹以下情况：汽车撞坏了人力车，司机要被警察罚款三元赔给人力车夫，其中两元警察当场就装进自己的腰包。那么你可以想见，在这些无法无天的乡村里，情形会是怎样。顺便指出，虽然革命军打到这里，但并没有撤换地方当权者，只是规定他们必须加入国民党。

在所有的村庄里，革命军的政工人员都张贴了宣传画和呼吁书。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当局没有将它们撕掉，因为这些宣传是针对豪绅的。我们常看到画有镰刀和锤子以及号召农民组织农会的传单。我们看到一些宣传画，上面写着拥护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口号。这都是出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之手。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相当大的乡镇——马市^①。经了解，此地80%的农民没有土地，而是租种大地主的土地。

马市为我们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似乎是过韶关后受到当局如此款待的第一个地方。镇子外边，学生们沿道路两旁列队欢迎，还有一个中、西混合乐队。我们的队伍一出现，学生们便借此机会尽情地放了一阵子鞭炮。

^① 音译。——译者

在学生队后，沿街道两边，站着手持花束或红纸花，身穿厚丝绸长袍和马褂的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毕恭毕敬地向我们行礼如仪，把名片塞到我们手里。再后是商人，富一些的（从衣着上看得出来），靠近当权者；穷一些的，站得远一点。最后，是劳动者，从种种迹象判断，他们是来看热闹的。如果有哪位平民百姓要挤向前去，想目睹一下部长们的威仪，那么，长袍人物脸上的笑意就被愤怒的表情所代替了。

这里的人给我们讲了另一种欢迎场面。一位新任县长去广东某县。乡里人们都知道，这是个坏透了的贪赃枉法的家伙。于是，当这位新县长领头坐着轿子，后面的人抬着他的老婆和箱笼，洋洋得意地前来时，城门开了，排在他面前的是二百来个雇来的哭丧婆，以送葬的干嚎和哭叫迎接这位新上司。就这样，县长没有进城，迫不得已地回去了。

出了马市，大路沿着北江峻峭的岸边伸展开去，间或有几处难涉的渡口。山岩上多处凿有窄石阶，我们拾级而上。山路陡峭，甚至历来不下轿的部长先生们这次也不得不徒步攀登。

我们走到广东省最后一个县城。这里的欢迎仪式更为隆重。举行了群众大会，发表了革命演说，墙上贴着手绘的反帝宣传画。

南雄是一座古城。城墙、楼阁和宫宇都表明这一点。古代，这里出过一些哲学家，因此，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学者兼军人谭延闿攻占该城后，便首先建立了纪念碑以示对他们的崇敬。

我们在公园的石头门楼里住下。休息之后，我们顺着狭窄的街巷散步。衙门的院里立着许多一人高的大石碑。碑已经很老，长满了绿霉青苔。我们擦净了一块。保留下来的文字说明，这是明初的土地法。石碑全文已无法卒读，因为年代久远，已

有五百多年历史了。

南雄的手工业发达，是一个热闹的商业城镇。每家门上都挂着避邪的符咒。门两旁贴着抵制英货的宣传画。镇上的水井台用石头整齐地砌成，它的上面，在石龕里摆着佛像，像前点着蜡烛。

出了南雄，路向山里延伸。往前走，我们就要翻越粤赣交界的山峰。道路起先只沿着稻田田埂，后来路面变宽，急转直上。

这也就是山隘前的最后一个广东村镇，最后一批酒馆和最后一次休息。

顺着这条石砌的和凿在悬崖上的山路，登得越高，视野就越宽阔，山峰、瀑布、分散在山坡上的村庄都映入目中。

越高，庙宇也越多。最后是一道石拱门。走进这座梅岭山口大门，面前便展现出江西境内层峦叠嶂的迷人景色。远处大余在望。这是我们路过的江西第一座县城，离这里十五公里。

我们进了一个新的省境，它不久前才进入国民革命的行列。广东省已在身后。国民政府在那里虽然是时来时去，但已断断续续管辖几年了。

经过广东的城乡时，我们没觉得那里有革命的高潮。老百姓对国民政府已经“司空见惯”了。在那里，我们到处碰见的是少地的贫困的农民。在农民看来，情况并没有改变，地主仍然出租土地奴役农民，绅士还是绅士，征税的还是征税，受贿的还是受贿。因此，农民感到失望，对国民政府持冷漠态度。

二十四、南 康

江西、湖北和刚解放的各省是另一种情况。这些地方正经历着革命的春天，千百万人站了起来。他们相信，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定会给予他们所憧憬的一切：佃农相信自己会摆脱地主和官僚的压迫；工人相信能缩短工作日和挣得足以维持俭朴生活的工资；乞丐相信以后能吃得饱；小资产阶级相信可以平平安安地经商和赚钱。

各种集会都是群情激昂，国民党则在会上不负责任地滥许诺言。一切都在沸腾，热火朝天。群众举着孙中山和列宁像走上街头、广场，处处觉得出他们的强大潜力。

群众还没有看清楚革命的敌人，他们欢天喜地地抬着明天将屠杀他们的刽子手、国民党右派，这些人现在是披红戴花，侈谈国民革命。

我们从山上下到江西的山谷去。下山省力，但是膝盖打颤，腿似乎马上就会软得倒下去。远处传来乐声，从大余前来欢迎我们的人群依稀可见。这是真正的全民的欢迎。

我们在商会里歇下，等着宴会、客套寒暄等应酬完毕，以便在艰苦行程之后得到休息。但是，尽管时间已晚，仍然举行了群众大会，我们也应邀前去参加。

令人惊异的是，省的界限在这里竟如此分明。大余离广东大约十五公里，可是老百姓就不懂广东话；在广东，我们没见过哪个男人留辫子，可是在江西虽然可以见到剃光头的男

人——这说明此地旧习惯开始在破除，但是，还是经常可以见到辫子。江西农村妇女穿着另一种服装，戴另一种头饰。田野里没有广东那样零碎的土地。自己有房的富裕农民比较常见。这里甚至连耕畜都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与广东不同的一些场面，很能说明江西乡村和小城镇生活习惯的特点。例如，一伙人围着占卦者的小桌子。大余有带着半圆形小鼓的和尚沿街行走，为每个家庭、每个店铺消灾去邪。和尚到住家房里，把装有自制火药的纸袋点着。火药燃起明亮的火焰，屋里便乌烟瘴气。随着紧张的震耳欲聋的鼓声，灾气就被“烧掉”和赶走了。

又走了一天，我们就到达另一个县的中心——南康镇。这座城镇是1926年9月6日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我们来到时是11月底。就在这里，在很短的时间内，社会生活苏醒了，组织了工会，国民党党部也已建立。尽管该省已从孙传芳手中解放出来，但是中共党团组织却仍然没有脱离秘密状态。

南康镇是约有三千户居民的热闹的商业手工业城镇。这里可以看到外国的影响；近几年来兴建了一些洋房，还能遇到新开的出售外国货、挂英文招牌的中国商店。城里已有一座电站。

近南康时，有许多浓施脂粉的妖冶女人，使我们很感惊诧。当地官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南康妓院的，有三百多个妓女。

我们在南康停留了一整天，这一天尽是无休止的宴会和集会。我们找了一个机会逛了拥挤的小街。

为了了解这个小镇的生活，我收集了贴在墙上的广告，特别是盖有地方当局钤记的那些广告。这类广告中，确实有一些价值很高的材料，甚至有刚刚组织起来的工会的章程。但是，最使我吃惊的是新的国民党当局出卖征税权的文告。现全文援引如下：

“《赣南财政委员会布告》”

11月11日接省财政委员会主任电报，他通知了关于一切税务机关可向商人出卖征税权的决定。出卖省税务管理权同出卖其它城市税权一样，将在省议会大厦进行。出卖其它（即县级的）管理权，应在当地办理。指示业已发出，俾使地方财政委员会尽速确定出卖期限，特发此电。购买税务机关时，应付清现款。

照上述决定，在南康贯彻实行这一措施。出售日期和条件，将另行通知。望一切熟悉统一税务管理章程并拟按契约购买之商人，前来衙门了解有关指令。”^①

人所共知，谁收税，谁就有权。江西国民党政府就是这样把权力卖给了商人。如果商人向税务局一类企业投资，他们就要首先想法牟取利润。根据一些资料判断，利润率决不会低于百分之百。这就要靠榨取工农获利了。

当商人可以按契约买到税务管理权的时候，军队、警察和法庭就有义务帮助商人勒索劳动人民，因为税捐的一半归政权机关，另一半是商人的收入。

看完这个文件，我们不禁想起了对国民革命抱有莫大希望的人民群众。这份文件于11月份贴满了南康街道，我们是在中山大街上发现的，这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江西新政府的阶级本性。

当时，约五百户的南康工人已组织起来。他们顺利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并取得了部分胜利。在斗争过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工会的名称使人想象得到，南康占优势的是手工业行业。这里有木工工会、理发工会、各机关服务工会、银

^① 引文未经核对。——译者

匠工会和铁匠工会、织布业工会、茗业工会、鞋艺工会、染晒工会和缝艺工会等各种联合会。入会费，以木匠工会为例，木工每人伍角，雇主每人贰元，学徒免交。每月的会费是，雇主壹角，工人伍分。

每个工会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委员会分秘书、组织、财政和宣传四个部门。不论本镇工会，还是全县工会，都包括工人和雇主。城里建立了街道分会，每个月开会不少于一次。如果分会成员之间发生冲突，则在工会总部解决。

工会委员会的会议每两星期召开一次；全体大会每六个月一次。会上选举产生联合会的委员会。

木匠联合会在街上贴出由当地印刷所印好的章程，并发表了下述的决议：

“1.从本月30日（10月——作者注）起，联合会会员的工资每天增加伍分以上。

2.工会会员学徒期以三年为限。

3.凡木工职工，不论是否会员，均须向联合会收纳处交费壹元。”

再比如贴在街上的缝艺工会章程。此章程的第一点规定：“本联合会由工人和店东组成，实为职业性组织。”第二点：“本会以全体会员共同努力、建立会员间的友善关系，提高生产和扩大事业，结束贫困，保证会员福利为己任。”这个联合会的入会费，与木匠联合会的规定相同，此外，每台缝纫机要抽取一元交工会。组织机构同于木工职工会。街道分会主席由委员会任命。联合会委员会设七名委员，其中四人是农村的裁缝。

因此，南康的工会实为行会；在中国建立阶级工会的道路上，显然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这里的国民党组织是由当地共产党和共青团早在5月份，

即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南康的三、四个月以前就已建立了的。全县国民党地下组织约有一百名党员，其中三十人在南康本镇作事。国民革命军到来后，国民党转为公开。我们到这个县时，本镇已有六百名国民党员。

当时，国民党城市秘密组织约有三百名党员。其中有教员、学生、工人和农民。到1926年11月，加入南康国民党组织的有：农民十六人、工人六人、商人二十五人（主要是店员）、教员二十九人、学生十三人、医生二人和绅士十九人。因此，全城组织几乎半数是绅士和商人。

南康象中国所有的县一样，是农民的县。这里有两万七千农户，计十五万到二十万居民。有些人肯定地说，全县居民不下三十万人。这个县有四十一个乡，大致每十个村子为一个乡。这样，全县就有四百多个村子。

多数农民无地。我们从两份不同的资料中得到了关于居民社会成份的数字。不敢贸然偏认哪一份绝对可靠，故将两种数字均引用如下：

	I	II
大地主	1080 (户)	810 (户)
自耕农	3240 (户)	2720 (户)
半佃农	9720 (户)	13820 (户)
佃 农	12960 (户)	9650 (户)

在两种计算方法中，半佃农和佃农的总数大致都占到农户总数的80%。农村的贫农基本上是半佃农，但是在这一类人中，也有些农民靠租地扩大自己的经营。

关于雇农的情况，歧异之处甚多。如果全县居民总数约为二十万人左右，那么按前一种算法，雇农总数就是三万四千人；按另一种算法，仅四千人。如果第一种算法切合实际，那么这

就意味着，本县有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但是，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当地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很少见。因而可以毫不动摇地否定这个数字，但第二个数字也毫无疑问又偏低了。因为本县有大量的农村苦力，十分引人注目。

占两千亩(约一百二十五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全县只有四个。大地主平均占地一百到三百亩。一般地说，他们自己不种地，而把地租给农民。但同时也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人告诉我们说，某地主拥有二百亩土地，但没有租出。他全家十口人都干活，还雇了十二个工。但是，这样的户本县极少。

南康大地主的出身也很有意思，他们都不是世袭的封建地主的后裔，几乎全出身于乡绅和商人家庭。出租土地的人不一定总是大地主。有时候把土地租出去是出于不得已，由于劳力不够，不能耕种。按中国继承权的规定，是把土地平均分给各个儿子，因而土地越分越小。但是分地总有着一定的限度，往往继承人只得到一小块可怜的土地，例如三、五亩，全家只种这一点土地必定挨饿。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则丢下土地，去城里当苦力，作手艺人，有时候还作小商，而把土地出租给人家。

自耕农是占有十——十五亩土地的小私有者。其实在江西，并不是计算土地面积的大小，而是计算收成的多少。在南康，收粮五十担^①者，就算自耕农。一亩地通常可打四——五担粮食。

自耕农的范畴不一样。凡是有十——一百亩地的农民都算自耕农。在南康，占地一百亩者不算是大地主，而是富农。这是大富农。而自耕农有各种各样的阶层——从贫农到富农。

^① 一担等于六十点五公斤。

半佃农加上佃农占了南康农民的绝大多数，他们自己有微不足道的小块土地，全家无法赖以维持生活，所以被迫租种土地。凡是在自地收获粮食平均二十担以内（四——五亩地）和靠租地（六——七亩地）收粮三十担以内者，通常都被算作半佃农。但是，与这种租佃形式同时存在的，还有资本主义的租佃。南康就有这样的富农，自己有地一百亩，同时还租种五十亩。

最后，第三种类型是佃农。实际上这是转租人。因为无地的穷人，不是直接租种大地主的土地，而是通过中间人——经常是富商之手租种。将土地租佃给无地的农民（高利贷地租形式）的富农和乡绅就是佃户。富农和乡绅给大地主当保人，为此他们从农民那里取得一定数量的收成，作为家庆或别的节日之礼物。这样一来，佃农就受到地主和保人的双重剥削。

本县土地分为水浇地和旱地两种。佃农租种旱地，地租大约每亩四元；而水浇地交实物地租，依土地质量而定。水浇地习惯上分为三等。租头等地，富农租户最低要将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但是对农民来说，这种地租在许多地方要占收获的80%。二等地的地租不超过收获的40%。第三等地则交收获的30%。租种公产和庙产土地，地租也不超过收获的30%。南康县公产土地不多，总共只有两千亩。形式上这些土地的收入归公有或作为本村进城求学子女的学费。人们都称呼这部分土地为学产。实际上公有的土地都掌握在乡绅手里，进城上学的主要是他们的子女。

庙产土地占本县全部耕地面积的10%。庙产土地的来历相当有趣，它是与南康县农村的家族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富裕农民临终时，常留遗嘱把自己一部分土地交出，用以修建庙宇。庙宇占地越来越多，因为修庙家族的成员临终时总留下遗嘱把小块土地捐送庙宇所用。这样庙宇周围逐渐出现大片的土地。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族长控制的一种宗族财产。实际上庙产土地掌握在富农和大地主手里，由他们出租这些土地。

出租任何土地都按特别的契约办理，而且在契约上一般地不确定期限，这就是说，土地所有者可以随时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走。

除了土地，牲畜也出租。这个县的贫苦农民，一般说，都没有自己的耕畜。自耕农有一头耕畜，富农有五——六头，而大地主则牲畜成群，可供出租。主要耕畜是水牛，由于价格太高（每头水牛值八十元），贫农买不起。农民既然没有自己的水牛，就只好租用。为此，一年要交五担稻谷（一亩地的收获量）。一担稻谷在这里值四——七元，因季节而异。五担稻谷平均值二十五元左右。可见水牛的“折旧”大致三、四年就可以捞回，而水牛的寿命却是十五——二十年。因而，购买牲畜被当地商人认为是很能赚钱的事情。

这里雇农有两种：年工和日工。年工可得拾伍——肆拾元，男短工一天可得壹角伍分——肆角，女短工一天可得叁分——壹角。一律由主人管饭。

南康县的农民种稻子、豆类、落花生、马铃薯、蔬菜、烟草、靛蓝植物、棉花和亚麻。当然主要是水稻。水稻和豆类等粮食作物的面积不断增加，而靛蓝和棉花等经济作物面积不断减少。这是因为年复一年外国颜料和棉花的输入有增无已，广大农民普遍陷于贫困，农民想的仅仅是糊口而已。烟草是个例外。种烟草的面积增加了，因为当地烟草工业的需求日益增大。

外国和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影响了南康农村。手工业作坊的数目减少了，零工、短工增加了。同时货币关系发展起来：农民出卖稻谷、花生油和烟草，在市场上买到布匹、农具、碗碟和肥料。农民的衣服也是买的。

这里所有的大地主和商人都放高利贷。放款一般不愿超过一年。较普遍的是借给几个月，农民要付15%的月息。这样一来，放款一年，就收回150%的利息。而借实物，一般的利率是100%。若欠债不还，就有被抓走或以农民的女儿抵债的危险。

南康县有以下正式课税：土地税、烟酒税、割头税、船税、印花税、警察费用税，以及供学校费用的特别税。县长和包税人通过村长、乡绅收税。

但是，这仅仅是官税。此外，当地的绅士和军阀巧立名目勒索农民，他们向农民征收种种额外的苛捐杂税，如称之为供士兵买鞋的“鞋税”。

因倍受勒索，农民纷纷破产，卖掉了土地。自耕农变成半佃农，半佃农变成佃农，南康县每年都有土地集市，在那里进行大批土地交易。买地的多半是城市商人。

农村的政治制度相当复杂。宗族制残余势力雄厚。本县有近一万人属宗族势力，为首者是拥有几个副手的族长。至今仍禁止同族人通婚。宗族间常因土地纠纷发生械斗。

每个村子里都有属于不同宗族的村民。他们联合成按家族划分的宗族，为首的是宗族长。这是南康县农村中的最低行政单位。按宗族派系，村长服从全宗族的族长；而以行政论，则是族长服从乡当局委任的村长。乡的首领是三——五个由县长委任的乡绅，县长则是由省当局委任，而实际是由控制本省的军阀委派。县长同时也是警察首脑。南康县有三个警察局和五十名警察。除警察外，农村里还有大地主和绅士支配的乡丁，即所谓民团（本地称乡团）。乡团实力不大，每队只有一枝来福枪，其余是冷兵器。

各种争端和诉讼案件首先在宗族一级调解。如果调解不了，再转到村长、乡绅，最后到县长处。没有专门法庭。各级行政

机关同时也是法院，这便给营私舞弊和敲诈勒索大开方便之门。

村里还有连环保的残余。如果无法查获罪犯，那么，其成员犯有同罪的人家就受到追究。

这就是南康农村宗族生活的残余。它们还有相当势力，而且拥有以宗祠为中心的宗族财产，不仅乡村学校靠宗祠资助，而且有时穷困的宗族成员也靠它救济。可是，宗族集团依然无法阻止农民日益破产的进程。

宗族首领原先是宗族中的耆宿；现在，金钱动摇了这种习俗。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最富者做宗族首领。不仅宗族的财产，而且宗族的管理，族长的权威都落到了大地主手里。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来到时，委任了新县长，因为原县长同孙传芳的军队一起逃跑了；而许多地方，即在农村里，依旧是乡绅和村长掌权。

即将到来的革命唤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涨。我们未到之前，这里已有二十二个农会，联合了二千五百个农户。农会组成了自卫队——保团，并开始解除乡团的武装。从乡团手里缴获的武器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国民党党部掌握。解除了这些队伍的武装后，农民协会就开始推翻农村旧政权，并在许多地方夺了权。夺权后，农民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是减租。同时还与高利贷者以及从农村拉伕抓兵的现象作斗争。农民要求改变婚姻制度（在中国，要为未婚妻纳大量彩礼：城里达到一千元，乡村有四百元。农民要求废除彩礼）。

还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刚刚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仍然受着那样多的压迫，那样多的禁锢，在这里，我们所到之处，他们还提不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

二十五、历史的回顾

我们经过了許多农村，了解到农民的生活，思考了许多问题。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广东农村。村里街道两边是相向而立的平房，覆盖着瓦或稻草。每套房子一个屋顶，房内分成一个个单间，开门就是大街。于是就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一大家住一套房子？而农民不是每家人单住自己的小房子？”很清楚，这一套住房远比我们所谓家庭概念更广泛。确实是，所有的亲属，整个的宗族都住在那一幢长房子里。

买卖土地老早就发生了。然而农民依旧认为土地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家产族产。卖掉继承父亲的土地和不把土地传给儿子甚至在二十年代还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破产的农民宁可把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出租，也不卖掉。

我在前边已经说过公产和庙产土地以及公用厕所。此外，有些地方仍然保存着村社的公共种子和仓廩，以供旱涝无收时备用。这批储备由村民捐纳实物建成。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残余。可是，到底是哪一种社会关系呢？是封建关系吗？然而一路上我们没有碰到过欧洲特有的封建城堡、典型的地主庄园、公爵、伯爵、贵族等等。

大地主是相当多的。可是，这主要是卖地和租地给农民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操此营业的乡绅们似乎就是往日知识界的下层。他们认识一些字，能看懂上级的指令，并能把农村情况向其上书报告；他们还懂得最低限度的法律。实际上，这就是从

事重利益剥的农村官僚。虽然英国人可据发音的近似称呼乡绅为“绅士”，但是，绅士与小地主、贵族毫无共同之处。这里没有封建主、贵族，宗族的首领比乡绅有更大的权力。

此外，我们到处都看见，资本主义关系渗入农村，买卖得到发展，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业很普遍。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只要再迈一步，就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雇佣劳动。农村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里，我们给学员讲授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发展的课程：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制度，再由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随后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把中国（上海不在内）的社会关系解释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的关系。现在，我们在中国农村徒步走了三百多公里，走过了欧洲人足迹可能未到的很多地方之后，我对我们教给学生的那些东西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是封建残余，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东方社会的那种制度。其基础是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名义上属于作为天神的代表的国王，或者属于国家最高权力的化身的最高祭司。应当把占有土地或者使用土地同对土地的私有权区分开来。“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①

实际上，土地主要地是由最初按宗族组成的农民村社占有。农业的基础是人工灌溉系统，从主要水系引水灌田，不管是古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还是中国的长江都一样。建造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译者

业所需要的水渠和堤坝，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职能。天然水系源远流长，国家领土辽阔广大，公共工程的建设以及强制征调人力，结果使国家权力集中并且把国家权力变成了偶像崇拜的专制政权。

在此基础上，有的国家是知识阶层的统治，有的国家是祭司统治，有的国家是神权统治，有的国家是官僚统治。皇帝的专制权力今天驱使和强令农民修堤坝、挖运河，明天建造规模宏大的埃及金字塔、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庙宇，修筑万里长城等等。在宗族村社里仍维持着崇敬祖先的习俗，维持着儿子对父亲、对宗族长老、族长、政权、皇帝的唯命是从的教义，以及连环保制度。

没有土地私有制，村社占有土地，为防天灾而保存种子的公共仓廩，多少世纪形成的这种社会关系被某些思想家加以美化，几乎被描绘成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批判了对农村公社的美化。他写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①

现在已经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是亚洲所固有的，凡是农业使用集中的人工灌溉系统的那些地区，它都存在。这种情况在南美的印加人和阿西德克人帝国里有过，而农业靠着尼罗河浇灌和需要强制劳动的古埃及也有过。难怪法老图坦哈蒙的雕塑所表现的是手执小鞭子——象征着权力和强制——的形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页。——译者

非常明显，每个东方国家的社会形式各不相同。甚至在象印度和中国这样相邻的国家里，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就没有至今印度还保存着的那种等级关系的痕迹。但是，对于一切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来说，其特点就是强制劳动，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部公共工程，建筑庙宇等。强制劳动存在的地方，就可能产生奴隶制，但是，奴隶制任何时候也不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反之，这就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度了。比如，在中国，奴隶制存在于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家庭奴隶制的形式中或者惩罚制度中。

知识阶层或者祭司阶层在这种社会组成了最高的统治阶级，其次是军人阶层，再次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所有这些阶级主要是靠农民来养活，农民几乎就是全体人民。

但是，如果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堤坝和水渠遭到破坏，水旱灾害侵袭农业，而饥饿又威胁着农民，那时，就会爆发农民革命。中国就是屡次发生这样革命的典型的国家，由于高利贷商业资本瓦解了社会制度，由于统治阶级强占公田，他们只顾自己富足和奢侈，不关心水利工程的保护和维修，致使此旱彼涝，造成歉收、饥饿和死亡。农民革命使旧的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地得到恢复，于是历史又一次重复循环。直到外国资本侵入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前都是这样。1850^①—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最后一次这种类型的农民革命。如果太平天国从欧洲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那只是因为原始的基督教共产主义符合于否定土地私有制，符合于中国农民的村社制度。

上文已经说过，我现在再次来到中国后，曾间或搜集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资料。在我们所经过的一个城镇里，我靠中

^① 原文如此。——译者

国同志的帮助，获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宝贵资料，其中包括其土地法的全文。我把这些资料带回莫斯科，译为俄文，并发表在中山大学附属的研究所出版的一期《中国问题资料》上。土地法指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上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①

这就是一部想要恢复十九世纪就已解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法律，促成这种解体的不仅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利贷商业资本，而且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的加速入侵。

太平天国的土地法清楚地表明了东方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它的底层是农民村社，它的上层则是最高土地占有者国家。这个国家，就是那些祭司、绅士、军事长官阶级。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先被村社本身（作为私用保险基金）尔后被国家占有和分配。一部分集中的剩余产品形成为国家保险基金，另一部分被统治阶级所消费。这就是东方社会的真正面貌。手工业和商业引起了变化，这个变化的前提是一部分农业产品用去进行私人交换。而市场和私人交换正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深刻的矛盾。

十九世纪中叶，数量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农民参加了交换。因村社的平均主义关系使他们很感不方便，商人们更不喜欢这种生产关系。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年以上的人们，特别在南方，对

①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36—137页。——译者

太平天国革命记忆犹新。当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必须考虑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训。不研究在中国占优势的土地关系，就搞不清楚1925—1927年革命的动力。

还在1926年，即到中国之前，我预备在中山大学讲社会结构问题时，就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在我们那几年的书里，我竟然没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论述。此外，我觉得这可能与太古时代有关系，太古时代比奴隶制更近似原始社会，尤其是近似于封建主义。所以当时我就没有怀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前曾经有过封建制度，更何况中国的督军制很容易被看作封建制度。因而简单地认为每个督军都是封建主，督军制度就是中国的封建割据。我们每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在二十年代都是这样想象中国社会结构的。实际上，督军制正是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这两个东西的产物。

正是现在，即在由广州去南昌的路上，当我碰到了明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目睹那原封未动的人工灌溉系统和灌溉稻田的古代技术之后，我对中国封建主义发生了怀疑。

1927年初回莫斯科后，我求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摘录了其中至少在1853—1867年这十四年间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东方社会的全部论述。汇集起来的经典作家言论，乃是一部关于这种既区别于奴隶制、又区别于封建制的特殊社会制度的完整学说。现在，当我占有了在中国搜集的资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对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太平天国革命问题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我极有兴致地开始写这段革命史。写完后，将手稿存放在书桌抽屉里。因忙于别的事情，没有把它整理好拿去发表。几年之后，手稿连同其它资料全丢失了。然而，这一著作的某些材料残存下来了。

我想稍微说得远一点，讲一讲1927—1928年间就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所展开的热烈讨论。

我离华回国后，曾于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过几次报告，讲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问题，着重论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它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对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意义。

在讨论过程中，发生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这种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了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封建制度？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运动碰到了哪种社会结构的残余？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就此开始了。

1928年初，国际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杜勃罗夫斯基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就这个问题去做报告。

国际农业研究所在沃兹德维任卡（今加里宁大街）的一所别墅里，现在此房是苏联对外友好协会。研究所书记是阿利鲁耶娃。她也参与了我将去做报告的那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于是，我结识了这位令人愉快的女性，她善良、真挚，是一位十分纯朴、礼貌和特别谦逊的共产党员。谁也不会想到，她就是斯大林的夫人。

杜勃罗夫斯基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与他的交往几乎一直持续到他临终的前几天。他是研究土地问题的历史学家，很熟悉围绕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种种争论。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特征，是村社使用土地，所以，杜勃罗夫斯基就带着“俄国的”观点看待东方社会。问题是，关于俄国封建主义是否存在的问题已争论很久。早在1902年，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所谓的俄国封建手工业时期的论点时，就写道：“这里象是故意选上这个对俄国很不合适的说法，因为‘封建制度’这个

名词是否适用于我国的中世纪，就常常引起争论。”^①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莫斯科罗斯时代就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主义者坚决反对俄国存在过封建主义的说法，他们断言俄国有过以村社为基础的、自成一体的十分特殊的社会制度。俄国民粹派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俄国不仅没有封建主义，而且没有资本主义。论战不久就转向另一个问题：现在谈的已不再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是封建主义，而是俄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列宁坚决反对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派，他证明俄国早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几年后，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些证据，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存在的是纯粹的封建关系，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帕甫洛夫—西利凡斯基1907年发表的《古罗斯的封建制度》一书证明了这一点。的确，他纯粹从法律上揭示了俄国的领主和贵族制度与法国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同一性。

1924年这部书再版，波克罗夫斯基为它写了序言，指出帕甫洛夫—西利凡斯基“发现了古代俄罗斯为西欧所熟悉的、而被先前的一切历史学家否认的封建权利的形式……”。帕甫洛夫—西利凡斯基在信仰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党派归属上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从对于俄罗斯封建制度问题的研究中，做出了一个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俄国历史的论据。这就是帕甫洛夫—西利凡斯基著作在方法学上的巨大意义^②。

杜勃罗夫斯基是波克罗夫斯基的学生，从未研究过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关系。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

① 见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第二个提纲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8页。——译者

② 帕甫洛夫—西利凡斯基著：《古罗斯的封建主义》，彼得格勒“普里鲍依”出版社，1924年版，第3—5页。

到俄国时，他就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制度，而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所以他在国际农业研究所的发言，从纯方法论的角度谈到我的报告，他依据的是俄国的历史经验，而没有运用中国土地关系史的具体资料。

从同杜勃罗夫斯基的辩论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村社和村社土地占有制不仅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而且是封建制度的特点。应当指出，十七——十九世纪的俄国村社与中国村社并不相同，中国的村社是宗族的，就是它比俄国村社更古老，俄国村社是地区性的，因而是村社的变形。

同时可以看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基础不是村社，而是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没有人工灌溉系统、没有堤坝、水道和把水提到一定高度的水车，就不可能进行耕作。没有这一切，肥沃的土地就会变成荒漠。

关于到底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封建制度之争既非纯粹的繁琐哲学，也不带有考古发掘的性质。它对于解决现代问题，对于确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制定中共土地纲领时从中吸取教训，都有着极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产生了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浓厚兴趣。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1928年秋在中国问题研究所举行的。

尽管我调动了工作（1928年主持《消息报》编辑部的一个部），我仍是中国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当时的叫法不同，称“研究所正式委员”），并积极参加了辩论。我的关于太平天国革命问题的报告提纲打印后，散发给与会者。

差不多所有参加辩论的报告人和发言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制度。主要报告人休卡里坚持这个观点，就这个报告发言的有波利亚科夫、沃林、斯科尔皮列夫、科洛科洛夫、巴拉诺夫斯基、施罗科夫，格里

尼奥维奇、马季亚尔（关于此人，我将专门交代）。在这次辩论会上，我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评价了太平天国革命。

一些同志在阐述中国历史发展时，坚持关于存在封建制度的观点，他们在估价太平天国革命及其领袖之间的斗争等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是除个别人外，又在一个问题上一致起来，即认为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革命。这个估价看起来合乎逻辑：中国由于受到商业高利贷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影响，资本主义取代已解体的封建主义，而太平天国就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者。但是坚持这种观点的人，谁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农民宣布的是土地村社所有制，而不是土地个体私有制？为什么城市资产阶级反对太平军？

我的发言可归结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已届成熟。亚细亚生产方式已被本国商业高利贷资本和外国资本所瓦解。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他们向往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关系，首先是恢复村社和废除土地私有制。所以太平军与商人组织“三合会”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由于这个原因，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加入太平军。工人阶级仍旧同商人在一个行会里，还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在那样的条件下，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命运。

马季亚尔也参加了辩论。他是匈共党员，1922年到苏俄，并加入了苏联籍。1926和1927年他在苏联领事馆工作——开始在汉口，而后在上海。他研究中国的土地关系，收集了这个问题的 大量资料后，写出了《中国的农业经济》一书。马季亚尔在该书中写道，土地私有制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解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方面我们持相同观点，所以我们建立了友谊。我为

他的书写了评论，登在1928年10月份的一期《消息报》上。

同年秋，在太平天国革命讨论会期间，马季亚尔的立场有点儿自相矛盾。他一边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一边又把太平天国革命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把太平天国土地法说成是反动的乌托邦。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讨论，1928年以后也还在延续着。1929年3月，中国问题研究所又就这个问题举行了新的讨论会。这次，斯科尔皮列夫是主要报告人。随后又出现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新的辩论。这次我没有参加，因为1929和1930年我在国外工作。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这个事实说明：不能如此轻易而简单地推翻历史上曾经存在这种生产方式，或否认这种社会制度的残余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中期。那些坚持认为存在封建制度观点的人，应该用经济学的论据弥补其方法学的论据，采用帕甫洛夫—西利凡斯基的方法论。应当记住，正是在帕甫洛夫—西利凡斯基之后，关于俄国是否有封建主义的争论就终止了。他的研究方法也适用于解决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再来谈1926至1927年间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年里，建立了农会，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提出一系列旨在改善农民状况的要求。但是，如果说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土地纲领的话，我大概不会犯错误。

二十六、赣州。乘舢板去南昌

我们告别小小的南康镇的日子到了。

又是田野，陡峭的河岸，乡村。这里盛行用鱼鹰捕鱼。一个农民划着由四根长竹竿编成的竹排。他站在竹排中间划桨。竹排一端放着鱼篓，另一端站着鱼鹰。驯服的鱼鹰潜入水中，把鱼吞到扎着的嗦嚨里，并游到竹排上。渔人从嗦嚨里取出鱼，鱼鹰便又叫着飞去捕猎了。我们常常看见河上拉着驳船逆水而上的纤夫。

我们已经走了八天，可是到赣州换船还有两昼夜的行程。在狭窄的小径上即使两个人也不能并行和交谈。部长和太太们，



转赴南昌时的张太雷

坐在轿子上由民伕抬着。鲍罗廷弄到一匹马骑着。共产党员自然是步行，他们后面是民伕们抬着空轿子。箱子用粗竹竿抬着。大家都默默地走着，因为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谈不起来。只是到村子里，酒馆里才得以相互交谈。

有时路面宽达一米，那时才可以与某人凑在一起说话。

我的老朋友张太雷在行军。他走得消瘦了，脸颊塌陷了。在群众大会上，鲍罗廷用英语演说，他当翻译。那时谁又会料到，整整一年之后，1927年12月，张太雷作为广州公社的领导人之一，在保卫公社的斗争中捐躯了。

夜晚我们到一个乡村宿营，住在一个警察局里。那儿比较暖和，警察对我们过分殷勤，有时使人感到局促。他们是孙传芳的旧警察，一般不领薪水，靠贿赂、敲诈过活。

警察们从饭馆给我们弄来食物。我们要请掌柜的来清账，但没办到。来了一个小孩子，我们把饭钱付给了他，这钱恐怕未必能到饭馆掌柜的手里。

这是最后的行程，我们到了赣州——这个地区的行政中心。

在离赣州还有五公里的一个渡口上，组织了欢迎政府和俄国顾问的群众性欢迎仪式。河上停泊着画舫，放鞭炮欢迎我们。河对岸是赣州市社会团体的代表和当地驻军的队伍。最有趣的是还有古代农民的武装队伍。这是一些青年人，他们穿着饰有珠母钮扣的黑衣服，手持红缨长矛，仪容威严。

在前来欢迎的代表的陪同下，我们沿狭窄的街道接踵进入赣州。很快便听到了欢迎的乐曲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这里举行的是规模最大的、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就连盲人和乞丐协会也参加了。人们要求客人留住数日。接连不断的集会持续了两天。

城内专为欢迎鲍罗廷和其它俄国顾问张贴和散发了传单。

每个城镇里都散发了这类欢迎苏联人的传单，这是国民党和工人组织印发的。鲍罗廷在中国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在这里，即在赣州，简直要把他分成几半了，人们请他到每个会上去演讲。

赣州是一座相当大的商业城市，它比南康要大几倍。我们去逛了大街，得到一个印象：这个城市店铺和作坊很多。但是，即使在这里，也有外国的影响。出现了整整一条街道，全是三层楼的洋房，第一层是大商店和饭店。从那一排排中西合璧的、坚固的混凝土馆舍和厚实的大门里的深宅内院不难看出，资产阶级住的是什么地方。

地方当局对此地的高利贷钱庄商人也要毕恭毕敬。赣州有一千四百家工商企业。虽然外国人三年也未必会来一次，商店里却有很多洋货和英文商标。英文商标是大商号的标志，就象当地资产阶级和大官僚举行西餐宴会使用盘、刀、叉、勺已成为高雅的标志一样。既然城里有这样的需求，于是新建了三层楼的大西餐馆。热衷于洋货、西餐和洋派头，在那个时期甚至成了赣州这类城市官商界的特点。

这个城市不但是商业中心，而且还是手工业中心。我们去了一些作坊，对那里的生产方法很感惊诧。比如纺织业。木制的纺织机与我国古代农村的织布机没有什么区别。原色布要送到专门的染坊，染色的方法是原始的。粗陋的瓦缸，天然的靛蓝。就用这种靛蓝，按中国特有的方法把布匹染成蓝色。不过，这里有各色外国染料。染过的布然后经过打光，显出光泽。就是这道工序，使我们惊讶。光线仅仅能从门射进房里来，地上埋着一块大方石头，上有圆形的凹槽，表面磨得精光，在石头上方，高高的秋千架上用粗绳吊着同样大的一块凸形石头，对着下面的凹槽。染过的布缠到结实的木棒上，放进凹槽里，上

面的石头压到布卷上，年轻小伙子两脚踩着上面石头的两端，手抓住高秋千的柱子，就开始来回踩石头。布卷子上的石头平稳地滚来滚去，布匹就由两块石头磨出光泽。用脚推石头是沉重的劳动，但是当时工人每天要这样干十一至十二个小时。

从国民革命军占领赣州到我们抵达这里的两个月之内，城里已组织起十三个工会。至1926年12月，组织起来的有下列工会：

船夫工会	1000名会员
裁缝工会	902名会员
织工工会	820名会员
木匠工会	600名会员
舂米工人工会	600名会员
建筑工人工会	500名会员
烟草工人工会	230名会员
理发师工会	200名会员
鞋匠工会	200名会员
织袜工人工会	200名会员
烟铺店员工会	190名会员
制鞭炮工人工会	190名会员
伞工工会	30名会员

所有这些工会当时共联合了约五千六百工人，即赣州市全部工人总数的一半稍多一些。

就象在南康一样，店东可以加入工会。尽管如此，工会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结果，工作日被限制在十一——十二小时，而工资提高到平均每天壹角伍分至贰角。

全县的国民党组织计有四百名党员，其中三百人住在城里。城里的组织主要是中学生。当地的国民党组织有学生党员一百

五十人，其次是职员（三十人），再次有被迫参加组织的官员，包括四位绅士。工人党员仅三名。在党部我们听说，最近有一个人参加国民党组织是要取得一官半职。国民党部（当时还没有选举产生的党部）由七人组成：四名官吏、一个绅士、两名律师。赣州市工商部经理是党部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商人聚集在一个反动组织的周围，该组织办了一张报纸，每日发行八百份。主编是当地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师。此报宣传反苏，断言唯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是正确的，中伤学联为“赤色”学联。主编与上海被开除的国民党右派相勾结，得到他们为报纸撰写的稿件。因我们到达赣州，该报暂被查封。

当时，全县只有九名共产党员，其中三名是本地工人，其余由中央派来。这是很活跃的一班人，他们在这里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文字宣传方面。

县长是国民革命军新委派的。我们听到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他对国民党的工作漠不关心，但也不给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设置障碍。各地的政权仍然是旧的，当地绅士在城里开的大烟馆、赌场和妓院照旧生意兴隆。

我们在赣州，对于当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人集会颇有所感。深夜，城里店铺关门以后，集会在庙里举行。大庙里挤得水泄不通。墙上挂着红旗，上有无产阶级口号。煤油灯昏暗的光线微微照亮着工人们的面庞。这里也有上年纪的人，但前几排坐的是青年人和学生。大家一下班就直接来了，身上还穿着工作服。脸色疲倦，显得很沉闷。

讲话的是一位同我们一起来的中共党员，他穿着西装，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开始讲话，工人们警觉起来，最初对他表示不信任，皱起眉头——一句话，“不是我们的人”。

然而报告者原来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他善于巧妙地把听众吸引到热烈的讨论中去。已听到最初的喝采了“好啊！好！”并且逐渐地工人们表情变得明朗了。这位共产党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好，好！”的喝采声中结束了报告。

这里别有一番天地。这里没有令人作呕的龌笑和点头哈腰，不必在每道门前推让谁先进门，没有口是心非的恪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辞令。不，这是另一个真正革命的中国。

到赣州，我们疲惫的徒步旅程结束了。我们在这里换乘舢板。现在我们才明白帝国主义为什么难以深入中国内地，其原因就是道路和其他因素拯救了这个地方。我们沿狭窄的小径，即所谓广东到江西的“大道”走了十天。路两旁全是灌满水的稻田。进山以后的路就是在石头上凿的石阶。河上没有桥，乘船方可渡河。有的地方在摇摇晃晃的桥墩上铺几根竹竿。这些浮桥常使我们吃苦头。有一次，不知是谁连人带马，一起掉到水里。外国帝国主义者难以在这样广阔的国家里作战。羊肠小道妨碍大兵团行动。军队必须疏散成一个接一个的稀疏的队伍；不要说是重炮，甚至连轻炮也不可能从这儿拉过去。难怪外国对中国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在北方只能限于满洲和北京，在华中只能限于长江河谷（从上海到汉口），而在南方仅能限于广州；在中国其他地方，他们则不得不利用中国军阀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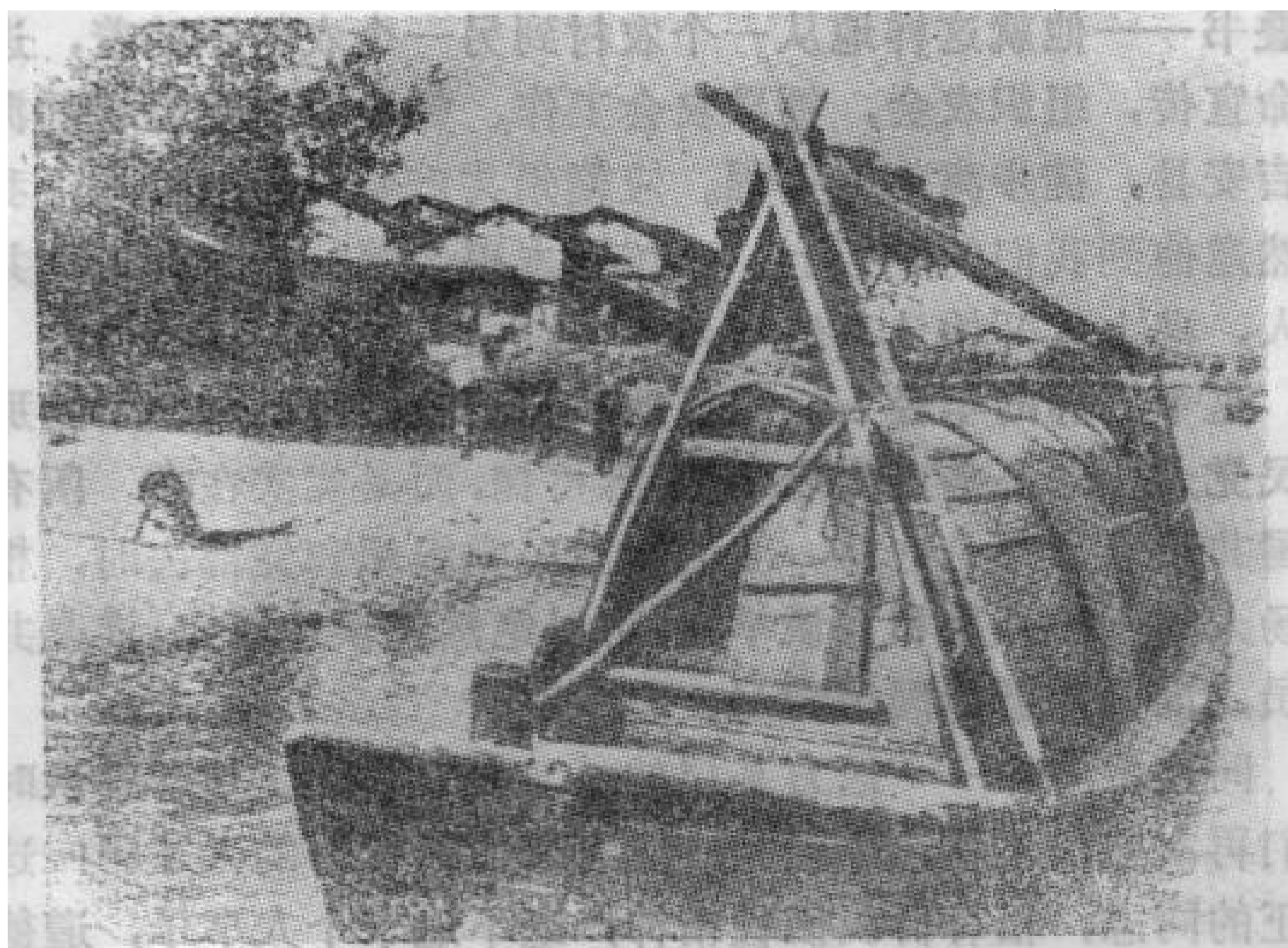
我们应乘船沿赣江到南昌。这种船适于运货。我们的小舢板载重量为十至十五吨。船上有很宽阔的木顶货舱，我们在那里摆行军床。每只舢板可以不费力地摆下五到六张床，舱里还相当宽绰。船中部还有防风的砖炉，我们在上面做饭。一个在这里作活的十二岁的小学徒帮助我们，他负责给大家做饭。帆船上有用竹席编的长圆形的顶篷，可以防雨。从上面拉开席帘，就是窗户；从下面拉开，就是门。

舢板的主人又是船老大和舵手，他与妻子和五岁的儿子以船为家。六名船工（每三人合摇一条螺旋运转的大桨），加上前边提到的小厨子，就是全体船员了。

这是小帆船，中国有载重量可达四百至五百吨、能在沿海航行的大帆船队。

从赣州到相距一百五十公里的吉安，我们航行了五昼夜。其实，即使步行这段路程，也无非就花这样多的时间。一路都是逆风，不能张帆。只能靠划船前进。夜间抛锚怕在黑暗中搁浅，就停在河心，当时河水较浅。此地夏季水量丰沛，可以乘小火轮从吉安直达赣州。

舢板上除了船员还有我们四个人：塔尔汉诺夫、约尔克、一个中国同志和我。约尔克懂中国话，因此我们当时了解周围的情况不单单是靠眼睛看，还能用耳朵听。由于约尔克的帮



我们乘坐的舢板

助，我们作了很多旅途笔记。约尔克不仅给我们翻译了人们的话，还翻译了沿途搜集的文献。

塔尔汉诺夫在中国完成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沿路为其优秀的短篇小说集《中国的故事》搜集了许多资料。我早就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谁也没料想到他还是天才的短篇小说家。

旅途的劳顿辗转之后，我们感到在舢板上就象在舒服的住所里。暖和而安适，主要的是能读点书和写点东西，整理旅途札记。同行的南康共产党员给我们很多帮助，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在南康农村的工作情况。

这位中国的共产党人甚至连外表都明显地与众不同，更不用说那些与我们都没有什么区别的风度和习惯了。这是一个我们很感亲切的人，不仅在信仰上，而且在性情上。一包行李，一叠书——他就这样地从一个农村到另一个农村漂泊着，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会，领导农会工作。如今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去吉安县，徒步离南康登程。应赣州共产党员们的请求，我们欣然邀他到我们的舢板上。这位同志平生第一次见到俄国共产党人，马上就开始认真地学习俄语。

这个沉静的年轻人，明显地不同于我们早已看惯了的那班国民党人。他不是点头哈腰、笑容可掬，而是实实在在。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这样。我们到国民党组织和党部去时，根据在场人的一般外貌和言谈举止，可以绝然无误地断定，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地道的国民党员。

同这位旅伴——地方基层的、又是农村的工作者攀谈时，我们再次坚信不移，中国共产党有着多么优秀的人才啊！这是真正的同志，很有自我牺牲精神，毫不追求个人享乐，道德高尚，忘我地献身于中国无产阶级的事业。

记不清是在船上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接近了小县城万安。远远地，陡峭的岸上出现一座塔——这标志我们驶近该城了。

万安的城墙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了。到了城墙跟前，我们看到墙上刚刚刷白了的一块地方有一段黑字题词：“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①——列宁”。

城里为我们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大会，最后全体用中国话高唱《国际歌》和《青年近卫军》之歌。这可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汉口，而是在万安，是在仅有一条小河与外界相通的遥远的小城；在地图上没有标出万安，因为它总共只有三千居民。

全县一万六千人，主要是农民。土地关系与别处不同。自耕农——50%，半佃农——30%，佃农只有20%。这里的半佃农比拥有四一五亩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稍富一些。半佃农除了自己的土地外，还租种着别人的土地。一般说来，万安县居更多的是弱小的贫苦农民经济。

这里没有大地主。而拥有五十亩地，即相当于自耕农十倍土地的人家就算得上富户了。地租比别处低一些——不超过收成的40%。土地税约在一次收成（这里一年两收）价值的50%以内。此外，还征收一系列其他名目的捐税。例如，每一担稻谷要抽三分钱的特别税，用来养活民团。

当地盛行绅士放高利贷，月息为30%。

万安镇有四家商业公会、一个县行会。城里的同业公会有四百商人，起初他们对国民党冷漠，但后来由于工农运动的成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译者

长，他们就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支持国民党右派。

我们到万安时，这里已有三个工会，计七十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还是旧行会里的。平均日工资壹角至壹角伍分。

这里还有全县范围的学生联合会。

县里的国民党组织从前还是一个不大的地下小组，1926年8月20日才公开，几个月内，党员数激增至七百人。商人党员很少，不到1%。大多数——60%——是教员、学生和职员，农民占30%，而工人占10%。

政权还是老样子。县长和警察局长还是在孙传芳时期就已担任此职。他们至今还未加入国民党，而且阻挠国民党的工作。县长有一个外号，叫“米篓子”——中国常这样称呼那些特别贪吃贪财的人。驻在本县的六个民团支队中，绅士当头目的就有四个。万安农村那时已经开始搞农民运动，有七十二个农村中组织起了农会，共有两千六百个农户。

这里加入农会的主要是自耕农，农会的基本要求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口号是“打倒征收苛捐杂税的劣绅和民团！”农民还要求降低高利贷的利率。

工农运动、学联和国民党组织全都接受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领导。这里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只有三十名党员，共青团有二十名团员。这两个组织都领导着工会和农民组织。

我们离别万安的时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中国革命的根子扎得多么深啊！

现在我们向吉安驶去。已是11月底了，但阳光暖人。我们上岸向前方的某个镇子步行进发时，天燥热起来了。水上很凉，特别是有风时。不得不穿上厚衣服。在去吉安的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颇费思索。

我已说过，与我们同行的是船主全家——他的妻子和一个

五岁的男孩子。天凉了，母亲给儿子穿上厚棉衣。小孩子在船上跑来跑去，一失足，掉进河里去了。他掉下去，连一声也没叫。父亲在旁边站着，并大声地说了点什么。妈妈也跑了过来。棉袄没浸透水时，孩子还浮在水上。但很清楚，棉衣一湿透，孩子就要沉下去。水流湍急，孩子被水冲离开舢板。父母站在船上一动也不动。他们的神情很悲痛，是伤心地告别。但看不出惊恐。他们甚至没有打算去救孩子，救孩子的是我们，而且当我们把孩子放到船上时，没听到孩子父母任何一句感谢的话。他们甚至有点惊慌。

这一切如此莫名其妙，我们请同行的中国同志解释孩子父母的这种行为。他说，救淹死的人是罪孽。

于是，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在天津、上海、广州看到的许多情景。人力车夫拉着旅客在街上跑。后边一辆小汽车开上来，司机鸣笛。人力车夫毫不理睬，甚至头也不回，也不给汽车让路。起初我以为人力车夫成心捣乱，是新旧事物的斗争。但后来，我天天看见这种场面。比如，两个苦力用竹杠挑着行李，后边的汽车鸣笛，他们根本不管。汽车总是绕开人力车夫和苦力，但他们不让路。汽车鸣笛在他们的脸上从来不会引起什么反应。

对于眼看儿子就要溺死而站着不动的那两位父母和对汽车的笛鸣没有反应的那些车夫和苦力，我想了很多很多，并得出了结论：这一切是千百年来造成的，是宗教信仰和风俗的教化之故。

中国历来是人口最多而增长又快的国家。不久前，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水旱灾害还夺走数千万人的生命。千百年来，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经常重复出现的现象就被当作不可违抗的天意而成为迷信观念。救溺水的孩子也成了罪孽，所以千百年来形

成了人们缺乏自卫的本能。可能，自然灾害在古代中国是人口增长的调节方式。

11月29日，在五天的行程之后，我们到了吉安城。

各政治组织的代表都打着旗子聚集在高高的古老的滨河街道上。我们登上石板铺的狭窄的滨河街道，这里备有一群小马送我们进城去。

我们来到一座院落，在那里举行了盛大宴会，席间发表了演讲。宾主频频举杯。所有的人，连女学生都发了言。宴会上最有意思的是大厅里吊满了长长的标语，这是向与会的政府委员提出的要求，其内容引起部长们的慌乱。

这些口号是：

列宁的精神活在我们的心中！

廖仲恺的精神活在我们的心中！

废除一切苛捐杂税！

要求废除厘金！

农工有权反抗捐税！

限制地租！

实行利工利农政策！

改善工农生活！

人民要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

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

采取措施降低物价、调节货币流通！

增加初小教师的薪水！

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些口号中有对政权的不满情绪，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要求已经有的东西。同时，根据这些口号可以断定，共产党人对当地居民已有颇大影响。

国民革命军到吉安是1926年9月24日。在此以前，这儿由

与南昌军阀勾结的乡绅统治着。国民革命军一到就激发了人民群众，他们起来首先把两个穷凶极恶的土豪马某和孟某驱逐出城。我们还没到，就如此快地知道了这一对坏蛋的下场，这就足以说明当地老百姓是怎样地倍受欺凌。

这些劣绅逃出城，投奔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师某司令门下，从而得到庇护。他们甚至往吉安写回信，扬言很快要在第二师部队的保护之下打回城来。

自从居民们得知这两个劣绅威胁着要卷土重来以后，国民党的工作也不好办了。人们害怕马、孟二人回来要报复赞同革命的人。

当地国民党党部委员请求我们把这种担心转告政府，并阻止这两个劣绅回来。我们离开这里之前，他们又一次就这个问题向政府递交请愿书。

在吉安，我们又一次得到证实，即使在国民党组织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它依然毫无权力，照旧是旧官僚，或者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指派的可疑分子把持着权柄。例如在吉安，没有一个国民党党部委员担任行政职务。在国民党党部掌权的地方，党部也不过是一群“改头换面”的老劣绅，或者各种地痞流氓的大杂烩，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国民革命军到来并驱逐了马、孟，才使当地共产党人有可能领导国民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至1926年12月，这里的国民党已有一千二百名党员，其中七百人属于吉安城内组织。它的主要核心是本地学校的学生。同时，大约有一百名工人加入了国民党。但在近期，一些乡绅也纷纷加入国民党。

共产党组织在吉安已存在近两年，全县有党员一百七十名，团员二百多名。大多数共产党员（约80%）是工人，青年团却相反，主要地是学生，仅20%是青年工人。城内共青团组织中

的青年工人比例不大，原因是手工业学徒和帮工还处在雇主的统治之下。

团员中只有一位姑娘，而当地共产党组织中，连一个女党员也没有。因共产党在这里还处于秘密状态，故不以本组织的名义，而以国民党的名义出面，所以老百姓完全不知道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我们到来的那一天。当时，由于政府和苏俄顾问到来，共产党和共青团同国民党一样，也单独发表了自己的呼吁书。

这里有约一万名工人，但仅仅是手工业无产阶级。县城总共只有六个工业工人，他们在电站工作，日薪伍角。他们是当地的工人贵族，断然拒绝加入工会。

工人一天平均可得到壹角至壹角捌分的工资，年龄大些的学徒年薪伍元，而小学徒除了每日的膳食，什么也得不到。工作日从早上六点持续到晚上十点，只有很短的吃饭休息时间。

上海1925年的五卅事件在这里得到了很大的反响，直至国民革命军到来以前，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秘密工会。地下工会在1926年6月和7月，即还在孙传芳时期就进行了一系列罢工，这是吉安工人最初的公开行动。

国民革命军占领吉安城后，工会开始迅速发展。截至12月份，已有二十四个工会，四千三百名会员。此外，还建立了商业职员和小商的联合会，有两千名会员。

这里的工会也吸收雇主参加。但是据说被吸收入会的，只是那些“好的”雇主。工人们组成了五百人左右的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名称叫“工人剿匪队”。

这里也开展了妇女运动。妇女会只有当地中学的二十名女学生，力量很薄弱。他们向我们抱怨说妇女组织缺乏领导人。

象万安一样，本地农民总数的80%—90%是自耕农和半佃

农。只租种土地的农民很少。自耕农拥有四一五亩地。也有雇工种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向农民出租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多数是城市商人。租金占收成的50%。

高利贷盛行，月息为20%—30%。高利贷者把钱借给农民不仅要极高的利钱，而且要求一律不得用现钱偿还本利，须按秋后的低价折算成稻米，一担米约折四元钱，可是春天一担米价钱可达到七元。这样一折算，实际每月利钱就占60%了。

吉安地区的农民运动始于1926年2月。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出现了秘密农会，在驱逐孙传芳部队中起了重大作用。到12月，农会公开活动了。共有六十个农会，五千户农民参加。他们建立了自卫队，并着手解除豪绅控制的民团的武装。国内战争在农村中开始了。

二十七、在蒋介石的大本营里。

牯岭会议

我们乘舢板沿着由南向北纵贯整个江西省的赣江，向蒋介石的大本营进发，已经是第五天了。

每三个人划一支安在船尾的桨，桨发出吱吱的响声，陡峭的河岸慢慢地向后移去，我们的旅程仿佛没有尽头，时间概念消失了。昼去夜来，究竟过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不是每个人都能记得的。

但是，从吉安城往下过去不远，迎面出现了挂满各色彩旗的汽艇，我们与前来的人在村旁一个停泊处见面了。汽艇上燃放鞭炮欢迎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兵士列队在船舷上向我们举枪致意，站在前面的将军领着士兵们呼喊欢迎口号。这是蒋介石司令部的一个将军，他奉命前来转达蒋介石的问候和赠送慰问品。士兵们什么也没问就把大筐子里的慰问品装到我们舢板上，有各种罐头、水果、饼干、酒和香烟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盛着各式糕点的篮子，那是农民从十里以外给我们送来的。

将军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出于礼貌过问了我们的健康情况，并通知我们说已准备了拖轮送我们到南昌。说完，他就乘船回大本营去了。

1926年12月5日，我们抵达南昌。拖轮哒哒地响着，噗噗地喷着气。天气晴朗，阳光照在水面上，光彩夺目，但是有些

凉，终究已经是12月了。蒋介石乘坐的快艇出现了。他满面笑容，祝贺我们安全到达。然后急驶回南昌，以便再次欢迎我们。那是例行礼仪的规定。

南昌已经在望了，这就是它，在河水涨溢的赣江转弯处。军校的飞机在我们舢板上空翱翔，撒欢迎传单。终于到了南昌码头，这里挤满了工人、国民党代表和司令部将军。以布留赫尔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也在这里，中国人都知道他叫加伦将军。军乐队在演奏着乐曲。各色彩旗。各种欢迎口号。气氛庄严隆重。

欢迎的代表和武装警卫陪同我们步行到前江西督军的官邸，蒋介石的司令部现在设在那里。和中国所有的官邸一样，它是平房，由许多有高大围墙的中国建筑风格的庭院组成。大院内套着许多小院落、水池、花坛。豪华的官邸同周围单调而简陋的灰色建筑形成鲜明对照。奢华的官邸象征着这个政权是和人民为敌的。

在公馆的大厅里进了早餐。桌上摆着西餐餐具。蒋介石夫人接见了我们。为欢迎国民政府和苏联顾问的到来，南昌举行了两天宴会。两天里蒋介石一直在窥探政府委员们的情绪和意图，而他们来南昌是为了同蒋介石举行军政会议。蒋介石现在不仅仅是总司令，还是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际首脑。

南昌是一个大而古老的城市。从它的外貌可以看出，近二百年中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里差不多没有欧式建筑物。它是江西省的官僚政治、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省内的主要名胜是陶瓷厂，其产品不仅驰名中国，而且驰名其他国家。外国的需求影响了产品的风格。这里不仅仅有中国式瓷器，而且有欧式瓷器。这部份产品大多为向欧洲和美国

出口而做。这样，南昌的资产阶级便同国际贸易和外国资本家发生了联系。

走出官邸一进城，我们立刻接触到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国民革命军抵达后，城市政治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遇到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很特殊的事情。在南昌我们决定去洗澡，长途旅行之后这是最必须的。走遍了南昌所有澡塘，只见都关着门。对我们问题的回答很简短，但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因为城里的钱不顶用。”我们在南昌想买点东西，但许多商店也关着门：“因为没有真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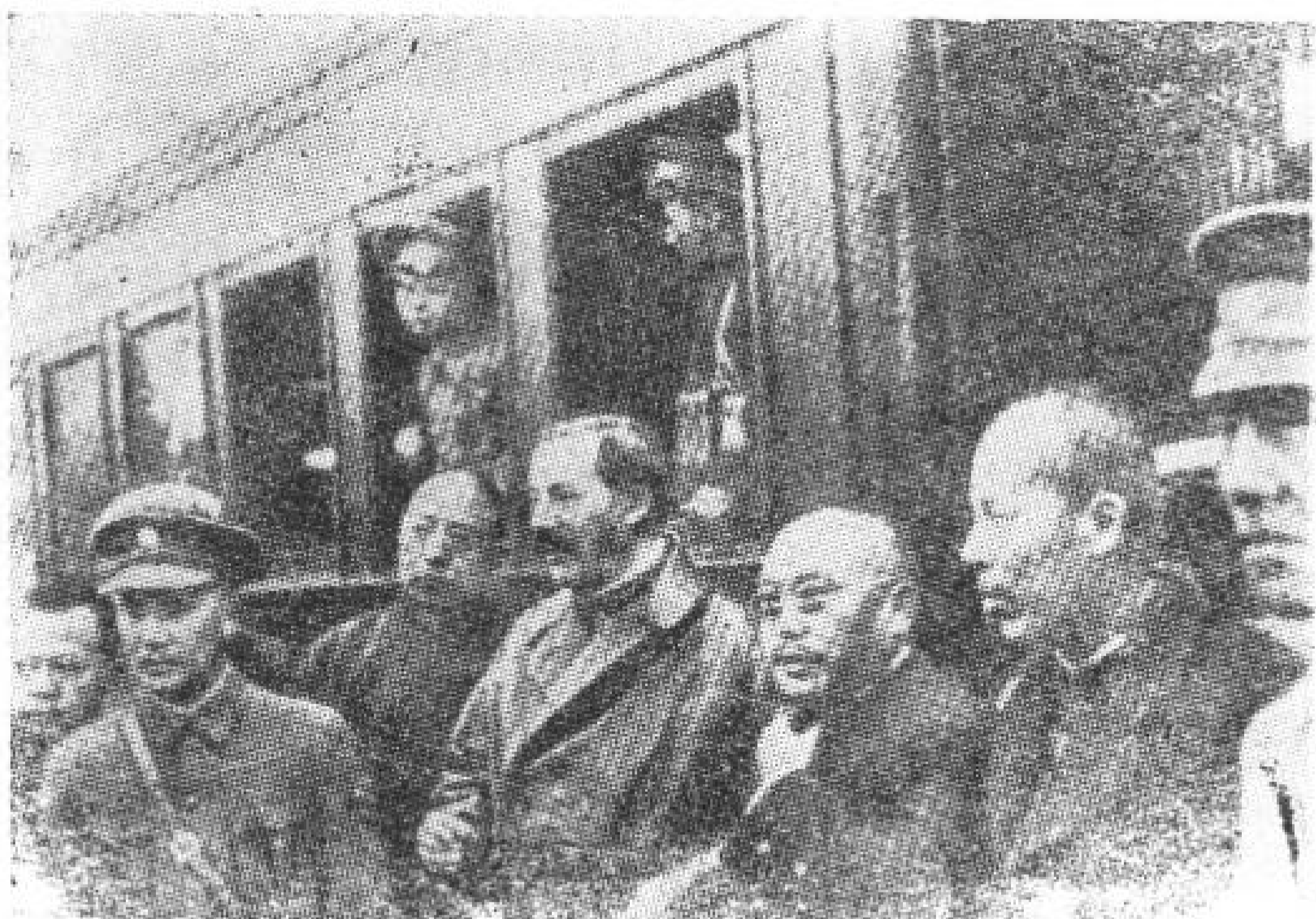
我们打听到，蒋介石在这里的参谋部开设了自己的印刷厂印发纸币，这些所谓“军用钞票”除了靠刺刀外，别无其他办法来保障其流通。蒋介石用这样的钱付清了粮食和其他军用品的债务，并从省内榨取了实际的贵重货币，主要是银元。居民用抵制“军用钞票”作为回答，店铺开始关门了。结果是商人宣布总罢市，即关门停业，并组织了抗议游行。

商人们要求新政府首先承认以前反动当局发行的总额达四千万元的公债，用旧公债券或者在这种债券保障下发行的历届政府的纸币，支付国民政府全部税务。

我们在南昌的日子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召集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这样的决议：一、承认以前的公债，并容许前几届政府的纸币流通；二、命令商人于12月7日一律开业，遇有不服从者则以武力胁迫之；三、建议商会和所有的公会使用他们收藏起的银元；重新开放已倒闭的江西银行。

据我们所见，商人们取得了胜利。

前来的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本应在蒋介石主持下举行政治会议。但是，城里的形势对召开这样的会是不利的：曾提出过各种要求的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商人们的骚动



动身离开南昌(中间者是鲍罗廷)

迫使蒋介石将会议转移到牯岭。

全体人员匆忙转移到九江，以便从那里再去牯岭。从南昌到九江可以通铁路，该路资本的占有权属于日本。我们动身到车站去，乘木排渡河，再从那里走三公里土路到车站。我们上了火车，从车厢向外望去，尚可以看到不久前结束的战斗的痕迹：被炮火破坏了的车站、弹坑、某些地方士兵的尸体狼藉。

不久，我们就在一个半毁坏的车站停下了。这是一个叫德安的小城。火车在这里停了约十五分钟。当地工人，主要是铁路工人，拿着小旗和石印的传单，并把它们交给火车上的所有旅客。我们和工人们交谈，他们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在自己的秘密工会领导下，三个月内竭尽全力阻挠孙传芳军队推进及运送军火，同时还不止一次地罢工。孙传芳三个月没有发给他们工资。最后，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但是，

现在已经有一个来月了，工人们仍然没领到工资。铁路工会从国民革命军来到后取得了合法地位，它派代表团去找蒋介石，要求不仅支付工人当月的工资，而且支付前三个月的工资，在那段时间内，他们帮助了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回答说，他不能偿还孙传芳的债务，但是答应了支付国民革命军入城后这段时间的工资。虽然如此，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付给。工人们告诉我们，除了上述情况外，他们还没有住所。这是实际情况。从车站就可以看到遭到炮火破坏的德安城。

“四个月来我们饥寒交迫，养活不了我们的孩子，请转告政府，我们要求救济”。

蒋介石坐在车厢里没有出来。

工人们继续述说。结果，蒋介石宣布这个工会是孙传芳的，就这样答复了铁路工会关于要求政府救济的坚决要求。蒋介石还命令解散这个工会，并建议国民党工人部组织新工会以代替现有工会。老工会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继续活动，但是，同时出现了和它并存的按蒋介石的命令建立的另一个铁路工会组织，它不是由工人，而主要是由职员组成的。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已经加入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工人。国民党员们对国民党建立的新铁路工会提出了抗议。

他们交给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两份宣言，一份是欢迎苏联代表的，另一份是要求汪精卫复位的^①。

让汪精卫复位的要求是因国内局势的变化而出现的。前面已经说过，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使汪精卫免除了政府首脑的

^① 后来汪精卫也成了和蒋介石一样的民族革命的叛徒。但是，当时他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所以被当成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逃跑后，第二军司令谭延闿暂时代替他任政府首脑，而全部政权，无论军权或民权，实际上由蒋介石掌握。

职务。他隐藏起来，后来到法国去了。他保留了身受蒋介石之害的“左派”声誉。

当时的北伐鼓舞了人民群众。国民革命军不断向北推进。后方受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南方的工会和农会建立起来了，国民革命军所占领的省份都出现了革命高潮。在这种形势下，左派的势力加强了，于是群众要求汪精卫复位。1926年10月，在广东召开了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汪精卫复位的决议。

蒋介石身在前线，他无法反对民众运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他的保护人和智囊——上海的银行家张静江建议他伪装成“民意执行者”，给汪精卫拍电报，请他返回广州。

不过，在国民党十月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汪精卫返回这一决议的时候，演出了一场滑稽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汪精卫回来后到哪里？因为他是政府主席，这个位置现在蒋介石占据了。代表们阐明，汪精卫应当归任政府主席职位，以代替蒋介石。这时候已经瘫痪的张静江被人用椅子抬到大会讲台上，这个睁着一只眼，歪着嘴的老头子宣读了刚刚接到的蒋介石的电报，内称蒋反对汪精卫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广州到汉口的途中，在每一个群众场合都有要求汪精卫复位的呼声的原因，这是为了反对一再推行反人民政策的蒋介石。现在，在德安这个小站，我们听到了同样的要求。

革命高潮巩固了左派的势力。但是，蒋介石对形势却另有估价：他认为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加强了地位，所以，现在他就有可能把1926年3月20日预想实现的计划进行到底。

火车开动了。有一些政府委员拿着德安工人的宣言。蒋介石因决定向商人支付孙传芳的债务，但不发给革命工人工资，自己觉得和我们坐在一起多少有点难堪，便默默地坐在车厢的

角落里。

当时蒋介石已四十开外，他出生在浙江省离宁波港不远的农村，一个约有四十亩地的商人家庭。他父亲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

蒋介石在宁波中学毕业后到了日本，在那里进了军事学院。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他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时期，蒋介石在宁波率领一部份人揭竿而起，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到了省会杭州，然后又到上海。

在上海他结识了戴季陶，戴季陶后来是国民党右派思想家。除戴季陶外，蒋介石和孙中山的战友之一陈其美建立了友好关系。

这三个朋友都来自同一个省份，在上海都和资助孙中山的张静江有关系。

辛亥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脱离了政治活动。他住在上海，从事个人的事业。只是到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站稳脚跟的时候，蒋介石才又重新和他建立了联系，并到广州来了。在这里，他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他和孙中山一起跑到军舰上。蒋介石之所以出现在这艘军舰上，并不是因为他忠诚于孙中山，而是因为除了逃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他还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用以背叛孙中山，他没有自己的军队，而没有军队，他对于陈炯明就无所效益。

但是，在孙中山最艰苦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一起，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他们接近的原因。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孙中山就利用蒋介石，准备重新攻入广州。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组织了新的武装集团。当时他派蒋介石到福建去，和安福系军阀建立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3年回到了广州。

孙中山在1922年遭到失败后，仍然继续斗争。蒋介石则不

同，就象在辛亥革命后一样，他又是心灰意懒。蒋介石在福建执行孙中山的军事任务时，曾写信给胡汉民：“十日内如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①

就在那时，孙中山和蒋介石开始通信。孙中山在1922年11月22日^②的信中，想鼓励蒋介石，他教训和指责他说：“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③在这第一封信里，孙中山同时把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

辛亥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离开政治斗争时以及他在1922年陈炯明叛乱以后的行为，都说明他极不可靠，也绝不是孙中山坚定的拥护者。

1926年3月20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证明不是汪精卫，而恰恰是他蒋介石应当是孙中山的接班人，从而公布了孙中山给他的信。读这二十二封信^④时，你会感到惊诧。因为这些信从反面说明了蒋介石的特点。

这些信什么都提到了。例如，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把武器运到适当的地点，蒋介石不执行命令，经过多次提醒，最后，蒋介石才把所需要的武器送到。但是，正如孙中山所写的那样，在“次日开始宣传，而兄处派人忽将手机枪并短枪收回，致不能照计划举行”。（1924年11月4日最后一封信）^⑤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孙中山为了培养真正忠于国民革命的新型军官，决定建立军校。他任命蒋介石为军校

① 《孙中山丛书》第四册，上海广益书局，1939年版，第41页。——译者

② 见上书，此信日期应为11月21日。——译者

③ 见上书，第41页。——译者

④ 见上书。应为二十三封信。——译者

⑤ 见上书，第51页。此信时间应为1924年9月4日。——译者。

校长。但是，孙并非十分信任他，故又任命了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党员廖仲恺去当政委。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杀害了廖仲恺。廖仲恺遇刺与蒋介石成为总司令的1926年3月20日事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北伐期间曾任蒋介石总顾问的布留赫尔对我说过，在第一次军事失利时，总司令就暴露了动摇性。有几次，当敌人打击了国民革命军并转为进攻时，蒋介石就曾企图逃离前线。人们不止一次执手相拦，不让他逃掉，因为逃跑会瓦解革命军的军心。

但是，国民革命军取得的胜利越多，越是向北推进，蒋介石就越发自以为是，他就越加崇拜拿破仑的形象，也就更加迅速地向右转。然而，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动向却截然相反，群众在向左转。

现在，陶醉于胜利的蒋介石就在车厢里，坐在我们面前。他体格匀称，束着皮带，脚踏皮鞋，生有一双明亮狡猾的眼睛，个子不高。他似乎真感到自己是拿破仑了，竭力摆出一付沉着冷静的样子，努力使举止带有一种与他的官阶相称的尊严。同时，这个笑容可掬的、客客气气的、总是对你很殷勤的将军，每一分钟都要站起来，给别人让座，拱手作揖，满脸堆笑。不知为什么，总不大相信，你面前的就是1926年3月20日广州事变的组织者。

尽管蒋介石追求留名青史，但他却首先把政治看成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他当时就已经开始盗用军费，他的每一个军官都了解这一点。例如政府发放了相当大数额的军用医疗费，这些钱进了蒋介石的腰包，士兵们仍然缺医少药。蒋介石每月为士兵被服厂领取五十万元，可是，供应全体官兵的被服全年有三十万元就足够了。

到了12月份，政府真的一文不名了。甚至连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学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留学所需要的三千元路费都没有了。而蒋介石这时却要求财政部拨款七千元给他的私人警卫队做军服。部长搜尽了各个角落，才凑齐了蒋介石要的钱。蒋介石也不嫌钱少。司法部长徐谦简直是哀告说：“如果还是为了军阀们个人发财而照旧掠夺人民，这叫什么革命！”正如中国所有的军阀一样，蒋介石首先是窃国大盗。

列车停了。我们到了九江。工人们，主要是铁路工人，聚集在车站广场上。搭了一个临时讲台并召开了露天大会。鲍罗廷发言，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帽子飞上天空。演说不时被热烈的口号打断。我们简直入迷了，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革命热情。

九江是对外国贸易开放的一个内陆港口。这里的长江江面可以通航大海轮。沿河岸有两排房子，是不大的外国租界，外国的领事馆和外国进出口公司的代办处设在这块很小的租界上。租界的周围发展了相当大的华人区。与外国资本相勾结的大买办在那里掌管着一切。

外国租界围着铁丝网，墙上堆着装土的麻袋。英、美、日等国的几艘炮舰停泊在港内。

第二天我们开始登山，牯岭就在山上。陡峭的山坡绵延十公里长，我们好象在云雾之中了。很难看清要爬的一层层台阶。空气湿润，四周浓雾迷漫，瀑布飞落之声可闻。两小时后，云朵已在我们脚下了。阳光灿烂，气候温暖，景色壮观。牯岭到了。外国人在这里修建了舒适的旅馆，欧式别墅，有几个教堂、医院和学校。上海外国公司的分号开业了。这里甚至有被称为“俄罗斯湖”的俄国租界。我们在镇上遇到的人仅仅是看守房产的公务人员、英国人、美国人、白卫分子和中国职员。从

前不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占有地皮。但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建了很多欧式别墅。

牯岭早就以圣地著称，这儿有著名的佛寺。外国基督教传教士也钻到这里来了，从那时起，这个地方开始为外国人所知晓。有个姓李特尔的英国人曾狡猾地用贿赂的方法，花四百美元买下了牯岭几乎所有的山峰。买到后，他在这里修了守卫室，挂出了英国国旗。中国人在自己的“圣地”看到英国国旗时，很感气愤，于是捣毁了李特尔的守卫室。他紧接着给北京政府发出了照会，以英国国旗被侮辱为理由，要求赔偿损失，要求政府立约。结果，李特尔因那间不值钱的守卫室得到北京政府批准的条约和四千美元的赔偿费。李特尔成了当地的土皇帝，他建起了疗养区，成了百万富翁。

1926年，他是中国的法西斯组织“反对第三国际斗争联合会”的领袖。这个组织的后台是英国的汇丰银行。该组织用中文积极地进行宣传，并在上海出版了反犹太人的英文小刊物《立宪主义者》。这个杂志甚至转载了莫斯科报纸上青年共产国际的公开信，同时进行了恶毒的谩骂。

我们来到了牯岭。现在它是一座空城，大多数外国人因害怕国民革命军而跑了。一些房舍和旅馆的门都被钉上，留下的不知是主人，还是仆人，反正都是外国人。

我们还没来得及在一个不大的旅馆里安顿下来，就隔窗看到了全体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主要活动家，他们挨门打听些什么。以后我们知道了，他们每个人都希望买一幢别墅。

就在这远离开人民群众，远离群众大会的山上，在听不到群众呼声的地方，召开了军政会议，讨论了今后的行动纲领。

首先研究军事问题：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停步？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革命派认为停止进攻以巩固后方是必须的。军

队已膨胀和扩充到三十个团，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不可靠。指挥人员是收编到蒋介石方面的反动军阀。现在的任务是加强各新军团的政治工作，并解除个别明显的反革命军队的武装。

应该指出，士兵已经三个月没领到薪俸，开始出现开小差的现象了。领不到薪俸的雇佣军随时都可能转到敌人方面去。

但是，根本的政治问题是巩固后方。许多省份解放了。农民、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期待着实行改善其境况的变革。同时，投诚过来的军阀依然继续掠夺和压迫工农。危险的是，群众会离开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取得胜利的军队，现在这支军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落到“改头换面”的军阀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继续北伐。

因此，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张团结，主张巩固后方，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从政治上改组军队。

在牯岭会议上决定停止进攻。但是，接着就谈到改革和工农问题了。在牯岭军政会议上，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代表最怕的正是这一点。虽然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城市的阶级斗争和开展农民运动的口号，但是他并没有就土地问题提出任何具体的纲领。

蒋介石最感兴趣的是财政问题。他力图继续控制对个别军团的拨款。因为他明白，谁给钱，谁就能够掌握住改编到国民党方面的军队。

因为国民党右派根本不准备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就提出了另一个计划。他们主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以便告诉群众说：胜利以后，全国统一以后就实行改革。

进攻！可是仍然没有战斗和进攻的力量。一直沿用的仅仅是收买敌军头目的老办法。军队打到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以保留原有地位为条件收买了这些军阀。反动军阀们转到广州方

面后，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相应的指挥员。用这种方法“占领”了浙江全省和离上海仅有几小时路程的省会杭州。对这样的战争来说，需要的不是士兵，不是武装，而仅仅是钱。蒋介石对钱是最感兴趣的。

他急于去上海抓海关税，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

牯岭会议上也讨论了汪精卫问题。蒋介石假装天真并再次说要召他回来。这几乎被认为是会议最重要的决议，是左派以放弃社会改革为条件做出的让步。

在牯岭，我同蒋介石谈过他最近的计划。他明显地着急了。当谈到国民党十月会议的决议时，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向大地主赎买土地。在这次谈话中，他尤其注意我们对他个人和对他的计划的态度。他的计划早已十分清楚了。他用毫不掩饰的询问口气对我说了自己的愿望，即到莫斯科去当中山大学的教授。他的手腕真可谓彰明较著，让人忍不住发笑。然而，为了迷惑左派，他确实已把儿子送到这个大学去学习了。

蒋介石和我谈话时，责骂国民革命军个别部队的头目。用他的话说，这些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做得很不好。他对我说，一些指挥人员在政治上言不由衷，他们妨碍部队的政治工作，说他们身为国民党员，实际上和这个党格格不入。这种情况当然符合实际。但蒋介石说这些时，你总得猜测，他指的究竟是谁。

不难理解，这里他所指的是军阀唐生智。因为唐的军队驻扎在武汉。目前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也设在这里。主任是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我们刚来到武汉时，蒋介石就通过邓演达解除了军队政治部宣传处长的职务，不久，邓演达本人也遭到同样下场。因为当时邓演达体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军队中的联合。

这样，在牯岭会议上达成了关于汪精卫复职和国民党政府

设在武汉的协议。

1926年12月8日，牯岭会议结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江。蒋介石是一付很关心和体贴人的样子，为安排政府委员和客人们的轿子还费了不少心，俨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最后一个坐上轿子的。

12月10日夜^①，政府从九江迁往武汉。大家都来到码头上，轮船已停在这里了。夜里很冷，政府委员们已经坐在船舱中。蒋介石来了，他轻松愉快，满面笑容，和大家特别客气，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别，因为他不去武汉，而将留在南昌。

清晨，轮船向后座了一下，就启航朝武汉开去。把一个政权中心留在南昌的河岸上，把另一个政权中心拉向武汉^②。12月10日，政府成员在武汉受到十万游行群众的隆重欢迎。就在这一天，南昌和武汉的斗争开始了。12月15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汉口罢工，然后紧接着发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装。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南昌发来。制定了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各种办法。南昌成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为首者就是蒋介石。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确切说，应是拉向“武昌”。详见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1975年台北版，第一册，第342—343页；又可见：半粟编《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上海太平洋书店印行，1929年增订本，第536页。——译者

二十八、武 汉

我们航行的终点是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三个城市总称为武汉。我们离广州后的漫长旅行就要结束了。我们主要靠步行及舢板，经过了许多村庄、县城和省城，历时二十五天。

九江的工人和政治团体的成员用鲜艳的纸旗装饰了我们的轮船，并把欢迎国民政府和俄国顾问的彩色标语贴到船上。主要是一些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还有一些口号着重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轮船的集体休息室挂满了各色外国旗，在火盆前取暖的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指给大家看，并说这些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国旗。于是，在哄堂大笑中，集体休息室的人们把小旗扔到了船外，“驱逐了外国帝国主义”。

我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大家在甲板上欣赏着由于泥沙而呈黄色的壮丽的江岸。这条江流经华中地区，自西向东奔去。纺织工厂分布在河两岸，象巨大的方匣子。冶金工厂隐约可见，工厂的烟囱浓烟滚滚。从外表可以看出，这里的社会基础与广州并不相同。广州是私人手工业生产占压倒优势，这里却存在着有现代无产阶级的工厂。

远方出现了一只饰有国民党旗的小汽艇，它向我们驶来。这是第七军军长唐生智将军和当时还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前来迎接我们。

轮船沿河左岸行驶。岸上就是汉口。我们的船头已经和岸

上“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罐并列了。远处是外国公司职员们舒适的别墅。我们驶过码头，那里停泊着外国炮舰和巡洋舰。那是为“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而开来的。在英国舰队中有一艘著名的“柯克捷夫”号，就是这只军舰不久前炮轰了不设防的城市万县^①。

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兰浦生先生当时正在汉口，他在等候国民政府到达，并准备和它进行“友好”谈判。他曾对报界发表谈话，声称中国人民似乎知道，近一百年来英国对中国实行的是“爱好和平的不侵略政策”。话是这样说的，可是“柯克捷夫”号干的却是另一套勾当。这艘军舰让我们的船开过，然后全力以赴地追赶，根本没有向政府致意，就从左舷绕过去，挡住了我们的路，靠岸了。

政府成员们对英国这种军事示威感到愤慨，于是不禁想起了兰浦生的“自由主义”态度。但是，正当“柯克捷夫”号示威时，三架国民革命军的飞机在它的上空盘旋欢迎国民政府，狂欢代替了愤怒。

我们的船沿着汉口的滨河大街前进。为庆祝政府到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街上挤满了人。工人组织举着革命旗帜来到街上，拿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到外国租界去示威。

过了汉口，轮船就开始横渡长江，向对岸的武昌驶去。围攻的痕迹依稀可见——城郊遭到破坏。这就是长江岸边绵延几公里的武昌。这里的情况难以用笔墨形容。几十万工人、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举着旗帜，唱着革命歌曲，来到码头上欢迎国民政府和苏联顾问。

^① 1926年9月5日，为阻止国民革命军的推进，英国军舰柯克捷夫号炮轰了长江上的万县港。

已经能够看清这旗海中的口号了。“联合苏联不是两国的外交联合，是两国革命人民的联合。”“鲍罗廷万岁！”（逐字解释是祝鲍罗廷顾问活一万年）“打倒英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万岁！”我们还看到许多运输船上也写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标语。

轮船靠近码头了，省革命政府、国民党部的成员及唐生智将军偕司令部人员在码头上挥手欢迎政府。人声鼎沸，鞭炮齐鸣。部长们穿过了新首都的街道。

武昌是中国古老的大城市，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它座落在很深的长江之畔，距海口有一千多公里，但可停泊海轮。长江的一边与上海、另一边与辽阔的四川省连接起来。武汉向北有铁路可直通北京。向南有铁路可与湖南省省会长沙相连。离武汉先乘轮船，再乘火车，一昼夜可达江西省主要城市南昌。这个有利的中心枢纽地位使武昌具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意义。当时在武汉已经有各种现代化的工厂一百多个。同时，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并保留着古老的手工工场。武汉是大的商业中心，各种货物由此运往全国的四面八方。在这里集中了大量的资本，集聚了大批的工业和手工业工人。

武汉三镇中，武昌是最典型的中国城市：狭窄的街道，白天拥挤嘈杂，夜里一片黑暗。尽管这里不久前才被占领，但城里已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标语所起的作用和我国在内战年代一样，它在鼓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两幅常见的宣传画，上面画着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同饰有镰刀斧头戴着高毛皮帽的俄国人握手。画上写着：“英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紧密联合苏联”的标语。到处都有解释孙中山的学说和他的遗嘱的宣传画。

傍晚举行了三十万人的欢迎大会。这是我们在旅途中所见到的最大的一次集会。人们的眼睛里热情闪烁，一个个心花怒放。群情欢洽，锣鼓喧天。千万面旗帜招展，几乎处处都是红

色。讲台下面是人的海洋。政府委员们向人民做了自我介绍。矮胖子孙科发表演说，无情地控诉外国帝国主义；徐谦对工农发出号召说，如果他们希望争取人的生活，就应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好地组织起来；宋庆龄向妇女们发出呼吁，号召她们站到国民党的旗帜下。鲍罗廷一心想维护统一战线，他站在所谓商人讲坛上，提出了广东货币的方针，向资本家解释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政府迁到武汉使人们感到有希望改善人民群众的地位，他们现在精神振奋，并且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圣诞节期间组织了反帝宣传周。每一个十字街头都举行了集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12月25日散发传单，揭露外国传教士的帝国主义行径。可以感觉到，群众的反帝情绪正在日益高涨。示威游行开始了，而且越来越盛大和激烈，其结果出乎政府预料之外：发生了1927年1月3日的汉口事件。当时群众的愤怒达到极点：他们夺取了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在这些日子里，外国人避免在街上露面或者根本从武昌消失了。

我们沿着武昌狭窄弯曲的街道漫步。街上贴满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一个跟在我们后边的人力车夫满怀喜悦地在每一张反英标语前叫住我们，用中国话给我们解释了墙上写的内容。他并不怀疑，我们懂得他的语言，热情地高呼“很好”！我们开玩笑，对他说我们是英国人。车夫对我们说，既然这个时候你们在武昌城里散步，并且满面笑容，那就是说，你们是俄国人，而俄国人和中国人是兄弟。

汉口座落在武汉对面、长江左岸上，它实际是外国在武汉的租界。汉口虽是这一地区的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中心，但中国人也开始逐渐多起来。这个城市的华人区扩大了。和外国商业发生联系的商业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往这里迁移。于是汉口的

财富超过了武昌。汉口和武昌的另一区别还在于它是按欧洲城市的式样修建的，宽阔的柏油路，夜里灯火辉煌。在这里能遇到许多说英语的中国人，但在武昌这倒是非常罕见的。汉口不仅仅是对外贸易中心，而且是大工业城市。如果说武昌主要是有一些手工业作坊，那么汉口则有许多外国工厂和产业工人。

因此，汉口的无产阶级是比较有组织的，它摆脱了行会的狭窄范围并抛弃了行会性质的组织原则。

汉口的外国租界分为五部份：英国租界，以前在形式上被中国当局掌握的俄国租界，法国租界，其情况与俄国租界相同的德国租界，以及日本租界。经过谈判，从1927年1月3日起，被人民群众占领的英国租界根据一定条件，由国民政府管辖。

汉口外国居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份是白俄。他们放荡不羁，竟有一个白俄神甫开了妓院。只要懂俄语，就可以在汉口租界应付自如。从国民政府到达后，白俄开始表现出积极性。法国人补召了一些白俄到法租界当巡捕，英国人搜罗白俄主要是让其当密探。只要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在华人员的情况及其活动性质的任何情报，即便是胡诌的情况，都会得到钱。这里我可以引证一份向英国在华特务机关提供的情报作为例子。例如，某位“克德罗利夫斯基”是英国在华间谍名单上“最内行的”白俄分子。他在中国的化名是叶夫盖尼·皮克。1927年，鲍罗廷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他是这样报告的：“五年前，苏联（当时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派遣了现在住在上海的斯托扬诺维奇到广州执行紧急任务，说服孙中山博士接受鲍罗廷为顾问，后者当时在莫斯科闲住。他刚刚由匈牙利归国，曾企图在那里搞革命。但是，由于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镇压，他遭到了失败。”

皮克似曾见过布留赫尔。皮克写的材料说他是德国人，说

维经斯基是工会专员和“汕头厦门工人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切列潘诺夫本是主要军事顾问之一，“皮克大尉”却说他领导鲍罗廷司令部的测绘局。至于我的情况，在他的报告中我扮演了两个角色：据克德罗利凡斯基的情报，哥萨克军官阿布诺利德在广州领导了一个军事顾问团，“达林是他的助手，据推测，他专事组织起义和叛乱”。这个报告者把苏联工作人员名单带到汉口后写道：“名单简况如上，最后，应当提到达林。他是莫斯科的检察长，以司法部顾问身份来此。”这就是英国特务机关为之付款的那些胡说八道的情报。

汉口外国租界的基本生活特点就是极度恐慌，害怕“赤色分子”——他们这样称呼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据租界条例，任何一个武装的中国士兵都不得进入租界，禁止革命的示威游行。由于“柯克捷夫号”事件，武汉反帝斗争的锋芒所向是英国人。把他们驱逐出汉口的，主要是工人。在一些英国住宅和机关工作的中国仆人罢工了，英国士兵和水手只好擦洗上海汇丰银行分行的地板。所有外国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罢工了。罢工损害了全部经济机构和英国帝国主义对汉口的政治统治。在罢工过程中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当需要帮助罢工工人，需要封锁罢工的企业的时候，工人纠察队就立即出动。

工人纠察队为了保护中国居民免遭来自帝国主义的可能挑衅，而监视着外国租界的活动。他们在华人区维护革命秩序。工人纠察队是1927年1月3日占领英国租界的主要革命力量。

纠察队有经工会批准的指挥人员和省职工委员会任命的总政委，纠察队穿的是蓝制服，帽徽是带有“劳动”字样的红星。

和首长见面时，他们举手行握拳礼。工人纠察队使人想起了1917—1918年我们的赤卫队，而区别只在于前者用木棍当武器。他们一直在争取得到武器，但是一无所获。假如把他们武



武汉工人纠察队

装起来，中国革命定会有一支真正的革命近卫军。然而，就是用木棍武装起来的纠察队，也成了保证罢工斗争胜利的一支力量。

不仅仅是外国企业，而且中国企业也发生了罢工。吴佩孚的恐怖严重到了这种程度，连最微小的罢工都要用武力镇压。由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工人立刻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斗争。罢工运动是群众性的，前几周就有五十二个工厂罢工，其中有三十个外国工厂。外国人害怕政治纠纷，就让步了。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在顽抗，斗争尖锐化了，企业主们开始逃往上海寻求外国帝国主义的庇护。

1926年12月初，商会就罢工问题召开了会议。会上做出的决议提出：第一，不马上增加工资，而是逐步增加；第二，企业主不应当同意缩短工作日；第三，企业主完全有自由雇用和解雇工人。

决议交给了当局并附带发出警告，倘若工人不接受这些条件，就会导致大批工人被解雇。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商会就罢工问题质问政府的另一个决议。现引述质问的全文。

一、在解决冲突时是否应当注意双方对于预防罢工和同盟歇业的强烈要求？

二、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应当是和睦的？罢工和同盟歇业是否破坏正常的营业、货币市场和总的社会状况？

三、怎样正确解释“资本家”一词？中国是否有真正的资本家？中国的工商业企业主是否就是资本家？需要准确阐述这些问题。

四、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应当有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之间是否会经常发生冲突？

五、由于物价上涨，许多工人受累，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应当增加工资。但是，什么是确定工资增长额的最佳方法？

六、企业主被迫增加工资的同时，定将提高食品价格，社会将怎样对待这样的提价？^①

在这个有趣的质问的第二条中，包含着伪装起来的威胁：如果政府站在工人方面，那么资产阶级将抵制革命政府发行的新纸币，并且不提供政府需要的贷款。这个决议起了作用。

在罢工已经结束，冲突交由政府仲裁的日子里，我遇到了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由上海来到汉口，我们谈论了国民革命军尚未占领的上海的情况。

教授说，“在上海，人们对国民革命军表示同情，但是，害怕罢工。革命军一到，罢工就必然要开始了”。

这就是上海的资产阶级对革命汉口的工人运动的反应，它不害怕蒋介石，但是害怕工人。

^① 未查证原文。——译者

武汉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对蒋介石持反对立场的将领们的基地。按社会成分来说，武汉政府是复杂的。参加这个政府的有：大地主兼军阀的谭延闿和唐生智；现代资产阶级的代表宋子文和孙科；急进知识分子的代表邓演达；还有陈公博一类的投机分子和贪脏枉法者。

这个政府对唐生智军队占领的地区有影响。唐仅仅在1926年从军事战略（和吴佩孚斗争的）考虑，接近了国民党。这个军阀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反对蒋介石，并因此乐意让武汉政府驻在他的军队占领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武汉政府在军事方面依赖于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在武汉政府中起很大作用。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广州政府副主席。谭出身于中国宫廷文人阶层，他的父亲是御派两广（广西、广东）总督。谭延闿本人在清代曾考中进士学位；他是所谓翰林院翰林。帝制时代的尚书、巡抚和督军只能从翰林中任命。1909年，当即将灭亡的清王朝苟延残喘，在进行短促的改革并公布了联省自治法时^①，谭延闿当了由大地主和绅士组成的湖南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时期，他投靠孙中山，1912年被任命为湖南省督军。1916年和1920年连任这个职务。1926年，湖南大地主谭延闿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武汉政府内起了明显的作用。

外交部长是叶夫根尼·陈（陈友仁），他生在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在英国学习法律，不懂中文。辛亥革命后，陈友仁成了唐绍仪内阁交通总长的顾问，创办了《京报》并兼任编辑。他是孙中山的信徒，执行了他的一系列外交使命。孙中山死后，陈友仁在政治生活中没有起什么大的作用，因为他不懂中文。

^① 原文如此。——译者。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宋庆龄的胞弟，在美国受过教育。他代表了当时美国化的中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最新势力。

交通部长孙科，受的同样是美国教育。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者。他有一付美国商人派头，把政治看作个人发财致富的源泉。这三个“洋人”之中叶夫根尼·陈是最彻底的民主派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

司法部长徐谦(乔治·徐谦)，被认为是最左最急进的国民党员。他出身江西绅士家庭，是县令的儿子。徐谦早在清代就是翰林院翰林，在北京屡次被皇帝委以高位，革命前他还当过户部侍郎。革命前的变法时期，他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列，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1918年在广州和孙中山共事。1919年乔治·徐谦是凡尔赛和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后，他离开孙中山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在此，他接近了冯玉祥将军。他和冯玉祥一样，也是基督教徒。甚至还有主教的教阶^①。在广州和武汉，谁都不注意他急进的演讲，徐谦仅仅被认为是盘踞在中国北方反对吴佩孚的冯玉祥将军的代表。在由广州到武汉的途中，我与这个看样子还年轻的老头子和他的逗人喜爱的小女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武汉我还继续和他见面。就凭这一点，英国侦察机关就足以把我想象为莫斯科的“检察长”。

参加武汉政府的还有邓演达。关于他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了。他是一个左派，一个倾向革命的国民党人。中国的民族知识分子认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他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

武汉政府里还有一个骗子、一个蝇营狗苟的政治冒险家，这就是1919年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学生小组，1920年和六个无政府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主义者一起成立了广州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那个陈公博。我在本书上卷已经交代过这些人的情况。到1922年，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除了谭平山外，都由于支持陈炯明反革命叛乱被开除出党。军阀陈炯明出钱派陈公博到美国留学。他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在武汉政府中充当蒋介石的特务。

这个政府名义上全由汪精卫领导，但是，我在武汉期间，他还没来。顺便提一句，这个“左派”后来成了露骨的反革命代表人物之一。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奸细、密探和各种各样的骗子钻进革命队伍里，在俄国也是这样。此外，有不少由于所谓“青年时期的错误”而参加革命运动的人。而且，总是会有一些同路人在一定阶段脱离革命，这些情况在中国也有。但是，在那里的各种人物中间碰到了完全是另一类型的政治活动家。这些人不是警察局的密探，不是同路人，而是没有任何坚定信念、毫无原则的人。他们总是言不由衷，言行不一。在当时的情况下，什么对他们有利，他们就毫不费力大肆加以谈论。在莫斯科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所发表的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的演说，他并保证说，他的党支持蒙古独立。这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共产党人”陈公博支持的是公开的反革命和英帝国主义的走卒军阀陈炯明。蒋介石发誓忠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蒋介石的儿子在莫斯科宣布和自己的父亲脱离关系，并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回国后，仍然成了他父亲在台湾的秘密警察头子。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却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而结束了其政治生涯。朝秦暮楚，所有这些被认为是当然的、正常的，特别是在有权可抓的时候。

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所有政治家都是如此。我曾与之共事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无限忠于共产主义、具有深刻

思想的人。但是，同时不能忽视这些特殊类型的无原则的野心家，落后的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贪官污吏”。资产阶级如此软弱，它不能把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不能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革命首先是农民革命。而工人阶级大多数是由手工业者组成，他们昨天还与老板们处在同一个行会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在90%是农民的社会里，仍是十分弱小的阶层，就在这样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出现了我所讲的无原则的政治家，中国式的马基阿维利^①。

^① 马基阿维利是十五世纪末意大利思想家，他主张以权术和霸道建立独裁统治。——译者

二十九、武汉的无产阶级

从1923年起到1926年底，也就是国民革命军占领湖北之前，武汉工人运动一直受到警察的残酷迫害。尽管如此，工会仍然秘密存在，并且积累了足够的组织经验和政治经验。

1926年10月初，国民革命军到了武汉。从这时起，全湖北省的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在前三个月短短的时间里，武汉就组织了二百六十九个工会，吸收了二十万会员，是将近二十五万工人中的绝大多数。在武汉三镇，工人运动和广州一样是分散的，这是由于本身的特殊原因造成的。

工人运动之所以分散，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业区分散以及本地政治地理的特殊情况。汉口的外国租界和华人区都各有自己的工会。汉阳、武昌和武汉城外都有单独的工会。武汉地区的许多工厂座落在沿长江而下的三湖地区的数十公里之内。

武汉工人与广州工人的区别在于，武汉工人有将近一半是现代产业工人，另一半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是按行业特点组织起来的，是在小作坊和不大的手工业工场工作的手工业无产阶级。但是，武汉的行会却与产业工人的组织并存，后者在当地居优势。

1926年12月，汉口有一百零六个行会。华人区有六千五百名会员的人力车夫行会，外国租界的七千名人力车夫单独组织了一个行会。当然，人力车夫行会并不是这个地区所特有的。这里最强大的工会组织是1922年已组织起来的纺织工人工会（其中

一个工会有九千会员，另一个有四千会员，还有一个有二千会员，每一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工会)。烟草厂的工会联合了二千五百人，车辆厂工会有二千二百会员。当时武昌共有十二个工会。

武汉城外有二十三个工会在活动，其中有英美烟草厂约一千一百人的工会。这里的工会也是以单个工厂为基础建立的，有的工会将近三千会员。汉阳有三十三个联合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汉阳机器制造厂工会（二千名会员）和有二千五百会员的兵工厂工会。汉阳是冶金工人占优势。

武汉近郊有十二个工会在活动，它们也是以单个工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可见，这里工人组织的分散，并非因为它们和广州的情况一样，由行会发展而来，而因为它们是在罢工过程中，在单独的工厂建立的。武汉的工会委员会实际是工厂委员会。

领导工会全部活动的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的路线，是按生产原则联合各组织。已经建立的有机器工会、五金工会、码头工会等等。总工会还实行区域大联合，把个别企业的工会变为武汉全市的工会。在1926年12月，已经有二十三个全市性的工会。它们按生产特点把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武汉火柴业总工会和武汉纺织业总工会就是例子。三个月内，总工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工业工人占主导地位是这个工作成功的原因。况且，武汉的工会还分两种类型：大工业工人工会和手工业工人工会。但不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工会，其章程的第一条都是：“本会的宗旨是加强工人之间同志式的团结，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提高工人阶级的作用。建立本工会旨在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共同斗争。”^①

^① 未查证原文。——译者

和广州不同，武汉工人组织更强调自己的政治性质。在关于工会运动的原则一类文件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规定：“工会是联合工人的组织，同时是工人阶级的学校。工会应当对会员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具有较高的觉悟，并吸收他们参加革命工作。”^①实际上，武汉工会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活动。工会都设立了宣传部，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湖北省总工会甚至组成了专门的情报处，向工人报刊提供时事情报。

总工会在武汉郊外建立了一所工人学校。一开始就有四百人入学，不仅有工人，而且有工人子女。鉴于报名者很多，只好在两个工厂内又建立了两所这样的学校。此外，还有培养工会工作人员的一所专门学校，12月已经开学，校内举办工人运动问题讲座。教学大纲中包括罢工策略，工会技术工作等科目，讲授中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俄国革命史。

除这些学校外，湖北省总工会建立了下级军官培训班。这是一些短训班，学生在校期间除经常学习政治常识以外，还有专门的军事教育。

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罢工就立即开始了，武汉工会在罢工过程中成长起来了。罢工是由于实际工资急剧下降引起的。

当时武汉最低工资是九百铜子，月薪约二元，手工业工人和职员月薪八元，工厂工人月薪十五——二十五元，而最熟练的工人月薪名义上是五十一元。但是，由于最近八年三次物价飞涨，工薪实际上贬值三分之一。难怪商会以大批解雇工人相威胁时，总工会向商会声明说：如果资产阶级希望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继续存在，那么它应该懂得，统一战线自然应当有工人

^① 未查证原文。——译者。

参加。工资这样低，工人连性命都保不住，所以就不能参加统一战线。因此，工人参加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是改善其经济地位。

资产阶级对维护统一战线问题不太感兴趣，他们唯利是图。同盟歇业成了对付要求提高工资的工人常用的方法。中国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都不象武汉的资产阶级如此广泛地使用这个武器，这就使阶级斗争更加激化了。同盟歇业造成了统一战线的裂隙。

武汉大资产阶级不仅仅用关闭工厂来对付劳动人民，还对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对付工人阶级。同时，大资产阶级把资金往外国银行转移，逃进上海的外国租界。当国民革命政府到达武汉的时候，财政部长宋子文指望向资产阶级借债，他断定几乎无人可找，因为资产阶级最大的代表把钱转存到外国银行后，都逃到上海去了。这就迫使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向工人发出停止武汉罢工运动的号召，马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并号召资产阶级返回武汉。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记者同部长们的谈话：解释政府的经济政策，说明政府不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宋子文发表声明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是工业的创造者，并因此不允许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任何磨擦。

蒋介石向武汉工人发表了宣言，开头的的话是：“中国国民党是个代表全民利益的党”^①，如果说在对资产阶级的讲话中，蒋介石声称，国民党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那么在对工人的宣言中，这几行字则被下面一句话代替了：“本党对于武汉工友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尤其关切。”^②

①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1日。——译者

在向工人发表的宣言中，对于工人运动没有跟随国民党这一点表示遗憾，并包含着威胁：“工人若不受本党的指挥自由行动，结果是被敌方各个击破，一切希望都归失败。”^①这个威胁的含义十分清楚：既然工会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工人不服从国民党，就必将招致共产党的垮台（即“统一战线就会垮掉”）。蒋介石继续说：“工友们应该知道，知道自身除为阶级利益而奋斗外，同时是国民革命的战员……，在这个重要意义下，工友们非但不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之内，急谋谅解……在奋斗的过程中，必须在本党之下，受本党的指挥。”^②

武汉工人从1922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在与反动派的较量中和共产党同甘共苦，工人并不准备用自己同共产党的血肉联系去换取蒋介石的诺言。他们继续斗争。在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存在的前两个半月之内，即1927年1月之前，工会进行了一百六十次罢工，有将近二十万人参加。工人工资大大提高了（月薪由三元长到八元）。虽然某些行业的工资增长达26%，但仍然少于最低生活费。武汉工人在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不大，只不过是罢工前日工作十七个小时的人争取到工作十三个小时；日工作十六个小时的争取到十二个小时。

在农村展开了农民运动。某些地方已在初步尝试分配土地。湖南、湖北的大地主逃到武汉，与武汉资产阶级勾结起来了。

人民大众发动起来了。工人们认为，国民革命不断取胜，他们的生活也应当得到改善。因此，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农民要求摆脱高利贷的盘剥。阶级力量正在重新配置。

在1926年12月，资产阶级还没有失去希望，它在国民革命

^{①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1日。——译者

军许多军官中，看到了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老朋友。资产阶级决定向他们呼吁。例如，当一个纺织厂爆发了罢工时，这个厂的厂主争取让军队包围了工厂，并封锁了罢工工人，不让他们出入，也不许把妻子儿女带来的食品转交给他们。

军队和工人之间发生了不少起武装冲突。甚至在国民革命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的那个有重大意义的日子里，开完群众大会以后，士兵和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之间就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大会结束后，人们散去了，只剩下工人纠察队，士兵们闯入广场。他们和纠察队员争吵起来，并企图破坏挂有革命口号的、刚刚还曾有政府委员演说的讲台。纠察队不许他们这样专横拔扈，于是，士兵打死了几个工人。

武汉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忽视国民党许多部队的性质已发生的变化。他们看见，到1926年底，这些军队的大多数头目是由投靠蒋介石的军阀们担任的。对此，他们没有等闲视之。这就是为什么不是在1926年12月，也不是在1927年5月，而早在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解放武昌的那一天，当时已经成立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就发表了宣言，申明：“我们支持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是认为它能捍卫人民的利益。但是，如果政府和军队不捍卫人民的利益和自由，我们决不支持它。我们要求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利益。”^①

这样，随着革命的扩大和深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尖锐化了。

^① 未查到原文。——译者

三十、革命中的农民

我们走的是广东和江西的大路。当然不能不注意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中国没有任何全国性的统计资料，谁也回答不出，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多少。当时写的和说的一般都是四亿人口，但是中国没有进行过任何人口统计，故所用数字仅仅是推测而已。很明显，这是个农民国家。但是，同时在中国又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古老城市。没有关于城市、贸易、手工业、机器工业、商人、工人等情况的任何统计材料。尤其缺乏关于国家土地关系总的资料和分省资料。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判断，是根据对个别乡村和县的抽查材料。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已经引证了我们所走过的那些县的土地关系的资料。总的说，农村矛盾是很尖锐的。在某些地方，大多数农民是小佃农，各种地租形式在这里都有所表现：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压迫农民的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兼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个大地主是谁，他何时从何地来到这块典型的平均主义的农民革命的地区，——这个问题很复杂。农村的官吏压迫农民，军阀们掠夺农民，课以名目繁多的捐税，预征许多年的税。例如在江西省，除规定的七种税外，又添了十种。山东省税收增加到五十多种。1926年湖南已经预征到1929年的税。山西预征到1931年，四川预征到1933年。有的地区巧立名目，甚至预征了十六年的税。

由于军阀混战和对农民的掠夺，作为中国农业基础的古老的人工排灌系统荒废了，有的地方简直不能再利用。因此，自然灾害——水灾和旱灾越来越多，许多省饿殍遍野。此外，农村人口大量过剩。所有这些情况都使亿万中国农民陷于赤贫和半赤贫状态，他们只靠极小块土地，勉强糊口。

无土地、高租金、苛捐杂税等等是中国发生农民运动的原因。在得到军队支持的地方，农民运动发展特别快。就如城市保存了封建行会和手工作坊一样，农村有一些古老的半宗教的秘密组织如“红枪会”、“黑枪会”、“硬肚会”、“土地会”等等也在继续复活发展。

以前，这类秘密组织有许多是在财主、绅士、地主甚至军阀的控制之下。1925—1927年间，有一些这样的会道门重新具有了革命性。就在不久前，不仅仅河南、山东、直隶有这种旧式的农民组织，连中国南部也有。可是，在广东，这类组织现在已变成了农会。

半宗教的农民组织成份复杂。有些是真正革命的，还有一些则变成了反革命的工具。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地主和绅士为了掌握农民，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利用现存的宗族关系，农民的迷信和愚昧无知，更主要的是用债务束缚他们。

随着农村内部矛盾尖锐化，昔日半宗教性的农民组织形式开始消失，特别是在1926—1927年间。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地方新的革命联合组织——农会，这些组织的大多数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建立的。

在广东驱逐陈炯明反革命势力和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组织“纸老虎”匪帮的过程中，农会起了很大作用。在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组织工作中，农会起了更大的作用。

早在1925年5月1日，广东农会就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当时，仅广东一省的农会就联合了六十万会员。其他省份农会数量的增长与革命军北上有直接联系。

从农会会员数量来说，湖南省居各省之首位。湖南农村阶级矛盾表现特别尖锐。

湖南省的耕地分为山地和平原两类。平原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他们有时占地达几千亩。例如，率领军队占领了武汉的军阀唐生智，他一个人就占有几千亩土地，每年收地租五千担稻米。除了这些大地主外，还有大量占有三百到五百亩地的土地所有者阶层，他们几乎掌握着湖南全部可耕土地。这里的自耕农占五亩到十亩土地。这个数量的土地是最典型的农民经济。当然，这里的农民中也有占五十亩到一百亩或更多一些土地的中农和富农。

山区的情况与平原区别不大，山区的土地也不在农民手里，但是平均地租稍低于平原地区。

通常，湖南占有十——十五亩土地的农民也使用雇工。所以，湖南和其他省的另一个区别是，除了占农民大多数的大量无地的佃农外，还有很多雇农。

对湖南省许多县份农民状况的调查提供了以下结果，后来刊登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通讯》上（全部农业人口的百分比）：

县名	雇农	佃农	半自耕农	自耕农
保靖	20	35	25	20
平江	10	40	30	20
长沙	25	45	13	17
常德	20	28	22	30
耒阳	15	40	31	14
麻阳	10	35	28	27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因此被迫向大地主租地；或者只有很少土地，为了养家糊口，必须再租种一些土地。地租很高，并且不交付货币，而主要交纳农副产品实物。通常的租金占收成的50%—60%，甚至高达70%—75%。因为租种的土地平均都不超过十——十五亩，有时是二十亩，那么佃农向土地所有者交出收成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之后，所剩的粮食已经不能果腹。

自耕农的生活条件稍好一些。年景好时，他们可以勉强过得去。年景不好，遇上天灾，如水旱灾害或军阀混战时，农民就落到农村高利贷的控制之下，此后，便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在湖南、湖北的农村，放债的月息是五——十厘，或者是年息60%—120%。月息通常是30%，或年息360%。这里的农民迅速破产，湖南变成了向全中国提供苦力的地方。

湖南苦力同各省当地的苦力抢活干。在广东、江西都可以看见湖南苦力。全国各城市都有。

国民革命军占领湖南后，革命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革命军北伐的巨大意义在湖南表现得最为明显。国民革命军的到达、共产党的鼓动工作、改善生活的希望鼓舞了农民群众，并引导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某些县的农民夺取了政权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认为这里的农民运动仅仅开始于国民革命军到达之后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农民运动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但采取的是另外的形式。湖南还保留着氏族制度的痕迹，农村公社的残余。氏族和村社组织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了农民。此外，这里还存在传统的半宗教性质的农民组织，它们为反对绅士和军阀们的暴行而斗争。湖南的另一特点是，因为农村贫困，出现了许多土匪，只有在赤贫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土匪。

在农民秘密组织直接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占领了这个省。为了进攻湖南省会长沙，首先必须掌握防卫牢固的平江要塞。这样，敌人就没有任何一个据点赖以支撑。因此，国民革命军第一个决定性的战役，就是占领了平江。为了这个目的，集中了三个军的兵力。尽管如此，若没有当地农民组织的帮助，就占领不了平江。有过这样的情况，单靠农民的力量就把一支支军阀队伍全部解除了武装。国民革命军进入长沙的时候，起义的农民俘虏了反动军队的官兵，缴了他们的械，并帮助国民党军队占领城市。

农民组织在国民革命军军事战役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农民组织一边打击敌人并解除其武装，同时就夺取军事装备来武装了自己。这一点有重大意义。

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人员使用了各种手段阻止农民武装起来。他们企图没收农民夺得的武器，并为达此目的，火烧了许多村庄。但是，对任何军队都持批判态度的湖南农民，没有交出武器。这一点，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1926年8月，湖南省南部已经有九十多个农会，会员总数达三万七千人。到12月份，农会数量已经不再按个别村庄的组织计算，而是按县的联合组织计算了。到了这个时期，已有五十四个县级组织，计一百二十多万会员。到1927年2月，农会会员总数超过了二百万。湖南和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会员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一家一户，这个情况应当考虑在内。

农民的要求有两类：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经济要求主要是减租减息。有一个情况很典型，1926年12月湖南起义的农民只要求恢复1916年前例行的租地条件（1916年水灾后，地租超过了收成的50%），另一个要求是反对高利贷：农民取得的成果是利息减少了一半。

农会的政治斗争，是解散民团和要求建立“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1927年1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刊登了关于当时农民运动性质的饶有兴味的材料：“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可以说都还是非常幼稚。县长民选口号农民固然没有感到，就是乡村的政治要求，也还只有消极的；至于反动派所造的‘没收土地’、‘组织工农政府’之类的谣言，更是连影子也没有”。因此，几百年来被压迫的湖南农民所提出的仅仅是最低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状况的要求。

大地主和绅士们对这些最低的要求的回答，是用武力镇压农会。许多县里，当地地主和绅士领导的民团驱散了农会的集会，殴打积极分子并企图根本取缔农会组织。事情一直闹到了这种地步：大地主和土豪劣绅把队伍开到一个县城，捣毁了当地的农会会部。

农会开始建立自卫队来对付这种情况。湖南农民过去缴获来的和击败反动军队时得到的武器，这个时候倒是都用上了。农民自卫队不是凭空建立的。为了和吴佩孚斗争而建立的“挨户团”武装队在农会组织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它们变成了农民的自卫队。

“挨户团”组织没有步枪，只有旧式兵器，如斧、刀一类。自卫队则有枪有炮，是从吴佩孚军队手里夺过来的。

农村的武装斗争开始了。农民刚一组织农会，大地主和豪绅马上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保产会”、“保产党”，还有连名称都与俄国反革命组织“白卫军”近似的“白化党”。

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使用了各种手段瓦解农民革命队伍。他们企图利用原有宗族关系从内部瓦解农会，即加入农会以窃取领导权，制造流言蜚语，说革命军连吃败仗，吴佩孚就要回来了，他一定会惩处农会会员。

为了挑起农民和国民党政府的冲突，土豪劣绅和财主们挑拨农民破坏税务局和其他国家机关。但是，这些挑拨绝非处处奏效。

1927年2月，受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影响，农民要求的性质改变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提到了首位，夺权斗争开始了。在中国，湖南成了农会控制大多数县份的第一个省。夺取政权后，某些地方着手分大地主的土地。中国的农民革命就这样发展起来。

据领导过农民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讲述，在农民掌握政权的地方，建立了铁的秩序，完全制止了土匪活动和抢劫行为，农民甚至夜不闭户。

大地主和豪绅在同农会的斗争中失败了，他们于是逃到城里，逃到上海、天津的外国租界去了。

我已经说过，对中国许多农村土地关系的调查已证明，除了土豪劣绅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农村的大地主。的确很难说，是什么把资产阶级推进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营垒：是工会和罢工运动；还是农会、减租减息及夺取大地主土地的威胁。这两个过程同时影响了资产阶级。

三十一、革命危机

现在，我要追溯到我们从广州到汉口时那些难忘的日子。至今，我眼前仍浮现着那些接连不断的人民集会、旗帜、标语、革命口号、工人代表团和农民会议。千百万人觉醒起来，发动起来了：工人、农民、大学生和货架上全部商品只值十至十五元的小商人。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投入运动，他们为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的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不仅是国民党，而且共产党人也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政策。群众来到广场上，不只是为了欢迎国民革命军，同时还为了申述自己的穷困，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这是真正的革命，它和辛亥革命有许多区别，那时还没有工人纠察队，没有革命的农会，而主要的，是中国没有与苏联为伍，中国也没有共产党。

群众在1919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领土的时候，已经发动起来了。两年之后，他们又奋起反对来自香港的侵略。随后，又因上海、广州、澳门外国租界里中国工人被杀，群众义愤填膺，便行动起来了。经常发生罢工，但多半是在外国企业里。那是1919—1925年持续七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在反帝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打出的旗号还有反对封建反动势力、反对割据和削弱中国的军阀。但是，在这个阶段，不同派系的军阀仍然把持着国家。孙中山打算依赖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从而消灭他们，但他并没有成功。对于群众来说，主要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运动

的倡导者是大学生，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是在反帝斗争的这个阶段里建立的。

在1926年北伐时期，革命运动发展到最大的规模。但运动已经不仅局限于反帝斗争了。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社会斗争也展开了。我们走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确实感到，是社会解放问题发动了人民群众。1919—1925年间，运动主要在大城市展开，参加街巷游行的多数是学生。现在，运动席卷了几千个城镇，几万个农村，广场上满是工人、农民。在国民革命军解放的省份里，各阶级参加的战斗破坏了国民革命运动中孙中山时期第一阶段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团结。罢工运动不断扩大，农会不断发展，先是要求减租减息，随之则要求平分土地。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航船，开始时而向这边、时而向那边倾斜，它勉强支撑着，到后来几乎就要沉没了。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离开了革命。随着革命的深入，阶级力量就重新进行了配置——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法律都开始生效了。

从广州往汉口转移的过程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各种力量重新配置的情况。当然，我们彼此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谈论也不少。一般说来，所有的人，鲍罗廷也好，维经斯基也好，拉菲斯也好，都坚持认为，必须维护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持这种态度。但是，现在孙中山去世了。他在晚年曾希望他建立的国民党成为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力量。然而，他死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和加剧，右派势力——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勾结起来了。在国民党内有巨大影响的是竞相争夺领导权的军阀。

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保持住国共的联合呢？有两条路可达此目的：支持只是在国民党宣传机关有力量的国民党左翼，或者制止罢工斗争和限制农会的斗争。预料后一点应当使国民

党右派放心。总的说来，这个策略是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自我克制”，为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制定的。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自我克制”意味着收缩或者甚至停止罢工及夺取大地主土地的斗争，以便不致把“资产阶级和地主吓得退出革命”。

但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制止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为减租减息及分配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已经不可能了。阻止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以及从而阻止国民党右派转入反革命阵营也已经不可能了。

革命危机开始了。到1927年初，阶级力量的重新配置已经发展到很深的地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了。依赖于大中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国民党军阀的国民党右派已经相当强大，现实的问题已不再是共产党人是否退出国民党，而是共产党被赶出国民党、共产党转到秘密状态和武装反抗新反革命的问题了。1926年3月就已开始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要求共产党人交出跨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刚刚开始北伐曾一度从议事日程中取消了这个问题。现在，在取得了军事胜利、人民群众运动高涨及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下，它又重新成为迫切问题了。

我们到汉口不久，就得悉在我们旅行期间所发生的情况。

北伐开始和蒋介石到前线以后，广州的军事防卫委托给了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完全清楚，蒋介石离开广州时，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人”。

李济深的经历值得在这里交待一下。众所周知，1925年3月杀害廖仲恺的是粤军第一师师长、军阀梁鸿楷，而李济深是他的参谋长。廖仲恺被杀害后，凶手虽然没被处决，但是免了职并被监禁起来。师参谋长成了师长，并被派往广西进行“国

民革命”。李济深是广西省最富有的大地主，他和本省其他的大地主关系密切。

李济深率师到达广西后，与反对广西省督军(军事总督)的军阀联合起来，推翻了广西督军，让另外一个“友好的”军阀充任此职。广西的“国民革命”就这样实现了。此后，李济深凯旋返穗，并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现在，在蒋介石去前线后，为了维持“革命秩序”留他在广州。和他一起防守广州市和广东省的是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11月16日国民政府向北方开拔。12月初，当政府委员与蒋介石在南昌会晤，然后在牯岭开会时，李济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首先驱散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握的广州警察局，任命了新的局长，这个局长“清洗了”警察局中的左派分子。接着又采取了另一个行动，用军队包围并查封了由左派担任领导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此后，便开始进攻工人组织。首先是兵工厂停止供应工人纠察队军火，然后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起初，还没有完全解除。颁布了新法令，它赋予当局以武力镇压罢工的权力。根据新法令，在当局认为属于国家军事要害的企业里，严禁罢工。公布了这类企业的清单。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工厂随时都可以被宣布为军需工厂。因此，军事当局可随时要求停止罢工，如果工人拒绝这个要求，则以武力弹压之。

按照新法律，严禁工人携带武器。不服从者被监禁。禁止查封商品，因为在企业主不肯向罢工的工人让步的时候，通常要使用查封商品的办法。

同时，警察也开始反对香港罢工工人的斗争。当省港大罢工发生时，工人离开了香港，回到广州。政府向他们提供了住处，即原属于同“纸老虎”叛乱有关系并逃出广州的那些资产

阶级的房产。而新的警察局长是买办的走狗，广州反革命资产阶级马上就利用这个时机，他们向警察局长提出了对工人的起诉书，要求工人或者交付其现占住所的房费，或者从那里滚开。报纸上刊登了记者和警察局长会谈的纪要。局长声称，他认为广州资产阶级的要求完全合理。然后，他开始逐步把香港罢工工人，这些反帝斗争的英雄们，驱赶到街头。

工人开始骚动，要求向每个香港罢工工人支付原已答应的一百元钱。工人封锁香港达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未曾领到工资。我们在关于广州商人那一章已经说过，资产阶级搜罗的那点钱，刚刚够用一个月。1926年10月，当取消对香港的封锁时，政府将所有商品都课以捐税，想用税收中得到的那笔钱支付给每个罢工者一百元。工人被骗了。政府迁往武汉之前欠每人一百元，现在只给每人十元。于是，当工人要求其余九十元时，新的当局没有发给钱，而用枪来对付他们。香港罢工工人被武力赶出现住所。

同时，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更加疯狂。他是广东番禺县人，过去是土匪头子，绰号“灯罩”（一次他闯入某家抢劫，因没有武器，顺手抄起一个熏黑了的灯罩相威胁，灯罩活象大手枪的枪口，结果袭击成功了，房子被洗劫一空。李福林于是得到了“灯罩”这个绰号）。这还是辛亥革命前的事。从那时起又经历了许多血雨腥风，李福林成了大地主。1924年，他甚至当了几天广东省省长。整个第五军都是由李福林一类的土匪组成的。

迁都北方后，李福林疯狂袭击农会，以武力捣毁了农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在12月份写道：农会四面受敌。

在这种局势下，广东省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了。代表们选自右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进了党部，他现在不仅代

表国民党，而且代表军方开始活动。

国民党新党部对工会执行了既定的政策。前已指出，广州存在着革命派的工会和“黄色”工会，其中有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现在李济深把革命工会缴了械，而武装了“黄色”工会。

1927年1月3日，人民群众占领汉口英租界后，李济深设宴招待广州的外国领事，以此强调，他与反帝活动毫无共同之处。

1927年2月以前，所有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甚至伴以革命的词句，因为当时李济深注视着正和武汉政府谈判的蒋介石。但是，广州工人没有受骗。

1927年2月，工人与军警公开的巷战开始了。第一次战斗发生在香港罢工工人被逐出住所之后的2月2日。真刀真枪，打得十分激烈，周围的店铺都关了门。战斗中不仅有伤亡，而且双方都有被俘人员。只是因为工人俘虏了警察，工人才得以解救被警察俘虏的自己的同志。

这次战斗还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和当局就又开始进攻工人组织。因为工人在罢工期间获胜，广州资产阶级就决定进行报复。广州无产阶级取得的成果是，雇用和解雇工人务须经工会同意，同时向被解雇工人付一定补偿费。现在，当反革命控制着城市的时候，资产阶级利用中国的新年这个机会，向革命工人进行了报复。按照老行会的风俗，主人在过年时辞退他认为不需要的职工，另雇新工人。雇用时谈定，只有到下一个新年才能辞退。现在，广州资产阶级要求遵守行会的老规矩。雇主们说：“好！我们这一年就听工会的吧！但是，你们不应该剥夺我们几百年就有的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过年时解雇和雇用工人的权力。”工人拒绝这个要求，并以罢工回敬之。于是，

1927年2月20日，资产阶级组织了二万二千个企业主的示威游行，他们找到地方当局，直到国民党声明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他们时，游行才散去。

企业主得逞了。于是，资产阶级解雇了所有革命者和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把他们赶到街上，雇用了一些工贼。这一切又引起了新的罢工浪潮。工人纠察队在厂房上挂出了标语，上面写着：本厂歇业，或者是此处罢工。当局命令军警赶走纠察队和撤掉罢工者的标语。罢工遭到了武装镇压，资产阶级得逞了。城里大肆逮捕工人。这场戏的第一幕演完了。

广东的这种情况，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其他省份也开始出现。这里说的不是“地方事件”，因为一切都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办的。这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危机。关于国民党本身的命运问题也越来越公开了。阶级力量的改组是否将先引起这个党左派的联合，尔后引起该党本身的分裂呢？

我并不是在研究中国革命史及分析其胜败。我仅仅在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和想法。

只是到了中国，我才了解到1926年3月20日广州事件的详情。最初杀害廖仲恺和后来排除汪精卫，已经表现出了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社会关系不成熟，采用的是中世纪的斗争方式：暗杀、阴谋和军事政变。但是后者是有明确社会目的的。这样一来，就脱离了1924年1月他们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新三民主义，走到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相接近的方面去了。这一点没引起我们之中任何人的怀疑。就是在由广州去汉口的途中，我和鲍罗廷就这方面的问题也谈了许多。

但是，3月20日之后局势的特殊性在于，蒋介石还没准备破釜沉舟，而共产党也没有准备回击蒋介石并急剧改变自己的

策略。由于这个原因，国民党的新领导与共产党妥协了。妥协对于蒋介石来说，意味着反革命政变延期，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是赢得时间开展工农运动。但是，从3月20日事件中并没有得出正确结论。北伐开始及初战告捷后，便以为事件“完结”了。北伐引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工农运动扩大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数量增加了——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蒋介石“忽然”留在南昌，而政府迁到了武昌。发生了新的事件并开始寻找新的妥协。一些人在谋求同蒋介石的协定，另一些人想依赖军阀唐生智对抗蒋介石，而忘记现在冲突的根本原因已经改变。3月20日事件，这还是国民党内部和政府内的倾轧，而现在的冲突是由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内阶级矛盾尖锐化所引起的。

1926年12月在汉口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布留赫尔谈论过时局。布留赫尔过去是工人，从1916年起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是天才的战略家和内战时期的英雄，他实际上领导了中国北伐时期的战役。

在同布留赫尔谈话时，我为他对各种事件明确的阶级观点、对蒋介石的正确估计、对其种种意图的了解而甚感惊奇。总之，他没有错看蒋介石。

布留赫尔对我说：“占领长沙及继续北进之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打先锋的是国民革命军最革命的部队，是共产党员多的部队。正是他们占领了武昌，正是这些部队在战斗中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占领长沙后，我建议把蒋介石本人的部队安排去打先锋，以保存最革命的力量和搞乱反动派的力量。但是，没允许我这样做。”

我问布留赫尔，是谁不允许，他回避回答这个问题。

顺便说一点后来的情况。两个政治中心——南昌和武汉

——的形成是以所谓的分裂和武汉政府（形式上有两个共产党员苏兆征和谭平山参加）的建立而告结束的。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在旅途中谈及的国民党的分裂。这是对分裂的讽刺，这是一个傀儡的建立，而不是真正革命政权的诞生。

别人向我介绍张国焘回忆录的第一卷时，我已经快写完这本书了。我和张于1921年在伊尔库茨克相识，曾一起出席了1922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里我们在广州经常见面。

1922年5月，我们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持对立的观点。他反对加入国民党。此外，他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所以根本不应当与之保持任何关系。他当时持有宗派主义的左倾立场。现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他始终认为需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只是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孙中山完成了转变，愿意接近人民群众并改变了三民主义内容时，张国焘才改变了观点。当时，他超过了合作的立场，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下半年，我已经从上海回国后，我们得到消息，在北京吴佩孚下令逮捕了张国焘，军事法庭判处他十二年徒刑。应该说，甚至在1922年，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也没有改变对张国焘的友好态度。他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几乎是唯一完全献身于中国工人运动以及在中国组织革命工会的共产党人。在我们得到张国焘被捕并被判重刑的消息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小册子《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已经排版完毕了。为了表示我同张国焘团结一致，我决定把这本小册子献给他。后来才知道，并没有任何军事法庭，他仅仅坐了五个月牢，在北京政权的经常更迭时被释放了。

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卷和我这本书讲的是同一时期，我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他的回忆录。他写了许多事件，例如，关于1921年的伊尔库茨克、关于舒米亚茨基、关于1921年俄国的饥饿，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等。这些事件和其他许多情况同他在那些年代所说、所想的并不一致。他的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是应美国发行人的需要而写的。不过，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特别是1926年前的那段时期的材料，如果纠正了一切回忆录所固有的主观主义，那么，总的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可是，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关于我的情况，却并不符合事实^①。

我们当然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目击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思索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大家都明确，1926—1927年革命，就其本身性质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它是1776—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②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简单重复。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中，完全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中国革命应导致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及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扫除所有障碍。很自然，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我们看到了中国1925—1927年革命的雏型。因为1905年俄国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进行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必须取得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达到的东西：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民主制度。俄国无产阶级应当担负起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因此，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

①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ume one of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oo.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21—1927) 张国焘自传》第一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616—617页。

② 应为1775—1783年。——译者

程中，产生了列宁论述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问题。

我们那时都认为，中国1925—1927年革命，就其性质来说，也应当接近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尤其因为它是在比1905年革命更有利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的。这时国际局势的特点，是俄国十月革命已经胜利，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毗邻中国。我也持这个观点。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宣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学说是托洛茨基主义，并据此把我和其他同志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

应当指出，当时不仅是共产国际，而且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主张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现在，张国焘断言，与此相反，他在1926—1927年就认为需要召开国民会议，即蒋介石在其宣言中答应召开的那个会议。

三十二、过去和现在

我在汉口的事已经办完了。开始准备离去。回莫斯科还要再次经过由于战事失利而丧失理智的孙传芳控制下的上海。1926年10月23日，上海工人试图不等国民革命军部队开来就发动起义。这一尝试并未取胜。这时上海白色恐怖猖獗。必须预先采取一些特别措施，更何况上海已签发了逮捕我的拘票。我决定乘12月30日从汉口启航的日本轮船。我改名换姓，定制了名片。响第二遍汽笛即将开船时，我才上船。我的新名片嵌在我所在的舱门上一个专门的小框子里。我等着开船的第三遍汽笛。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打扮的中国人，但他用英语问我是不是达林。我把他带到门口，让他看了看钉在门上的名片。很清楚，虽然预先采取了措施，关于我离去的消息，还是被人知道了。我的情绪很坏。第三遍汽笛声响了，轮船开动了。

我在这条日本船上迎来了1927年元旦。在一等舱里，除我以外，仅有几个日本人携带妻子同行。我们一起过了新年。几位日本妇女对我极为关照，我很感动，但我无心理睬她们。我心里忐忑不安，那个叫我真名字的中国人一直在我的脑际。

1月初，轮船开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码头。我注意到有大批印度籍的英国巡捕上了轮船的舷梯。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过。在舷梯的斜坡旁聚集了二等和三等舱的乘客，可暂时未与放行。我走到一个巡捕面前，说了声：“请”，求他允许我上岸。巡捕想

了想，多半以为我是个什么重要的文职官员，便给我行了个礼，提起我的皮箱，在人群中开了一条路，领着我沿舷梯上了岸，安排我坐上汽车，就向我行礼告辞了。

我又到了上海。这时它已是中国反动派的堡垒，但还未投到蒋介石方面去。

孙传芳的军队已经瓦解，正在外撤。司令部没有了军队，将领们纷纷倒向蒋介石。

他并未费什么气力就占领了上海，因为孙传芳的舰队早已被收买了，而那个1927年2月在大街上砍杀起义者的极端反动的将领李宝章（孙传芳的走卒）已经与蒋介石勾结起来了，口袋里藏着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密令。

蒋介石怕的不是孙传芳或他的后继人张宗昌的军队，而是帝国主义列强驻扎在上海的军队。为了占领上海，他必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大胆地开近上海，那就说明总司令已经同列强搞好了关系。

就在那时，上海工人还相信国民党，工人们正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力求加速民族解放反帝革命的胜利。1927年的头三个月里，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两次起义。

第一次起义是反对孙传芳的，爆发在2月。工人们退却了，但上海的无产阶级却没有停止斗争。1927年3月又发生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结束，张宗昌失败了，政权转移到工人手中。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离去以后，我现在写这些情况，只是因为不能中断我的记述，应当把我离开中国后发生的事件按日期衔接起来。

1927年2月我回到了莫斯科。我又在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大学的学生中间了。在中国期间，在他们动身到莫斯科之前，

我和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谈过话。现在我们是故友重逢了。我被任命为中国学教研室主任，该室在1928年改为隶属于劳动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在这个教研室工作的有一批已享有盛名的中国学家，比如伊万诺夫（伊文）和安德列耶夫，还有一些懂汉语的年轻人，如施图金、爱伦堡、维施尼雅科娃。后者是我的老朋友，1922年我在北京与她相识，1926年在广州又和她相遇。她在中国进修完了汉语，现在在中国学研究室，助我一臂之力。

我在大学工作，处在中国学生中间，随时都感到仿佛仍然置身在中国，而不是在沃尔杭克大街16号昔日的男子中学大楼，那时的中山大学的大楼里（现在这里是林业木材加工工业部）。

回到莫斯科，我首先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向同志们介绍我的感想和看法，革命过程中阶级力量的新配置，蒋介石投向反革命阵营的可能性。大家建议我把这些情况写成报告。此后，《真理报》（从1927年2月20日到4月3日）很快连载了我关于民族革命阵线内部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特写和文章。

看来，文章引起了一定的注意。我被请到曼努依尔斯基任主席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专门会议上去做报告。我和库西宁谈了几次话，我们还是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有一种情况使我困惑不解，即在莫斯科并不是总能准确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看来，从中国得到的情报有很多疏漏。

与此同时，中国事件正在朝着极为不利的方向发展。1927年3月间，武汉和南昌之间的冲突已经公开化。蒋介石日益明显地亮出了他的底牌。2月底，他开始和张作霖谈判。同时他派了手下的人到日本去谈判。在和英国人谈判汉口租界被占的

问题时，蒋介石指定了过去北京的某位部长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顾问。武汉拒绝承认这个任命。蒋介石继续和过去北京的部长们调情，企图把他们塞进国民政府。武汉已知道了这些情况。国民党左派要求蒋介石解释，并发表声明抗议他的做法。湖北和湖南省都举行了集会，作出了反对蒋介石的决议。2月底和3月初，蒋介石发表了一系列演说，这已经不仅是向武汉革命政府，而且是从整体上向革命发难了。他在这些演说中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并且声明不再向政府提供关于他收到的那笔军费开支情况的财政报告。政府要求蒋介石不提出报告，因为知道他把用作军费的不少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武汉政府仍然希望蒋介石不致走上断绝关系这一步，希望他能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那样还能与他达成某种协议。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和他的同党参加。蒋介石没有来，但派来了代表。在3月10日开幕的这次会议上，左派取得了胜利。会议决定把两个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员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和国民政府开除出去，由两个共产党员代替他们。

武汉报纸刊登了国民党左派的发言，以回答蒋介石在南昌的演讲。被蒋介石的讲话所激怒的人民群众呼着“打倒蒋介石！”“打倒革命的叛徒！”“打倒新军阀！”的口号走上街头。武汉、长沙和其他城市，在这些口号下举行了几十万人集会。但是蒋介石还必须赢得时间，他还没有做好事变的准备。他必须首先占领上海，和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串通好。这就是为什么他宣布服从紧急会议的决议，而他本人却率部向上海推进，从而迷惑了武汉方面。

3月26日攻陷上海，这并不是因为受到蒋介石军队的打击，而是由于上海工人的起义。蒋介石的军队两天后开进上海，立即

就和控制上海的工人冲突起来。蒋介石军队和武装的工人交锋了，致使起义者蒙受伤亡。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他一到就对记者发表了一系列有意安抚帝国主义列强的公开讲话。他力求博得帝国主义的信任，说他不是外国资本的敌人。同时他和最反动的上海资产阶级进行谈判，以镇压工人运动相许诺。但是，虽然蒋介石已与外国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谈判，他却仍然害怕和武汉方面公开决裂，以致没有任何退路。

1927年4月初，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5日发表了他和陈独秀共同签署的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书，呼吁必须保持两党的团结。同时，汪精卫又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从4月5日到8日，他们二人进行了一系列谈判，通过了武汉和南昌、国民党右派和左派之间进行“和平谈判”的如下条件：

“第一，汪精卫将承担起通知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之义务，以便他立即命令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地区的全体共产党员，暂时停止共产党的活动，等待在南京协商会议上解决问题。

第二，既然迁往湖北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仅仅由几个委员控制，那么它颁布的一切决议不能被承认为有效。假如这些决议经审查发现有害于未来的党和政府，则应在汪精卫倡议的南京协商会议召开以前就予以废除。

第三，现已公认，有人正在搞阴谋以分化军队和各省的国民党各党派组织。所以汪精卫建议召开的协商会议，其条件是：军队应完全彻底服从高级军官，党组织的活动也应暂时服从他们。

其中，所有工人纠察队以及全部武装组织应完全置于总司令部管辖之下，否则将被视为反政府的阴谋组织，并因此将被查禁。

武汉所颁布的一切决议和命令，应立即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会审查，审查以前均无效”。

与武汉方面的这些“妥协”条件刊登在1927年4月8日的上海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上^①。实际上这并不是妥协，而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最后通牒。

武汉方面没有接受这个最后通牒。于是4月12日蒋介石便解散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此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杭州、广州、汕头和所有国民党右派掌握的沿海省分都开始枪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镇压工会和枪杀工会领袖。蒋介石先是在上海，然后在沿海地区一直到广州，到处举行了反革命政变。

“纸老虎”的领袖陈廉伯回到广州，重又组织起反革命匪帮。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步其后尘，组成了自己的反革命军队。这里到处都开始从国民党和国家机关里“清洗”共产党员，并从肉体上消灭之。世界上的反动派都在狂呼乱舞。

1927年5月9日张伯伦在英国议会中发表演说，他告诉人们：“暴徒、共产主义鼓动家已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严厉惩罚，任何一个外国强国都做不到如此之严厉和坚决。”

4月15日^②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它实际“管理”的仅仅是他办公厅里的一张桌子，因为就连访问过南京的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们，在这里也不可能找到一点政府的标志。政府尚未及成立，蒋介石就已逮捕了几个政府委员，他们与其说是部长，还不如说是他司令部里的各种将领，因为他们想占据个别省份而未以俯首听命取悦于蒋介石。

当时在武汉组成了称为左派国民党的政府。最初设想国民

① 此处据俄文译出，经查该日报纸无此文。——译者

② 应为4月18日。——译者

党左派及其武汉政府，将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这个政府既然代表农民、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就应能够成为摧毁北方军阀、东部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以及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特别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武汉政府存在的客观历史意义，它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由于武汉方面一直遵循着广州时期的阶级和平立场，故郑重宣布了1926年10月形成的国民党早先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各种矛盾在广州就已经产生了。

武汉政府存在的整个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到5月中旬，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完秘密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而告结束；第二阶段——从5月中旬到7月中旬，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为止。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开展城乡阶级斗争。武汉的国民党希望利用工农运动的高涨反对南京和反动的北方，甚至连武汉的军阀当时都没有公开反对工农运动。但是，武汉的国民党始终坚持阶级和平观点。阶级斗争已发展到如此程度，具有了如此广泛的规模，以至于5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谴责了“先广泛而后深入”地开展革命的策略后，建议国民党离开阶级和平的轨道，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从而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武汉国民党没有走这条路。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武汉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这是国民党和工农运动冲突增长的时期，是逐步在越来越大范围内——首先是个别军阀，后来是唐生智本人、“左派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使用白色恐怖手段的时期。

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共产党员退

出政府的正式声明。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发表声明回答共产党，指控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阴谋，并宣布将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针对共产党员的“清党清国”^①运动开始了。开除了共产党员之后，武汉就参加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统一战线中去。反革命活动是在与南京相同的“打倒共产党！打倒工会和农会！”口号下进行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共产党人、工人和农民不仅一般地遭到杀害，而是被浇上煤油烧死或活埋。1925—1927年的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队伍内部对所犯错误和革命失败原因的估价存在着意见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势力猖獗不已。中国共产党、工会和农会蒙受了許多牺牲。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不能最终消灭革命，革命已经在人民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恐怖解决不了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土地问题、工人问题、国家统一和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她没有被扼死。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力量对反动派进行了武装反击。1927年8月1日，在共产党员叶挺和贺龙指挥下的革命军队占领了南昌。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发动了广州起义，宣告了广州公社的成立。两次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共产党员们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深入中国内地，在那里建立了苏区和真正的人民军队。反革命未能扑灭革命的火焰。人民斗争的烈火在中国许多省分熊熊燃烧，直到1949年底革命力量取得了胜利。

.....

(原书结束语从略。——译者)

^① 原文如此(Чистка партии и страны)。——译者

俄 汉 人 名 对 照 表

Абнольд	阿勃诺利德
Абрамсон М.М.	阿勃拉姆松
Акимов В.М.	阿基莫夫
Аллилуева Н.С.	阿利鲁耶娃
Андреев М.Г.	安德列耶夫
Арманд И.Ф.	阿尔曼德
Арнольд	阿尔诺利德
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	巴拉诺夫斯基
Бичурин Н.Я.	俾丘林
Блюхер В.К.	布留赫尔 (加伦)
Бордига А.	博尔迪加
Борисов С.С.	鲍里索夫
Бородин М.М.	鲍罗廷
Бородина Ф.С.	鲍罗廷娜
Брикке С.	勃里克
Бродский И.И.	勃罗茨基
Букатый В.И.	布卡蒂
Бухарин Н.И.	布哈林
Ван-Равестейн В.	冯·拉维斯坦
Ван Цзин-вэй	汪精卫
Варга Е.С.	瓦尔加
Вертинский А.Н.	维尔京斯基

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 В. Д.	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
Вильде С. Л.	维利杰
Вишнякова В. В.	维什尼亚科娃
Войтинский Г. Н.	维经斯基(威金斯基、吴廷康、伍廷康)
Волин М.	沃林
Волковойнов М. А.	沃尔科沃伊诺夫
Гай По-пин	魏邦平
Галин 见 Блюхер	加伦(见布留赫尔)
Гардинг У.	哈定
Гексман	盖克斯曼
Гемпель	根佩尔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Гивенс	吉文斯
Гортер Г.	霍尔泰
Го Тай-ци	郭泰祺
Готвальд К.	哥特瓦尔德
Граммш А.	格拉姆什
Гриневиц П. А.	格里尼奥维奇
Громов М. М.	格罗莫夫
Давидович С. А.	达维多维奇
Дай Цзи-тао	戴季陶
Данчинов Г.	丹奇诺夫
Джонсон Линдон	林顿·约翰逊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 Э.	捷尔仁斯基
Димитров Г. М.	季米特洛夫
Добисов М.	多比索夫
Дуань Ци-жуй	段祺瑞
Дубровский С. М.	杜勃罗夫斯基

Дунаевский В.А.	杜纳耶夫斯基
Дункан П.	邓肯
Дутов А.И.	杜托夫
Дын-дыб	登德布(音)
Дэн Пэй	邓培
Дэн Янь-да	邓演达
Екатов А.Н.	叶卡托夫
Е Тин	叶挺
Забиров Ш.	扎比罗夫
Зарикто (Старков)	扎里克托 (斯塔尔科夫)
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
Зинек И.Я.	齐涅克
Зильберт И.	齐利贝尔特
Зимин С.И.	齐明
Зиновьев Г.Е.	季诺维也夫
Зорге Р.	佐尔格
Иванов А.И. (Ивин)	伊万诺夫 (伊文)
Иолк Е.С.	约尔克
Ишидоржин	伊什多尔任
Калачев Н.	卡拉契夫
Калинин М.И.	加里宁
Камышев В.П.	卡梅舍夫
Катаяма Сен	片山潜
Кар	卡尔
Кауфман Л.	考夫曼
Кедроливанский(Е.Пик)	凯德罗利凡斯基 (皮克)

Керженцев В	凯尔任采夫
Климов А.	克利莫夫
Коларов В.	科拉罗夫
Коллонтай А. М.	柯伦泰
Колоколов В. С.	科洛科洛夫
Колчак А. В.	高尔察克
Кончиц Н. И.	康奇茨
Коняев Ф.	科尼亚耶夫
Крупская Н. К.	克鲁普斯卡娅
Ку	顾 (音)
Кузнецов В. П.	库茨涅佐夫
Кузнецова М.	库茨涅佐娃
Куйбышев В. В.	库贝舍夫
Куманин М. Ф.	库马宁
Кун Бела	贝拉·库恩
Кузов Г.	库诺夫
Куусинен О. В.	库西宁
Лаццари К.	拉查理
Лекай	列凯
Лемпсон	兰浦生
Ленин В. И.	列宁
Лелешинская А.	勒柏辛斯卡娅
Либкнехт К.	卡尔·李卜克内西
Ли Да	李达
Ли Да-чжао	李大钊
Линкольн А.	林肯
Линь Сэнь	林森
Линь Тун	林同 (音)
Литтль	利特尔

Ли Фу-линь	李福林
Ли Цзи-шэнь	李济深
Ли Юань-хун	黎元洪
Лозовский С. А.	洛佐夫斯基
Лю Жэнь-цзин	刘仁静
Люксембург Р.	罗莎·卢森堡
Лютomsкая Е. Н.	柳托姆斯卡娅
Лю Чжин-тянь 见 Лю Жэнь-цзин	刘仁静
Лян Хун-кай	梁鸿楷
Ляо Чжун-кай	廖仲恺
Маdьяр Л.	马季亚尔
Маккартней	马卡特涅伊
Маликов Ф. П.	马利科夫
Мамаев И.	马马耶夫
Мануильский Д.	曼努伊尔斯基
Мао Цзэ-Дун	毛泽东
Маринг (Снефлит)	马林(斯涅夫利特)
Марко Поло	马可波罗
Маркс К.	马克思
Мацейлик Ф. Г.	马采依利克
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В.	马雅可夫斯基
Меркулов	麦尔库洛夫
Мильграм И. В.	米利格拉姆
Минскер Я. Г.	明斯克爾
Миф П.	米夫
Михеев И. В.	米赫耶夫
Муссолини Б.	墨索里尼
Мюнценберг В.	明岑贝尔格

Найденев Н.И.	纳伊金诺夫
Наполеон	拿破仑
Нацов	纳佐夫
Нгуен Ай-квак 见 Хо Ши Мин	阮爱国 (见胡志明)
Орловская В.Н.	奥尔洛夫斯卡娅
Осипов В.В.	奥西波夫
Павлов-Сильванский Н.	巴甫洛夫—西利凡斯基
Пайкес А.К.	巴意开斯 (帕依克斯, 帕凯斯)
Паннекук А.	潘涅库克
Перлин Л.М.	佩尔林
Пик Е.С. (见Кедроливанский)	皮克 (见克德罗利凡斯基)
Плеханов Г.В.	普列汉诺夫
Покровский М.Н.	波克罗夫斯基
Полевой С.Н.	鲍立维
Поляков А.С.	波利亚科夫
Пу Ши-цзи (Пролетариев)	卜士奇 (化名普罗列塔里耶夫, 意即 无产者)
Радек К.Б.	拉狄克
Райгородский И.М.	拉伊戈罗茨基
Рафес М.	拉非斯
Рихтер З.	里赫特
Рогачев В.П.	罗加乔夫
Рой	罗易
Роланд-Гольст Г.	罗兰—霍尔斯特
Ростоу У.	罗斯托
Рывкин О.	雷夫金

Сапунов С.	萨普诺夫
Сафаров Г.И.	萨法罗夫
Сахьянова М.М.	萨赫杨诺娃
Семенов Г.	谢苗诺夫
Серебряков И. (Ким Ман Гем)	谢列勃里亚科夫 (金满根) (音)
Серрати Д.М.	塞拉蒂
Скачков К.А.	斯卡奇科夫
Скорпилев А.И.	斯科尔皮列夫
Слепак С.И.	斯列帕克
Сталин И.В.	斯大林
Старков (见Зарикто)	斯塔尔科夫 (见扎里克托)
Стойнович	斯托扬诺维奇
Су Чжао-чжэн	苏兆征
Сун Мэй-лин	宋美龄
Сун Цзы-вэнь	宋子文
Сун Цин-лин	宋庆龄
Сунь Фо	孙科
Сунь Чуань-фан	孙传芳
Сунь Ят-сен	孙中山
Сухэ-Батор	苏赫巴托
Сы И Ян Сы-и	仙逸 (见杨仙逸)
Сюй Цянь (Сюй Чэн Джордж)	徐谦 (乔治·徐谦)
Сюй ши-чан	徐世昌
Тагучи	田口
Танака	田中
Тан Шао-и	唐绍仪
Тан Шэн-чжи	唐生智
Тань Пин-шань	谭平山
Тань Янь-кай	谭延闿

Тарханов О.С.	塔尔汉诺夫
Тесляко Е.В.	捷斯连科
Те Хун	泰洪
Тодзевич Е.В.	托德泽维奇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А.И.	托马舍夫斯基
Торез М.	多列士
Троцкий Л.Д.	托洛茨基
Турати Ф.	屠拉梯
Ульбрихт В.	乌布利希
Унгерн Ш.	恩琴
У Пэй-фу	吴佩孚
У Тин-фан	伍廷芳
Фын Юй-сян	冯玉祥
Хан Маи Шин	韩满申 (音)
Хо Ши Мин (Нгуен Ай-кван)	胡志明 (阮爱国)
Ху Хань-минь	胡汉民
Хуан Бинь-хунь (Вонг)	黄壁魂
Хэ Лун	贺龙
Хэ Сян-нин	何香凝
Цзэн Да-бэй	詹大悲
Цзэн Ци	曾琦
Цитович Я.	齐托维奇
Цюй Цю-бо	瞿秋白
Чан Кай-ши	蒋介石
Черепанов А.И.	切列潘诺夫

Чжан Тай-лэй	张太雷
Чжан Цзин-цзян	张静江
Чжан Цзун-чан	张宗昌
Чжан Цюй-бо	张秋白
Чэнь Цзи-мэй	陈其美
Чэнь Гун-бо	陈公博
Чэнь Ду-сю	陈独秀
Чэнь Лянь-бо	陈廉伯
Чэнь Цзюнь-мин	陈炯明
Чэнь Шэн	陈森
Чэнь Евгений 见 Чэнь Ю-жэнь	叶夫盖尼·陈(见陈友仁)
Чэнь Ю-жэнь (Чэнь Евгений)	陈友仁
Шас М. Е.	莎斯
Шацкин Л. А.	莎茨金
Шейнгар	舍恩加尔
Шекспир В.	莎士比亚
Шервуд Э.	舍尔伍德
Шиллер Р.	许勒
Широков В. Н.	什罗科夫
Шмераль Б.	什麦拉利
Шмидт И. П.	史密特
Штейн В. М.	史特恩
Штукки А. А.	史图金
Шумяцкая Л. И.	舒米亚茨卡娅
Шумяцкий Б. З. (Андрей Черво- ный	舒米亚茨基(安得列·契尔沃纳)
Шумяцкий Д.	舒米亚茨基
Щукарь М. И.	休卡里

Элберс Д.
Энгельс Ф.
Эренбург Г.Б.
Эрколи М. (Тольяти П.)

埃贝斯
恩格斯
爱伦堡
埃尔科利(陶里亚蒂)

Юань Ши-кай

袁世凯

Юдин В.И.

尤金

Юрин И.Л.

(Гинтовт-Дзевалтовский)

优林(金托夫特—捷瓦尔托夫斯基)

Ян Сы И

杨仙逸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亚罗斯拉夫斯基

达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著作目录

Вопросы юнош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ИДВ, (1921),
4, С.640—646.

«远东青年运动问题», 载《新远东》杂志, 1921年第4期, 第640—646
页。

Съезд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олодеж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равда» 31 янв.
1922 г.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 载《真理报》, 1922年1月31日。

Молодежь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Корее. 1924, М.

«朝鲜革命运动中的青年», 1924年莫斯科出版。

Молодежь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Монголии. 1924, М.

«蒙古革命运动中的青年», 1924年莫斯科出版。

Молодежь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Китая. --М., «Новая
Москва». 1925, 144с., с илл.

«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 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1925年版, 共
144页, 有插图。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мальчики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апаша.--«Путь МОПРа»,
1925, 16, С.16—17.

«‘基督教’童和美国神甫», 载《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之路》杂志, 1925
年第16期, 第16—17页。

В рядах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Л., изд.«Моск. рабочий»,
1926, 144 С.

«在中国革命的行列里», 莫斯科—列宁格勒“莫斯科工人”出版社,
1926年版, 共144页。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Конфликт на КВЖД). -- «Молодой боль-

шевик», 1926, 3, с. 19--25.

«满洲的事件(中东路冲突)», 载《青年布尔什维克》杂志, 1926年第3期, 第19—25页。

Учан-Ханкоу. «Правда» 22 фев. 1927 г.

«武汉», 载《真理报», 1927年2月22日。

Кантон. «Правда» 3 марта 1927 г.

«广州», 载《真理报», 1927年3月3日。

Сун Ят-Сен. «Правда» 12 марта 1927 г.

«孙中山», 载《真理报», 1927年3月12日。

Кантон рабочий. «Правда» 3 апр. 1927 г.

«广州工人», 载《真理报», 1927年4月3日。

По деревням и городам китайским -- НМ, 1927. 9, с.193--209; 10, с. 205--218.

«漫步中国城乡», 载《新世界》杂志, 1927年第9期, 第193—209页; 第10期, 第205—218页。

Очерки революции в Китае. --М.—Л., «Моск. рабочий», 1928, 282 с., с илл.

(Очерки очевидца. Северный Поход. Гуанчжоу (Кантон). По деревням и городам. Ухань и е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 Хунань. Шанхай. Чая Кай-ши. Крах гоминдана.)

«中国革命随笔», 莫斯科—列宁格勒“莫斯科工人”出版社, 1928年版, 共282页, 有插图。

(当事人的随记。北伐。广州。城乡见闻。武汉及其无产阶级。湖南。上海。蒋介石。国民党的垮台)

Тезисы о тайп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кн. Тайпи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М., изд. КУТК, 1928, литогр.

«太平天国革命提纲», 载《太平天国论文集», 莫斯科, 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出版社, 1928年石印出版。

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 1975, М. 359 с., с илл.

«中国回忆录(1921—1927)», 1975年莫斯科出版, 共359页, 有插图。

Великий поворот. В кн. «Сунь Ят-сен. 1866—1966гг.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1966, М. стр. 255—285

《伟大的转变》，载《纪念孙文诞生一百周年（1866—1966）。论文、回忆、资料集》，莫斯科，1966年版，第255—285页。有插图。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未命名图书

作者 =

页数 = 3 3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